

(美) 羅伯特·康奎斯特 主編

劉靖兆 劉振前 等譯

# 最後的帝國

——民族問題與蘇聯的前途



-225

# 最后的帝国

——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美] 罗伯特·康奎斯特 主编  
刘靖北 刘振前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帝国

1

1

(沪)新登字第201号

责任编辑 王子奇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 主编

刘靖北 刘振前 等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80千字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本

---

ISBN7-5617-0989-7/D·050 定价: 9.10元

---

# THE LAST EMPIRE

---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Edited by

ROBERT CONQUEST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First printing, 1986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 中译本序

## 兼论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姜 琦

由刘靖北、刘振前等译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十几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集体编写而成的。该书以详尽的资料，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宗教、民族意识、人口等不同侧面，对苏联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视野比较开阔，开掘有一定深度，对苏联长年积下的民族矛盾的严重性，要比当事人看得透澈，书中写道：民族“裂痕继续加深，民族主义与许多更明显的问题相比也许是苏联的唯一的弱点。……随着好战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与社会不满的其他原因——经济短缺和管理不善，生活水平恶化，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信誉的完全丧失，特权阶层引人注目的消费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或者明显的无能和腐败——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动力；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体产生了，只需一个火花，它就会燃起熊熊烈火。”1991年苏联解体的事实，说明本书作者预见的准确性。至于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本能地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和某些颠倒是非的分析及用语，这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说自有鉴别能力。当我们为研究一个问题，在查阅参考材料时，不必首先拘泥于是谁写的，谁说的，而应该首先看他说的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然后经过自己一番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做学问的应有态度。更何况象这样一些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写的著作，为要保持一个学者的严肃态度，一般也不

会随便粗制滥造的。为此，我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人员，对刘靖北、刘振前等同志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深表谢意。

1991年，苏联领导人解散共产党、抛弃社会主义，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这是苏联长期来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民族矛盾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就联盟解体来说，民族因素的比重显然要大得多了。

## 列宁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卓识探索

苏联是一个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它不仅有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矛盾。还有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共和国内部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历史上就存在着。

在14世纪以前，沙皇俄国原本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至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以后的300年时间内，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凭借剑与火征服了周围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这100多个民族，大小不一，起源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七大板块：俄罗斯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中亚穆斯林、高加索民族、犹太人、波罗的海民族、若干西欧和东亚民族。有些板块内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沙皇俄国辽阔的版图上居住着100多个国家，共有100多种民族语言，分属印欧、高加索、阿尔泰、乌拉尔、古亚西亚、汉藏、闪含等七大语系，20多个语族。各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民族信奉东正教；中亚穆斯林几乎全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两个高加索民族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则信奉基督教；犹太人有自己的犹太教。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从宏观上看，这块地方正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汇集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前，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民族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亚各民族基本上处在封建社会阶段，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有的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由于这100多个民族聚集成一个庞大帝国，不是自然接近和融合的结果，而是凭借武力征服所致，因此，也就谈不上具有内在涵摄力、凝聚力，倒是潜伏着巨大的离心力。历代沙皇为了维系这样一个充满离心的庞大帝国，采用的是高压同化政策。政治上建立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派驻俄罗斯总督和官吏主持政事，凭借庞大的军队严加控制。经济上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不仅摊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且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阻挠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所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极力摧残少数民族的文化，禁止他们使用本国语言，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人为地强行俄罗斯化。在民族关系上，沙皇赋予俄罗斯人以种种特权，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对立，以便分而治之。综上所述，沙皇俄国就是列宁所说的“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规律，沙皇俄国是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的国家之一。

列宁在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上，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十月革命前，列宁原则上反对革命后建立联邦制国家，认为搞联邦制那是历史的倒退，他主张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他指出：“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sup>①</sup>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民族问题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29页。

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发生，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频繁，民族界限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确立。”<sup>①</sup>第一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它导向各民族集团间的分离和分立。第二个趋向导向各民族接近与联合，表明了“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sup>②</sup>二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广阔的地域内才能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他赞成建立那种打破民族隔阂，促进经济生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鉴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这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原来的各被压迫民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并相继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如果仍然坚持建立民主集中的共和国，则很容易造成多数民族的误解和不信任。二是国际帝国主义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武装干涉，如果不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的联邦国家，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列宁强调，为体现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联合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甚至提出，作为大民族应该吃点亏，实行不平等，用这种态度和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政府在过去带给异民族的不信任。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的权利。这是列宁处理民族问题在国家体制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这本书的一些作者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看作是沙皇俄国一样的帝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最深厚的基础是：①当时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在

---

①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第93页。



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起着核心作用；②有着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自愿联合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各族人民联合到一起来了；③外敌的威胁是联盟的粘合剂。

当然，如何巩固联盟，还有着一系列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列宁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例如，列宁把侧重点放在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特别是要求俄罗斯不仅需要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作出让步，遵守大民族的不平等，以此来抵偿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换取少数民族对联盟国家的支持；为了不仅使各民族在法律上享受平等，而且要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列宁提出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促进民族间真正的接近。这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卓见。但这种“让步”、“帮助”会不会给民族主义留下空隙，如何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抬头？列宁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又如，列宁提出，联邦制是把“俄国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统一的、民主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是向真正民主制过渡的步骤，”至于走向统一的政治经济条件是什么，联邦制在促进这种条件实现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列宁也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而过早地逝世了。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这篇重头文章，只好留待列宁的后继者来写。

##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 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成绩及埋下的祸根

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中，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是有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1)注意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扩大少数民族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斯大林曾把各种各样的民族自治形式统一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民族专区，以后又把一些自治共和国提升为加盟共和国。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了两院制（联盟院、民族院），使民族院成为更好地反映少数民族意愿的机构。

1936年宪法进一步增添了两院主席轮流主持联席会议的制度，规定了任何一院都具有否决权。(2)注意保障少数民族法律上的平等权利。1924、1936、1977年三个宪法文本都有各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的条款。勃列日涅夫在修改宪法涉及到各加盟共和国权益时，态度严肃谨慎，他否决了要求取消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限制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动议。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斯大林提出了民族地区的干部“主要由当地人组成。”(3)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少数的民族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是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而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又是民族间产生摩擦的根源。为此，国家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实行人、财、物多方面的支援和帮助。使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工业迅速发展，阿塞拜疆的石油开采是占全苏的20~80%，在中亚、高加索、西伯利亚建立了纺织工业基地，在远东、哈萨克斯坦、乌拉尔等地大力发展机器制造、冶金和采矿等企业；中央还采取了“特殊的方法”，使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地区，加快步伐，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斯大林提出民族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反对强制推行俄语，并帮助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书籍和报纸。总之，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使苏联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把他们处理的民族问题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实事求是的。但长期来，他们在执行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失误也是严重的，这就为后来民族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长期来，苏联领导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

首先，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的建立，使苏联的结构，由形式上的联邦制演化为实质上的单一制。

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产生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这种体制的形成，有恶劣的国际环境因素，有理论认识上的因素，也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对这种体制的历史地位、功绩和弊端，已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作了精辟分析，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后，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统统集中于中央政府，各加盟共和国很少有独立自主权，一切必须绝对服从中央，这样，民族自决当然也就难以兑现。这种国家结构形式上是联邦制国家，实质上已演化为单一制国家。另外，这种高度集权体制在经济运转方式上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连接各共和国经济的不是商品经济关系，而是指令性计划，这就缺乏多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内聚力；加上全苏实行专业性分工，这就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落后状况被固定了下来。文件上倡导的“使落后地区的发展赶在前面”的良好愿望当然也就很难实现。由于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又往往“劫富济贫”，搞一平二调，这又难免引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族怨言，难怪俄罗斯人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充当奶牛”。所以，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反映在民族问题上，是为民族动荡和分离主义埋下了种子。

其次，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及其政策上的失误。

大凡在多数民族国家内，都有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存在。正确地解决好这两种倾向，不让其自由泛滥，是多民族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沙皇俄国一直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导的统一集中制国家，俄罗斯主义的泛滥处于主导方面。民族主义既表现为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又是潜在的分离因素的一种表露。列宁为了建立联盟和巩固联盟，把反倾向的重点放在大俄罗斯主义一方，甚至提出了为了实行民族平等，俄罗斯民族做出让步，甘愿吃亏，实行不平等。这是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斯大林虽然在组建联邦时提出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联盟的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但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他还是遵守列宁

的教导，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的危险，重点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但自从十七大(1934)以后，斯大林在反倾向重点问题上发生了态度转变，开始提出两种倾向都可能成为主要危险，继而发展为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过分地宣传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和奉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言行，无疑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滋长，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压抑感。由于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造成政策上的明显失误。在肃反运动中清洗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大多是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表示不满的人，其中包括当年反对斯大林“自治化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穆吉万吉等。卫国战争中因有以下几种情况，而遭到整个民族迁移：①由于少数民族中出现民族败类，而遭到整个民族的放逐；②对新占领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批迁移；③对某些与邻国同族的民族，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迁移。用刺刀逼迫他们离开故土，这种所谓“政治移民”，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人为地造成了更深的民族隔阂。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已成为列宁所说的“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斯大林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非俄罗斯民族曾经得到较温和的待遇，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从没有放松过。总体上，他们都是沿着斯大林的路子往前走的。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正是孽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宣传机器对俄罗斯民族的美德大加褒扬而有丝毫改变。事物就是这样无情地发展着。

再次，理论上的错误。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在民族理论上犯了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错误。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因而也“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1961

年，赫鲁晓夫不仅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还上升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认为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它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组织——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矛盾”。提倡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前任的看法，1987年，他认为，“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些言行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是有着密切关系，剥削阶级的消灭当然会大大减少民族间的对抗，但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并不是同步的，剥削阶级的消灭不等于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问题比起阶级问题来，面要广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列宁早就看到这一点，他说，民族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sup>①</sup>他还说，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这种错误的理论在实践上所引起的负效应是：①粉饰太平，掩盖矛盾，使苏联领导人在激烈的民族面前更加视而不见，麻木不仁；②忽视民族特点，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的进程，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逆反心理，增强了离心倾向。

## 戈尔巴乔夫点了一把火，终使联盟瓦解

苏联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一旦爆发，其势必猛，这就叫“蓄之既久，其发必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70年来，历届宪法都写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26页。

有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和自由的条文，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和国敢实践过，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却弄得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解体无疑是苏联内外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而就联盟解体中的民族因素来说，我认为，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搞垮了共产党，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状况又是急转直下，加上趋向缓和的国际大气候，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恶性膨胀，联盟也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在过去的70年，因为有共产党领导作为纽带，作为核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有一个持有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利剑的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在那样的条件下，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当然不想提也不敢提退出联盟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这对长期缺乏民主体制的苏联人民来说确实兴奋了一阵子，苏联人讲，这好象“在莫斯科上空注入了新鲜空气。”但“民主化”和“公开性”必须与法制的建设相配套，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人们的文化素质、人们的习惯相适应，也就是说，“民主化”和“公开性”必须有适当的度。而戈尔巴乔夫那种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民主化”、“公开性”，其结果，开始是舆论失控，出现无政府状态，继而夹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进行所谓“历史反思”的旗帜之下，对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行了“不留空白”的清算。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直至公开地批判列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苏联建立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诱惑了世界上1/3的人口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试验。”在人民群众思想混乱、不辨真相的情况下，这种夸大其辞带有感情色彩的歪曲评价，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又导致组织上的混乱，各种势力纷纷结帮成派。可以这样说，无边无际无度的“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扶植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当有人主张实行多党制、要求夺

权时，戈尔巴乔夫则步步退让，自己也认为苏共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已构成推行改革的障碍机制。终于在1990年2月中央全会上通过实行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实行了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犹如打开了闸门，使苏联这样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当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而一时又没有什么可导致政治上忠诚的时候，民族主义思潮在民族分离分子鼓动下迅速地填补了人们意识上的空白。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以物质利益为转移。长期来，苏联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使苏联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转了向的改革，更使苏联经济每况愈下。经济恶化和生活贫困，使人们越来越失去了忍耐。一般的规律是，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民族矛盾还比较容易解决；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族矛盾就很难解决。各族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很快地通过民族主义这种极易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民族矛盾更趋激化。既失去了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又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加上刹不住的经济滑坡，这就使本来就有民族压抑心理的民族沙文主义沉滓，象山洪一样爆发出来，15个加盟共和国就象脱缰的马，怎么也难以驾驭，联盟解体的结局，终于成为不可避免。

苏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这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前途。作为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如实地把握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切不可动辄把民族问题简单的归结为政治问题、阶级问题。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所开掘的面，对我们是有启示的。而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中像列宁那样探索前进，寻求最佳的科学决策。这方面，又是本书作者所望尘莫及的。当然，最本质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

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千方百计地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搞上去，因为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根本问题。如果经济上长期落后于原属同一起跑线的资本主义国家，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可言？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往往带有毁灭性的威胁。



## 译者说明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学术著作。编撰工作由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国和东欧研究室主任康奎斯特主持，由当代欧美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集体完成。本书在1986年出版后，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当代欧美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本书内容广泛，涵盖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全书从内容上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概述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了民族问题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以及苏联民族政策在政治上的得失。第三部分从经济、文化、语言、宗教、民族意识、人口等不同侧面对苏联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民族问题在这些方面对苏联未来的影响。第四部分分述了苏联各地区的民族问题，着重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苏联穆斯林地区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它们在决定苏联前途中的作用作了分析。第五部分分析了苏联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对东欧和世界的影响，并提出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民族问题应采取的对策。事实上，书中的每一部分，甚至每篇文章在内容上都不免有所交叉，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全书贯穿着一个总的观点，这就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对苏联国家制度

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巨大威胁，是决定苏联未来的一种关键性因素。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作者是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因此书中必然带有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例如，许多作者认为列宁缔造的苏联和沙皇俄国一样仍是一个帝国；有的作者认为列宁的民族理论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也有作者把领导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等等。所有这些，我们相信读者自有批判鉴别的能力。

本书的翻译工作始自1990年下半年。翻译结束后，苏联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苏联解体，在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基础上出现了十五个独立的国家。为此，我们重阅此书，深感此书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因素中，民族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原苏联的民族问题至今仍然是困扰着独联体及其各成员国的重大问题。因此，出版此书，对于我们研究苏联的解体及其经验教训，对于研究独联体各成员国的民族问题及民族状况，发展我国的民族事业，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意见，我们对此书重新进行了整理，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及附录、注释，取其精华部分，编译而成。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宗华、刘红、刘振前、刘登晓、刘靖北、李政、李训茂、李振连、张祥云、张维克、林建华、周德武、倪业群、郭庆棠、高和顺。刘靖北、刘振前对全书作了校正、统修。程玉海教授参加了部分统修工作。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姜琦先生在百忙中审阅了全书，并为此作译序。出版社的领导及王子奇同志对本书的翻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在此，我

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翻译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尝试，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本书涉及面极广，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2年1月

## 编者前言

人们普遍认为，在以某种方式决定苏联未来的诸种力量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民族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本书旨在提供更多有关的资料，并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本书撰稿人中许多是现代欧美苏联学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名字本身足以证明这个集子对切实的研究和政策的制定将有极为重要的贡献。

民族问题纷繁复杂，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在本书中对所有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并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确实都涉及到了。在某些问题上，各个作者的意见亦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并没有对这个仍存在许许多多未知数的领域加以不合逻辑的系统化，而是试图通过新的探索、通过对过去的论断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从不同的侧面对整个问题进行阐述。有些文章的观点是全新的；有些文章涉及边缘学科的研究；有些文章是预测性的；另一些文章则发掘了一些新材料。所有这些都将对读者有所启迪或为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本书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显然是从重点论文中产生的主要主题，涉及到问题的各方面，或涵盖了许多主要地方性问题。本书起初是要作为一本专集出版。目录出来之后，在美国新闻署的资助下，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

平研究所于1983年4月13日至16日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由我本人主持，多数撰稿人参加了会议。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提交会议的论文，并得到学术界及政府部门专家的审评。然而，本书从开始起就被看作是一本专著，而非普通意义上的会议论文集。

总之，书中文章本身会证明其价值，这里无须赘述。也就是说，尽管在一般民族问题上，在少数民族意志问题上，我们对莫斯科不断遇到的重重困难是熟悉的，然而，书中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观点，并列举了大量全新的资料。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问题一向为人们所忽视，本书有几篇文章对此作了探讨。

人们似乎常常设想，既然苏联少数民族正当的权利都被否定了，那么，从消极意义上讲，俄罗斯的民族感情本身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早就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他本人是怀有浓厚民族感情的典型，但他呼吁给边疆民族以分离的自由；虽然他自称是“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在另外一些场合还包括白俄罗斯民族）的代言人，但他仍认为东斯拉夫民族获得自由、建立独立国家意志的实现高于他们最终的自由联盟。

应当承认，俄罗斯爱国主义（尽管它像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一样也被扭曲了）永远是一种力量。但谈到西方的政策，我们当然应该支持隶属于苏联各民族的自由。然而，我们永远不应该忽视真正俄罗斯民族感情的要求。长期以来，这种感情要么被现政权利用，要么受到现政权的压制。

在这个领域里，对有些方面我们的知识并不完善，因而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有些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本书中我并没有排除一些非常有争议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可以丰富我们的见识或使我们注意到一些被忽视的方面。比如，除当作猜想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接受阿古尔斯基博士关于苏联特殊政策研究的

细节，但显然那种性质的事情正在党的高层圈子里发生。“乡土”作家大量而且常常公开责难现代化、甚至集体化（他们把它描写为对民族精神源泉，即农村文化的摧残）的作品的出版发行，甚至因此获得很高奖赏，这一事实只能用受到党的高层人士保护来解释；而克拉斯诺夫所描写的画家格拉祖诺夫受到广大群众的保护也确是事实。但同样清楚的是，也有大批有影响的人物和报刊杂志反对他们。自1983年以来，他们已失去了阵地。这并不是说党内保护他们的人也和他們持同样的观点。确实，可以说这些党内人士对自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并无明确、清晰的概念。但是，这确实表明了一种倾向或趋势（即使它是失败的），如果忽视了它，那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

本书所包涵的内容就这么多。限于篇幅，本书内容总的说来局限于苏联内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而没有论述受苏联控制地区的问题。然而，如果一点也不涉及不受苏联直接统治（像国内一样）但受其影响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情形的话，那是荒谬的。幸运的是，我们收到了一位东欧最杰出的公民米洛凡·吉拉斯关于这一地区的综述性文章。

不幸的是，两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夏皮罗和休·塞顿——沃森在完成稿件之后即与世长辞了。值此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罗伯特·康奎斯特**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俄国东欧  
研究室主任、高级研究员）

# 目 录

中译本序 兼论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姜琦
译者说明·····	( 1 )
编者前言·····	( 1 )

## 第一部分 概 述

### 第一章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透视

( 休·塞顿-沃森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 )

民族与国家·····	( 3 )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 4 )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7 )
俄罗斯化政策的出现·····	(10)
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	(14)
苏联68年来的民族问题·····	(16)

### 第二章 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历史综观

( 亚历山大·本尼格森 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

俄罗斯的压迫·····	(22)
少数民族的反应·····	(27)
当代民族主义的遗产·····	(33)
结论·····	(39)

### 第三章 当代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综述

(特雷莎·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 渥太华卡灵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引论	(41)
以往政策的影响	(44)
当代状况	(49)
民族精英分子的作用	(60)
政策联系	(62)
结论	(66)

## 第二部分 民族主义与苏联政治与意识形态

### 第四章 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阿兰·贝桑松 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列宁的民族理论与苏联的民族政策	(71)
大俄罗斯主义	(73)
非俄罗斯民族	(75)
结论	(79)

### 第五章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景

(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员)

什么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81)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	(82)
遭争议的“苏联控制下的和平”	(90)
俄罗斯反对派	(92)
权力之争	(94)
俄罗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	(100)
结论	(102)



## **第六章 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联政治：官方与非官方见解**

(弗雷德里克C·巴洪 耶鲁大学名誉教授)

引论 .....	(104)
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 .....	(109)
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 .....	(115)
持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	(127)
结束语 .....	(142)

## **第三部分 民族问题与苏联经济、 文化及人口**

### **第七章 苏联民族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

(格特鲁德E·施罗德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苏联的民族政策 .....	(155)
地理位置和城市化 .....	(158)
语言和教育 .....	(160)
经济发展 .....	(164)
就业及其就业结构变化 .....	(167)
生活水平 .....	(166)
地区间的收入转移 .....	(174)
结论 .....	(175)

### **第八章 语言、文化、宗教与民族意识**

(约翰B·邓洛普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副所长)

语言问题 .....	(180)
文化领域 .....	(187)

宗教 .....	(194)
结论 .....	(201)

## 第九章 俄罗斯民族感情：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

(弗拉季斯拉夫·克拉斯诺夫 蒙特雷国际研究所副教授)

最有争议的三幅画 .....	(205)
二本评论集 .....	(208)
为什么一些人不喜欢格拉祖诺夫?.....	(210)
为什么这么多人热爱格拉祖诺夫?.....	(213)
格拉祖诺夫的艺术鼓舞激发了反犹太主义吗?.....	(218)
“苏维埃爱国主义”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吗?.....	(221)
结论 .....	(223)

## 第十章 从世界观点看苏联各民族的人口统计

(米哈伊尔S·伯恩斯坦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南方和北方 .....	(226)
资料和方法 .....	(227)
人口结构 .....	(230)
增长差异 .....	(237)
人口转变的差异 .....	(238)
平均寿命的不同与死亡率的不同 .....	(240)
导致死亡率差异的因素 .....	(242)
人口出生率的差别 .....	(244)
导致人口出生率差异的人口变量 .....	(246)
经济变革与出生率下降 .....	(256)
当代的趋势与未来的估计 .....	(260)
讨论 .....	(264)

## 第四部分 苏联各地区的民族问题

### 第十一章 乌克兰和俄罗斯

(罗曼·斯鲍拉克 密执安安阿伯大学历史学教授)

- 俄罗斯必须与“乌克兰联合” .....(275)  
乌克兰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278)  
乌克兰的历史意识 .....(285)  
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演变 .....(290)

### 第十二章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

(亚历山大·斯特罗马斯 索尔福德大学政治学和现代史的审稿人)

- 抵抗与支持(1940—1941和1944—1952) .....(302)  
屈从与抗议(1952—1982) .....(317)

### 第十三章 苏联的穆斯林边疆地区

(S·恩德斯·温布什 牛津大学中亚研究学会会长)

- 引论 .....(330)  
人口的压力 .....(333)  
帝国的边疆 .....(339)  
中国因素 .....(341)  
结论 .....(343)

### 第十四章 苏维埃帝国民族主义中的反犹太因素

(伦纳德·夏皮罗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

- 反犹太主义与民族主义 .....(346)  
苏联现代反犹太主义与反犹太运动 .....(348)  
当代苏联反犹太主义概况 .....(351)

## 第五部分 苏联民族主义对东欧 和世界的影晌

### 第十五章 苏维埃帝国内的东欧

(米洛凡·吉拉斯 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书记)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	(360)
苏联与东欧经济关系 .....	(367)
结论 .....	(370)

### 第十六章 苏联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晌

(唐纳德W·特雷德戈尔德 西雅图大学历史学教授)

引论 .....	(372)
苏联民族问题现状 .....	(376)
苏联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影晌 .....	(380)
西方对苏联民族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	(383)
英汉译名对照 .....	(389)

# 第一部分

## 概 述



# 第一章

##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透视

若把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首先必须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两个概念。“民族主义”一词常常被人误用，用以描述政府自私的侵略行为。我认为：民族主义应被限定在下述两种定义之内：一种是指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政治组织学说；另一种是旨在发展民族利益的运动（通常是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

### 民族与国家\*

民族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有着不解之缘。然而，尽管两者在传播媒介及国际政治辞令中经常混淆，国家与民族仍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国家是基于官僚统治集团之上的法律组织，民族则是相信他们自己具有同种文化遗产的共同体。这种文化遗产包括共同的语言、文学、宗教、及民间传说以及复杂的相互经济利益，共同的历史与神话等等。一个民族可以包括上述几种，甚或所有情况。而国家则可以由能够和睦相处的无数语言群体、宗教团体组成。但是，一旦一个共同团体中的少数派坚信自己是一个民族；

---

\*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后同。

要求得到政治上的承认，亦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至少是被动地承认其领导作用，民族就随之产生。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扩散，在近200年里，它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和地中海沿岸穆斯林地区，时有发生，近来又席卷非洲整个次撒哈拉地区。

这种过程各有其特点，而且组合成分亦不相同，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宗教、语言、社会结构和经济利益。历史记载表明：取决于成长中民族与其所处国家之间关系的民族的产生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没有自觉努力的条件下，民族和国家同步产生。其明显的例证是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第二种类型是，独立的国家首先产生，之后才有意识地将其居民塑造成一个民族。这一方面，早期的例证是17世纪的荷兰，最近的则是美洲和非洲新形成的国家。第三种情况是，一个民族产生于由另一民族成员统治的国家中。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优秀分子致力于在整个社会传播民族意识，新的民族最终从多民族的国家中分化出来，建立起自己独立主权的国家。例如，1815年后的巴尔干诸国、中欧及穆斯林地区的一些国家。

##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历史非常复杂，因为我们不能肯定俄罗斯民族指的是哪一部分人。早期的俄罗斯民族，毋庸置疑，指的是第聂伯河流域讲斯拉夫语的那部分人。10世纪时，他们建立基辅公国，后来向北、东扩张，征服了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异邦人，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接受斯拉夫语言。13世纪，基辅公国被蒙古人占领，其大部分地区变成鞑靼可汗的属地。然而，包括基辅在内的西南部成为立陶宛的一部分，后又被纳入波兰人的统治之



下。自此，历史上的争论产生了。

根据传统俄罗斯的理论，俄罗斯中、北部各附属国在莫斯科公国的领导下，后来逐渐获得了自身解放，摆脱了鞑靼人的桎梏，团结成强大的莫斯科政权。莫斯科公国是继基辅公国而发展起来的，后来摆脱了波兰人的统治，解放了俄罗斯西南地区。根据传统的俄罗斯观点，西部和西南部的人民被称为白俄罗斯或小俄罗斯。他们仅仅是现在以莫斯科公国为大本营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17、18世纪，他们与莫斯科的统一是解放与再联合的过程。俄罗斯语言和小俄罗斯语言是俄语的两种方言。

然而，现代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并得到一些波兰史学家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莫斯科公国是由外邦人建立的，它只继承了早期拜占庭—斯拉夫文化的残余，其中掺杂了大量鞑靼或亚细亚专制传统。莫斯科公国是基辅公国承继者，仅仅因为其居民掌握了斯拉夫语言，而且随时间推移，发展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基辅的语言的语言，人种也不是纯粹的斯拉夫血统，而是与芬兰—乌戈尔人及鞑靼人的混血后裔。按照乌克兰的观点，置第聂伯河东岸（即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乌克兰”意为“边疆”）于莫斯科公国沙皇保护之下的勃拉茨拉夫协定（1654）既非单方的解放，也不是吞并，而是两国之间缔结的条约。后来，沙皇撕毁条约，推行集权政策。同样，沙皇18世纪对波兰占领的第聂伯河西岸（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吞并既不是解放，亦非统一，而是莫斯科公国的帝国扩张。

可以肯定的是，19、20世纪期间，西南地区及加里西亚（1772年前为波兰的一部分，后为奥匈帝国所吞并，并于1918年重新被波兰收复）东部地区的人认为：当时在那些地区确实存在一个不同于莫斯科公国的有自己完善的语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民族。这种民族意识起初只存在于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之中，后来扩展到较低层的人士中。西南地区的精英分子接受了

“乌克兰”这一描述性名称，亦使之具有爱国情感。他们认为并声称他们是乌克兰民族。他们的这一要求随着乌克兰书面语言的发展和一种崭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学的崛起（至少出现过一位天才诗人，舍甫琴柯，1814—1846）得到加强。1905年，圣彼得堡科学院承认乌克兰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方言，而且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这给乌克兰民族以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从理论上讲，布尔什维克革命会给乌克兰民族主义带来更大欣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列宁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之一。由此产生了一种官方对以前几百年历史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既不同于传统的莫斯科公国的观点，亦不同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根据苏联的观点，乌克兰是一个与大俄罗斯不同的民族，但根据1654年的条约，他们自愿加入俄国；尽管沙皇后来对乌克兰土地的占领属于帝国扩张的行为，但产生的效果却是积极的，它使更多的乌克兰人加入到了一个共同的国家中。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俄罗斯帝国主义寿终正寝。根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苏联占领加里西亚东部地区以及1945年爱德华·贝奈斯割让罗塞尼亚（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不表明扩张在继续，而是乌克兰民族解放与统一的终结。

上述三种观点（传统的俄罗斯观点，乌克兰民族主义观点，苏维埃官方的观点）都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尽管三者均可找到历史根据。已形成的两个民族可称为俄罗斯民族。如果认为还有第三个民族存在，即居住在俄波边境北部地区在历史上曾和立陶宛人及波兰人相融合的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的话，那是可以争论的。然而，在近代史上，白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发展远不及乌克兰民族。

上述足以证明：若要回答俄罗斯民族到底指哪一部分人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并非易事。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今日之俄罗斯从某种程度上讲等同于由小莫斯科公国发展而成的幅

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俄语等同于大俄罗斯语言。至此，我们一定会问：俄罗斯人何时起成为一个民族呢？俄罗斯民族主义过去和现在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毋庸置疑，莫斯科公国的形成、集权及扩张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人们或许会提出：两种过程是同时发展的。但是，假如我们把俄罗斯的情形和英法作一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国家比民族发展得快，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17世纪初叶，波兰和瑞典的威胁促进了两者的发展，但至于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讲那时已存在俄罗斯民族，则不得而知了。俄罗斯人民忠诚于教会和君主，他们是东正教徒，“沙皇的奴隶”，对俄罗斯土地和神圣俄罗斯有着笃定的献身精神。这对上层社会，包括特权贵族和军人贵族亦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由拜占庭和鞑靼的概念衍化而来的专制统治原则。尽管一些上层人物由于争夺皇位的斗争而产生了分裂，而且在18世纪的继续冲突中，贵族阶层本可以从立宪政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仍然顽固地支持毫无限制的专制统治。相反，具有不同政见的个别人反而受到了压制。社会的下层仍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基督徒，沙皇的奴隶。彼得大帝以后的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纵向联系仍然和莫斯科公国时代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一种以民族感情为基础的横向联系。

事实上，这种感情的发展受到了由彼得一世制定并由凯瑟琳二世继续执行的俄罗斯上层社会欧洲化政策的遏制。俄罗斯贵族受到刺激，接受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并讲法语，从而拉长了他们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包括农奴和自耕农）之间的距离。同时，欧洲化政策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一些受过教育的俄罗

斯人在熟悉了欧洲语言文学之后，转而对本民族的语言发生了兴趣；同时，对欧洲文学的了解使他们接受了启蒙时期欧洲盛行的一些思想观点。18世纪末，俄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语言改革家，著名作家，历史学家N·M·卡拉姆辛。提尔西特和约（1807）前后，拿破仑的气焰日渐嚣张，甚至那些对法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企图改革俄国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必须保卫俄罗斯，以保持其本色。有些人甚至把严酷的现实理想化了。

1812年—1815年的战争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形成中的里程碑。贵族阶层视拿破仑的军队为由野心家控制的近代欧洲大国的武器，而自耕农和乡村牧士则视之为由反耶稣本人领导的群魔。然而，共同的危险缩短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距离。这是整个世纪，甚至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战争后，农民军人又回到了乡村，沦为农奴，但是战争带来了民族团结。战后的许多岁月里，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从卡拉姆辛至天才诗人普希金，达到异常繁荣的阶段，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文学的繁荣使俄罗斯民族感到自豪。把俄国历史上这几十年同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相比拟，这并非虚妄。两者都是在大敌当前、语言振兴与丰富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纷呈的情况下发展的。自这一阶段起，对沙皇及东正教的忠诚同对俄罗斯民族的忠诚联系到了一起。这一点在贵族、中层官僚及高层人中较在广大平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使他们也都受到了影响。

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崛起从三位具有完全不同政见的著名人士身上可以略见一斑。

十二月党人巴威尔·比斯杰尔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方法上讲，都是雅各宾派的，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革命家。他计划不仅要解放农奴，而且要给他们土地，使他们成为俄罗斯民族平等的成员。对比斯杰尔而言，俄罗斯民族指的是所有讲俄语的人。他是第一个坚持俄罗斯民族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的政治思想家。他认

为，其他民族必须彻底地归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在其理论著作《俄罗斯真理》中波兰人是唯一可以给予独立民族地位的非俄罗斯民族。他给未来的波兰国家提出了三条重要的限制条件：①波俄边境问题要取决于俄国；②两国必须结成军事联盟；③波兰人的政治制度必须以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原则为基础。

斯拉夫派作家，尤里·萨马林是个土地所有者，年轻时曾在民政部门任职，后来在1861年的农奴解放运动中及在镇压1863年的起义之后的波兰土地改革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和比斯杰尔一样，在他的思想中，社会改革和俄罗斯爱国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包括俄罗斯民族对帝国内非俄罗斯民族的统治。在波罗的海诸省任职期间，萨马林看到日耳曼民族的土地所有阶层仍然坚信，日耳曼文化优于俄罗斯文化，看到日耳曼民族虽然处于沙皇的统治下，其法律、行政、教育制度等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有别于俄罗斯民族，为此，他感到愤怒。在萨马林的思想中，要求官方将统一的行政结构强加给其他民族的自然欲望和对以俄语和东正教义为基础的俄罗斯文化的狂妄自大结合到了一起。他认为，俄国有义务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从日耳曼经济文化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代之以优越的俄罗斯文化，而非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S.S.乌瓦洛夫伯爵曾于1833—1849年间在尼古拉一世政府中任教育部长。他才华横溢，文化修养高，是个坚定的保守派。然而，他同情那些坚持俄罗斯文化优越论及俄罗斯绝对统治其他民族观点的人。1832年，在呈交给沙皇的报告中，乌瓦洛夫提出：应当把“真正的，具有拯救意义的俄罗斯专制制度、东正教教义及民族思想的原则”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这一具有三重意义的公式成为俄罗斯保守派的口号，规定了以后75年间政府合法性的本质。

然而，这一公式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乌瓦洛夫在合法性两

条传统的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第三条，把俄罗斯民族置于和沙皇、教育同等的地位上，应受到俄国全体公民的忠诚。第三条原则有潜在的民主含义，正因为如此，受到尼古拉一世的反对。皇帝本人满足于臣民服服贴贴地完成统治集团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对他而言，他们的母语是否是俄语无关紧要。尼古拉厌恶甚至镇压波兰人，这并非因为想把他们变成俄罗斯人，而是因为他们反抗他。他断然拒绝干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及芬兰、瑞典人的社会体制，也不干预亚美尼亚教会，因为那些民族已表明他们是他忠诚的奴仆。尼古拉曾亲口谴责萨马林在波罗的海诸省的反日耳曼行径。其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对波罗的海的日耳曼人持有同样态度，萨马林始终没有说服他改变立场。直到亚历山大三世继位（1881—1894），俄罗斯民族主义才得到皇帝的支持，并成为官方政策的一部分。

## 俄罗斯化政策的出现

几种不同的趋势共同促成了俄罗斯化政策的产生：①军事领导人对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及高加索地区忧虑重重；②东正教会统治集团对扩大自己的地盘，保卫自身，防止其他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在中部伏尔加地区的传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③官僚阶层对统一帝国行政、法律及教育抱有狂热激情，他们特别痛恨波罗的海诸省及芬兰现存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先进的欧洲制度；④坚持俄罗斯文化至上，坚持俄国政府有权利和义务将俄罗斯文化强加给帝国所有臣民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有所抬头。这虽不太明显，却在日益加强。

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帝国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发展成一种学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应被看作是与查尔

斯·莫洛斯民族一体论及在英美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应的理论。俄罗斯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野心比英美在非洲的野心毫不逊色，并获得类似的感情上的支持。尽管俄国知识阶层很少有著名人士支持这种观点（丹尼列夫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应看作是例外），尽管后来发生的事件在知识分子中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到来和反对帝国主义态度的产生，我们不应忽视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的强大吸引力。它吸引了大批有智慧、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员，对社会下层具有潜在的煽动性。

“俄罗斯化”一词具有贬义，常被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及具有自由思想或社会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人用来反对官方的政策。然而，政府并没有有意识地采纳这样一种统一的政策。狂妄自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日益发展的趋势确实存在，但其在实际中的影响作用因地而异。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强迫非俄罗斯人同化为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主要存在于乌克兰地区和波兰。圣·彼得堡官方断然否认乌克兰民族具有独立的民族特点。1863年波兰发生第2次叛乱，许多俄罗斯人断言，由于波兰是个不可救药的反叛成性的民族，如不根除其文化，俄国将永无宁静之日。

在波罗的海诸省，俄罗斯化的目的是要把俄国的管理体制应用到那个地区，把俄语变成官方的语言，但并没有真心要强迫日耳曼人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包括给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俄语，放弃路德教改信东正教也非出自真心。然而，这些就足以激怒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了。如果政策对头的话，本来可以和这两个民族结成友好的关系。然而，这种努力并不能遏制他们反对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的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

在芬兰，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文化上的，倒不如说是宪法权力上的纷争。俄罗斯统治者决心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把俄罗斯帝国的立法强加给芬兰，而把芬兰议会变成地方议会，只能负

责纯粹的地方性事务。根据这一政策，芬兰的学校必须教授俄语，官方语言中除了芬兰语和瑞典语之外，还应包括俄语，俄罗斯公民在芬兰应与芬兰人、瑞典人享有平等的地位。不过，如果说政府计划把芬兰人变成俄罗斯人，未免夸大其词。但是，芬兰的宪法之争，如同在波罗的海推行的政策一样，引起芬兰人极大的敌视。新的民族主义的结果使本来乐意效忠沙皇的四个民族变成仇敌。

在亚美尼亚，对东正教会统治集团的敌对情绪和官方要求统一性的狂热导致了对亚美尼亚教会的压制，其民主结构，包括学校和税收制度必然引起具有圣彼得堡观点的人的反对。这引起帝国内部本来支持俄罗斯的其他民族的极端愤怒和广泛的消极抵抗。在伏尔加河流域，教会统治集团逼迫鞑靼人放弃伊斯兰教，改信东正教的企图一无所得，而在争取伏尔加—乌拉尔较小的异邦部落改变信仰的问题上，鞑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鞑靼伊斯兰教传教士稳住了阵脚，而东正教传教士自从采纳了主教N.I. 伊尔明斯基（1882—1891，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密友）的政策之后取得了某些胜利。伊尔明斯基主张用世俗语言作演说、发行宣传品的方式宣传基督教义。他坚信：那些弱小民族的人民一旦皈依东正教，总有一天会被吸收到俄罗斯文化中来。因此，他可以被称作是具有远见的主张俄罗斯化的人。但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官方作斗争，反对他们用粗暴的方式逼迫伏尔加地区各民族归顺俄罗斯民族。按照他的观点，这样做只会驱使那些民族投入穆斯林阵营。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讲，鞑靼人抵抗住了使他们改变信仰或俄罗斯化的任何企图，同时也受到了俄罗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鞑靼人是穆斯林世界最先倡导现代化的民族，发展了一种一半基于伊斯兰教，一半基于突厥语民族统一观念的世俗民族主义。鞑靼——突厥民族主义受到沙俄政府的压制，但压制的结果相反使它更强大起来。



在19世纪60、70年代被俄罗斯征服的中亚地区，可以说俄罗斯化政策从来没有实行过。在那些地区，俄国政府面临和英法在非洲穆斯林地区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俄罗斯军事力量在中亚地区起到相对更重要的作用，其军队和殖民人口之间的比例远远高于英属印度。但是，总的看来，俄罗斯军事长官并不干预当地现存的社会结构，也不干涉穆斯林的文化生活。这种做法与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在英属尼日利亚采用的间接统治政策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俄国政府鼓励俄罗斯移民迁居殖民地，这跟法国政府鼓励殖民者定居北非具有相似之处。

1905—1906年革命的爆发使非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完全暴露出来。在这半议会统治的短暂时期，非俄罗斯民族政党迅速形成，俄罗斯化政策不得不作出改变，或者完全放弃。然而，1907年6月政变后，旧的政策再次占了上风。这种新的压力在芬兰及伏尔加河流域表现得特别严重。但是，从民族自信，甚至民族文化机构中所赢得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官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帝国统治最后十年的主要特点。的确，在官方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思想意识因素相对而言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超过以前的军事、官僚和宗教因素。

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中对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煽动作用一直未引起重视。因为是左派取得1917年革命的胜利，并且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都厌恶民族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化政策只存在于统治集团之中的观点占了上风。特别是俄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最革命的力量”被认为是不受这种毒素毒害的。但事实上，在帝俄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强大政党不断出现，并得到1907年后公民权的支持，而且正在赢得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那些人组织的种族屠杀涉及到大批城市贫民。根据传统的说法，参加屠杀的人都是流氓无产者（工人中最粗暴，最没教养的那部分人）。当然，

这是一个最难以界说的范畴。只有流氓无产者才热衷于种族屠杀，这一命题本身自相重复，其基本意思为：只有喜欢暴力的工人才喜欢暴力。而与社会主义政党有联系的那部分工人显然不受民族主义煽动的影响，没有参加种族屠杀。但是，在整个城市劳动力和具有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工人之间划等号是荒唐的。事实上，美化俄国和俄罗斯民族以及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一切本身就很有鼓惑性。反犹太主义，作为“痴人的社会主义”，非常行之有效，它集中原始的反对资本家的感情，反对犹太人小店主，因为在俄罗斯帝国大部分地区他们是现实的资产者，而且城市贫民和他们接触频繁。当然，俄罗斯民族主义利用反犹太宣传，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也都在利用反犹太宣传。

## 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

1917年，左派获得胜利，列宁掌握了左派的领导权，取得内战的胜利，从而使他及其政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列宁极端反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及俄罗斯化政策，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他早就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只会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把广大群众的力量从社会革命推向民族纠纷及帝国主义一边。列宁还认识到，革命的潜力存在于非俄罗斯人民的不满情绪中。内战中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无疑比“俄罗斯不可分割”这一反革命口号更具有吸引力。布尔什维克从各民族的消极偏爱，有时甚至从直接支持中获得了莫大的益处。然而，革命结束后，非俄罗斯民族并没有获得行使自决权的机会。只有在那些军事力量不利于他们的地区，如波兰、罗马尼亚、波罗地海沿岸及外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才允许那里的民族脱离俄国。而在其他地方，无论愿意与否，

非俄罗斯民族完全被联合到一个权力比帝俄时代更为集中，占据着几乎同样国土的国家中，尽管它改变了名称，而且是按照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原则组织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苏联某些非俄罗斯民族的命运有所改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政府允许他们，甚至鼓励他们在政府、学校、出版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多也是本民族的成员。但是，作为回报，除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之外，不准有其他政治思想及政治组织存在，甚至虚构的文学内容也必须局限在及其狭窄的范围之内。30年代，这种限制更加严格。列宁在世时，一直告诫共产主义者必须避免两种偏差：一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二是“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前者更危险，因此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后者则可有姑息的余地。自从1934年联共布16大以来，斯大林却有意地把侧重点转向后者。从那时起，在各民族中谴责、压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成为苏维埃公共生活的主要部分，但“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极少提到。

在实际中，民族政策（政府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态度）随着中央总的政策的波动而变化。在相对稳定、繁荣时期，民族对立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比如1921—192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1934—1936两年间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如此。而在尖锐的危机时期，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非俄罗斯民族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对政府的仇视中，而且表现在对俄罗斯人的仇视中。这也诱发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敌视。这包括1931—1933年集体化时期（乌克兰及哈萨克尤其如此）以及1936—1939大清洗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罗的海诸民族及乌克兰起初寄希望于德国入侵者，但很快认识到希特勒的地方长官比斯大林的州第一书记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把一些小民族整个赶出家园，流放到外地。比如，由于害怕他们会协助进军

的德国人，斯大林放逐了在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再如，作为对个别合作者的行为的集体报复，他还放逐了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战后初期，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岁月里，在恢复战争创伤的时期，斯大林对多数非俄罗斯人极端不信任。在这期间，各民族不仅受到压制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被篡改了。文艺创作，尤其是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文学创作，都横遭干涉，其意图可以说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

斯大林逝世后，非俄罗斯民族得到较为温和的待遇。曾有一个时期，赫鲁晓夫赞扬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自豪，在文化方面给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一定的自主权。而且，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中央政府通过俄罗斯人施加的压力也有所放松。然而，莫斯科当局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警惕。谴责、清洗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连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彼·叶·谢列斯特（1973年被撤职）这样的知名人物也未能幸免。然而，公开的民族主义冲突常常发生，这并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宣称：苏联是一个基于互爱、由亲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各民族组成的和谐的联邦（这在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苏联建国50周年纪念会上断言：“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 苏联68年来的民族问题

苏联对具体某一民族的政策及与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相关的一些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及人口问题在以下各章中均有论述。下面我扼要地回顾一下苏联68年来，俄罗斯民族主义及俄罗斯政策的情况。

一些主要共产党人会矢口否认党曾执行过俄罗斯化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他们也会否认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其政策的动机，或俄罗斯人至高无上是其目标。从夺取政权一开始起，布尔什维克党就在尽最大努力贬低俄罗斯民族传统。对那些党内外具有民族思想的俄罗斯人而言，似乎俄罗斯人受到非俄罗斯人的统治。自1917年以来，高级领导人中波兰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及亚美尼亚人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还有一些穆斯林。东正教义、宗教仪式及家长式君主的神话起重要作用的俄罗斯文化在1917年10月被轻蔑地摒弃，在这方面，党从来没有公开改变过。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稳住阵脚，且地盘有所扩大。今天，俄罗斯人对历史、民族特点及纪念碑发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俄罗斯民族意识中文化因素的复苏影响到党内一些人士及持不同政见者，后者的代言人当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受到影响的人对党的领导过去或现在的态度表示不满。这一复杂而且有趣的问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探讨。

从非俄罗斯成族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是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尽管某些非俄罗斯人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但党的高中层一直由俄罗斯把持。在绝大多数共和国中，许多重要职位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这从中亚地区的领导格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那里，共和国首脑和州委员会党的第一书记通常是中亚人，而第二书记通常是俄罗斯人。在政府各部门及管理集团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俄罗斯移民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殖民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沙皇时代。哈萨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不是立陶宛）诸共和国是这方面显著的例证。里加正在逐渐变成俄罗斯人的城市。

苏维埃政权中俄罗斯人不可避免地要占绝对优势（无论是政府内还是党内），因此沙皇时代的民族精神及政治文化仍有某种延续。对广大群众傲慢无礼，对上级卑躬屈膝，对失宠的官员口诛笔伐是苏维埃制度中小官吏的一大特点，其程度不亚于沙皇时

代。官僚阶层粗暴的特点不可避免应归咎于他们是俄罗斯人这一事实。这未必是公正的评价，没有理由去设想非俄罗斯民族官员将会更好些。然而，凡是一个民族被另外一个民族统治或觉得自己被人统治的社会中，不满情绪总是存在的。这一状况并没有因为苏联宣传机器对俄罗斯民族的美德大加褒扬而有丝毫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这一具有赞扬意味的称谓和仅仅是描述性的“大俄罗斯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篡改历史，夸大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他们说成是非俄罗斯民族无私的朋友，并把这种历史强加给非俄罗斯民族，这种做法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因此，俄罗斯人总是断言，而且一再向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及本国人民重申，因为苏联境内的亚洲民族自从1917年以来在工业和教育方面都取得进步（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们热爱基于无限的、无私的仁慈之心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如此断言常常激怒亚洲人，因为他们往往把自己显著的进步归功于自己辛勤的努力，认为（或许是不公正的）如果没有俄罗斯人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但是，如果说苏维埃帝国自己不受到近代历史规律的影响的话，这就奇怪了。根据这一规律，殖民地人民的忘恩负义是历来如此的。民族对抗不是产生于帝国政权残暴地压榨殖民地人民的时候，而是产生于它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物质繁荣、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及社会前进的时候。

像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没有一种官方统一使用的语言是不行的。这种语言必定是俄语，因为操俄语的人占苏联人口的半数以上。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曾作出巨大努力，要求非俄罗斯民族人民既要懂得自己的语言，又要懂俄语。这一政策虽然合情合理，在实施的时候也需要讲策略，而策略却并非人人具有的一种能力。伴随着大批俄语教材出版发行，其他语言的出版

物势必受到排挤，乌克兰民族的情况尤其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俄语成为先进、高深的自然科学领域及高等甚至中等教育的教学语言。官方统计数字证明：俄语的普及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然而，由此作出简单化的结论仍是不明智的。即使我们相信1970和1979年的人口普查数字，相信乌兹别克人的俄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由此假定乌兹别克人对俄罗斯人抱有高度的热情并热爱他们，也未免草率。学会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语言非常有用，但这并不一定说明他们乐意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并感激他们。捷克人在受奥匈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学会了德语，波希米亚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学会使用捷克语，但两者都没有产生热爱之情。

我在这里试图作出如下结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而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结果。苏维埃自1917年至今，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而狂热过，其言辞恭维了俄罗斯民族，而其行为却在清除俄罗斯的文化遗产——就像其言辞把无产阶级尊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而现实无产阶级却受到他们的雇佣者——莫洛克神式国家的剥削。政府希望苏联公民，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非俄罗斯人，都要服从它，对那些会给苏维埃帝国带来威胁或者那些可能被纳入其支配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民族则傲慢沙文。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的是对庞大帝国的自豪和满足，而帝国的本质是毫无文化内涵的绝对权力。苏联盛气凌人的帝国宣传因注入一剂反犹太主义“强心剂”而得到加强。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世纪之交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产生过的那种感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感情在俄罗斯城市的广大群众中根深蒂固，虽隐而不见，却具有强大的力量。斯大林曾利用这种感情，其继任者则用得更多。这种感情的诱惑和力量对动员群众获得支持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那些利用它或被它诱

惑的人，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黑帮。

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仍然源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大的列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并把它传给一些中央委员。（据承认，其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或许这只是一时错误，但是这并不妨碍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正确掌握。）

值得争论的是，苏维埃政府合法性的有效来源如同19世纪沙皇统治合法性的有效基础一样，已经发展了。的确，在现今政府有效原则和乌瓦洛夫的准则之间有一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在乌瓦洛夫准则的三条之中有一条跟现在的理论相当接近，这就是专制统治。这个词现在并不讨人崇敬，但其实质没有变。东正教为残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替代，苏联政治阶层中所有的成员都精通它的术语。今天，这种信仰胜过了别林斯基在给果戈里的信中所指的农民信徒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仰。乌瓦洛夫的“民族性”被80年代苏联的帝国沙文主义所代替，其实质虽然不同，但气势更为嚣张。

民族主义一词并不能用以描述苏维埃官方的态度和政策。民族主义，无论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还是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必须捍卫本民族的文化。而在苏联官方的舞台上明显缺少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摧毁俄罗斯及帝国内其他民族文化的努力已宣告失败，反生产性的政策带来了大堆的问题，并且正困扰着苏维埃的统治者。在未来保卫民族文化的共同斗争中，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要是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帮助，那该多好啊！然而，这只不过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历史表明，这是不可能的。



## 第二章

### 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历史综观

民族主义的定义很多，而且都与民族——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种历史现象——的概念有某种联系。所有这些定义（个别例外）几乎都不适合沙皇俄国的少数民族。在本文中，民族主义具有下述更为广泛的双重意义：

首先，民族主义可用以标明对某一特定的建立在各种标准之上并与之相符合集团的归属意识。这些标准包括：某一特定的宗教或国家教会，对某一国家政权或朝代的效忠，对民族语言文化或某种生活方式的依恋；

其次，民族主义代表了保护民族共同体不受占支配地位的外来民族（本文中的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化或生物同化的意志。从这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是对挑战的一种反应或答复。

最新人口普查（1979年）表明，苏联共有104个民族，但是有“民族问题”的仅有少数几个。这些民族中有22个为外来少数民族（边疆民族或殖民地），其中族包括日尔曼人、波兰人、希腊人、朝鲜人及匈牙利人，他们的语言在苏联没有合法地位；34个为小民族，有自己的地方语言；还有16个较大的民族（例如楚瓦什、加告兹、雅库特、莫尔多瓦及其他民族）信奉东正教，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上述三大类民族注定将很快被俄罗斯人同化。

然而，另有几个特定民族可以说是真正具有历史根基的民族。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宗教或自治教会，其中一些民族还有自己的治国传统，例如乌克兰民族、格鲁吉亚民族、亚美尼亚民族、犹太民族、立陶宛民族和穆斯林民族，这些民族是24个民族中的几个，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有着共同的宗教历史文化传统。所有这些民族（大革命前的俄国还有另外两个民族，即波兰人和芬兰人）占苏联总人口的41%，是苏联存在“民族问题”的民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帝国的生存与否主要取决于民族问题能否得到积极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归纳起来为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老大哥”与其“小兄弟”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50年来，苏联理论家反复叫嚷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在这一章里，笔者将追溯并分析民族主义尤其是穆斯林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穆斯林民族主义尽管不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样突出，但它或许是动摇苏联最终安定的更危险的因素。

## 俄罗斯的压迫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对来自统治民族压迫的一种反应，在俄国，这种压迫由下列因素所决定：

1. 俄罗斯民族与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独特性。
2. 16世纪至1917年征服边疆地区时期莫斯科及圣·彼得堡政体的不断变化性。
3. 征服者所遭到的不同程度的反抗。

苏联是大欧亚帝国中的最后一个，但它与以前的帝国相比，

有其独特性。的确，苏联一些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小兄弟们，早在他们的俄罗斯老大哥之前，就已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有一些还建立起了大帝国，并且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俄罗斯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独特性。后者对前者不但没有自卑感，而且还对其后来主人经常带有一种优越感。就穆斯林而言，这种特征由于持续长达300年之久、永远不会被忘却的“鞑靼枷锁”的历史遗留而更加强烈。几乎所有论及鞑靼人对俄罗斯影响的俄国（及苏联）历史学家，都认为俄罗斯文化上的落后、俄罗斯统治者的专制现象以及臣民们的卑躬屈膝，都是由于蒙古——鞑靼人的影响造成的。分析这种理论并作出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那种不幸的历史遗留并没有落到那些被蒙古人征服并纳入其直接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伊朗、中国、土耳其斯坦等国家的头上，而俄罗斯仅仅是处在“鞑靼枷锁”的间接统治下。然而，可以肯定：鞑靼人的统治激发起俄国人对于鞑靼征服者政治、军事优势的崇拜，结果使俄罗斯人对其以前统治者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自卑感，这就使得俄罗斯—穆斯林关系具有了特殊性，与传统殖民型的关系迥然不同。现代苏联的穆斯林，尽管不得不屈从于具有绝对实力的俄罗斯老大哥，但是他们在政治文化上并不感到自卑。一位革命前的鞑靼政治家阿雅兹·伊斯哈基对他们的态度作了这样的总结：“如果我们成了我们以前的奴隶的奴隶，那后果将会怎样？”

从1552年对喀山汗国的征服大约至1900年，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持续达360年之久。在此期间，俄罗斯国家政权及政治意识形态历经变革，因而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或给予少数民族的待遇）也相应地变化。伊凡四世遵循蒙古宗教自由的传统，在宗教及民族问题上持容忍态度，他欢迎穆斯林成为他的臣民，尤其是欢迎那些克里米亚人、喀山人及阿斯特拉罕可汗的后裔。伊

凡的第二妻子玛丽亚·泰姆鲁科夫娜生于穆斯林家庭，其父卡巴尔达大公泰姆鲁科——沙皇的岳父——以及她的几个在沙皇身边服役的兄弟，都是穆斯林。

这一时期的宗教自由，由于伊凡雷帝的过世而宣告结束。在其继承人、他的儿子费多尔的统治下，长时期的宗教压制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中部伏尔加的穆斯林被当作帝国的“公民”看待，因此他们仍应和俄罗斯人一样尽其应尽的义务（例如服兵役），尽管他们被剥夺了基督教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例如教育、文化自由等）。200年来，帝国作了巨大努力，通过使穆斯林皈依东正教的方式来同化他们。反伊斯兰运动在1738年至1755年安娜女皇掌权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喀山省的536座清真寺有418所被捣毁。企图用如此方式解决穆斯林问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鞑靼人及巴什基尔人对斯特凡·拉辛和埃米利安·普加乔夫大起义的积极介入。

凯瑟林二世大大改变了这种民族战略。她懂得，一个非俄罗斯民族人口持续增长的多民族帝国，不论其臣民的宗教及文化背景如何，只有对其臣民一视同仁，才能得以生存。反穆斯林运动暂时告一段落，鞑靼人获许建立清真寺，鞑靼商人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特权。这种宽容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几乎一个世纪里，鞑靼商人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忠实的伙伴，穆斯林商人则成了沟通俄国政府与中亚及中国的先头兵和媒介。

这种双方互利的合作时期持续到亚历山大二世当权为止，此后政府作了新的尝试来解决民族问题。然而这时，文化上的俄罗斯化政策已经因其起反作用而被废弃，并代之以新的方式，即在保存其民族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通过使他们皈依东正教的方式，同化各个民族，不管他们是穆斯林、佛教徒、东方的泛神论者，或是西方的新教徒。然而，在北高加索及中亚细亚两个穆斯林地区，俄罗斯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高加索的山里人在

百年血战之后被征服了，但他们得不到帝国公民的地位，他们仍然是“异族人”〔旧俄对非俄罗斯人的蔑称——译者注〕，不得服役。在达吉斯坦及车臣尼亚，俄罗斯乡村殖民化被禁止，俄罗斯政府也不干预这个国家的内务。在这些地区没有实行同化政策，强迫皈依东正教的政策被禁止。而相反地在高加索西北部（切尔克斯克地区）的肥沃平原却被俄罗斯给殖民化了，当地居民——切尔克斯克人及阿布哈兹穆斯林——被迫向奥斯曼帝国迁移。至1865年，近100万穆斯林离开新被征服的领土。

在人口众多的沙漠绿洲——中亚细亚，俄罗斯的乡村殖民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直到大革命前，那里的俄罗斯人人数仍很有限。那里的第一任总督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所制订的民族政策，有点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相类似。他们不招募当地人服役，并且封锁这一地区，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使其不受其他民族如鞑靼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等的影响，皈依东正教被禁止，当地俄罗斯人政府试图保留伊斯兰文化的最古老形式。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使土耳其斯坦保持其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使其社会和文化停滞不前，进而希望当地居民由于隔绝外来影响而一直衰落下去，最终达到消亡。栅栏区内的犹太人亦遭此厄运。

尽管犹太人、穆斯林和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受到歧视，但新教徒却受到平等待遇。因此，沙皇政府的态度似乎在不断变化，毫无逻辑性，这与苏联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一贯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表面上看来，帝国的民族政策似乎缺乏一贯性，但透过现象却可以看出某些稳固的趋向，这些趋向即所谓的对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战略”。

这种帝国战略最显著的特征是俄罗斯行政的整体性及对早在16世纪莫斯科公国时所实行的间接统治的不信任性。在随后的350年里，这种不信任性逐步增强，所有破坏中央集权制或保留地方统治者主权的企图都被摒弃，到大革命的前夕，俄罗斯帝国已

几乎是铁板一块了。帝国所有省份（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除外），都必须仿效这种官僚政治的范例。自相矛盾的是：到19世纪末，俄罗斯人占总人口不到一半的俄罗斯帝国似乎已成为一个大俄罗斯民族国家了。

至19世纪末，东正教的确已成为俄国的国教，俄罗斯人只能成为基督东正教徒（或者无神论者），并且在帝国领土上只允许一个教会即全俄罗斯东正教会存在。成立于公元4世纪，并且从6世纪开始一直有自己首领的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于1811年被取缔，仅仅成为莫斯科教会管辖的一个分支。15世纪由莫斯科分离出来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于1657年屈从于莫斯科教会。而且，国家教会组织禁止设立有自己宗教语言的东正教组织，以防止东正教会集中控制权力的分散。1913年，喀山传教士会议宣布“东正教”与“俄罗斯”一词同义。

不知何因，非东正教及非基督教宗教被容忍，甚至按照难以说清的标准受到某种优待。那些活动中心在帝国本土上的宗教或教派受到偏爱，例如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教派就是如此。享有宗教自由者有高度分散的路德教各教派、佛教徒（蒙古佛教徒、布里亚特人、阿尔泰人）、聂斯托里教派（亚述人），甚至还有所谓的魔鬼信徒（耶齐迪教徒）——这些魔鬼信徒在奥斯曼帝国及伊朗受到迫害而在俄国高加索地区则受到保护。无论何时，只要一个宗教的中心在国外，那么它将受到极大的怀疑，并且其信徒亦经常受到歧视。因此，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穆斯林）——俄国的“宿敌”——有对教皇或奥斯曼苏丹哈里法比对俄罗斯国家更忠心的嫌疑。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权利极其有限，而东正教某些教派的信徒（如俄国基督教秘密教派成员；苦行派信徒；莫洛克派教徒；18世纪创立的俄国教派成员等）实际被视为违法分子。

## 少数民族的反应

从上述可以看出，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变化无常，而且亦非一视同仁。结果，少数民族对此作出的反应因地区和时间不同而不同，其民族运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趋向。西方公众舆论同意布尔什维克对沙皇俄国的描述，认为它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有些民族对征服者俄罗斯人奋起反抗，而且，在被征服后，奋力摆脱其征服者。但是，另有一些民族，包括几个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却由于各种原因接受甚至欢迎俄罗斯对他们领土的吞并。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没有表现出畏惧或憎恨、反对俄罗斯的特征，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从来没有发展成一种有意识的完整的民族主义。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民族运动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赞同甚至支持，因为他们把矛头指向外部敌人，而不是指向俄罗斯人。

### 接受或者说不反对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

自愿接受俄罗斯的最高统治，或者说对俄罗斯缺少反抗，可由许多历史因素来解释。那些欢迎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可分为下列五类：

第一类是指社会、文化及政治高度发达（有时比俄罗斯民族还要发达）的一些少数民族，面对外来更大的危险，他们得到俄罗斯人的保护。例如，亚美尼亚就属这类情况，他们的民族存在就受到相邻的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帝国及伊朗的威胁。亚美尼亚人有着很强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有着古老优秀的文化，而且

他们自卡尔西顿会议以来已有了自己独立的民族教会。他们的民族运动组织严谨，富有战斗性，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取从奥斯曼突厥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有感到俄国对它的威胁，甚至当他们的民族政党反对沙皇政权时，他们也从来没有采取反俄罗斯的立场。这种亲俄态度经历了十月革命。现在，亚美尼亚人或许是所有苏联少数民族中最亲俄的一个，甚至当他们坚定地反共时也是这样。他们的敌人仍是土耳其人。

同样，俄罗斯人还保护蒙古人不受中国的入侵，而且从16至18世纪一直保护哈萨克部落抵御一直威胁其生存的强大的佛教信徒戎族人。现在的蒙古民族运动，同过去一样，是反对中国、亲俄罗斯的。至于说到哈萨克人，他们最早的民族领袖乔坎·瓦利哈诺夫、伊布雷·阿尔泰萨林及阿贝·库纳巴耶夫则是19世纪所有穆斯林卡尔图尔特拉格(Kalturtrager)中最亲俄的。乔坎·瓦利哈诺夫曾经宣称：“没有俄罗斯的帮助，我们哈萨克人将会变成野蛮的亚洲人。”只是到1895年，当哈萨克草原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潮流所淹没之时，哈萨克的民族运动才开始反俄、仇俄。

对于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及拉脱维亚人来说，俄罗斯的征服不是民族的灾难，而仅仅是一种：“小小的不幸”，或至少是“众多潜在不幸的一种”。在他们并入俄罗斯帝国以前，他们是波兰或德国日耳曼君王压迫蹂躏的农民。俄罗斯统治没有将他们从受压迫中解救出来，但至少帝国的这些新公民可以选择他们的压迫者。俄罗斯在这方面没能占垄断地位，因而他们不享有成为他们唯一敌人这一特权。

第二类是不反对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在并入俄罗斯帝国之时尚未形成民族国家或者已经失去其民族国家的民族。亚美尼亚亦属于此类，因为它在11世纪就已被穆斯林塞尔柱人所征服。亚美尼亚教会首领一埃奇米阿津的大主教是最高统治



者。同样，阿塞拜疆在俄罗斯侵入前正处于封建制的无政府状态，是俄罗斯人给外高加索地区带来了他们几百年以来都不曾知道的和平与秩序。

第三类是指那些文化水平较之俄罗斯文化水平低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抗。这些民族包括俄罗斯帝国东部的异教部落：芬兰人（马里人、莫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科米人）或非穆斯林的突厥人（楚瓦什人、雅库特人、阿尔泰人）。对于他们来说，皈依东正教或被俄罗斯同化代表着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进步。除个别民族外，这些“没有历史根基”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真正抵抗俄罗斯的统治。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其上层拥护语言俄罗斯化政策。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极其模糊，而且他们的民族性正处于萌芽状态。

第四类是指一些外国的侨民，他们在本国受到歧视和迫害，因而来到沙皇帝国寻求庇护。这些民族包括：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和东干族人（1865年新疆阿古柏反叛被平息后移入俄国）、亚述人、穆斯林或信奉耶齐迪教的库尔德人，还有来自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希腊人。所有这些少数民族都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而维吾尔和库尔德人已有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运动。然而他们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反俄罗斯的偏见；相反他们都把俄罗斯国家视为传统的保护神。因此，目前，这些少数民族在苏联各民族中仍然最亲俄和亲苏，并且他们大多数在文化上都享有真正的治外法权的文化自治。

最后，第五类不反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是指那些沙皇政府从中选拔了一批贵族、牧师及商业资产阶级成员的那些民族。这些上层人物能得到与帝国相应社会阶层一样的爵位或特权，17世纪和18世纪初这种政策也适用于芬兰的贵族阶层、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日耳曼贵族、乌克兰的高级牧师以及伏尔加鞑靼商业资产阶

级，这部分人具有较完善的民族意识，并且面对俄罗斯人常常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意识。通常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例如，瑞典人和日尔曼人信奉路德教）、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不乐意与斯拉夫人混杂在一起。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沙皇的忠实臣民，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不承认他们忠诚于俄罗斯国家，更不承认忠诚于俄罗斯民族。然而，正由于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与其同胞并不团结，除极个别外都不参加本民族的民族运动。

## 反对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

反对俄罗斯统治并且产生过较强的民族运动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有历史根基”的民族，或者是“有历史根基”民族的残余。每个民族都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并且大多数认为自己比俄罗斯人优越。其民族主义（一般具有强烈的反俄罗斯性质）的重心在于保护或恢复各种民族机构，如国家、教会、宗教、文化和语言等。

“有历史根基”的民族指的是那些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俄罗斯人所取缔或者其统治王朝为纯粹的俄罗斯统治所取代的那些民族。失去独立的痛苦记忆最能激发民族主义的产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向往俄罗斯统治以前那段光荣、英雄的历史，失去独立的痛苦记忆愈加激发产生民族主义。这类民族包括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北高加索人、哈萨克人及土耳其人。要求恢复独立构成了波兰和格鲁吉亚民族运动的中心。复兴克里米亚鞑靼国家和乌克兰国家是鞑靼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主旨之一。1918年，沙米尔神权政治的重建是保守派领导的北高加索山里人运动的公开目标。巴赫奇萨拉尹

的喷泉和苏尤姆比克塔是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象征。“沙皇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这一口号在大革命前夜，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热烈的响应。

第二种反抗的决定因素是古老的东正教传统，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情形即如此。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以保卫和重新获得民族宗教独立为目标。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反俄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其民族文化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在这些地区，确定或保护本民族书写语言及本民族的学校，争取出版、著作自由是抵制俄罗斯国家同化政策初级阶段的主要特色。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伏尔加鞑靼人，他们的民族复兴运动始于19世纪初。第一阶段是一场宗教改革，是对伊斯兰教徒苛刻、保守的经院哲学所作出的反应。这种思想自从16世纪俄罗斯征服以来一直禁锢着鞑靼人的精神生活。接下来是19世纪中叶的鞑靼人文艺复兴运动（这样说并不夸张）。这种有趣的历史现象有如下几个方面：文学语言的现代化，新的教育制度的创立，以及现代政治文学的出现。如果没有这一整个世纪的努力，那么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成熟的政治运动将是不可能的。文化上的现代思想是政治复兴的前提条件。克里米亚鞑靼改革家、“俄罗斯现代主义之父”、鞑靼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倡导者、第一所新型穆斯林学校的创办者伊斯梅尔·贝伊·加斯普林斯基主持召开了1904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的第一届俄罗斯穆斯林（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俄国穆斯林政治生涯的开端。

在那些其生存受到俄罗斯乡村或城市殖民化威胁的少数民族中，民族主义亦闪耀出力量的火花。这些民族包括：来自达吉斯坦和车臣尼亚被从北高加索肥沃土地上驱逐出来并因在俄罗斯移民侵入后被迫迁进山地的穆斯林和牧场在1895年以后被俄罗斯和乌克兰殖民者侵吞的哈萨克游牧民族。他们的反抗运动到1916年游牧部落的大暴动而达到高潮。上述民族的民族运动一开始就初

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普遍潮流。从前亲俄罗斯的知识界精英也被迫采取了反俄态度。

在那些被分割为俄罗斯帝国和其他国家两部分的少数民族中，其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因为这些民族可能而且事实上常常受到国外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乌克兰语虽然在俄国没有合法地位，但是在奥匈帝国却是官方认可的行政管理和教育语言之一。利沃夫的乌克兰文化中心为俄罗斯帝国内部的乌克兰人树立了榜样。伊斯坦布尔和大不里士的诱惑力对阿塞拜疆突厥人民族主义发展具有更大的刺激作用。

哪里存在着宗教歧视，哪里民族运动就以抵制俄罗斯东正教会传教活动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基本上连为一体。立陶宛人只能信奉天主教，信奉东正教的立陶宛人则已成为事实上的俄罗斯人。对穆斯林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只有穆斯林才可成为乌兹别克人、达吉斯坦人或土库曼人。反过来说，乌兹别克人或达吉斯坦人必须是穆斯林。1917年大革命的前夕，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仍认为他们是根本上的穆斯林人，基督徒乌兹别克人（或土库曼人或达吉斯坦人）这种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他被看作是俄罗斯人。只有伏尔加鞑靼人例外，信奉基督教的鞑靼人、16世纪皈依东正教的斯塔罗克里亚申人和18世纪皈依东正教的诺沃克里亚申人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是鞑靼语（用西里尔字母书写），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独立民族，其民族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旧保存着（苏联1926年的人口普查把他们单列为一个民族）。

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后没有什么变化，目前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仍然是立陶宛人和穆斯林人自我识别的主要成分。乌兹别克人可能是信教者，也可能是无神论者（“不信

教的穆斯林”一语在中亚经常被使用，这与某种实际相一致），但不可能是基督徒。自相矛盾的是，皈依基督教（东正教或其它基督教派），正如十月革命前一样，是一个穆斯林切断他与他的米列特—他的民族共同体—联系的唯一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人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民族特征不可能归结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人种合一的信条。在高加索，信奉天主教新教、甚至一些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占一定的比例（具体比例很难估计），但他们首先是亚美尼亚人。就连很小的穆斯林亚美尼亚团体（约有一、两千人在17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强迫皈依逊尼教派的“赫姆欣”）也不能完全排除在亚美尼亚民族之外。尽管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仍然在使用亚美尼亚语言。

## 当代民族主义的遗产

若要理解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最好先分析一下现在与过去的联系，笔者将着重分析苏联的伊斯兰民族，因为穆斯林民族是苏联俄罗斯化程度最低的少数民族。他们比其他民族更为成功地抵住了与俄罗斯人文化与生物相互依存的影响，保持了其民族特性。

二战期间及刚结束时，中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新发掘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由于两次书写字母的改变（1928—1929年从阿拉伯字母到拉丁字母，1939—1940年从拉丁字母到西里尔字母）曾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自己的历史。这种重新发掘是一个特别值得注目的过程，是为争取恢复民族传统进行的一场斗争。这种民族传统的恢复只能用一个特殊字眼“遗产继承主义”来表示。由此而引起的斗争使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及政治

遗产绝大部分都是“进步的”，因而应该在苏联社会中保留下来）与俄罗斯中央政权发生了冲突，因为政府试图仅仅保存地方遗产中能增进苏联各民族之间友谊的成分。其他成分，尤其是那些伊斯兰教成分则被排斥在外，被斥责为“牧师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这次冲突在1951年至1952年间达到高潮，俄罗斯人与穆斯林人在穆斯林民族史诗歌曲的地位问题上进行了激烈斗争。穆斯林有正当理由认为这些史诗是他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俄罗斯当局者则想把他们作为宗教的或“封建的”东西而加以压制。这次论争可说是民族遗产继承主义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斗争的结果出人意料：穆斯林取得胜利，这是土著知识分子第一次战胜俄罗斯中央权威。斯大林逝世后，这个争论趋向缓和，并且更侧重于学术问题，但是，这种承袭过程仍在继续。每一年，实际上每个月都有新的文坛或政坛人物被从历史中发掘出来，成为新一代土著知识分子的可敬的令人鼓舞的民族传统的典范。

遗产继承主义有四个方面：帝国传统，对俄罗斯征服的抵抗，穆斯林经典文化对于最近的俄罗斯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十九世纪穆斯林文艺复兴的进步性。

## 帝国传统

中亚史上的英雄帖木儿是这种遗产继承的最主要对象。谨慎地恢复大突厥征服者的地位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帖木儿不仅是光荣过去的象征，而且还是未来复兴的希望。帖木儿是突厥民族的象征，他曾统治了历史上整个突厥大帝国，整个中亚细亚都在他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了。因此，恢复帖木儿的地位就有了泛突厥民族的意义。他使人们回想起所有突厥斯坦为统一的穆斯林民族（米

列特)的那段光荣历史。重要的是,帖木儿现在为中亚最大民族并日益在中亚扮演当地“老大哥”的乌兹别克人所垄断。因此帖木儿已成了即使不是全苏联的伊斯兰民族至少也是中亚团结的象征。

帖木儿,是虔诚正统的穆斯林教徒,他保卫了苏菲(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兄弟会,建立了许多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被誉为当今苏联穆斯林共和国内泛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

## 对俄罗斯征服的抵抗

有几位抗击沙皇军队的领袖当今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他们在斯大林时代都曾被从苏联官方史书中抹掉了,因为沙皇扩张被认为是“积极的史实”,而抵抗沙皇侵略的领袖们却被说成是叛徒和国外势力的代理人。斯大林死后,有一些恢复名誉,但大多数在官方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这些英雄人物中,沙米尔伊玛目,1828年至1859年间高加索山地人的领袖,是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他被斯大林打成土耳其和英国的特务,但自从部分地恢复名誉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高加索人和全俄国(和苏联)穆斯林的杰出英雄。他立刻成了一位成功的军事指挥家,一位信奉东正教的穆斯林(一位纳克西班底苏菲兄弟会的杰出人物),一位英雄主义的典范。他与俄罗斯帝国的强权及刚刚将拿破仑击溃的沙皇最优秀的将军战斗了20多年,战绩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出现了沙米尔崇拜热。用“崇拜热”一词来描述穆斯林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对达吉斯坦英雄的态度一点也不过分。这不难理解:沙米尔的反抗证明俄罗斯帝国的军队是可以被打败的。如果说这在过去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特别是在当今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正向人们表明苏联军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些抵抗领袖也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象征。他们是哈萨克中部草原上抗击（1837—1847）俄罗斯统治中部哈萨克游牧部落的克涅萨里·卡苏莫夫可汗；普加乔夫的巴什基尔副官、1797年死于施占塞尔堡监狱的萨拉瓦特·尤列叶夫。50年代，哈萨克历史学家认为克涅萨里·卡苏莫夫是一位“民族爱国者”，试图恢复他的地位。然而，结果是徒劳的。70年代，中亚知识分子开始对中亚细亚农民反对苏俄统治的游击斗争即1920—1928年的巴斯玛奇运动发生了新的兴趣。

在高加索地区，抗击俄罗斯征服的抵抗运动由神秘的苏菲兄弟会领导。这里登场的宗教“人物”，尤其是那些在与俄罗斯人作战中牺牲的人物，赢得了民族领袖的赞誉。在他们死后，被尊为高加索民族主义的先驱，这一点，可以从其陵墓的威名上看得出来。据苏联最新调查，高加索一些最负盛名的圣地为下列陵墓：

1. 座落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迪什涅——维杰诺村的乌尊·哈吉的陵墓。乌尊·哈吉是纳克西班牙底兄弟会的教长，他与纳吉穆金·戈辛斯基一起是北高加索保守宗教的主要领导人。他根据兄弟会的原则反对俄罗斯人，不管他们是邓尼金的白军抑或是布尔什维克的红军。1919年至1920年，他仿效沙米尔神权政治国家在车臣尼亚山区建立了伊斯兰教长国。乌尊·哈吉死于1920年春，享年90岁。他死后，纳吉穆金·戈辛斯基接替了他，并领导了达吉斯坦和车臣山地人的大起义。这次暴动始于1920年，直到1923年才被平息。

1961年苏联政府封闭了这个圣地。然而几年之后，仍有大批人来这里朝拜，他们来自车臣共和国各地，及其他共和国，北高加索的自治地区，甚至格鲁吉亚。来这里的朝圣者有的步行，有的是乘火车，还有的是乘小汽车。

2. 索格拉特尔的阿布杜拉赫曼（一位纳克西班牙底兄弟会的



教长)的坟墓，座落在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喀山尼希的奥尔附近，是北高加索地区第二大最令人敬仰的圣地。作为1877年—1878年暴动的达吉斯坦首领之一，阿布杜尔拉赫曼教长被俄罗斯人处以绞刑。

3.巴拉哈尼的穆罕默德教长的陵墓，座落于达吉斯坦的格尔格比尔村附近。巴拉哈尼的穆罕默德，又一位纳克西班底兄弟会的教长，他指挥一支起义队伍，于1920年11月阿拉坎山谷全歼一支重要的红军部队——莫斯科“革命纪律模范第一兵团”。

4.塔绍·哈吉教长的陵墓，座落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萨亚桑村。这是第三大朝圣地。塔绍·哈吉——沙米尔的战友，是他将纳克西班底兄弟会传入车臣国的。

5.位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维杰诺区哈吉·奥塔尔村，座落着库恩塔·哈吉·基希耶夫母亲的陵墓。库恩塔·哈吉——北高加索第一位恰季里教长，1864年被俄国政府逮捕，后死于俄国一所监狱内。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崇敬转变成对他母亲陵墓的敬意。

6.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沙利村有阿里·米塔耶夫教长的坟墓。阿里·米塔耶夫，一位恰季里教长，他是库恩塔·哈吉死后形成的恰季里的四派之一的巴姆马特·基拉伊·霍贾兄弟会的首领。1925年他因“反革命活动”罪在罗斯托夫被处死。

## 穆斯林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发掘恢复其民族文化方面与俄罗斯的“同志们”展开了一场斗争。虽然这场斗争并不是多么惊心动魄，但它却关系重大。有人说苏联的将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此说并不夸张。

二战后，实际上俄罗斯人自己也在努力恢复自己所有的文化遗产（它其中包括一些不利于“苏维埃文化”的人物或方面，例如：费奥多尔·妥思陀耶夫斯基，安德烈·鲁布列夫，诺夫戈罗德·伊康斯和N·S列斯科夫）。同样，中亚穆斯林知识分子也在发掘、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并翻译成现代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或拼写成西里尔文字）。这些文学，完全渗透着伊斯兰精神，它包括诸如杰拉列金·鲁米、费里杜德金·阿塔尔和阿米尔—尹·霍斯罗—尹·杰列维等人的神秘诗篇之类的丰富的苏菲文学。

年轻一代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文化复兴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内容：

1. 辉煌的古典文学遗产。从9世纪布哈拉的波斯诗人鲁达基至15世纪会使用两种语言从事创作（波斯语和察合台突厥语）的赫拉特诗人米尔·阿里·希尔·纳瓦耶伊，他们不仅仅属于一个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中亚细亚。这种观点支持了被苏联谴责的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土耳其斯坦统一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后将是伟大的。

2. 文学复兴运动的另一方面，正如这场运动本身表明的那样，即：“我们无须仿效俄罗斯，我们的文化较之他们的文化既古老又伟大……当我们的“老大哥”的祖先还在森林里隐藏时，我们的鲁达基（莪默·伽亚谟）已经在布哈拉萨马尼德统治者的宫廷里开始写作他的《鲁拜集》了”。

## 19世纪穆斯林改革运动的进步性

最近五、六年间，穆斯林民族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复兴其文化遗产的斗争中又开辟了新的战线。它涉及到现代主义运动，一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鞑靼和高加索自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政治文化运动。他们的大胆目标是使穆斯林社会从根本上现代化，以便能在20世纪高技术世界生存并且能够在不失去其宗教基础的情况下与外部世界竞争。这是一种卓越的努力，它涉及宗教、妇女教育、语言文字、政治等各个方面。十月革命破坏了这次现代文艺复兴运动。一些领导人物加入了反革命阵营，另一些与布尔什维克站到了一边，后来又成为“民族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他们试图调和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结果是徒劳无益的。30年代他们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从那时起，苏联史书上称现代主义者为马列主义的大敌，称现代主义为一种讨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现象。当前，这种努力即使不能复兴整个现代主义运动，那至少要恢复（文化史上）几个主要人物的地位名誉，对穆斯林来说，其意义极为明确，而对苏联当局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它使人们想起，在不远的过去，伊斯兰教曾掀起过一次进步、自由、伟大的社会文化运动，它成功地克服了穆斯林民族许多落后的方面，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结果，有人断言，社会变迁可以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通过民主演变而取得。因此，马列主义并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道路。

## 结 论

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演变的肤浅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与人们常常相信的断言相反，俄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人们的注意力过份地集中到俄国为大公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有时接受了大公的宗教信仰的个别人身上，他们的后裔们后来被俄罗斯化了。我们往往倾向忽视这些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成功地抵抗了400年来基本上是系统的同化政策的受压迫的小民族：穆斯林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还包括那些延续至今的更小

的异教的芬兰部落：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莫尔多瓦人、科米人等。

十月革命前，同化个人或整个民族的唯一办法是：迫使他们皈依东正教。俄国的教会有很好的传教条件，但宗教活动较少，因而近400多年来收效不大。

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融合的最好工具是宗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乌兹别克或立陶宛共产党人仍然是乌兹别克或立陶宛人，但是他们如果皈依了东正教，便成为俄罗斯人。近来，俄罗斯教会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独自起着粘合作用，这与1917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苏维埃政权的68年已确定无疑地表明共产主义已将不再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是种能够动员群众的哲学思想和伪宗教，今天它只不过是在苏联官场谋职的一种手段。具有“超民族”诚心的“苏联人”仍未出现，大量事实证明，这种人只不过是苏联理论家的梦想而已。

## 第三章

# 当代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综述

## 引 论

苏联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对苏维埃制度的建立及其政策的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来说，它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结果。

所谓客观条件，指的是俄罗斯帝国的遗产。500年来，俄国残酷地向东、西、南扩张，网罗进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少数民族。非俄罗斯人具有各不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民族集团。苏联的多民族社会是社会学家所谓的以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为核心及一些边缘民族组成的社会（事实上，俄罗斯人只勉强过半数）。核心民族认为自己从历史上就有盟主权。这一观念导致了俄罗斯人向边缘地区的进一步渗透，从而保证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威地位。这自然地又导致了俄罗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使其成为苏联普遍的社会准则。

形成苏维埃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观力量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建设新社会的政策；及对这些政策的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生产力所有权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决定社会关系，而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与社会压迫的产物——民族主义必定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中存在着两种并

行的趋向（其势头必定要持续到社会主义阶段）：一是资本主义早期在反抗民族社会双重压迫中产生的民族自主倾向；二是资本主义末期在垄断资本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社会关系国际化的倾向。用辩证法的术语讲，社会主义制度一旦确立，国际化倾向必定会成为主要趋势，对阶级的忠诚会逐渐取代对民族的忠诚。列宁承认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支持反对帝俄利益的民族自决权（正如其继承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自决一样），并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向民族主义作出了让步。然而，他自信：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消失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团结的产生。

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本身被看成是一种把广大人民群众从以前的社会、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行为。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矛盾冲突社会的基础奠定了。顽固存在的民族冲突被斥责为历史的遗留，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必须受到抑制和打击。

在苏维埃政权巩固阶段，边疆地区民族主义强大的离心力使人们确信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从历史的角度讲比民族自决的权利“更为进步”——这一论断使红军再次征服叛乱的边疆地区获得了合法的根据。1924年苏联建立时在联邦制国家结构中，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实力得到了承认，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团结通过一党独掌政权而保存了下来。这种组织方式被描述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从少数民族中选拔、教育新型的社会主义干部最先开始于列宁倡导的“地方化”政策。但是，由于新干部证明是和以前的资产阶级一样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斯大林争得继承权之后，废弃了这一政策，代之以集体化、工业化政策。反复的大规模清洗把共产党内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消灭殆尽。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销声匿迹，控制执行斯大林政策机构的俄罗斯人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俄罗斯人作为“苏

联民族大家庭”中“老大哥”的地位随着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明显地显示出来。战争中，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保卫母亲俄罗斯”的口号比“国际主义”及“阶级忠诚”的口号更具有号召力。

二战后，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正如苏联官方所宣称的，苏联的“民族问题”确实已经解决了。这一点在当时的文献中亦有所反映。但是，1953年后，苏联内部的权力之争把民族主义的魔鬼从斯大林主义的瓶子里放了出来。非俄罗斯民族的自主意识日渐明显，从而迫切需要调整民族政策，尽管是局限在——现在如此而且永远如此——列宁所设想的辩证发展，即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趋势的范围之内。1961年，在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提出“繁荣——接近——融合”的公式。70年代勃列日涅夫提出：随着国家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产生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忠诚凌驾于对某个民族的忠诚之上。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受到压制的俄罗斯老大哥的观念在60、70年代又得以死灰复燃。

因此，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苏联民族关系的辩证法据说是推进苏联各民族完全的自我实现（繁荣），同时以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互相丰富”使他们“日益接近”。上述为民族过程的两个方面，后者正在发展之中。这一切皆为最后融合开辟了道路。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各民族的融合已近在眼前。但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压力和对政治现实的认识迫使其继任者把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取得全球性胜利的遥远未来。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建国60周年的讲话中声明：“民族差异在阶级差别消灭后相当长时间里，仍将存在”。因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主要政策偏重于“接近”。然而，苏联领导人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事与愿违，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苏联各民族中爆发了。为确保联盟内民族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族际主义战胜

民族主义，苏联正在探索新的政策。

## 以往政策的影响

苏联领导人在实现建设共产主义和保卫共产主义制度两个目标中所采取的政策，都对民族关系及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影响。意识形态上的期望并未实现，民族与族际、繁荣与接近之间的关系并未按预定的路线发展，共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相互往来的增多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激发了民族自我意识，许多旨在促进一体化的政策反而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增长。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多民族的苏联社会中，有五项重大决策对民族自主的发展起过直接影响：①苏联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理论中的合法化；②联邦国家政权和一党专政的两分法；③加速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政策；④在“民族形式”下发展苏联各民族文化的政策；⑤二战后能动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

本文将重复争论的主要方面，并将它们和从对其他地区民族关系研究中获得的理论见解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已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然而，每个民族集团民族目标的实现及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仍被看成是在通向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民族过程辩证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理论赋予民族主义表达以合法性，只要这种表达披着应有的双向对话的外衣。理论上的漏洞成了表达民族要求的渠道。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随着强调民族平等和“地方化”政策的列宁神话的复活，漏洞越来越大。“繁荣”的合法性尤其促进了文化方面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人员都清楚，文化要求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民族自主的征兆，而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展开的文化斗争



不仅在主要加盟共和国民族中存在，在其他小民族中也存在。

苏维埃联邦国家的联邦结构对各民族保持并发展其独立的民族特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最初“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原则之下，只有这种国家结构才能包容国家主要民族的“残余”特性。但是，由于党的结构——它实行单一制，并且是普遍的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者——和国家结构是并行的，都以地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因此在实际中，各共和国的党政机构合而为一，并成为民族精英分子提出民族要求的渠道。正如印度、加拿大和其他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中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民族界线和行政界线的重合导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与社会经济、政治机构的同一化强化了各民族在社会价值分配竞争中相对地位的观念。由于战略功效和民族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需要按照民族的而非机能的方式聚合起来。

苏联少数民族民族性政治化的倾向还受到另一方面的刺激。首先，社会经济领域中自治子系统的缺乏，排除了各种利益以机能的方式结合起来；第二，自相矛盾的是，国家政权及其相关的官僚机构和民族集团等同划一，并且成为利益组合及表达的唯一渠道。苏联制度的集中化性质和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原则迫使许多政治斗争在暗中进行。但是，各加盟共和国和“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冲突在60、70年代愈来愈明朗化。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文化领域以外，民族主义的要求在人员安排、投资及资源分配诸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是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保存和有利于民族“繁荣”政策的副产品。按照起初的设计，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作为社会化载体的民族形式，以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内容。但是，随着民族文化形式——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它们越来越变成每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象征。这

一点尤其如此，因为如前所述，所谓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内容往往是和俄罗斯价值体系及文化标准的渗透同步发展的。

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这一公式正好倒了过来。莫斯科所强加的一律性，将民族形式汇集到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尽管其内容因民族不同而不同。

苏联的现代化政策产生了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结果。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家及早期西方现代化专家的设想，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将会解体，其传统的、特殊的、民族的特征将被共同的现代“特征”及价值体系所取代，而在多民族的社会中，“现代”特征及经济体系往往等同于最先进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特征及价值体系。然而，在实际中，这种影响却使传统的民族特征在现代基础上获得了复兴。从广泛意义上讲，尽管努力推行平等化，但现代化最初阶段的影响却使不平等延续下来，而且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差异感亦愈来愈强烈，民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平等的期望被唤醒，但由于他们起初就占优势，发达民族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较多的实惠，而获利最多的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同时，竞争日趋激烈，一种相对的失落感影响了其他民族。至现代化第二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面对来自以前从属民族的新的竞争，不是其他民族而正是统治民族开始产生失落感。无论哪个阶段，民族冲突都在加剧，对抗态度越来越多地通过新的精英分子（现代化的主要产物）表达出来，并开始影响到社会、政治组织。

在苏联，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确实使各民族集团相对地位的不平等延续了下来，并强化了他们的差异感。除西北部波罗的海的两个小民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之外，俄罗斯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民族。同时，民族期望的觉醒，激发了少数民族相对邻近民族和占统治地位民族的落后感，其要求越来越多地表达出来。近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已进入现代化第二阶段，经济指数

上的差距开始缩小，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报怨越来越多地来自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因此，与苏联理论家的预料相反，平等化和族际化似乎都没有对民族均衡化或民族和睦有何裨益。

中心——边缘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苏联。总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边缘的倾斜面似乎全部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俄罗斯中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占有优势。这种倾斜面对穆斯林各共和国来说也重合在一起，尽管（由于其文化的复兴）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文化优于俄罗斯文化。在摩尔达维亚、白俄罗斯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民族和散居的民族集团中，情况也是相同的。但是，就文化而言，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情形并非如此，在经济文化领域里乌克兰也并非完全这样。波罗的海各民族的现代化水平高于俄罗斯民族，从文化上讲他们是斯堪的那维亚和中东欧文化的一部分，而政治上却屈从于被他们认为是在文化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这尤其使他们感到耻辱。他们的怨愤是导致西部边疆地区民族主义和民族要求，包括分裂主义的主要因素。

民族不满情绪还产生于苏维埃化过程中对俄罗斯文化的联想。正如前述，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征（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民族标志）已被与“现代性”文化等量齐观，而且正如“老大哥”理论所表明的，被认为优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实际上，苏联的民族组织模式（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和几乎同样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的结合）似乎已成为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催化剂。而这似乎又反过来刺激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及其好战性的复苏。

最后，二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亦助长了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意味着其对民族自决原则的重视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团结高于民族忠诚这一论点在苏联国内似乎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而且，苏联内部的民族政策和苏联对其阵营内兄弟国家以及对世界范围的转向“社会主义方

向”国家的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苏共中央认为，决定国内民族政策的一些设想也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活动方式，国内取得的经验教训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同时，苏联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受到阵营内发生的事件的影响。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1980—1981年的团结工会运动都对苏联西部地区产生了影响，而且其反响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阵营外部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伊朗革命和苏联侵占阿富汗对苏联内部穆斯林影响之深远只有到现在才能看得出来。

有些时候，如何对待某个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会引起反响。这方面最显著的要算苏联国内犹太人及散居的犹太人的例子。此外，在苏联的德国人陆续迁回西德也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亚美尼亚人也是这方面一个潜在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跨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如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们在中苏抗争中被当作工具而加以利用，而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则在苏联侵占阿富汗时被利用，如此等等。

从上述回顾中可以看出：主要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无疑已被激发起来，并且不断地增长。受其影响的主要是加盟共和国民族，此外还有一些自治共和国民族，诸如鞑靼人（多数居住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地区以外）、雅库特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但对一些小民族的情况尚知之不多，因此，不能作出结论。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苏联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苏联修改宪法之所以延宕了这么久（20年），我认为，应该归因于对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和国是否已经过时、地区经济利益是否高于民族要求等问题无休止的幕后争论。有关争论的情况从苏联报刊上可略窥一斑。从结果来看，共和国派官僚要求维持现况的选择占了上风。在过去的20年中，土著精英分子在本共和国内享有的权力与日俱增（中亚地区的情形尤其如此）。尽管受到共

和国范围、重要性程度及权力交替危机的制约，代表制在全联盟水平上有所改善。

## 当代状况

### 理论修正：民族及民族倾向

苏联民族关系理论必须适应近来膨胀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调整的主要担子就压在苏联民族学家的肩上。调整的第一步就是解释列宁提出的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时期，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辩证关系的理论。调整的第二步是：推出新的民族理论，即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社会经济历史变迁的积淀）的理论。调整的第三步是阐释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民族过程既按照列宁的辩证法解释了少数民族的现实，又提供了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的方针路线。最后一种解释将决定苏联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三种主要趋向区分开来：巩固与同化是辩证理论中民族主义的成份，接近则反应了族际化过程。

“民族的巩固”是第一种趋向，它与政治原则中的“繁荣”是同义语。第二种趋向是同化，它是民族巩固过程的相反方面，它也有助于苏联各民族的一体化。第三种趋向是少数民族民族特性由传统的物质文化向新的“精神”，即现代文化“快速转变”，这和接近过程相一致。“接近”现象是注意和研究的焦点。

一个民族具有一定的民族集团的所有特征。

除具有共同的起源观念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的地域意识之外，一个民族主要的特性应包括语言、日常生活文化（包括习惯与仪式）、口头创作表达形式以及诸如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更

重要的被看成是一个民族恒定表现形式的“自我意识”等心理素质的特殊方面。事实上，自我意识被看作是民族的关键特征，是导致某一民族的成员透过自己文化价值的棱镜审视其他民族“我们——他们”两分法的根源。这些概念都是由苏联民族学家刚刚提出来的，它们和西方的概念有些类似，都普遍接受了上述文化因素作为民族存在的标志。特别是自我意识，它被认为是一种关键性的必要变项，一旦和民族性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民族主义，它是民族存在的必要前提。

然而承认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自我意识是民族不可改变的要素（并不随历史的辩证进步而变化），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现在苏联人士也承认：即使在其文化已被同化到占统治地位民族文化中去的集团（精英分子？）中，民族自我意识仍然存在。“……众所周知，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沉淀可以不受传统生活文化成份保存程度的影响，甚至可以在这些（传统成份）丧失之后形成”。

以上各种概念构成了民族问题研究新方法的基础。民族即“种族社会共同体”，其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民族的和经济社会的。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认了由于民族是不可改变的，因而其民族的方面基本上不受控制。然而，社会经济方面可以改变，以促进合乎需要的变革，这是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再现。正如布罗姆利院士所指出：职业（现代）文化比传统文化对民族过程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侵蚀。下面的研究将表明，对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最细微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当务之急。直接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和建议成为迫切需要。因此，出现了一些介于人种学科和其他传统学科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如：人种社会学、人种心理学、人种语言学、人种人口统计学等等。

苏联有关人士认为：巩固和同化的趋势在1926~1959年间达到高峰。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民族数目呈下降的趋势：1926年194个，而1959年仅109个，至1970年~1979年间降至104个。据说，民族的定型化得利于对抗性社会阶级的消灭。强大的民族在巩固自己“民族”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同源的和弱小的民族集团。

估价这一趋向的一种手段是分析某一民族的地区聚居程度（即仍居住于传统民族区域的其民族成员的比例）的变化。按照这个指标，俄罗斯人居住在传统地区的人数一直在减少，这种情况意味着俄罗斯文化在全苏的扩张。1926年俄罗斯民族有93.4%的人口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但1979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仅占俄罗斯民族总人口的百分之82.6%。居住在其他民族区域的白俄罗斯民族的人数亦呈类似的下降趋势。据说，1926年以来，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一些民族“居家”的人口比例一直在升高，而其他一些民族，如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阿塞拜疆人等，其聚居程度1926~1970年间较高，但1970~1979年间却在降低。一些自治共和国民族（例如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聚居程度有大幅度下降。总的说来，亚美尼亚人聚居程度最低（1970年为60%），格鲁吉亚人聚居程度最高（1970年为9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的传统居住区域已跨越了共和国的界线。因此，聚居程度相对低未必意味着民族巩固程度低，这对穆斯林及高加索民族而言，尤其如此。

多数情况下，同化趋势即意味着俄罗斯化。这对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和居住在俄罗斯人占绝对多数的城市或工业中心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但是，由于60、70年代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和其他民族中自主意识的产生，同化也意味着周围文化强大的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吸收。文化的契合、语言的变化（语言同化或两种语言并用制）、通婚等都对同化起到推动作用。

文化同化的速度取决于某一文化、语言与占统治地位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近程度，取决于居住模式如何及文化的内聚力如何。散居的城市化程度高的民族成员往往比聚居的农村人口更易于同化。在其民族地区以外居住的个人或集团同化的速度最快。人们认为：语言同化是民族同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并不意味着民族的改变。两种语言并用制被看成是民族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民族通婚的家庭中，其子女可以选择父母任何一方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联邦，如果父母中一方为俄罗斯人而且居住在城市里，子女选择俄罗斯民族的占绝大多数。在其他共和国中，命名民族则似乎颇受欢迎。据报道，加盟共和国民族中通婚率最高的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城市（1/3）。但是，在其命名民族占少数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中，如莫尔多瓦和哈卡斯，通婚的比例更高。苏联及西方人士都认为：城市化、语言变化，通婚和民族交流等等均为有利于同化的因素。

无论怎么说，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加盟共和国民族中最易被俄罗斯化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民族国家形式和人口环境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就两个民族而言，居住在民族区域以外的个人的同化程度比居住在家乡的人要高。在各共和国中，东部各共和国民族比新并入的西部各共和国民族（二战期间）同化程度要高得多。由于穆斯林民族、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化的强大力量和内聚力（尽管较小的穆斯林民族往往被周围占多数的穆斯林民族所融合），中亚地区及高加索地区的同化指数最低。威克斯曼指出，尽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人长期定居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尽管俄罗斯民族成份高度渗透，但语言上的俄罗斯化仍然很低，正如塔什干（乌兹别克首府）的情形一样，即使俄罗斯人占城市人口的40%。显然，他得出结论说，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要比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更易于俄罗斯化。早些时候，布赖恩·西尔弗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并得到其它西方和苏联学者研究成果的



支持。根据苏联学者的观点，同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有：莫尔多瓦人、卡累利阿人、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威普斯人、卡尔梅克人、科米——彼尔姆人和乌德穆尔特人。若要找出易于同化的民族，考察一下人口普查中语言指数是很有帮助的。凡是逐渐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放弃使用两种语言（俄罗斯为第二语言）的民族都明显地正在经历语言上的俄罗斯化。

苏联社会学研究资料表明：俄罗斯化并不是当今语言同化的唯一类型。比如，散居在乌克兰的民族（波兰人、犹太人还有俄罗斯人）正在被同化到乌克兰语言中；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中，一些土著小民族把乌兹别克语当成自己的语言，并且最终也把乌兹别克族作为他们自己的民族。类似现象在其他共和国中亦有发生。

有益于同化的因素也促进了日益接近——族际化趋势。俄罗斯移民是接近的最强大的促进剂，并且促进了现代化和族际化。这些因素都是社会经济变革的源泉。由于社会经济变革被看成是族际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接近倾向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接近的本质就是要把物质文化领域中的民族特殊性由传统王国向现代王国转变。在其对文化的影响方面，它被称为“民族一体化”，而且它事实上是民族过程中民族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之间关键的“环节”。“接近”被看成是当今苏联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人民”形成的基础。（1971年苏共24大上，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宣布，在苏联已经形成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正如布罗姆利院士所言：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民族间的接近（都伴随着文化的接近），是民族一体化过程的基本实质。

## 俄罗斯人：变化中的作用及观念

在“接近”的过程中，俄罗斯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吸引其他人，他们成为同化的焦点；他们向全苏各地移民促进了城

市的发展和工业化。然而，由于其人口活力减弱，而其他民族，尤其是苏联的亚洲人口活力却在不断增长，从而使俄罗斯人的影响作用相对减弱，其在边疆地区的主导作用亦受到削弱，接近倾向失去了起初的发展势头。

最近，一项关于俄罗斯人口及移民的有趣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其作者卡布赞和勃鲁克把俄罗斯民族1917年之后的人口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17年革命，结束于50年代。这是发展与具有活力的阶段。由于高自然增长率和同化，俄罗斯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增长迅速。在这一阶段中，人口流动性大，大量俄罗斯人从苏联的欧洲部分迁徙到亚洲部分。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人口活力开始停滞。五、六十年代期间开始减弱。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锐减（据某些估计，其人口增长率将呈负增长），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也减弱。西方人士既肯定了人口的减少，也肯定了移民格局的变化。罗兰报告说：1959—1979这段时间内，俄罗斯人口外向性移民急剧减少。向南部地带的移民微乎其微，相反南部和东部的人口开始反向迁移，向西北部和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仍保持其势头。

但是，1971年以来俄罗斯移民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俄罗斯联邦之外居住的俄罗斯人有半数是苏维埃时代的移民或移民后裔，移民的特点是向城市迁移。勃鲁克和卡布赞指出，1979年在俄罗斯联邦中，俄罗斯人在所有的区和州以及在5个自治共和国、4个自治州、8个民族区中都占绝对多数。他们控制着城市和工业中心。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在哈萨克共和国中占多数，在拉脱维亚占人口的1/3多，在爱沙尼亚、吉尔吉斯占人口的1/4多，在乌克兰占人口的1/5多。只有在高加索诸共和国及立陶宛共和国，俄罗斯占其人口的比重不足1/10。这些数字足以表明俄罗斯人对绝大多数地区土著居民及同化作用的巨大影

响。正如勃鲁克和卡布赞所指出的，我们完全可以说1917—1979年间俄罗斯人口增长总数的31%（1890万人）或几乎1/3是同化的结果。

但是，由于俄罗斯人的影响明显地减弱，有利于其领导地位和促进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开始减慢下来，甚至在逆向发展。如上述，俄罗斯民族的同化速度开始减慢，穆斯林民族的人口爆炸危及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的多数地位。尽管连续几次人口普查表明，俄罗斯人绝对多数的地位下降很小（1959年占54%，1979年占52%），西方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事实上俄罗斯人口只是勉强超过半数而已。1926—1959年间，俄罗斯人在加盟共和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对命名民族而言，一直保持增长，但现在这一趋势除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外，已经在逆向发展。

由于习惯了在俄罗斯联邦内和苏联其他地方的支配地位，俄罗斯人现在开始认识到自己在非俄罗斯共和国中作为少数民族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形势，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增长以及相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感情的发展而加剧。观察家们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正在觉醒，并在社会各个阶层：从流亡者到持不同政见者，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到军队及党政干部中表现出来。人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俄罗斯文化传统和价值（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并产生了一种日益强烈的衰落感（从人口和遗传上）。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自己被国家当成工具利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与苏联的少数民族关系中及与东欧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成员的关系中，“老大哥”的负担（以俄罗斯的资源支持年轻的兄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憎恨。而就苏联的未来而言，问题的关键似乎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增长，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目前在俄罗斯人中间传播着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俄罗斯民族利益和福利与政府族际主义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

## 接近的现实：问题的领域

正如苏联有关方面人士所承认，由于俄罗斯民族失去其原有的活力，由于苏联主要民族民族文化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具有自己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民族精英分子，一体化的势头已经放慢。少数民族势力日益强大，使苏联观察家们不得不承认，辩证地说，接近是与民族集团的持续发展相一致的（尽管处于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并不会导致其消灭。伴随这一更现实的估计，对“接近”的一些主要问题（趋向和现象）的更为公开的讨论出现了。

苏联决策者更为关注的是人口统计中表明的发展趋势。1959—1979年间，苏联各民族人口增长率的差异导致了斯拉夫和亚洲各民族在总人口中相对比重的变化。斯拉夫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77.1%降至72.8%，而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则由11.1%升至15.2%。布罗姆利告诉我们：

“在绝大多数的地区，尤其是在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白俄罗斯民族、波罗的海诸民族及其他一些民族的欧洲部分中存在的状况，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近年来其迫切性与日俱增。……〔这是〕向一个或两个孩子家庭的过渡。……〔作为比较〕中亚、哈萨克和阿塞拜疆的土著民族的人口增长指数为全联盟平均指数的三倍。”

现代化程度低、文化疏远程度高的那部分人口的膨胀只会给人力合理布局造成困难。这一点在苏联武装部队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一问题由于穆斯林民族城市化程度低（1979年，乌兹别克民族城市居民占人口不足30%，而吉尔吉斯仅有20%）并继续拒绝迁往城市而日趋严重。近20年来，中亚地区农村人口增长了37%，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农村人口则减少了22%。据说，其原

因是文化上的，直接与穆斯林民族墨守传统、轻视俄罗斯语言有关。这种观点早已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经济因素同样对这种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移民格局具有影响作用。中亚盛产棉花，这是一种经济作物，因而中亚居民收入颇丰；而且，对穆斯林而言，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和温暖的气候更为舒适。相反，俄罗斯欧洲中心地区的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很低，而且气候条件差，土壤贫瘠且无专业化作物。无论如何，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减少到令人惊讶的程度，留在农村的只有老年人和妇女。

教育水平及俄语水平的差异，作为劳动力恶性分布的主要因素，被反复提出来。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中，劳动力分布和土著人口流动性差的问题是1981年5月20—30日在巴库召开的全国民族关系研讨会上（受苏共26大委托召开的）几篇论文的中心议题。布罗姆利指出，在受过教育的合格青年比例高的地区（如俄罗斯联邦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工厂陈旧不堪，过时的经济结构使许多合格的青年找不到工作。然而，中亚地区虽具备现代工业设备，但当地的青年人却缺乏技术，许多人“缺乏普通的文化、职业素质”。简而言之，他们不具备“城市文化”。

若要参与社会主义（工业）经济部门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俄语（双语）至关重要。同时，它对接近倾向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讨论的侧重点在非俄罗斯人学习俄语的人数增加了多少，现在却反过来讲不学俄语的人数有多少。因此，有人反复指出，苏联人口中有40%的非俄罗斯人不能用“族际交际”的语言交流。在有些共和国中，“50%以上的人不会讲俄语”。更有甚者，我们听说，在一些共和国中存在着一些奇怪的现象：“中年人的俄语反而比青年人的要好”。据说，这种现象在中亚的农村、高加索诸共和国及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中尤其如此。这足以证明传统文化的强大和苏联几十年教育努力的失败。

80年代初，民族交流对一体化的影响和“族际化”环境的效

果问题似乎受到人们更为道德的审视。权威性观点认为，族际化（即武装部队及社会生活创造的多民族的工作环境）本身就会促进一体化，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一种日益接近的背景。这一设想已被否定，尽管族际主义背景仍然是“培育族际主义精神”（引自安德罗波夫苏联建国60周年讲话）的最佳土壤。社会学研究表明：某个特定的多民族环境中民族间交流的积极作用决定于共同体中能否存在一种“长期友好接触的经历”。在异族人主动移居的“新的”劳动组合、专区及城市中，民族差异往往表现得格外突出，各民族意识到了他们在文化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事实上，民族接触的增多反而激发了相互交往的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因此，“有必要进行主要的教育工作和实行得体的干部政策，同时必须特别周全计议，以满足相互影响的各民族的文化需要。”

其结论是：需要有一种重视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和传统背景差异的方法来灌输族际主义价值观念。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由于无知而抱有民族偏见。然而，必须承认，教育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对待其他民族的积极态度。假如产生像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那样受教育的青年人过剩，而工作缺乏这种现象的话，随之便会产生“可能会影响民族态度的竞争形势”，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甚至会产生“职业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想法”。这种观念“移植于民族的土壤中”便会产生民族对抗。进一步讲，对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研究表明，城市中多民族成份的增加并未“消除”民族差别。一位来自格隆齐（高加索北部主要油田基地）的科学家在1981年的巴库会议上报告说，对多民族劳动组合的广泛考察表明，甚至为民族交流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也不会把民族交往扩展到社会领域。

因此，通婚率低是不足为奇的。然而，民族间的通婚则被看作是“接近”的主要媒介，是培育族际主义态度的积极现象。然

而，通婚的人数少（1970年占结婚人口的13.5%，而1925年则为25%），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同源民族之间（如斯拉夫人嫁娶斯拉夫人，穆斯林同穆斯林结婚）。不管怎么说，有些通婚并不能为“族际主义价值”的发展创造“适合的气候”。

3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注明持有人民族类别的内部护照制度对一体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用苏联一些学者的话讲，这构成了一种“法律心理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公民的民族出身决定于父母的民族，不可变更。只有那些通婚家族的子女到16岁时才有选择自己属于父母哪一方民族的权利。如上述，在某个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里其命名民族颇受青睐。护照制度在复活民族差异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尤里·卢雷和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所写的有趣文章的重心。后者是受过苏联教育的社会学家，现在西方定居。对这个问题苏联有关方面刚刚提到，在西方研究者那里也受到忽视。

承认族际主义环境会激发而不是弱化民族冲突，这很可能是由于俄罗斯人（及其他移民）抱怨在民族共和国中受到不平等待遇而促成的。有人一再呼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保护“非土著移民”的利益。这些呼吁在苏共26大及其他许多场合都出现过。鉴于苏联过去在民族区域只为土著居民设立文化机构，这确是新的有趣的进展（俄罗斯人的文化设施总的说来遍及苏联农村地区）。这种要求的提出是由于俄罗斯人看到土著特权阶层所享受的优待遍及到他们的人民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以及吸引从文化上讲在他们看来是“异邦”的非俄罗斯人（特别是穆斯林人）到城市或工业中心去的需求而引起的。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都只能看成是向民族“繁荣”作出的让步，是“接近”的倒退。

苏联有关方面的研究表明：家庭，特别是农村的家庭，是传统社会文化的根源，其影响迄今没有减弱，甚至有增强的趋势。布罗姆利指出：家庭是“民族的支柱”，它“创造了价值体系”，并

在“实质性部分”中“决定社会行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化如此广泛，并认为已造就出了“新型的苏联人”和“苏联人民”的国度里能承认这一点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布罗姆利接着说，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家庭纽带的松弛有利于移民，而中亚人传统因素的保存则制约了他们的流动性。进一步讲，尽管农村家庭生活因民族制度的差异而不同，但总的说来其特点是和外界接触少，同等人的压力大，而这些正是社会控制、集体和家庭利益统一（以个体经济的形式保证家庭的经济利益）的有效因素。尽管城市的族际主义环境中存在种种缺陷，布罗姆利写道，但正是在那里“职业”（现代）形式的民族文化由于其他文化渗透而得到“丰富”，并带上了族际主义的特点。然而，村庄倾向于扩大单一民族的特点，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因此，为了恰当地控制民族过程，存在于职业物质文化（1/3的农庄有了电视）的族际化过程应特别引起重视和研究。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布罗姆利还承认：源自于乡村的价值观念往往在城市化或家庭生活衰落之后仍然存在，“尽管家庭衰微，尤其是对白领阶层及具有高技能的蓝领工人而言，……民族差异始终存在。”这里布罗姆利指的似乎是南方诸共和国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来讲，这也指的是乡村生活地位的提高和民间文化艺术（如民歌）“名副其实的复兴”，后者“在某些情况下”带有某些“民族象征”意义。人们已经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传统成分的保留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调节家庭的大小、子女多少及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程度。

## 民族精英分子的作用

很明显，新生的民族精英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巩固和接近



两种交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精英分子，或者没有被统治民族同化的精英分子，一个民族就没有内聚力，也没有表达民族要求的渠道，亦即没有民族自我意识。苏联有关人士认为，土著民族精英分子是“接近”的体现者，因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接受的教育，并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与其他民族有共同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起初，他们只是从事“创作”及行政管理的那部分优秀分子。后来，到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许多共和国中，“工业及科技”界精英分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苏联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作用并不明确，因而难以解释。他们是代表本民族的巩固呢？还是服务于莫斯科的族际主义利益？事实证明，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物除名字外，已完全被同化到俄罗斯民族中去了。但是，同样，也有证据证明，正是这些人物才是他们民族自我意识的代言人，向中央当局提出民族要求的表达者。他们还倡议在自己的共和国内实行有利于自己民族的政策。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是苏联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维护这种制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制度限制（他们努力使其限制放松）范围之内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权力和自主。在与其他民族为某一特殊利益竞争的斗争中，对他们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无疑，许多人被同化，那些在本共和国之外的全联盟官僚机构中做官的人即属此例。

但是，机会主义的、心理的及政治的原因阻碍了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永久性同化。有一种战略功效上的争论，即：他们的事业和自我保护取决于与其选民成就（如果不一定是利益的话）一致。甚至在那些受同化最严重的人中仍然对其出身的民族及其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上的赞同。而且，真正的同化并非轻而易举，对那些非斯拉夫人尤其如此，况且还有普遍存在的护照制度。同样，即使在自己的共和国中，土著精英人物仍居第二把交椅，地

位远不及中央的代表（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和四、五十年代相比，各共和国官僚机构中“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数大大减少。但是，他们仍身居要位，比如任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二书记，掌握着共和国的人事政策，是莫斯科和共和国之间的纽带。除个别人之外，要想进入莫斯科权力核心并非易事。“一朝为少数民族，永远为少数民族”的观念使那些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只有依靠传统遗产和民族选区选民的支持才能巩固其地位。

其他多数民族社会的经验表明：传统文化特性的遽减或丧失与一民族政治地位的降低没有关系。事实上，民族的战斗性往往是从被统治民族文化高度同化了的精英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一观点，如前所述，在苏联得到证实。同化和接近事实上非但不能保证一体化，反而会预示更强的战斗性。最后，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地位意识相对国家制度而言，本质上是有活力的，并取决于制度现在的力量和生存性。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俄罗斯民族人口和政治活力的丧失无疑是促进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少数民族要求加剧的主要因素。

## 政策联系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这在苏共26大及后来的会议上均有表现。1982年12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带有关注和紧迫的基调，它不仅引起有力的反应，而且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前所未有的坦率的讨论。这种坦诚也反映在1982年—1983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在1983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除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之外，还着重讨论了民族问题，特别指出了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以便制订恰当的政策措施。

正如布罗姆利所概括的，论证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

“一种比先前假设更为复杂的少数民族及民族发展的图景〔出现了〕……大量〔研究〕材料首先表明：伴随着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族际化的总趋势，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口以及其他领域中，还产生了一种某种程度上在日益增长的分化趋势。”

对民族问题的“新研究”，发现了一种更为完善的途径，一种更为分化的政策及更高程度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安德罗波夫执政的短暂时期内，民族政策新趋势的主基调通过总书记本人之口讲了出来。

“〔保证〕当代民族自我意识不会发展成民族自傲、自大，不会滋生分裂倾向及产生看不起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仅仅用过去的复活来解释〔民族意识的高涨〕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在此问题上〕工作方法不当的结果。这里任何细节都是重要的：人们对待语言和历史遗迹的态度，对历史事件的处理以及我们如何把乡村变成城市和我们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生活条件〔都很重要〕。”

安德罗波夫的政策似乎比其前任的政策更具有真正的“族际主义”特征。至于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只是一位过渡性人物）是否会执行新的路线，还是回到已故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重视俄罗斯化的路线上来，仍需要观察。但是，民族问题依然存在，离心力在不断加强。

1983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向民族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提出了与新的方法相联系的任务，要求他们对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繁荣”与“接近”两种趋势及“相互丰富”过程，找出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法。同时，特别注意民族过程的总趋向和基本方向，以及辩证相互作用中的“具体机制”，找出并分析民族过程中促进和阻碍民族性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联系的特殊条件、行为及因素，研究不同地区城市及农村民族关系的特殊动

力，研究非当地民族发展的条件及语言、文化、生活方式诸方面的问题。

社会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与政策的联系明确了。全会要求他们为具体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而且，全会许诺他们建立一个向上传达建议的新机制。但是，新的机构的细节问题并未解决。然而，决策者之所以这样做，其意图可能是要为学者和莫斯科的联系疏通渠道，保证他们不受地方利益当局的干预。全会要求中央对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进行统一协调。

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用安德罗波夫的话说，这是“自伟大的卫国战争以来最坏的事情”。对国内原因的描述听起来也具有类似的调子，即：必须反对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无阶级方法、宗法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以及必须利用实际生活中的积极传统。

对民族过程社会（国家）控制的强调和对行政方法的强调，清楚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劳动力问题、语言政策以及家庭生活方式、习俗和传统。

劳动力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契尔年科（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中央全会的主要报告起草人）抱怨说，已不可能完全调动后备劳动力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这表明了劳动力问题难以驾驭的特征。中央全会（以及26大）认为，需要“研究特定地区之间劳动力转移〔后备劳动力的重新定居〕以及〔直接〕控制人口形势的可能性。劳动力问题的民族性方面显得多么重要”。

对劳动力问题民族方面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不同民族“劳动习惯和传统”及乡村民族社会过程的“深入”调查，而且包括对家庭规模差异问题的分析。为了鼓励低出生率地区增加生育，政府给予二胎和二胎生育以家庭津贴。但这仅仅是人口问题社会控制的第一个步骤，因为，正如布罗姆利坦率指出的那样，家庭津

贴对于刺激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扩大家庭规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长期研究劳动力问题的人口学家V·I·佩列韦登采夫在1981年巴库会议上表示赞同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控制，但他也认为，地方采取的措施，即促使中亚青年农民进入城市而不是把劳动力从劳动力剩余地区迁移到劳动力缺乏地区的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些措施应包括更好的俄语教育、乡村的“城市技能”教育以及靠近乡村建立新的企业。据报道，许多与会学者支持后一种建议。佩列韦登采夫几年来一直倡导这种解决方法，但迄今为止，投资类型和重新定居的谈论都没有表明这种解决方法的可行性。相反，据报道，在俄罗斯联邦技术学校培训中亚青年人的试点项目，为的是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定居在那里。

语言政策，特别是推行两种语言并用制(即掌握俄语)，已经与劳动力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1983年6月中央全会的报道表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非俄罗斯共和国中俄语学习的法规。当地的报道表明采取新措施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主要的是在于对操俄语士兵的需要。苏联著名的语言学家M·N·古博格洛在巴库会议上建议，社会控制应不仅适用于两种语言并用制，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细节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这个建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支持这个建议，有人则反对。

最后，关于家庭生活、习俗和仪式的研究以及社会过程对家庭生活和民族因素影响的研究问题，也是6月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全会对“苏维埃化”习俗、仪式(我们不能无视这种事实，即在各个时期，新仪式都受到了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异己的习俗和传统的侵蚀……)及同宗教的影响(仍然处于宗教影响下的人口不只是一小部分，这种宗教的影响受到了意在赋予宗教反苏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外意识形态中心的支持)的斗争。

——因此需要研究——给予特别的重视。

## 结 论

一项对民族性的总体研究表明：当今民族性的政治力量是“内部和州际冲突最强烈、最强大的因素，这种冲突取代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今天，它辩证地坚持自己作为主要的立法者和政治权威的挑战者的权利。”无疑，过去的几十年中，民族变项作为社会、政治的主要参照点已经在苏联出现了。这是苏联资料的讯息，并为西方学者对苏联流亡者的访问和调查有力地证实。苏联最近关于民族社会过程的材料证实了以前我们的假设，即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增长比一体化更加迅猛。

然而，同化趋势和一体化过程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除。为了真正地“解决”民族问题，三个斯拉夫民族的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它们团结起来，尽管穆斯林地区人口爆炸，斯拉夫人也能构成国家人口的绝对多数。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力宣扬三个民族具有共同的祖先。当然，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易于被同化，但也存在着强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三个波罗的海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公开和最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国家充满了俄罗斯移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可能已濒于人口灭绝的边缘。更小的民族继续俄罗斯化，并且尽管俄罗斯人口在下降，但到2000年，俄罗斯人口仍将构成苏联人口的微弱多数。

然而，裂痕继续加深，民族主义与许多更明显的问题相比也许是苏联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它的严重性继续增加。目前，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对国家的稳定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可测的变化。它可能受到国内力量

平衡变化以及影响或摧毁这种平衡的外部发展的激发。随着好战性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与社会不满的其他原因——经济短缺和管理不善、生活水平恶化、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信誉的完全丧失，特权阶层引人注目的消费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或者严重的无能和腐败——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动力，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体产生了，只需一个火星，它就会燃起熊熊烈火。





## 第二部分

### 民族主义与苏联政治与意识形态



## 第四章

# 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 列宁的民族理论与苏联的民族政策

列宁主义在地球上传播、扎根的70年里，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同时又带来许多问题。

在俄国，“人民”的概念除具有通常的“人民”的含义外，还具有“民族”的意思。“人民”具有宗教色彩，是具有同样信仰的人的组合。“人民性”具有浪漫的欣喜的意味，它扶持了圣彼得堡沙皇官方的民族主义政策，助长了斯拉夫优越论者和民粹主义的空想，使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反对圣·彼得堡开明传统）的沙皇政治制度以及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反抗运动都合理化了。

“人民”这个神秘的字眼，自从产生以来，一直含混不清，结果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它可以指民族，按官方的观点，包括帝俄的边疆地区，而非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加强了解放运动；它可以指人民，但它与西方化了的阶级与国家完全不同。基于这两种含义，“人民”仍保留其神秘的色彩，具有无上的价值，使众多的人为之献身。

列宁认为，对“人民”的两种理解可以统一在同一全面的理论体系中，并可在实践中为共产主义者利用。由于“人民”是个社会概念，列宁认为，其通常人民的含义亦混淆不清，需要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解释。在他广泛研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第一部著作中，列宁把人民的概念与民粹主义滋生的村社割裂开来。相反，他看到的是一系列阶级，或“社会阶层”，它们服从于，也应该服从于最优秀的阶级——无产阶级。同时，由于“人民”还可指民族，他自然认为，人民的概念应服从于阶级斗争。在人们所接受的这个词的两种含义中，人民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然而，只有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才能运用这一力量。“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

因此，民族问题亦成为马克思基本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所指的民族，是一个部分地由阶级组成的社会实体。是由哪个阶级组成的呢？是资产阶级。根据列宁的观点，应该“严格区别”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民主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运动是包括所有阶级参加的群众性运动。第二时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导特征。斯大林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总结：“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但是，这种运动的基本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运动。

这一理论阐明了民族外表之下阶级的主要作用，揭开了民族运动虚假统一性的面纱，说明从根本上讲民族运动即阶级的运动。它指导无产阶级利用这类冲突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能够利用的民族斗争。无产阶级是国际性的，因为资产阶级篡夺了他们的国家。但是，在不失去跨民族目标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必须夺回理应属于它的民族。当革命斗争结束，当全体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整个国家都置于无产阶级控制之下的时候，“人民”双层含义之间的矛盾会随之消失，它可以不加区别地指人民和民族。

这就是列宁主义观点。党代表阶级，阶级领导民族，就是这一观点的实质。因此，在实践中，党根据其总政策，决定是否利用政治斗争中的民族主义力量或者阶级力量，或者两者并用。阶级和民族不再是自立、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实体，相反，只是总体理论及意识形态僵化语言中存在的抽象概念。

以上基本的理论阐述，足以勾勒出68年来苏联民族政策的轮廓。

## 大俄罗斯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前期，列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立布尔什维克党在新型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打碎了旧国家，喊了一阵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之后，没有中间过渡，便进入重整军队、改造传统统治机构阶段。不少旧军队的军官以及政府机关人员怀着各自的动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他们有的希望恢复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减少犯罪；（2）有的抱着爱国思想，害怕在这新的“多事之秋”失去几个世纪以来建设取得的成就；（3）有的抱着民族主义的态度，以期拯救统一、不可分割的俄国，即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为最后一种动机提供了理由。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恢复单一政权对旧帝国内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这足以满足民族主义倡导者的最低要求。布尔什维克主义

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盟就这样形成了，而且这一联盟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主要道德力量，迄今仍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大俄罗斯联盟很快吸引了像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的极右的非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平等的，也不认为斯大林主义中在民族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有一种进步的融合。事实上，党仍然是联盟的领导者并懂得如何保持列宁所建立的党—阶级—国家的从属关系。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帝国的保持和扩大）而被抛弃。对党来说，问题是按照恰当的等级保持“党—阶级—国家”的等级。多年来，主动与俄罗斯“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本身进行斗争，显然是必要的。反对沙文主义甚至反对俄罗斯的斗争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切仅有教育价值，而且只适合那些可能危及党的利益的同盟。自30年代起，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渐地渗透到意识形态中。俄罗斯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党选取可以促进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具有民族意义价值的养料的源泉。例如，彼得大帝成为苏维埃国家推行军事及现代化计划的历史典范；伊凡雷帝成为肃反的先例；巡回展览派的绘画（画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解不开地缠绕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式上的典型；描写俄罗斯光辉战绩，蔑视西方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作品）倍受青睐，具有普遍价值和跨民族意义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受到严格的审查，甚至被禁止发行。

民族主义得到光大，因为它仇视共产主义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它被褒扬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主要力量，把民族沙文主义亦拉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使国家变成与民族主义结成的联盟，并应用它把苏维埃国家政权推行到帝俄的每一个角落，接着又用同一工具，将其形式与统治扩展到边境以外的地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外在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共产主义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

的发展。这在捷克和波兰表现为学校强制学习俄语，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奖励俄罗斯文学艺术而轻视西方艺术。

## 非俄罗斯民族

列宁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要求的利用甚至早于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呼唤。前者被用于瓦解沙皇帝国，后者用于苏维埃的国家建设。然而，1921年3月，重新占领格鲁吉亚之后，所有的非俄罗斯民族都被纳入苏维埃的控制之下。难道这自相矛盾吗？一点也不。列宁于1914年写道，“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一旦这种“一般民主主义内容”的能量释放殆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同反对以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族排他主义”作斗争。正如斯大林在1918年5月初所指出的：“自治是一种形式。全部问题在于这种形式包含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内容。苏维埃政权决不反对自治，它主张自治，但是它主张的是全部政权掌握在工人和农民手里的自治，是各民族的资产者不仅无权执政而且无权参加政府机关选举的自治。”因此，格鲁吉亚人有分离的权利，但必须把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送进监狱，就像对待所有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代表格鲁吉亚大多数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代表这个国家的权利。这种代表权只能属于薄弱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这仅仅因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这一事实。

“如果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在红军的支持下取得政权，就不会要求分离，相反，他们会要求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友谊。”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然而，把共产主义计划与非俄罗斯民族的要求结合起来，仍

旧是一个问题。作为“各民族的解放者”，布尔什维克主义取得了胜利。如何保持这一称号？这里我们遇到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艺术的最基本的成分：妥协。布尔什维克认为，妥协就是一种基于实际的考虑而进行的暂时让步。妥协的目的是坚持理想，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撤销让步，以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新经济政策是政治上妥协的一个例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挽救了国家，为集体化作了准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乃是外交上妥协的例证。1918年放弃大片的领土是为了拯救国家，以达到最终收复的目的；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妥协表现在容许自留地、集体农庄市场及自由市场的存在等；宗教方面的妥协则表现在二战期间主教职权的重新设立。每次达成的妥协，都壮大了党的力量。党一直是妥协条件的主人，只要它认为合适，可以随时撤销妥协。因此，讨论苏联的民族政策，也有必要讨论这一领域的妥协。

普遍意义上的妥协条件和只适用于某个民族的具体条件不同。民族有区域界限，显而易见，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满足。然而，在民族问题上，象征性的东西亦具有重要性。每一共和国在表面上都有自己的政府，拥有自己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部长会议和最高法院。尽管这些条款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但又并非完全如此。这正是主张集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自称为国际主义者，而其对手则称他们为卢森堡主义者）和墨守条文的共产主义者的冲突所在。这种冲突迄今仍然存在，勃列日涅夫修改宪法时，这一冲突更加明显，其中方案之一，就是要打破民族界限，代之以“经济区”。作为共产主义建设的进步措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它未能得到实行。

妥协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与民族语言上。斯大林早就规定：“无产阶级的文化，只要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各民族要根据语言、生活方式的不同，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类的共同文化。”总之，辩证唯物主义是同一的，但对某一民族区域而言，允许其以前的某些文化成份继续存在，也是合理的。

苏联保存了一些地方经典名著，这些著作连同俄罗斯的经典名著，被看成是可以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谐共存的。这一策略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中世纪史诗上并未引起什么麻烦，但却在舍甫琴柯的作品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争议。删什么，留什么，要服从于妥协的条件。总的说来，高层次的文化受到最严格的审查，而且常常受到压制，理由是它会滋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而低层次的文化则是中性的，不会构成威胁。不过，它会导致民族文化向民间文学发展。在遍布苏联的剧院中，政府的职能人员扮成哥萨克人，北高加索山里人或中世纪乌兹别克人，跳起由上世纪或本世纪民俗学家收集并编排的舞蹈，唱起类似的歌曲。传统作品上演代替了这些民族的文化生活，取代了曾一度被城市生活和居民衣着的沉闷单调以及全苏呆板的语言一律所排挤掉的东西。民间文学使这些民族透过历史的棱镜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文化生活，看到了社会主义许诺的人民与民族之间的统一。

除了上述主要方面的妥协之外，还有一些与某个民族达成的特殊的妥协。此处不能一一详细探讨。在某些情况下，对民族的特点作微小的让步是必要的。乌克兰民族即属于这一类。300年来，因为控制了乌克兰，才使俄罗斯帝国成为一个强国。让乌克兰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它人口众多、富裕强大，因此不能与之达成可行的、平衡的妥协。1921年、1933年乌克兰两度发生大饥荒，后又几次遭到清洗，遭纳粹破坏之后，接着又经历了新的镇压和饥荒的打击，结果乌克兰丧失了它的精英分子，失去了它的最主要的力量。乌克兰语言被赶出城市，贬成一种乡村方言。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原因恰恰相反，因为他们

太弱小了。力量的不均衡性并不意味着会作出让步。

然而，在突厥语各民族问题上，苏联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起初，他们遭到大屠杀（尤其是哈萨克人），被巴尔干化和俄罗斯化了。但是，近20年来，妥协的条件发生逆转。伊斯兰教保持了这些民族的凝聚力，人口的增长逐渐把俄罗斯人排挤了出去。他们没有忘却自己独立自主的辉煌历史，懂得时代正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这一倾向使妥协成为中期联盟的条件。这些民族在苏维埃体制的庇荫下，正在迅速发展。也许与和西方接触比较起来，不会给苏联带来毁灭性威胁，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忠诚，给苏维埃政权以极大的帮助。同时，他们正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以期重新确立与苏联的关系。因为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他们乐意顺其自然。

最后，其他民族已经作出了特别安排。曾几经沉浮盛衰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即属此列。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苏联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理由支持旧政权，因为新政府曾许诺解放他们，并让他们免费接受中高等教育。这是苏俄犹太人渴慕已久的愿望。但犹太人的处境还是迅速恶化，至1953年几乎到了“最后消散”的边缘。近几年来，苏联仍缓慢地、无情地对他们施加压力，这体现在对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上。但是，他们得到了虽然靠不住的但却是最宝贵的东西——移民特权。亚美尼亚也许是唯一一个公开地和不断地与苏维埃共产主义合作的非俄罗斯民族，种族屠杀的后果使这个民族的生存处在危险之中。虽然亚美尼亚人受尽苦头，但他们连同那些散居的人口，也都获得了一些重要的优待，比如，最近一些犹太人被解职，他们有机会顶替这些空缺。

## 结 论

在民族问题上，苏联总的政策在它的第七个十年里仍将是积极的，因为苏维埃制度依然存在。但是，维系统一的困难似乎越来越大。

观察家注意到，从总体来看，苏联在民族问题上所作出的让步，产生了一种类似地理的效果。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耕作得更好、更洁净、更像样，生活水平比俄罗斯中心地区高得多。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在俄罗斯地区只能存在于理论中。平行经济形式的存在带动了真正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它吸引和影响着重大的党组织。法庭作出的判决，警察采取的行动，都有利于新的精英分子。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连政治上的决策都要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特权的累加钝化了民族问题的尖锐性，从而使苏维埃体制得以存在。民族独立运动在受到收买的同时，也受到压制，但不是镇压。如果再出现1917年那样的权力真空的话，苏联就会像帝俄一样迅速解体。

从俄罗斯民族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民族地位的下降，会带来不稳定。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得到满足，即统治他人的欢乐、斯拉夫优越论预言家的成就、俄罗斯语言的普及等等。但也正是这种联盟带来了俄罗斯民族的巨大萎缩。因为它被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具体并一直靠近权力中心，因此它比其他民族受政权破坏性方面的影响更大。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昔日是国家的重心，今日却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毁坏的村庄、贫瘠的土地、肮脏的城市、悲惨的人民。这里酗酒成风，道德沦丧，生活必需品匮乏，人口负增长，死亡率增高，医疗卫生条件差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变故，苏维埃—俄罗斯联盟不可

能像以前那样坚不可摧。现在摆在苏联面前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重新回到严格的列宁主义。这是斯大林梦寐以求的。但这种政策需要以消灭民族为条件，民族在苏维埃主义的具有俄罗斯香味的稀糊中被掺和起来，俄罗斯民族也将失掉其鲜明的特点。显然，现存的政府无力推行这种政策，因为这会带来许多麻烦和困难，在国家最需要力量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时候，削弱国家政权的力量；而且，现在去做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事情，放逐所有的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放弃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达成的妥协，增加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加强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联盟。这一行动的结果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和抛弃苏联的虚构——这将是不会团结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为了估价这一全部的发展，首先必将放弃坚持的一种观点，即这种变化已经发生的观点。大多数西方政治家认为：苏联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薄薄外衣掩盖下的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倘若如此，放弃苏维埃意识形态则是轻而易举的。但，苏联不是帝国。若是帝国，必定有一个具有特权的民族，有军事征服的手段和确定的目标。这些都是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所具有的特点。然而，俄罗斯民族没有特权，只有“优惠”。作为共产主义最坚定的同盟，党的领导人，甚至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从他们之中选拔，但这些优惠不是权利，而且对俄罗斯人而言，他们担负着更为沉重的责任和义务。没有这些义务，倒是非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措施不足效法，因为它势必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的立即反抗，而最终不得不付诸武力，违背时代发展的趋势。况且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已不足于担当此任。

因此，摆在戈尔巴乔夫或者任何继任者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在斯大林路线与危险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之间谨慎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民族问题的无法解脱的困境。

## 第五章

###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景

#### 什么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景是同整个苏联的政治前途相联系的。许多（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将影响其命运。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坚决拥护者的抽象政治概念，而且是代表苏联政治制度中某一部分重要政治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要估计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景，就必须界定其社会和政治基础以及弄清它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所具有的地位。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框架中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尚未写出，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让我们首先给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下个定义。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与其排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正好相反，是从俄罗斯民族的观点出发维护现存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一种政治思潮。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并不否定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它并不对共产主义思想表示异议，尽管它为了政治的连续性努力削弱其重要性。然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与共产主义的目标不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将局限于创造一个俄罗斯超级

大国，或者创造一个尽管存在着相互对抗却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俄罗斯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集团。当然，这并不排除这样一个大国努力实现俄罗斯支配世界的可能性，尽管乌托邦梦想中不存在这种帝国。

因此，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绝不是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对抗者。纵观苏维埃历史，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一直存在——斗争的解决方式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一直是一种进化的，而不是革命的力量，主要受到组成这一制度的某些团体的支持。他们认为，执政党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政治机体，能够经受住共产主义思想削弱的打击。

##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革命一结束就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了。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其产生：俄罗斯人口优势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革命的俄罗斯正处于一种完全和西方对立的状态，因而得不到欧洲其它革命的支持。这两种因素不能不使苏维埃制度带上民族特点，而苏维埃制度到当时为止还没有形式上或者实际上的民族目标。

因此，曾被俄国领导人认为是世界革命第一阶段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却造成了俄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立。早期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外部，但是这些形式却成了后来发展的原型。1920年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首次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右翼孤立主义的系统阐述。乌斯特里亚洛夫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1917年俄罗斯政治灾难之后，危急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俄罗斯民族复活形式，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暂时手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

恢复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取得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他反对超出以前俄罗斯帝国界限的扩张政策。他的观点在1922年之后，引起了党内激烈的争论。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种模式——扩张主义的和甚至救世主式的模式，是由文学批评家艾赛亚·列日涅夫提出的。他称自己的模式是“土耳其斯坦”式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巴塞尔”式的社会主义。列日涅夫认为没必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阶级划分，俄罗斯的职责就是领导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家与人口出生率低的国家（即西方）进行斗争。

当然，列宁本人已经奠定了布尔什维克亚洲战略的基础。亚洲对列宁来说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储备力量，指导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是非常必要的。列宁认为苏维埃俄罗斯不能过于顾虑亚洲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必须依靠任何反西方运动。

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列日涅夫的观点都遭到官方的反对和谴责，但是它们都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苏维埃制度微妙的渗透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观点于1924年被斯大林所采纳，提出了他著名的口号“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与当时地缘政治形势（即西方日趋稳固和苏维埃俄罗斯日趋孤立）相适应的一种重要的策略行动。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努力支持亚洲各国的反西方运动，尽管当时已经出现危险征状（尤其在中国），亚洲大国的革命运动将会超越苏联的控制并转变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使得斯大林面对亚洲革命运动而颇感棘手，亚洲革命运动后来的成功源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在动力，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支持。

这种孤立主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迅速取得成功，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1）俄罗斯人口的压力；（2）人民不愿卷入世界范围内的新的革命冒险；（3）巩固不受广大人民支持的苏维

埃制度的必要性；（4）斯大林依靠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主要由非俄罗斯（犹太人）领导人领导的反对派的个人倾向。

因此，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一产生起，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动员和结合不仅发生在与西方的冲突过程中，也发生在与革命以来迅速发展的犹太政治和社会存在的冲突中。犹太人的存在被大多数俄罗斯人看作是革命的消极结果和外族的侵袭。将犹太人驱逐出政治生活的倾向，在早期阶段相对比较和缓。犹太人问题有其自身的动因；20年代以后，苏维埃制度内部的反犹太人趋势增强了。

斯大林所利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没有文化内容。对斯大林来说它只是政治动员的一种方法。斯大林在1928—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部分地调整了他的政策。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暴露了西方内在的弱点，另一方面也为苏联进口工业化所需要的西方设备开了绿灯。

但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所表现出的相对孤立主义仍然存在。随着政治的巩固，斯大林相信基于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机质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俄罗斯流亡者运动——“青年俄罗斯人”，他们认为五年计划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胜利，从而确立了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国地位。“青年俄罗斯人”认为苏联在其国内发展中正在向着民族革命的方向前进。到1938年，他们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位俄罗斯民族领袖。毫无疑问，斯大林清楚甚至在残暴的集体化运动和在疯狂的工业应急计划期间，如果连像“青年俄罗斯人”那样的君主主义运动也能把这些措施作为通往民族革命的道路，那么他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早自1930年起，斯大林就开始向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尤其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发起了进攻。这样，斯大林作为俄罗斯政治家的形象已经定型了。

企图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政治优势的并非斯大林一个人。他



依靠了一批俄罗斯血统的党的官员，尤其是谢尔盖·基洛夫和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他们支持了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结果所谓的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个新概念于1934年形成了。这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一方面是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内部民族联合的口号；另一方面，它又非常合理地阐释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苏维埃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联合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加强，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未削弱，而且在官方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任何限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在德国1941年入侵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确实，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危急关头起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暂时失去了中心地位，变成一种模糊的革命思想，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亦被看作是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中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用是苏联所面临的危急形势的结果。红军主要由俄罗斯农民组成，而且非俄罗斯人（部分地由非斯拉夫人）居住的苏联西部地区很快就丧失了，这就更增加了俄罗斯人的负担，尤其在穆斯林（除去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及其某种程度上的哈萨克人）不再被看作是一支可靠的战斗力量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这个国家的命运主要依赖于俄罗斯人，战争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抉择。这主要以亚里山大·谢尔巴科夫为代表，他在这一时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开始的决定性三年里，他是斯大林最亲密的顾问。他可能负责制定了当时的几项重要政治决定：（1）文学艺术的非意识形态化；（2）与宗教，尤其俄罗斯东正教会妥协；（3）共产国际的解散；（4）采用了新的具有俄罗斯色彩的苏维埃赞歌。

谢尔巴科夫对犹太人的政策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建立起来——这是自1930年犹太人办事处解散以来获得许可的第一个犹太人全国联盟组织，广泛地依地语出版计划也获得批准。不能说所有这些只是为

了动员西方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为苏联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谢尔巴科夫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极端反对犹太人参与最高层的政治活动。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接受甚至鼓励了一定的犹太人文化自治。有重要的证据表明，战争时期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中并没有反犹太人的特点。确实，自相矛盾的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伊利娅·埃伦堡，尽管他总是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埃伦堡在战争中鼓吹最露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人们甚至能够证明谢尔巴科夫在战争中发表的几项重要政治声明也是出自于埃伦堡之手。1943年11月11日，埃伦堡说“没有革命，俄罗斯也许会丧失其国家独立，背叛其历史使命”。谢尔巴科夫在1944年1月21日列宁纪念会上发表官方讲话时说到，在革命的前夜，“在我们国家就要失去国家独立的紧急关头，正是布尔什维克党从这样的耻辱中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战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基本的孤立主义。直到1944年春天，在克里姆林宫占多数的观点认为苏联的军事行动应限于解放1941年边界之内的苏联领土。1944年5月1日斯大林发布命令：“消灭敌人于巢穴中”，孤立主义至此告终，纯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迅速削弱。谢尔巴科夫的影响开始减弱，他的自由主义的文学政策受到苏联主要文学家如西蒙诺夫、普拉托诺夫、佐先科、丘诃夫斯基等人的猛烈攻击。埃伦堡本人也由于他偏激的反德言论而受到批评，其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主要发言人的职务亦被解除。谢尔巴科夫于1944年11月从社会舞台上销声匿迹后，于1945年5月10日去世，终年44岁。正如官方在1953年所声明的那样，他的死可能是不正常的。是什么将谢尔巴科夫置于死地？为什么战争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遭到排斥？

对这一问题有几种解释。谢尔巴科夫日益上升的影响自然引起了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的不满，他们发动了对谢尔巴科夫的斗争。他的对手不仅使他声名狼藉，而且还利用政治争论攻击他的

政策。的确，谢尔巴科夫的孤立主义首先被苏联的西方盟国搞得名誉扫地，西方盟国首先当场表示对苏联要讨论战后苏联边界的建议不予考虑。苏联当时只是要求承认其1941年的边界。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引起了苏联的怀疑和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中暂时靠边站的强硬派的反对。西欧登陆的拖延很可能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失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美好像都不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阻止苏联侵占东欧。

同时，党的意识形态派并不被动，以共产党员作为其主要力量的日丹诺夫主义者，选择了大规模的苏联扩张政策，并且取得了胜利。日丹诺夫依靠强大的共产主义传统，很容易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能使新国家在苏联的轨道上联合成一体。泛斯拉夫主义在当时是这种联合的尝试性思想，但是它在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北朝鲜、甚至波兰等国家中并不奏效。直到1948年，日丹诺夫主义一直是苏联主要的政策。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它的很多成分都溶进了苏联的政治生活，但它们要服从于新政策。尽管如此，纯粹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扩张具有内在的危险。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冲突是第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它表明不受帝国中心控制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事实上危及着新的国际体系的政治稳定性。这一发现立即被日丹诺夫的主要敌人马林科夫所利用。日丹诺夫被搞得声名狼藉，不久就去世了，可能与谢尔巴科夫死去的情形一样。

不论是谢尔巴科夫的俄罗斯孤立主义，还是日丹诺夫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主义，都以其政治上的失败而告终。这两种观点单独都已不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苏斯洛夫是这一综合的主要的倡导者，他鼓吹扩张主义以及甚至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起作用的救世主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新的综合与早期的列日涅夫式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很接近。可以说，在某种限度内苏斯洛夫的思想是一种救世

主式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早期纯粹按阶级区分的外部敌人的概念在日丹诺夫时期已发生了变化，在他死后仍在变化。

根据新的印象，西方作为代表世界罪恶的现存的宿敌向俄罗斯提出挑战。西方是破坏性的世界主义的渊藪；俄罗斯则是民族独立的主要支持者。斯大林在1952年10月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了民族独立的重要性，认为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因此，苏联控制下的和平的意识形态基础奠定了。但是，这种和平当时被认为是服从于一个中心的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庞大集团。民族主义作为苏联统治下的和平的基础被认可；但是它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和危及新结构的政治稳定性。上述新观点在对待非西方（主要是亚洲）世界的态度上模棱两可。由于这种认识存在潜在的危险性，斯大林从不相信列宁或者列日涅夫关于亚洲是主要革命储备力量的观点。然而事件恰恰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从而违背了斯大林的愿望。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迫使斯大林承认共产主义中国，并努力把它置于苏联控制下的和平秩序之内。然而这并没有恢复列宁的亚洲战略的地位，不可能被长期控制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使列宁的学说面临危险。的确，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苏联控制下的和平的支持者，而是发展成为能够威胁苏联本身的一种独立力量。斯大林对阿拉伯世界亦持非常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并不想干预这一地区的事务，比如，他并不想从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中获得好处。这也可能与他对穆斯林世界感到恐惧和不信任有关。比如，1943年至1944年斯大林把数以百万计的伊斯兰教徒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放逐，这足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斯大林统治后期，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苏联，其马克思主义成分成为苏联范围之内以及新的苏维埃阵营之内民族联合的一种思想，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也变成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斯大林之死加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侵略性。与各种估计

相反，他的死使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具有危险性。最激进的转变是朝着勃列日涅夫所谓的“土耳其斯坦”式社会主义发展。自1955年以来，苏联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政策，支持第三世界的激进运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维埃制度中的主导地位。扩张主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中俄罗斯民族主义成分相对减少（但是从未消失）。苏联的许多利益集团首先是苏联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其次是党的意识形态部门，都对世界扩张主义发生了兴趣。这时，世界扩张政策变得越来越凶猛了。

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控制着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教育制度、世界共产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的运动。它与外交政策以及强大的克格勃国际网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军事——工业联合体也已成为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

苏联的世界扩张主义竞赛在196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把世界共产主义胜利的宏伟计划第一次作为可以预见的真正的政治目标提了出来。这一主要政治变革是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作用的结果。西方力量衰落，开始从第三世界大撤退，这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政治真空地带。这种情形使人联想到1944年至1945年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与军事——工业联合体一起企图立即填补这一真空地带。事实上，西方的政策鼓励了苏联的扩张，而且西方决定向苏联提供大量的信用贷款资助它的扩张。

然而，苏联的人口基础并不能保证苏联的世界霸权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而决定在苏联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民族一体化的原因。这个讲俄语的共同体必须尽可能地俄罗斯化。然而，这也许并不能导致俄罗斯化，而是导致非民族化，甚至俄罗斯民族也会走向非民族化。因此，像勃列日涅夫和尼古拉·鲁索夫那样的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思想，才接近于现实。他们呼吁，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必须牺牲作为民族统一体的俄罗斯民族的利益。

## 遭争议的“苏联控制下的和平”

然而，就在胜利的时刻，为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即使被认为是俄罗斯人的世界使命）把民族的俄罗斯变成其帝国一部分的政策遭到驳斥。俄罗斯知识分子首先起来抵制，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以牺牲俄罗斯为代价换取危险的政治乌托邦的计划。但是对苏联统治下的和平的反对也来自苏维埃政治制度本身和党的组织。事实上，党组织与意识形态部门相比较，在革命初期是多民族的，但是只有犹太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才占据要位。在党中央机构中，甚至连乌克兰的代表都几乎被忽视，穆斯林人口几乎从来没有代表参加。来自这些少数民族的党的官员是坚定的主张一体化的人。然而1938年大清洗之后，他们（除了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之外）都消失了。

自那以后，党中央机构完全由俄罗斯人主宰，政府也差不多具有类似的特点。这比其他事情更能说明苏联民族政策的本质。

从这种观点来看，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共和国党组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会立即激起在中央党组织中的民族代表权的要求。日丹诺夫集团建议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其目的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结果很明显它被指责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死后，尤其在贝利亚死后，俄罗斯人的政治优势甚至有所加强，因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也被从中央政治机构中清洗出去了。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官员进入中央统治机构之后，把由前乌克兰党的官员组成的强大的政治团体也带入了党内，从而使中央领导机构变成斯拉夫人的而不是俄罗斯人的。塞韦伦·比亚里尔认为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在党的机构中的优

势是苏联政治稳定的一个条件。

同时，1966年通过的民族一体化政策与党中央机构中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相抵触，因为努力实现一个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而不顾苏联领导机体的民族组成将是不合理的。军队里的情况亦是如此，高级指挥官几乎全是斯拉夫人，其中俄罗斯人最多。

苏联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形势更加严重。确实，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人口中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相对比重急剧下降，其力量亦由于战争、恐惧，尤其经过斯拉夫人口的大规模都市化而受到削弱。同时，非斯拉夫民族，主要是穆斯林的力量却迅速增强。因此中央领导机构中民族一体化路线只能加强。这里我们应当强调指出，苏维埃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现在不仅表现在离心力而且表现在向心力中。共和国党的精英不是努力实行分裂主义，而是努力谋求通向克里姆林宫、通往中央领导机关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居于优势地位的党中央机构努力破坏民族一体化政策的原因。俄罗斯人完全有理由来关心民族一体化计划，甚至世界共产主义统治的总计划，但是这些都将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构成威胁。

当然，党的高级官员的动机可能多种多样。除了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机质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外，他们也许也意识到世界范围的苏联统治下的和平的乌托邦政策将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从而破坏建立在俄罗斯人占统治地位基础之上的政治稳定性。看来，有利于扩张的地缘政治形势并不能证明这一政策的合理正确性，因为在这样一个新世界秩序中俄罗斯人口只占其人口的很少一部分，不能维护这种和平的稳定性。苏联统治下的和平将很容易成为奥威尔统治下的和平，将会给不同的共产主义阵营之间带来永久性全球冲突。

## 俄罗斯反对派

党的机构（或者其中一部分）开始支持孤立主义的俄罗斯反对派——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然反应。这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时期。尽管党的机构处在与意识形态及军事——工业集团的激烈冲突状态中，但它并不想毁掉自己革命的合法性。因此党的机构只是破坏新的总计划的下列几个方面：

1. 广泛的工业增长和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中新的投资计划。

2. 俄罗斯农村超工业化计划。（最后一道俄罗斯人口壁垒的致命危险）。

3. 民族一体化计划。

4. 无神论运动对俄罗斯传统家庭和俄罗斯人的伦理道德构成危险。

5. 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开展的极端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6. 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无限支持。

7. 任何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

8. 与中国危险的冲突（这会把苏联卷入一场绝望的和毁灭性的战争）。

而且，他们还强烈反对向苏联的战略预算提供大规模资助，反对扩大烈性饮料的销售。党的机构也想同美国达成相互军备控制协议，因为这样就能限制军事——工业综合体危险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要求。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孤立主义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的话，就能发现所有这些要点都有所表述。首先，他们批评苏联工业社会破坏了传统的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作



家像瓦连京·拉斯普京和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等)。人们(如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费拉基米尔·奇维利欣、奥列格·沃尔科夫及其他很多作家)愈来愈关心生态环境,从而严重阻碍了许多新工业项目的建设。苏联的宇航竞赛在几种场合下都被谴责为毫无用处和毁灭性的举动(比如,彼得·普罗斯库林和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呼吁停止实行农村的工业化政策,尤其是停止对小村庄的破坏,也是他们的要求之一。这一要求成了像瓦西里·别洛夫和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这样作家的无数文学作品和政论作品的题材。

正如以前所述,苏联多民族结构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强调。多民族原则与民族一体化的原则相违背。苏联重要刊物《我们同时代人》(月刊)在“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一栏中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学留出固定版面。这实质上是对苏联民族问题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处理方式,瓦连京·拉斯普京对这一方式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说俄罗斯人将永远是俄罗斯人,鞑靼人将永远是鞑靼人,等等。(就是说,他不相信官方民族一体化的政策。)显然,把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看成是俄罗斯反对派,是完全合理的。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反对派通过对官方反犹太复国主义,即实际上反犹太主义进行含蓄批评,形成自己对犹太人这一敏感问题的特殊处理方式。小说家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写的近作于1981年在莫斯科党组织的赞助下,在温和的俄罗斯反对派文学月刊《莫斯科》上发表了。叶夫图申科夫其人并不重要(他是一位政治机会主义者),但是杂志本身却是重要的。而且小说的前言是由瓦连京·拉斯普京所写,并强调了该小说的政治意义。确实,小说明确反对反犹太主义,谴责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有几种迹象还表明,党中央对待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包括反对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即使在最近一次黎巴嫩战争之前,以色列也可能被俄罗斯反对派看成是苏联的潜在同盟和穆斯林世界的平衡

力量。这种观点在当代苏联政策中并不算什么全新的东西——只是1947年至1948年斯大林支持以色列政策的重演而已。党中央组织的主要喉舌《党的生活》(半月刊)对阿拉伯共产党和穆斯林世界共产党而言,形象并不那么好。这种情形自1977年就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瓦莱里·叶米利亚诺夫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种微妙政策的一个例证。叶米利亚诺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言人,以其疯狂的反犹太主义而著称。在其发表在《我们同时代人》上的一篇文章中,叶米利亚诺夫强调(他没有在其他文章里这么做)“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否定以色列国家毫不相干,它只是对以色列政策的否定。

这种思想苗头似乎在勃列日涅夫的苏共26大讲话中亦有所反应。讲话中,他既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亦反对反犹太主义。这也是第一次,勃列日涅夫没说中东冲突是全球性冲突,是世界和平的危险因素。这表明了苏联的中东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勃列日涅夫的观点也许是苏联领导阶层中不同派别互相妥协的结果。

批评无神论者攻击宗教,尤其是攻击俄罗斯东正教,在俄罗斯反对派与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声称官方的无神论导致了道德的沦丧,破坏了传统的俄罗斯家庭,即俄罗斯的人口堡垒。而且,基督教被认为是对抗民族一体化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基督教也被认为是与西方联系的纽带。

反酗酒运动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重要行动。其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烈性饮料的销售量以限制军备竞赛的主要开支来源。据苏联有关人士说,仅加里宁一个省每年向苏联中央财政上交4亿卢布!(叶夫图申科前面提到的小说也暗示酒是苏联财政预算的主要来源)。

## 权力之争

正如前述,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总是处于一种冲

突的状态中。然而，斯大林却用绝对的权力来解决这种冲突，要么压制冲突中的一方，要么使双方妥协。斯大林去世后，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不欣赏斯大林的权力，而且，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苏斯洛夫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长远目标的形成方面，战胜了赫鲁晓夫，接着又压倒了勃列日涅夫。

因此，孤立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与共产主义思想处于一种冲突状态，而且与1948年之后苏斯洛夫所维护的侵略性扩张主义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也处于一种冲突状态。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两种趋向互相抵触。这种抵触当然有其理性基础，但这个基础与苏维埃制度内部组织上的矛盾冲突亦有密切联系。

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与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一起受到党的机构的挑战，后者意识到党作为全国的行政机关从根本上讲能够在意识形态消失后仍然存在。受谢尔巴科夫提名的人取得很大权力，谢尔巴科夫的模式也未被忽视。

勃列日涅夫只是这两种竞争力量的调解者。因为他自己的权力实质上是由几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乌兹别克）的党组织所决定的。这些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寻求党中央组织的民族一体化，勃列日涅夫经常犹豫不决。

可以看出1966年的计划受到削弱。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受到阻碍，起初彻底一体化的口号为接近的口号所代替。苏联农村的超工业化政策随着小村庄的相继消灭而最终受到怀疑，至少其极端的形式受到怀疑。正如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瓦西里·科诺托普198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有明显迹象表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内部斗争。生态保护运动的逐步发展给工业带来麻烦。1979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成了用以攻击苏联军事和战略预算的靶子。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反应，意识形态与军事

一·工业集团挑起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使国际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反对派1979年几乎公开表明了它的政治目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维埃俄罗斯报》中判断出来。该报突然开始发表伊索式的社论，明确地谴责西方军事—工业综合体，含蓄地攻击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以及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同一家报纸上列举苏联军事—技术节日中完全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即1979年11月19日战略火箭部队日，因为这支部队是庞大的苏联军事预算的主要耗费者。有意思的是，忽视这一节日的唯一例外，一家报纸是用乌克兰语在基辅出版的党的机关报《乌克兰光辉报》。它可能表明俄罗斯反对派与乌克兰党的机构之间有某种合作关系，共同组成统一的斯拉夫战线。

靠分析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和参与的公共活动，我们似乎能在俄罗斯反对派中找出像米哈伊尔·格里申和伊万·卡皮托诺夫一类的人。后者长期以来在莫斯科党的领导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俩在党内的生涯都始于谢尔巴科夫手下工作时。莫斯科党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彼得·杰米契夫或许也可以归入这一派中，尽管把他在赫鲁晓夫手下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提升归功于对苏斯洛夫的反对。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似乎与他们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他与基里连科联系密切，与“莫斯科人”的合作也许只是暂时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已故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有一份材料称他为“俄罗斯党的领导人”，从他早期的讲话和行为中可以断言，上述论断完全正确。但是他在1982年4月22日的讲话确实暗示他与俄罗斯反对派有某种联系，因此安德罗波夫好像就是中央党的机构的俄罗斯分部的领导人。但是关于安德罗波夫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作出最终判断。

就我们从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核心人物维克多·库利克夫、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和谢尔盖·索克洛夫元帅们发表在《苏维埃俄

国》上面的文章来判断，他们也支持俄罗斯反对派。

但是，这些人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有相当数量的苏联地方党委（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委员会）支持俄罗斯反对派。俄罗斯反对派可能控制了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关键部门，即控制军队、克格勃和警察的任命权的管理部门。这个部门可能已由卡皮托诺夫统一负责管理。

俄罗斯反对派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也有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因为它控制着部长、元帅、将军和大使的任命权，而且它可以否决任何推荐的候选人。

苏联大使的任命权在苏联的权力之争中是一个重要领域。从派往共产党国家的大使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说明苏联领导阶层与这些国家有明显联系。比如，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是前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托卢别耶夫，其实保加利亚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据点。前莫斯科党组织两位高级官员巴甫洛夫和斯捷帕科夫于1971年同时被派往两个最“自由的”共产党国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尽管巴甫洛夫于1982年2月从匈牙利被派往日本）。以共产主义阵营的“自由试验场”而著称的匈牙利与莫斯科党组织有着极其友好的关系。

这一情形从表面上看由于任命莫斯科党组织的鲍里斯·恰普林为驻越南大使而有变化，但是，他之所以被任命，可能是由于俄罗斯反对派想控制危险的中越冲突而促成的。中越冲突也许会导致苏联与中国严重对抗的局面。

内部斗争的一个迹象就是越来越重视谢尔巴科夫——但是这是某种程度上的选择。人们对他的思想态度兴趣日浓，他是俄罗斯反对派主要核心权力欲的象征——（“莫斯科派”的领导人很多是谢尔巴科夫任命的），这一切足以解释上述现象。《真理报》、《红星报》、《莫斯科真理报》以及《共产党人》于1981年10月10日都祝贺谢尔巴科夫的八十岁生日——这是俄罗斯反对派的一次政治

胜利。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和军事—工业集团庆祝日丹诺夫诞辰，而未提及谢尔巴科夫，以此来向这场运动提出挑战。新日丹诺夫主义是同俄罗斯反对派进行长期斗争的迹象之一。这一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各有各的象征性方式。此外，对俄罗斯反对派的攻击还表现在其他几个方面，比如，对家长主义倾向的批评，对低估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批评，等等。

有的攻击矛头直指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它是由国外情报机构煽动起来的，非常危险，或许会破坏苏维埃制度。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惯用策略就是以扩张主义的救世主的形式来代替孤立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这可能就是《青年近卫军》（月刊）和《星火》（周刊）之类刊物的主要任务。由于两种倾向间具有共性，故完成这一任务并非难事。基于同样的假设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攻击在这个微妙的替代过程中非常重要，自1968年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发起这场运动以来，一直持续进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向苏联和世界图书市场投放激进的反犹太人的书籍，如伊万诺夫、E·叶夫谢耶夫、V·别贡和尤·科列斯尼科夫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甚至再现了犹太人旨在毁灭俄罗斯世界性阴谋——古老的黑色一百的神话。这一运动具有重要的内在危险，其目的就是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是俄罗斯不共戴天的敌人，使苏联的方针中新斯大林式的以色列政策名誉扫地，并且试图使苏维埃制度之内所有敢于依赖新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人丧失信誉。孤立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对犹太人在俄罗斯的政治参与，并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术语来强调犹太人的政治渗透；其对立派也用这个术语指犹太人和以色列人。

这种两重性在以色列干涉黎巴嫩中再一次暴露出来，这是俄罗斯反对派第一次成功地避免了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进行干预。但是苏联的宣传机器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猛烈攻击，公然违抗了苏联的中东政策。

1982年1月，苏斯洛夫之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地位。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出警告，反对加快民族一体化的步伐。苏斯洛夫的宿敌彼得·费多谢耶夫后来声称俄罗斯语言不是苏联人民的民族因素。“多民族的祖国”（《我们同时代人》的口号）这个表达方式在被冷落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又重新出现在官方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

1982年，在中苏两国公开敌对18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公开提出与中国和解并承认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特点，这是苏斯洛夫所断然否认的。此外，重要的是“五一”口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作用。在1981年10月的口号中，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负责教育、信息和意识形态；但在1982年5月的口号中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负责将党的决议传达给群众。这是对它的独立地位的否定。

经过一个短期窘迫之后，意识形态和军事—工业集团反攻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可能是苏斯洛夫的门徒）在访问越南时并没有重复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向中国作的建议。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斯洛夫以前的得力助手、国际部的主席鲍里斯·波罗马廖夫在任命尤里·茹科夫（苏斯洛夫的主要发言人和《真理报》的专栏作者）为苏联和平委员会主席时发表了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讲话。正是茹科夫第一次谴责西德在1968年企图进犯捷克斯洛伐克。茹科夫还声称犹太复国主义隐藏在杜布切克和团结工会的背后。至少在《真理报》的两篇社论中，俄罗斯反对派受到含蓄的批评。其中一篇社论抨击了对待过去不分阶级的方法，另一篇强调了“人事稳定”的必要性，并谴责了匿名的党组织在人事挑选上所持有的错误观点。事实上，这个要求是政治机构的主要政治口号。

## 俄罗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

从整个这次斗争中找出俄罗斯民族战略的中心政治议题，并非难事。讨论起始于1980年，费奥多尔·涅斯捷洛夫首先尝试制定出一个思想纲领，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团结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周围。涅斯捷洛夫受雇于臭名昭著的卢穆巴大学的国际革命运动苏联研究中心。他曾写过一本专著，以极端的反西方的观点来解释苏联的历史。涅斯捷洛夫认为，苏联与西方隔着一条深渊，即使相同的词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也具有不同的意义。涅斯捷洛夫声称俄罗斯人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得不与外部敌人斗争，因而他们获得了非凡的民族品质。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原则。涅斯捷洛夫为专制制度辩护，认为绝对专制制度的产生是一种健康的民族反映，因为为了保卫祖国有必要集中民族的力量。遗憾的是，专制制度在18世纪以后被日耳曼化了，变成了一种反民族的力量。涅斯捷洛夫说俄罗斯的扩张与欧洲开拓殖民地有着原则性的差别，欧洲人认为被殖民化的人民是劣等种族，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够平等对待其他民族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俄国，因为只有俄罗斯人能够抵制人为地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在涅斯捷洛夫看来，所有其他民族都想进一步扩张。

自然，俄罗斯反对派原则上接受了对革命的任何民族性的解释，但却不能全盘接受涅斯捷洛夫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割断了与西方的所有联系，这在20世纪人口条件下是极端危险的。另一个明显的障碍是涅斯捷洛夫书中的反基督观点。《我们同时代人》（月刊）批评了涅斯捷洛夫几方面的错误，包括对待教会在俄罗斯历史中作用的错误观点。但是《星火》却毫不保留地对涅斯捷



洛夫这本书大加赞美。

1980年，有关民族战略的公开论战也开始了，是由库里科沃战争（当时俄罗斯人第一次打败鞑靼人）600周年纪念日引起的。这个敏感的节日被用于动员俄罗斯民族和重新考虑苏联的亚欧政策。弗拉吉米尔·奇维利欣突然猛烈攻击所谓的欧亚运动——由一群俄罗斯移民发起的早期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宗教形式。欧亚混血人认为俄罗斯与亚洲各民族是欧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欧亚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明，它极端敌视西方，双方展开了一场不妥协的斗争。与之相反，奇维利欣声称俄罗斯是公认的欧洲的一部分，忘恩负义的欧洲是俄罗斯人从具有纯粹破坏力量的野蛮人入侵中挽救出来的。俄罗斯只是通过暴力才使这些野蛮人文明化。

另一位作家瓦西里·列别杰夫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并补充说俄罗斯的精神基础及其与欧洲共同的标准是基督教（鞑靼族可汗马麦于1380年要把基督在各地根除）。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列夫在《星火》上撰文驳斥这种观点。古米列夫认为库里科沃之战并不是对亚洲的战斗，而是对热那亚国际金融中心派往俄罗斯的国际世界主义者集团的战斗（明显的迹象表明是犹太人的阴谋）。正是鞑靼人将俄罗斯从13世纪真正的致命危险——西方中挽救出来。

1981年，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瓦季姆·科日诺夫更加详尽地提出了一种俄亚联盟的概念，旨在达到团结所有人类这一救世主式的目标。科日诺夫认为只有俄罗斯人首次在历史上表达了宇宙神教的观点，据说这一点既不能在犹太教中找到也不能在基督教中找到。因此只有俄罗斯人才有责任完成团结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科日诺夫的观点（尽管未提及他的名字）立即遭到弗拉基米尔·舒布金的批评。舒布金认为基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基础，是俄罗斯与西方联系的纽带。舒布金说，俄罗斯的宇宙神教否定暴

力，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建立在憎恨之上。在舒布金抽象的言谈背后隐藏着他对与西方对抗的政治哲学。科日诺夫的文章也受到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库列绍夫的攻击，他批评的主要目标是科日诺夫的关于俄罗斯人——亚洲人联盟反对西方的观点。库列绍夫声称这一观点与科日诺夫所指的列宁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 结 论

我们毫无理由相信在苏维埃制度之内孤立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其对手的斗争会是和平的，斗争的结果亦难预料。苏维埃政治制度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扩张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某些领导人所处的地位及他们与西方签定的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协议无关。在苏联的政治部门中，内部权力之争将会引起极端主义的逐步升级。温和派不可能成为这个部门的领导者，尤其在扩张代价不高的情况下。然而，俄罗斯反对派在权力之争中有良好的前景。人口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社会的其他危机非常严重，如不作出紧急反应将会导致灾难。甚至现在，俄罗斯反对派在施加一种巨大的抑制性影响，没有这种影响，苏联的政策将很容易失去控制，突然变得狂暴起来。

必须指出，在西方专家中流传着对苏联内部政治生活错误的估计。遗憾的是，这种估计是西方对苏联总政策的组成部分。这种估计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一种国际威胁。根据同样的观点，苏联现在由温和派当权。这个信念没有区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不同趋势，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警告的富于侵略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具有相当政治权力的、现存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承认。

理查德·派普斯第一次清楚地承认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胜利

表明苏联政策的重大改进。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但是派普斯并不知道如何鼓励这场胜利。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西方承认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和平抉择意愿，能有力地影响苏联的内部发展。

每一次民族主义的爆发都使得美国政治家感到恐惧，他们视民族主义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罪恶。但是现在是废除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了，因为它认为世界的进步必定朝着丧失民族独立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俄国在向联邦化发展的过程中，将要经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漫长的历史时期，或许还要改变其内部结构。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强大的政权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建立不起来，要预测苏联的内部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内部冲突也许会导致全球性冲突，因为正如科尼利尼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显示的，一个宗派总是倾向于走极端，并最终决定进行冒险。

## 第六章

# 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联政治： 官方与非官方见解

### 引 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及得到苏联官方许可的大众媒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大量出现。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之所以被允许在苏联大众媒介中广泛传播，显然至少是由于一些有权势的精英人物认为它合乎政治需要而造成的。然而，苏联当局对小说家、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现已被查封的《爱国》杂志、《市民会议》的编辑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所表述的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本文将力图系统地描述、分析和尽可能地说明苏联出现的各种观点，而这些看法按照《真理报》的社论来说，是同社会主义的族际主义不相容的。族际主义是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核心。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列昂纳德·W·杜布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了极为有价值的界说。他认为，爱国主义——一个人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坚信，他本人及其所属的重要集团有赖于保持和扩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权力及其社会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大致统一的要求。这些要求（1）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共有；（2）产生于爱国主义；（3）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并易于表达出来；（4）使人们乐意为政府的目标而自我牺牲；（5）可能或者不可能导致恰当

的行为。

杜布的观点强调政治领导在产生和培养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强调外部威胁和民族主义反应之间的联系，对研究各种政治制度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者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当然，如把杜布的观点运用到多种族、多民族如苏联那样的国家中，仍会产生一定的困难。由于苏联领导人声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摆脱了或者应该摆脱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最丑恶的东西，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化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常谴责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者削弱苏维埃社会基础的工具，在苏联不同民族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他在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宣称：培养人民“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族际主义精神”，使他们为属于伟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祖国”而感到自豪，这是苏联共产党的神圣职责。然而，一些关于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关系的报告指出，非俄罗斯人理应称颂俄罗斯人为他们提供的“无私援助”。在赫鲁晓夫执政的相对自由时期，政府已不再或放松了要求非俄罗斯民族向“苏联领导民族”（1945年5月，斯大林在其向俄罗斯人民的祝酒词中是这样称呼俄罗斯人的）象征性地表示敬颂。然而，在1976年的苏共25大上，非俄罗斯民族代表团的领导人对俄罗斯人百般颂扬，极尽奉承之能事。这在斯大林以后的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对非俄罗斯民族领导人施加的新的压力，实质上是要求非俄罗斯人公开向俄罗斯民族宣誓效忠。这是苏联民族理论史上的一大发展，其重要性仅次于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本质与意义的权威性断言。早在1913年斯大林就提出了民族组成的四个因素，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直到1929年，斯大林一贯坚持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年，他在

一篇题为《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的文章中，指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已经在苏联形成。此外，他还指出，俄罗斯的语言是社会主义的语言，并将在同其他语言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同他强调俄罗斯人民居于领导地位的观点相结合，意味着一个充满新型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民族正在苏联形成。

勃列日涅夫继续贯彻执行斯大林在最大程度上曾实行的俄罗斯化政策。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至少就其理论的合理性而言，比斯大林的政策更有害于民族多元化。它清楚地反映了主张民族同化的学者——如P·M·罗加乔夫和M·A·斯维尔德林等官方人士的观点。几十年来，他们四处游说，企图把斯大林民族理论中的心理文化因素从官方民族概念中删除。他们主张对民族特点作出更纯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解释。在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民族关系中，他们强调“族际化”和“族际主义”——在苏联现存条件下，这只是迫使非俄罗斯民族接受俄罗斯化的代名词。

1972年12月，在苏联成立50周年（1922年以前只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庆祝会上，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人民，一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产生了。勃列日涅夫要求人们多关心“最发达和最强大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特殊作用”，认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屏障和情同手足的援助者。罗加乔夫和斯维尔德林在一本权威性著作中，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要求，但却强调后者是“统一的族际的苏维埃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令人回想起沙皇的“俄罗斯是一个整体和不可分割”的概念。“苏联人民”概念中的同化主义倾向也在罗加乔夫和斯维尔德林的主张中有所反映。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建立意味着在社会阶级和民族关系两个方面达到了“一致”。

罗加乔夫和斯维尔德林认为，与苏联人民共同体相结合的爱

国主义是比民族爱国主义更高的爱国主义。这种被歪曲了的语言无疑反映了其命题的不稳定性。他们承认新的共同体在“许多本质方面”与民族类似，有共同的经济、地域、文化、心理、苏联人意识，以及一种全联盟族际交流的语言等等。但是，他们又补充说，苏联是一个由“独特的”和“相对独立的”“民族单位”所组成的“族际社会”。苏维埃和民族成份相互融合，构成了这一社会的特点。

罗加乔夫和斯维尔德林是我所说的“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权威发言人。他们指责任何偏离苏联共产党使命（把俄国从“外国资本奴役的威胁下”拯救出来）或任何削弱党在科学、工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的任何“有限制的爱国主义”。在历史、文化领域，他们反对那种坚持苏维埃时期和苏维埃以前时期具有连续性的主张，反对过分注重某一民族的文化遗产，从而妨害对“使各民族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的东西”的认识。颇为有趣的是，伪斯拉夫派政论家维克多·恰尔马耶夫却是罗加乔夫—斯维尔德林派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反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爱国主义形式。有关恰尔马耶夫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论述。近来，又出现了一批以契尔年科的民族问题顾问瓦季姆·佩切涅夫为代表的民族问题专家。

有充分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表示不满。可惜的是，许多证据都具有局限性。近年来，决策权有所转移，以前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所属的权力现在却归属莫斯科中央政府。同时，中央机关中，俄罗斯民族的成员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非俄罗斯成员相对减少，某些非俄罗斯民族，特别是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俄罗斯化速度相当快。然而，在许多非俄罗斯民族中，只有少数人学过俄语，并把它当作第二语言。卡雷尔·唐科斯说，“在穆斯林民族中，我们发现人们的俄语知识越来越贫乏。”

相对于这些时刻存在的潜在潮流而言，西方人更熟知的却是非俄罗斯民族的一次次抗议运动，有时还得到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反对抗议就是对地方事务的干涉，甚至是对民族性的威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提及大量秘密印刷的请愿书及书信，或一些意外成功的示威活动。比如，1978年，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及阿塞拜疆人成功地说服莫斯科当局，允许他们在共和国宪法中保留特别的条款，确立地方语言为共和国的“国语”。如今越来越多的苏联问题专家，尤其是民族问题专家和卡雷尔持相同的观点，那就是“莫斯科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迫和最棘手的是由少数民族挑起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的情况又怎样呢？难道斯大林控制苏共及苏维埃国家政权以来他们在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优势地位没有加强吗？对此谁都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刺耳的叫嚷与其说是表明自信或满足，不如说是表明他们的灰心。

总的来说，苏联的审查制度只允许官方媒介报道有关俄罗斯传统和民族感情方面的内容。当局认为，这些东西能给程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带来生气。从沙皇旧时代继承下来的独裁——仇外主题最有益于达到这一意图。当然，俄罗斯的东正教遗产是俄罗斯精神遗产的核心，它同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全然不相容的。甚至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虽然可能有利于培育“无产阶级族际主义”，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国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及苏联宣传的一些最重要的外国听众的反感。

苏联所允许表现出的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可能满足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也不可能满足像奥西波夫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士。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假如他的俄罗斯形象和官方的有很大差别的话，都可能会发觉自己和当局发生了冲突，并迟早会遭到压制。只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集团（本文中我称之为“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才获许更自由地明确表达自己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越出了集马克思主义成份与俄罗斯意识形态于一体的斯大林主义的范畴。

最后，俄罗斯民主派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深信他们能够通过苏联广泛地传播个人和公民权利的普遍原则更好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像索尔仁尼琴和奥西波夫一样，他们激烈地抨击了他们认为是狭隘的沙文主义俄罗斯形象。在一封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公开信中，布科夫斯基从苏联民主运动的立场出发，巧妙地描述和强烈地否定了潜藏在苏联官方“族际主义”背后的民族沙文主义。他写道：“我是俄罗斯人，但我为我国的高级官员公开鼓吹沙文主义，视俄罗斯化为国家政策的最高原则而痛心疾首。可惜的是，当今的俄罗斯仍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甚至比60年前更糟。我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员，但我公开地说在苏联存在着民族歧视。”

## 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或笔者在本文中所论述的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数十年来，一直被苏联报刊杂志等描述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948年，德国苏联学专家克劳斯·梅纳特在一本题为《Weltrevolution durch Weltgeschichte》的书中，恰如其分地把苏维埃俄国比作装有两部发动机的飞机，一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部是民族主义。他预言，这两部发动机很快就会失去协调，停止运转，从而带来苏维埃意识形态的崩溃。尽管言之过早，但梅纳特的预言引起人们对现存制度所处危境的关注，其存在的合法性倚重于一种由不完全协调的因素组

成的学说。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就把俄国民族主义的肾上腺素注入苏维埃政治血流之中。直到他使大众用语如“祖国”等完全合法化之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武器一直被排除在苏维埃政治词汇之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本人以种种方式，为斯大林彻底的民族主义政策和理论铺平了道路。也许斯大林以为苏维埃爱国主义同列宁在其《论大俄罗斯民族自豪》一文中主张的无产阶级民族自豪是一致的。列宁在1918年向新生的红军发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抵御西方“干涉”的号召与斯大林在反抗纳粹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宣传也有契合之处。不同的是，后者的口号不仅呼吁阶级忠诚，而且使人们想起了俄罗斯人为民族生存同拿破仑军队斗争的历史。列宁和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加强，甚至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建立起一种政权和苏联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即俄罗斯民族同一的观念。

斯大林的遗产和几十年使人头脑麻木恐怖的影响在苏联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赫鲁晓夫短短几年的“自由化”不足以消除这一切。斯大林创建的政权一心一意致力于加强苏联领导人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军事实力”。斯大林的遗产现已为许多人所不齿，这份遗产的中心内容就是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官僚和军事化的国家政权。为了创建和维护这个国家，斯大林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强迫实行他那著名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斯大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自由的内容，代之以实利主义、等级制度、特权和民族沙文主义。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理论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指责的沙皇的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为对俄罗斯人治国方略和军事功绩的颂扬所替代。二战期间，斯大林成功地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使苏联一跃成为政治上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虽然他的领导有这种那种缺陷，但他的功绩

使苏联人民，特别是俄罗斯高层人士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在苏联各族人民（包括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中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许多非俄罗斯人，特别是那不幸的“被驱逐出境”的7个民族的人民——他们对斯大林没有丝毫好感。罗伯特·康奎斯特经过苦心调查，写成《人民的凶手》一书，详尽描述了他们的悲惨命运。正如格里戈里·斯维爾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人质》中所揭示的，犹太人在苏联抗击希特勒侵略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都不为人所承认，对他们而言，反抗纳粹种族歧视的战争标志着俄罗斯人漫长反犹历史中新的一章的开始。支持马克思主义改良或西方式民主的少数民族虽然极其弱小，但在某些情况下却非常执著，他们憎恨斯大林主义，更恨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这些公民往往认为，所有对民族主义目标的支持拥护，即使伴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都是新斯大林主义的，至少是反动的，或许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

60年代后期以来，新斯大林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宣传中，特别是在针对苏联青年和苏联教育过程的宣传中，急剧膨胀。宣传中的俄罗斯成分若干年来似乎很快就要压倒马克思—列宁主义。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谋求与西方“缓和”的同时，加快了影响第三世界的步伐。他们认为，新的外交政策重点的成功将会由于夸耀俄罗斯的民族中心推动作用而受到遏制。无论怎样，自从1970年以来，梅纳特所谓的苏维埃意识形态的两部发动机基本上在同步运行。克里姆林宫在不断从俄罗斯民族主义源泉中汲取营养的同时，要求非俄罗斯民族感激俄罗斯人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并以此方式显示了其对族际主义的献身精神。

1970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某些明显夸夸其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言论在苏联报刊上受到公开批判，其作者也受到轻微的惩罚。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不再对苏联的主张、政策产生影响。的确，一些公开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著名人士吃了

些苦头，这其中包括1971年10月被撤职的《青年近卫军》杂志主编。但是，同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所遭受的迫害相比，相信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念的人和维克多·恰尔马耶夫及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之类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受到的打击是极为轻微的。

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家谢尔盖·谢马诺夫于1970年8月发表了文章《论相对的和永恒的价值》。该文措辞强硬，富有战斗性，颇有肖洛霍夫在苏共23大上关于作家辛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作的报告的浓烈味道；似乎是在命令褻渎了斯大林神圣理论的知识分子作出简要的忏悔。它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残暴、扩张主义——以救世者自居、独裁集权统制经济的世界观，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斯大林一脉相承。谢马诺夫断然否定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一命题。他抱怨说，这不仅在日常言语中很流行，甚至在那些自命为严肃的理论性著作中也很流行。

谢马诺夫为与他一起给《青年近卫军》撰稿的洛巴诺夫作辩护，反对苏联主要“自由”期刊《新世界》编辑杰缅季耶夫对他的批评。杰缅季耶夫指责洛巴诺夫是一个过激的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爱国主义所持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在他对反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抨击中，谢马诺夫指责他们采用“暗示、隐喻和影射”及其他欺骗手段，隐瞒他们的真实思想。谢马诺夫显然在暗示，他的攻击目标是那些近乎进行某种阴谋的人。按照与上层人士颇有联系的民族主义批评家、《青年近卫军》撰稿人阿纳托利·兰什契柯夫的说法，在60年代后期的文学争论中，指责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作者有“影射政治”嫌疑的做法很普遍。他暗示，这似乎有“行政干预文学创作”的意味。

文章中，谢马诺夫对“近十年来”苏联史学界的工作表示满意。尽管西方对俄有不良影响，阻碍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历史学家清楚地证明——俄国绝对不是西方的“半殖民地”——这种说法使列宁也会大吃一惊。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及广大知

识分子都应该了解史学家的发现，并将他们融化到自己的思想库中。从政治观点上看，这个超级爱国的小册子最惊人之处是用这样一句话开头的：“现在已非常清楚，30年代中期是同破坏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转折点”，文章接着称赞道，“我们的宪法”有着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它使所有“诚实的劳苦大众”紧密地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坚如磐石的整体”。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毒素不像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那样猖獗，但它还很顽固，仍须不懈地进行斗争。文章结束时，他敦促苏联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义务”，维护“坚如磐石的社会统一”。

谢马诺夫提到的“坚如磐石的社会统一”、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称作“俄罗斯的”革命以及文章的其他一些特点都表明：他的俄罗斯——非俄罗斯关系的概念是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概念，与沙皇的“俄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并无两样。他有时的确也曾提到非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及苏联政治、文化发展的贡献。于是，他断言苏联人民为“古代基辅、埃里温和撒马尔罕的艺术家而骄傲，为我们伟大的文学和音乐而骄傲，为鲍罗季诺战役的光荣、为她的人民曾经统治过广袤的欧、亚、美领土的伟大业绩而自豪。”这确实是非凡的断言。但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谢马诺夫认为，遥远过去的纪念碑、传统和习俗值得保存，“我们伟大的俄罗斯革命”也值得引以为荣，因为这次革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因此，正如赖萨·列尔特指出，谢马诺夫把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扯进了他们的逻辑结论中。

谢马诺夫对“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严厉态度及其“坚如磐石般统一”的主张，反映了苏联新斯大林主义者对赫鲁晓夫部分地放松控制言论自由的强烈不满。这一宽松的政策允许在报刊杂志上，特别是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上发表常常是非常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观点。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从1964年到1970年，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又逐渐加强，只

允许正在兴起的新斯大林主义拥护者和反对者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辩论。与这次论战相类似，渐进改革派（如罗伊·梅德韦杰夫，他对根据“列宁主义”制定出的许多政策持不同意见）和更为引起反对的不同政见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秘密论战。苏联当局不仅反对像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列昂尼德·普柳希等“民主派”，而且反对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发表和传播颠覆性批评的“民族主义者”。

赫鲁晓夫的集体继任者竭力阻止任何形式的公开论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1969年秋弗谢沃罗德·科切托夫创作的强烈反西方间谍惊险小说《你究竟需要什么》的出版使苏联当局陷入尴尬的境地。科切托夫的小说发表在他编辑的《十月》月刊上。该杂志被认为是反特瓦尔多夫斯基“教条主义者”的喉舌。这部小说在苏联从未出版过单行本。这一事实证明，官方可能陷入了窘境，而这一情况又与颇受尊敬的“当权”的知识分子批评该书有反列宁、支持斯大林倾向有关。科切托夫在巧妙的伪装掩盖下，攻击西方著名理论人士，对他们表示不满，这也许是不明智的。小说拙劣地丑化了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者”维托里奥·斯帕达的形象。此外，小说还歪曲了一位美国女记者、俄国问题专家的形象，把她塑造成情报机关的间谍。如此拙劣地丑化西方人，在谋求东西方缓和的苏联领导集团看来是极为不合时宜的。

1970年，科切托夫在忧郁中去世。然而，《青年近卫军》助理编辑维亚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发表在该刊1981年7月号的一篇题为《文学与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的长文中曾赞扬科切托夫。饶有趣味的是，人们还注意到，苏联民族主义者中斯大林最忠实的信徒之一，谢马诺夫的事业一直在蒸蒸日上。按照70、80年代政论家的礼仪，他亦相应地克制了自己。据我所知，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列昂·托洛茨基进行典型的、粗暴的、惯常的人身攻击。该文以书评的形式发表在《我们同时代人》刊物

上。这家刊物多年来一直在贯彻执行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对苏联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指示方面，同《青年近卫军》竞争。

## 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

谢马诺夫、科切托夫等人的主张，同我称之为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完全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股支流。谢马诺夫及其同志者们侧重强调沙皇和苏维埃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和成就。相反，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则更注重俄罗斯的“精神”价值，含糊其词地承认，它产生于苏维埃以前的俄国历史。在某些方面，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如作家、批评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据我所知，他未遭到苏联当局的迫害）与现代苏联统治者的大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之间有密切关系。例如，索洛乌欣和索尔仁尼琴都对俄罗斯过去有一种怀旧之感，而且热爱俄罗斯乡村的田园景色。但是，索尔仁尼琴毫无畏惧地同苏联政府作斗争，而恰尔马耶夫和索洛乌欣之流则作为热诚的反美宣传者为其服务。与索尔仁尼琴不同，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从未对斯大林的清洗、劳动集中营，或者当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的迫害提出批评。

从苏联报刊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恰尔马耶夫1968年发表在《青年近卫军》上的两篇文章《崇高的愿望》和《必然论》，特别后是一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篇文章主要探索马克西姆·高尔基作品的意义，把俄罗斯“精神”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无情”、“市侩作风”和“理性主义”作了对照。像其他《青年近卫军》派民族主义者一样，恰尔马耶夫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显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和世界观的产物。他指出，这两者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力量，不可能满足于“议会

炉”或“适合于小丹麦”的社会福利等区微小利。恰尔马耶夫认为，高尔基在小说中已经表明，俄罗斯人民需要革命，它能使俄罗斯的特点突破“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道德规范和限制”。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出于“从俄国普通公民野蛮状态中”提炼“美的需要”，恰尔马耶夫似乎——糊涂地——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贡献在于把俄罗斯的灵魂从阻止它发挥道德感情潜力的力量中解放了出来。

恰尔马耶夫从俄罗斯普通人的身上发掘出其固有的美德——在这一点上，他引用了诗人谢尔盖·叶赛宁有关俄罗斯乡村文化优于西方“机械生存方式”的观点。然而，他称颂高尔基反对亚历山大·布洛克把俄罗斯人描绘成“塞西亚<sup>①</sup>人”和“上帝信使”。按照恰尔马耶夫的说法，高尔基认识到：偶像不能把俄罗斯从西方“低级文化”侵略下拯救出来。恰尔马耶夫指出，列宁试图消灭契诃夫和布宁笔下的“乡村农夫”，这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在文章中，恰尔马耶夫根本没有完全遵循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一点，杰缅季耶夫及其他一些反民族主义批评家已经指了出来。至少在某些高层人士看来，他尖刻的反美主义无疑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他引用叶赛宁的一句话来表达这一意思：“美国是那样臭气熏天，在那里，艺术和人类所有最崇高的冲动都不复存在了。”

在评论高尔基的文章中，恰尔马耶夫对20、30年代破坏革命前大部分艺术、建筑深表惋惜（但语气比索洛乌欣要温和得多）。这一点值得一提，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作品所表现出的态度。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作者断言，高尔基对“现在文学艺术、音乐以及绘画中爱国主义这条金线连接到一起”有着伟大的贡献。

---

<sup>①</sup> 黑海与里海间东北部一古地名。译注。



我认为，《必然论》似乎比《崇高的愿望》少一些糊涂之词，立论亦更为条理清楚，它似乎包含了反西方宣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怀旧情绪、反工业主义以及其他反映苏联社会各阶层中日益有影响的思潮（当然，这与官方对经济发展、“科技革命”的美化是不相容的）。在这篇冗长、拖沓、但有时又颇有说服力的文章中，他广征博引，但寓意却很简单。他抱怨说，俄罗斯人过去没有、现在仍不能高度珍视他们自己，特别是普通人的美德以及俄罗斯人以往创造的财富。例如，谈到俄罗斯仇外情绪的危害和愚蠢时，恰尔马耶夫引用了17世纪支持俄国、反对日尔曼的尤拉伊·克里赞尼克大主教的观点。恰尔马耶夫断章取义，有选择性地引用历史资料，例如，他只字未提克里赞尼克提出的“用西方思想改造俄国”（唐纳德·特雷德戈尔德语）的主张。而这是他的主要观点。

恰尔马耶夫对俄国早期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如拉多涅日的谢尔久斯（经常受到索尔仁尼琴的称颂）和德米特里·东斯科伊等，推崇备至，甚至还提到过圣哲雅罗斯拉夫和沙皇阿历克谢的“功绩”。他为苏联涌现出大批描写沙皇及封建家长的历史小说感到满意。他强调，这并非在美化君主制，而是在探索“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尚未实现的历史时期中俄罗斯人民“历史进步”的轨迹。恰尔马耶夫对在17、18世纪业已显示出来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非常热衷。他认为，俄罗斯人常常能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如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死气沉沉、宗派林立的俄国被改造成一个“赶上和超过”了西方（的国家），从而使莫斯科周围日尔曼地区“温和的居民”大吃一惊。在他称颂彼得大帝丰功伟绩的同时，恰尔马耶夫发表了其最为惊人的“修正主义”言论。他宣称，卡尔·马克思非常羡慕地描绘了俄罗斯帝国治理国家的功绩，这是无可非议的。他接着又补充说，马克思所推崇的俄罗斯人的“高贵语言”不仅仅是俄罗斯统治者的功劳，而且是“所有

（俄罗斯）爱国者”的功劳。

恰尔马耶夫在文章中断言：“在振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运动中，不仅有知识分子的舞台，而且有人民的舞台。这是时代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不仅仅昭示了文章标题的内在含义，而且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意图和目的。此外，这句话似乎还表明，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派仇视苏联其他圈子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有关系的知识分子。恰尔马耶夫认为，他们在对待当代西方文化问题上“心慈手软”，离“民族”利益太远。和《崇高的愿望》一样，《必然论》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诽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文明。这也是苏联文化生活，尤其是所谓的乡土派文学中各种思想倡导者论战的主题。

在《必然论》开头部分，恰尔马耶夫嘲笑“肤浅的西方报刊”，称现代西方文明是“玻璃纸装潢的野蛮状态”，为苏联某些知识分子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俘虏”感到惋惜。恰尔马耶夫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长篇大论愈来愈激烈（在评论到伊万·布宁的《来自旧金山的绅士》一书时），接着，他作出异乎寻常的评价：在世界历史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理想而存在的国家。他指责布宁、波德莱里、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道德沦丧”、“虐待成性”、“残忍”的“资产阶级世界”，企图把俄罗斯人民变成一盘散沙——当然，恰尔马耶夫认为这是痴心妄想。但是，他警告说：“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中，不应低估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诱惑作用。”他接着又以《真理报》作者的语调补充道，当今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中间道路。”他还引用了瓦西里·弗奥多罗夫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赢得人心，就会被敌人得到”——来充实自己的论点。

恰尔马耶夫谴责乡土作家，认为他们“美化了农民”——或许这是给索尔仁尼琴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指责他们“喋喋不休地

奢谈乡村的绿洲”，极端反对城市化，使人们在“苏维埃祖国”最需要理解的时候产生误解。恰尔马耶夫认为，俄罗斯及苏联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对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及勇气的一种感情。这一切能使俄罗斯人民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确保取得“和平、进步与人性”的胜利。

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所著的《俄罗斯博物馆信札》是宣扬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一部特别重要的著作。它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一篇向苏联大众发出的文辞优雅的呼吁书，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更好地欣赏俄罗斯艺术宝库，特别是安德烈·鲁布列夫的伟大雕像和古代木雕作品。索洛乌欣对列宁格勒美丽的宫殿崇尚备至。这些建筑都是由沙皇和大公所建，其中的俄罗斯博物馆乃是迈克尔大公所建，因而长期被称之为迈克尔宫。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内斯托罗夫、瓦斯涅索夫、苏里科夫和鲁布列夫等18世纪俄罗斯艺术家创作的现实主义经典绘画作品。

然而，重要的是，索洛乌欣对恰加尔、堪金斯基、塔特林等其他对现代艺术发展有过开拓性贡献的卓越艺术家却不置一词。这表明他有自己的政治算盘。索洛乌欣之所以没有把那些同样有名的艺术家考虑在内，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博物馆毕竟是为俄罗斯民族艺术而设立的。谈到“当代的现代派”艺术家，他讽刺说，他们很清楚他们能够画出任何东西，而且坚信，尽管没有人看得懂，他们的作品在百万富翁那里肯定“赚大钱”。这暴露了他自己的思想意识。谈到他力图宏扬的各种地方艺术形式，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业已展出的艺术品和仍存藏在俄罗斯博物馆内的艺术品。确实，他怀着极大的热忱谈到罗斯托夫、苏吉达尔、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彼尔姆等地的艺术与建筑，以及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雕像修复工作。

《俄罗斯博物馆信札》主要对许多保存下来的俄罗斯艺术迄今尚未引起公众的关注表示惋惜，对30年代“重建”时期破坏了

数以千计的雄伟教堂及其他不可替代的建筑、艺术、历史古迹表示愤慨。在从列宁格勒寄给莫斯科一位不知姓名收信人的13封“信”的第二封中，索洛乌欣虽然对莫斯科——他的故乡——表达了爱国的崇敬之情，但他仍然坚持说：“和莫斯科相比，我更热爱列宁格勒。”他解释道：列宁格勒不像莫斯科那样千疮百孔，它留下了自己历史缓慢发展的轨迹。或许，假如索洛乌欣是无辜的，应该说，信中也暗含着对斯大林（虽未指名道姓）打着进步的幌子肆意进行破坏提出批评（这需要勇气），尽管贬低他的人，特别是颇有思想的历史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否认这一点。

除公开诋毁现代艺术之外，《俄罗斯博物馆信札》还包含着更重要、更明确的思想宣传。索洛乌欣报道说，他在列宁格勒期间，整座城市贴满了“美国建筑艺术”展览会的海报。他充分发挥自己语言才能，描述了富有侵略性的美国宣传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些宣传如此有力，“人人都在谈论”这次展览会，人们为了一饱眼福宁可排五、六个钟头的队。他说，他通过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弄到一张入场券，出席了展览会，看到一位“迷人的美国姑娘”向来宾微微一笑，发给大家每人一份目录和一个别针。索洛乌欣很羡慕美国人的办事效率，比如，他曾提到过每日发给参观者的、数以千计用精良纸张印制的、有美丽插图的目录和“活的鼓动家与宣传员”。他说，他们〔指展览会上的服务人员〕每天8小时所“热心宣传的不光是美国的建筑艺术，而且还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他补充说，对此，他丝毫没有感到惊奇，而且展览会也并没有给大多数列宁格勒人留下什么印象。然而，令他义愤的是，这么一次“微不足道”的美国建筑艺术展览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而15世纪俄罗斯壁画展览却几乎无人问津。两次展览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引用圣耶科瑟佩里的话说：“只要听一听15世纪的民歌，就会明白我们堕落得多么深了。”

索洛乌欣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他认为，在文化竞

争中，俄罗斯人的产品优于美国人，但美国人却在劣质品的装潢和广告上技高一筹。为了迎击并赢得竞争，俄罗斯人须做如下几件事情。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提高对自己古老文化丰富性、美和力量的认识。第二，他们必须学会在有组织的公共交流和公共关系中打败美国人。

1982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上，索洛乌欣受到严厉批评。同时，他还因发表与苏联官方的理论不相容的言论而在其所在的党组织会议上受到批评，谴责他在“与上帝调情”。然而，1984年，他60岁诞辰时，被授予劳动红旗奖章，与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所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相比，安德罗波夫更不能容忍“民族主义”情绪。为了给自己“昭雪”，索洛乌欣付出了代价，他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显然，他之所以能够恢复名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悔过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官方认识到，他像其他重要俄罗斯“爱国”作家一样，在其作品中常常表达深刻的反西方态度。

上面我们探讨了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观点的某些有代表性的表述，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某些未公开的证据。这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潜在根源，弄清为什么1971年以后官方会减少在官方媒介中发表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观点。本文的材料来源于有关1969年官方文学“研讨会”和共产党组织苏联作家协会会议的报道。报道载于《内部参考》第1009期，即自由广播电台（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内部系列材料之一。

这些材料使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苏共政治局逐渐作出决定，禁止《新世界》自由派和《青年近卫军》“民族主义者”发表有争议或煽动性文章。之后，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新世界》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和《青年近卫军》编辑阿纳托尔·尼科诺夫被迫辞职。有关研讨会的报道表明：在讨论了《新

闻工作者》月刊一再强烈攻击《新世界》事件之后，与会者开始讨论《青年近卫军》杂志的问题。讨论中，与会者运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了《青年近卫军》的撰稿人。F·莱温谴责“恰尔马耶夫及其追随者”没有看到“俄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认为他们从大祭司阿夫瓦库姆那里引伸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宗法制度下农民的立场上”看待“我们的历史渊源。”科日诺夫似乎有保留地支持兰希科夫为恰尔马耶夫所做的、有一定限度的辩护。他说，迄今为止，讨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他补充说：法西斯主义被战败后，“今天的危险来自于极左思想”（他注意到了马尔库塞在西方的名望）和“乌苏里江两岸而非易北河两岸。”然而，他说，对苏联的威胁来自东西两方。他含糊其词，为自己找到下坡的台阶。

另外，一位与会者，费利科斯·库兹涅佐夫认为，如果苏联文学界存在分别以《新世界》和《十月》为代表的“两个极端”的话，现在围绕《青年近卫军》和《我们同时代人》又出现了第三派。他解释说，这一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生活”的产物，并有其“精神根源”。他追溯出两种“传统”：一是西方革命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以恰阿达耶夫、早期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派、陀思妥耶夫斯基、韦克赫伊、别尔佳耶夫为代表的另一种传统。然而，虽然库兹涅佐夫认为第三种立场或恰尔马耶夫立场“极端有趣”，但由于他本人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讲明“民族普遍原则”与当代生活的联系，库兹涅佐夫对此感到困惑。他解释说，当代文学中所有的“宗法式农民”都是老年人，表明他们已背离了当代社会。他最后作出结论说：“当代已无处逃避十月革命。”科甘重复库兹涅佐夫最后一句话，并补充道：现在应该明白“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程度还不够；不在于欧洲，而在于欧洲化的程度还不够”。他还为他所称之谓的“对乡村幼稚的伤

“情调”的广泛传播深表惋惜。因此，科甘把自己看成一个“主张西方化的开明社会主义者，否认“乡土派”，否认民族主义和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

研讨会上，著名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阿纳托利·兰希科夫试图对《青年近卫军》的观点作出解释，并为之辩护，他说：

“我们寻求的是失去的理想。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理想。这甚至使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颇感忧虑。更确切地讲，理想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停止追求理想的文学便会停滞不前。”

兰希科夫认为，现在应该停止仅仅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去探求“积极的理想”。接着，他语出惊人，说：“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特殊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说过。”这时，台下有人提出疑问，说他的话是“别尔德耶夫观点”的翻版。兰希科夫则肯定说，别尔德耶夫和列昂捷夫的思想中有积极的因素。他说，他们的思想能够吸引许多人，这是不难理解的。兰希科夫还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乡土文学”，认为“乡土文学”（他认为“如索尔仁尼琴”）“恢复了我们的语言”。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著的《主人与玛格丽特》一书颇有赞词，认为这部著作成功地处理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似乎是在提出挑战，兰希科夫强调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文化发展中起的作用。他说，他那一派要“回归本源”，从“他们的道德”中获得力量。他最后的几句话颇有救世主似的语气，说：“我们的人民的使命比现在我们所认识到的，要高尚得多。我们有话可说！”

研讨会上首先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瓦季姆·索科洛夫，他在作总结发言时，对恰尔马耶夫和兰希科夫提出强烈批评。除马克思主义之外，他不承认有“第二”或“第三”条道路存在，正如他所言，“我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批评恰尔马耶夫盲目、无辨别地崇信“祖国”，认为祖国毕竟

也有“缺点”。我们要求祖国“给我们比以往的时代更多更好的东西。”他还对俄罗斯在世界上起“特殊作用”的观点提出特别批评。他提出，在1917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特殊道路问题，而是“世界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别尔德耶夫主义不可能调和起来。索科洛夫接着说，“找出革命的阶级根源，而非民族根源”很有必要，不能用俄罗斯有“特殊”作用的方式来评价革命。他最后说，当代的问题不可能“在宗法式农民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必须以“在旧道路上注入新内容”的方式加以解决（农民“不看写他们的东西”，而且正在“离开乡村”）。

根据载有上述报道的资料的简要附记，在作家协会“同一议题”的一次党员会议上，莱温说：“共产党执政50年来〔像恰尔马耶夫〕这样的文章还从未发表过。”恰尔马耶夫把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都作了修正”。他的文章不仅仅是“修正”，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剔除”了。莱温批评索洛乌欣在《俄罗斯博物馆信札》中片面地赞美内斯特洛夫，贬低较激进的其他画家。共产党莫斯科市委领导人瓦西列娃批评恰尔马耶夫用列昂捷夫的观点为自己辩护。她警告说，这条路只会导向波别多诺斯采夫一方。与莱温一样，她认为恰尔马耶夫的文章应在报刊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否则，如她所言，“人们就会传言这是上面的旨意。”在党的会议总结报告中，一位叫苏季林的人说：恰尔马耶夫的文章（虽然他写文章时头脑中已存在“必然性”）中有“诋毁（列宁）的言辞”，把列宁比作“蒙昧的列昂捷夫”，从而“引起人们严重关注。”他指出，迄今只有三家苏联报刊（虽然党的会议在研讨会之前召开，早于杰缅季耶夫的文章）曾发表“反对恰尔马耶夫”的文章。

上面简要地介绍了在《青年近卫军》“路线”问题上展开的论战，虽未探讨在《青年近卫军》和《我们同时代人》上发表的“爱国”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但，我认为，这已足以清楚地



说明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政治思想意义，多多少少准确地反映了报刊上苏联文学界“自由派”和“教条派”、及一些有影响的“上层”评论家和负责文学工作的党的中层干部对它的理解。

本文中所探讨的文化上的一些问题或许对世界上最实际的政治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权威性声明和苏联最高政治当局的行政行为中表现出来。1970年11月《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文化遗产》的文章，教育恰尔马耶夫及《青年近卫军》其他撰稿人，要求他们放弃在对待革命前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

官方援引列宁的权威性论断，即保存旧时代的遗产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局限于那种传统，对此作出批判。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言以蔽之，《共产党人》谴责《青年近卫军》过分地强调苏维埃以前俄罗斯人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提醒《青年近卫军》的作者（似乎他们并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吸收旧时代的优秀成份是恰当的方式。《共产党人》告诫说，“民族自豪”是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不可分割的。”然而，重要的是，文章对《新世界》评论员杰缅季耶夫比对“民族主义者”更苛刻，责难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过分姑息的态度。文章告诫知识分子，要忠诚地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思想准则，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努力避免在苏联各民族人民幸福的大家庭内部播下纠纷的种子。这表明，苏联统治集团越来越不能容忍残余的多元化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是由于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实行改革政策，决心结束令人难堪的丑事外扬而造成的。而最后一点，按照领导集团的观点，无疑是不同观点没有完全被压制住的反面结果。

但，只要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双翼被剪断了，意识形态机器内部的反对派显然认识到，不值得对他们再大动干戈。无论如何，这似乎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下台合乎逻辑的推理。

1972年11月，雅科夫列夫撰写了一篇冗长、事实堆砌、广征博引的文章，其意图似乎是要从意识形态上的彻底清除“民族主义”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雅科夫列夫曾获史学博士学位，现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任要职。

文章中，雅科夫列夫运用迄今唯一可以和文化生活中的“民族主义”及其他令人反感倾向抗衡的全面的列宁主义，批判了洛巴诺夫、兰希科夫、谢马诺夫及其他许多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和史学家。无疑，雅科夫列夫成功地表明：他所批判的“民族主义”作者严重违反了列宁关于文化的“阶级”基础、“沙皇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等理论。他不仅批判了在《青年近卫军》和《我们同时代人》上发表有关作品的俄罗斯作者，还批判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一些民族的成员，指责他们像俄罗斯同行一样，“美化”了苏维埃以前历史的“反动”的一面，却没有赞颂“进步的”、“革命”传统。

雅科夫列夫警告那些崇拜苏维埃以前某些传统、理论和作者（如他曾提到过维克希派及列宁对其观点的否定）的人，指出他们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抨击索尔仁尼琴最近在国外出版的《1914年8月》，认为它“美化了帝俄时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他警告说，“甚至与旧时代反动、保守的传统简单地调情”都会遭到“坚决的反对”。尽管他反对美化“反动”历史，雅科夫列夫对为沙皇将领歌功颂德的文章和诗歌却不置一词。这些作品是自1966年以来“军事英雄爱国主义”吼声的一部分。尽管，也许正是部分地因为他坚决捍卫“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雅科夫列夫于1973年5月被撤职，派往加拿大出任苏联大使，这实际上是政治流放。然而，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一听到有人公开赞美俄罗斯民族主义便惊惧而反感，因此，戈尔巴乔夫又恢复了雅科夫列夫在苏联宣传机构中的职务。

## 持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我们所说的“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指的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新斯大林主义及有时为政府所容许的其他形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那部分人。无疑，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倡导不同政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人中最有才华、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也是和官方意识形态及政策最有抵触的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人士还包括著名代数学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历史学家、控制论专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小说家、《大陆》杂志（巴黎）编辑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索尔仁尼琴和其他有大致相同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注重历史、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宗教与伦理道德（索尔仁尼琴尤为重视后者）。然而，他们的观点有重大政治意义。

当然，就自己选择的职业和使命而言，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位艺术家、道德家，但他却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敏锐和力量。然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和他对斯大林奴隶劳动集中营制度淋漓尽致的揭露是其他探讨道德、宗教问题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为此，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证书上写着：“赠给以道德力量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割舍传统的人。”正如其他政治犯一样，索尔仁尼琴在监狱和集中营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自己属于俄罗斯民族，从而抛弃了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回归到自己民族传统的正统信

仰上来。

在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中，对传统的尊重与非正统的个人主义及对个人的道德责任的特别强调并存。对索尔仁尼琴而言，甚至一个人的民族成员资格，正如涅尔任的小说《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逐渐认识到的，依赖于“人的内在自我”。若想“成为民族的一员”，一个人必须“努力锤炼、修理、净化自己的灵魂，并先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索尔仁尼琴在一篇题为《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的文章中指出：他最主要崇尚尼康和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他说：“自尼康和彼得大帝毫无人性的改革起，俄罗斯民族精神开始受到压制和根绝，我们忏悔的能力亦开始枯萎、干涸。”索尔仁尼琴偏爱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历史，这与1972年关于“一千年基督教道德气氛”的《斋戒书札》提及的事情是相辅相成的。

索尔仁尼琴在其非小说作品中，特别是在《诺贝尔讲演》、《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系统地探讨了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当然，索尔仁尼琴并未亲自登台讲过《诺贝尔讲演》。1970年，索尔仁尼琴没有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倘若去了，苏联当局将不会允许他重返故国。

在《诺贝尔讲演》的前几页中，作者表达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同的观点，认为假如艺术家“作为上帝天堂之下的普通学徒心甘情愿地工作”的话，“美会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说，“整个民族文学”“未装棺材便被埋葬”到了古拉格群岛。他说，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梦想着有一天能把讯息带给“外部世界”，但如今的世界缺乏领悟力，“一点也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然而，索尔仁尼琴文章的总基调仍是乐观的，认为文学艺术自身“能够克服人类仅仅通过自己的经验获得知识、而对其他无动于衷的不幸弱点。”艺术的这种超验作用，清楚地

表明，它是与艺术作为某个民族“活着的记忆”的作用相等同的。他认为，后者是“人性的财富”，每一民族至少“有其自身的特殊特征，自身中蕴藏着上帝设计的特殊方面”。

谈到国际主义问题，索尔仁尼琴认识到各种他所谓的国际危险，如“慕尼黑精神”会在侵略面前产生惰性，“消息阻塞”又使国际条约成为“虚幻的”。他最后满怀希望地说：世界文学（索尔仁尼琴原文用大写）通过揭露暴力赖以保存权力的谎言，会带来暴力的崩溃。此外，作者还在《诺贝尔讲演》中多次为“人类日益加强的精神团结”振臂呐喊，坚决反对“某内务部”认为文学是“内部事务”的理论，相反，他反驳说：“在我们拥挤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内部事务之类的事情。”他补充说：“若要拯救人类，人人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东方人必须热心西方事，西方人必须热心东方事。”当然，这种观点和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并无两样，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存在分歧。可以肯定，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讲演》中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俄罗斯根基怀有拳拳赤子之情的人来讲话的，但其美学与精神视野已超出民族的界限，面向整个世界——显然，他的观点比苏联那些上层人物的观点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这些上层人物压抑、破坏艺术，他指出，这不仅是俄罗斯的悲剧，而且是对人类的威胁。

在《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一文中，索尔仁尼琴号召俄罗斯人民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忏悔，因为正是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使苏维埃与苏联历史上的罪行成为可能。就革命前时期而言，他强烈谴责“对旧教徒实行可怕的惩罚”，谴责没能废除农奴制以避免留下仇恨的种子，赞扬俄国的东正教会。这里，索尔仁尼琴没有具体地讲细节，但上下文表明，他抱有和激进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产生的同样的思想态度。这一点从他的一句话上可以反映出来，“在20世纪，给人类幸福的忏悔的雨露已

不再能够软化被仇恨理论烧硬了的俄罗斯土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号召俄罗斯人民为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取得对俄罗斯统治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忏悔。文章中有一部分充斥着对自己民族人民的谴责，责难他们在古拉格行动中犯下了共谋的罪行，他说，“这个黑暗、虚假、残暴的王国，……这片泥泞的沼泽，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造就的。”通过“减轻我们过去的负担”，他的国家能够向前发展，“成为公正、洁净、诚实的社会。”从这里，他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与马克思主义改革者和民权活动家不同，他警告说，即使“最完美”的社会经济改革都不会带来理想的变革。

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几次阐述了与其他许多“民族主义”不同政见者相同的观点，认为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忍受的苦难最重。有一些地下出版物，把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容和俄罗斯传统等同起来。索尔仁尼琴愤怒地批判并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放纵了好战的无神论和阶级仇恨”。

《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中不乏对俄罗斯人虐待非俄罗斯人丑行的强烈针砭与批评，其中包括苏维埃及沙皇时代对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压迫与消灭”以及其他无数罪行。索尔仁尼琴还大胆地提到了“集中营中残害波兰人民之花”这一向来被禁止的问题。然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抨击了某些波兰人在力量均衡发生变化时对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结束讨论波兰—俄罗斯关系时，呼吁双方“互相忏悔，互相谅解”。索尔仁尼琴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或许是为了维护我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而制订出来的。”苏联的政策承担起“东欧国家命运的责任，而这与我们现在的精神发展水平和理解欧洲需求与方式的能力是不相配的”。索尔仁尼琴接着写道，它（政策）在追求虚幻的目标的过程中，干涉每一块陆地上的事务。他主张，俄罗斯必须远离“喧嚣世界的竞争”，把精力转向

内部，“医治好自己心灵的创伤，教育子孙，理好自己的家。”

文章结束时，索尔仁尼琴提出一项建议，这一建议以后又出现于1973年写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并且更加完善。他提出，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应由外部事务转向开发东北部“未驯服的广袤地区”，即索尔仁尼琴所谓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及中北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东北能“提醒（我们）……我们的海洋是北冰洋，而非印度洋。我们既不属于地中海，也不属于非洲。那里不关我们的事！”预料到会有人批评这是一个过分孤立的防御性计划，他补充说，防御力量必须保存，但必须控制在“足以应付真正的而非想象中的威胁的范围之内”，并“希望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会很快开始改变。”文章结尾时说，“如果它（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译注）不发生变化，罗马俱乐部已经算出结果：我们生存的时间已经不足100年了。”

当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中政治性最强的是他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作者在文章中极为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提出治疗苏联及世界性弊病的极为详细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惊奇的方案。而且，直接把《信》写给苏联领导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颇具戏剧性、令人惊讶的行为。在其回忆录《橡树与牛犊》中，索尔仁尼琴多次提到《信》。他写道：在他被关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期间，被从本土驱逐出境之前，他已预感到，他肯定就要被带去和苏联领导人对话。他说，《信》是写来“代替这种对话的”。他解释说：“我们不能放弃改造他们的希望，否则我们就不能称其为人。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一点人性也没有。”在同一书中，他还指出，写信“纯粹是一时冲动，事先并无深思熟虑。”1973年9月初，当他把信寄给克里姆林宫时还抱有幻想，但他未料到政府对此会如此无动于衷，加上克格勃搜到了他写的《古拉格群岛》的手稿，从此他所有的希望都化作泡

影了。索尔仁尼琴获悉这一不幸事件的时候，西方的出版商也开始印刷他的《古拉格群岛》。对苏联统治者而言，这无异是一枚重型炸弹。随之，骚扰、诽谤和谩骂接踵而至，甚至以死亡来威胁作者及其家属。

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的开头部分就定下了全文的“民族”基调，猜想收信人和他一样关心全体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依赖我们”的那些人和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民的命运。他希望领导者们“不会容不下自己的血统、父老和故土”，不会对自己的民族漠不关心。接着，他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强苏联的实力，结束东西方的对立，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或者假如爆发这样的战争，确保苏联获胜）。而对共产主义中国，作为确保安全的一种途径，它敦促领导人用俄罗斯爱国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对苏联领导人说，“强大的美国之所以输给了弱小的北越”，是因为“美国民族意识太弱，太不发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在《信》中责难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许多弊端（包括与中国及西方的紧张局势、忽视国家内部的发展、甚至道德沦丧，索尔仁尼琴认为，甚至最后一点都部分地是由于用意识形态代替宗教而造成的），但他并没有要求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建议允许各种世界观（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宗教）同时并存，在竞争中争取公众的支持。

在《信》中，索尔仁尼琴提议，应该把“民族行为的引力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及我们国家的东南部”转移到它的“东北部”。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注释里言简意赅、极为风趣地说：“这种转移”，“迟早会带来解除对东欧的保护，也不可能想用强迫手段保留苏联内的边疆民族。”

《古拉格群岛》第三部中的某些言论进一步证实了索尔仁尼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索尔仁尼琴热情赞扬了他所认识的爱沙



尼亚、立陶宛囚犯。他说，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耻辱”，因为他们的人民“由于和我们唇齿相依，挡住了我们的出海口”而受苦受难。他详细地论述了俄罗斯—乌克兰关系问题，认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两个民族未能和睦共处”，明智、体面地解决办法应该是让“乌克兰人自己”决定乌克兰未来的地位。

《废墟之下》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均对俄国历史上的独裁主义原则进行了探讨。在《〈苏醒的时候〉1973年跋》中，索尔仁尼琴承认“与官方的条条框框持不同见解”的绝大多数苏联人民都一致认为苏联社会应为“自由和多党制议会制度”而努力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补充说，革命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早就相信：“他们及民族的事业只能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知识分子为追求物质利益，却让“亿万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知识界有些人不关心无意义的物质价值，而俄罗斯人几乎不懂得何为“自由”，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说了上述一番话之后，索尔仁尼琴接着轻蔑地论述了他所谓的“外部自由”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危险”、“甚或是致命”的缺陷。他说，“历史上的各种民主制度面对一小撮假慈悲的恐怖分子而束手无策”，在这种时期，这些弱点已变得“愈来愈明显”。在西方民主制度发生危机的时代，索尔仁尼琴认为，再在那种制度中“寻找”我们国家的唯一出路是不合适的。他尝试性地权衡了独裁统治的利弊，承认它会带来独断专行，甚至暴政。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者之所以危险，恰恰是因为很难找出高层次的价值准则来约束他们。”而“宗教时代的独裁者”自己也认为应该对上帝负责。

鉴于1917年的俄罗斯民主制度只存在了不到8个月便夭折这一历史事实，索尔仁尼琴质问：“难道我们国家的发展只能从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吗？难道这是唯一畅通的道路吗？”再次论及“精神”问题时，他认为现存政治制

度的弊端不在于独裁本身，而在于它要求对“我们灵魂的彻底降服”和“不断参与制造谎言”。但，要想战胜谎言，人们无须采取“革命、暴力、或者社会组织措施”，而只须在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迈出“道德的一步”。索尔仁尼琴在给《废墟之下》的最后、最长的一篇稿子中，呼吁那些他称之为“一知半解者”（遵奉者、野心家、具有西方倾向的苏联知识分子）履行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职责，站出来大胆地揭露官方的谎言。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敦促统治者从道德上净化政权。他向他们保证（他的保证和他用非暴力手段从事政治的主张相一致，萨哈罗夫及所有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皆有此观点），他绝不是革命者。一个仅仅政治领导权的变化只能带来毁灭性的斗争。而且，他接着写道，他也不是一个主张建立西方那种民主体制的斗士。那种民主只能体现在四年一度的选举中，只会使盗窃出卖国家军事机密的犯罪行为逍遥法外。在否定了“狂暴的”民主制度之后，索尔仁尼琴坚持说，自由是“道德的”，但不存在毫无约束的自由；秩序只要不是暴政，亦非不道德。之后，作者严厉批判了1917年民主立宪制度的力量，认为俄罗斯当时尚不具备建立民主体制的条件，而从整个国家来看，条件就更不具备。

极为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在《信》中建议，要求恢复1918年6月被剥夺了权力的苏维埃人士的地位和名誉。他在这里再次建议，要允许各种思想、道德及宗教理论进行充分的自由竞争，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应以是否是共产党员为标准。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人道、开明、自由的建议，强调对犯人要仁慈，给文学艺术以自由，允许自由出版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方面的专著。

提出自己的改革计划以后，索尔仁尼琴使收信人相信他们丝毫不用为此信而担心，因为“不可动摇的权力、独立、强大、坚定的党和军队”等等仍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他接着补充道，

“要让人民呼吸、思想、并发展！”他敦促领导者立刻采纳他的改革措施。否则，他预言，可怕的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他们将不能求助于世界共产主义，而只能求助于人民。是的，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他预计，如果即刻采取行动，整个过程只须10年就足够了。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生活将提出更加严酷、更加迫切的要求。”信结束时的几句话或许表露了他写这封信的动机。他写道，写这封信使他“在俄罗斯历史面前”背负上了“沉重的责任。”但是，他作出结论说：“自己不承担起寻找出路的责任，无所事事——那也是更大的负担。”

像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及其他向领导人提建议的各国公民一样，索尔仁尼琴并没收到回信。但是，《信》在1973年发表之后，对世界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政府对《信》，或许特别是对《古拉格群岛》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于1974年2月14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项法令，以从事反政府活动为由剥夺了作者的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从苏联驱逐出境。随后，报刊间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官方媒介称他为叛徒。然而，他的被捕和被放逐不仅引起一些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如伊格尔·沙法列维奇和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等）的抗议，而且引起在许多问题上与他有意见分歧的，如罗伊·梅德韦杰夫和安德列·萨哈罗夫等一些人的抗议。因此，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索尔仁尼琴相反却被政府扣上叛徒的帽子。这个政府，用索尔仁尼琴6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来说，在为了生存而抗击纳粹的俄罗斯人民战争期间，“成功地束缚并利用了俄罗斯民族主义。”

我认为，索尔仁尼琴1980年写的文章（最初发表于《外交》季刊上，后再版，题名为《致命的危险》）是他被流放之后最重要的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其主要意思是美国的苏联事务专家、俄国史专家正在“危害各个民族，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俄罗斯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普遍弊病与共产主义首先控制的国

家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领导人破坏了“民族生活方式”，褻渎了“民族圣地和历史遗迹”，使人民“60年以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已“不见容于人民。”另外，他说，一些西方史学家忽视了甚至在一战时期俄国的经济进步、报刊“预先不受政治审查”的自由以及战前的其他进步。顺便说一句，索尔仁尼琴在小说《1918年8月》一书中已就这个问题间接地进行了探讨，他亦因所谓的美化德国军国主义而受到官方媒介的严厉抨击。

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观点，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在发给本国的报道中重复了史学家“对旧俄罗斯歪曲的描述”。他还特别提到了政府限制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与平民接触的著名禁令，指出：记者对俄罗斯有限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如作者本人“在苏联偏远地区”生活了55年的经历之广泛、深刻。他否认西方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统治民族”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很有市场。同许多移居国外的人及一些西方学者一样，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已经受到极端的压抑和羞辱。”他讽刺某些作家对“苏联俄罗斯沙文主义”所表现出的担心与忧虑。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在50年来几乎无果腹面包的国家中煽动起好战的民族主义”。他用几页的篇幅列举了俄罗斯人民深深敌视共产主义的证据。

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苏联政府，才从西方的“反俄罗斯运动”中得到益处。他认为，政府企图利用俄罗斯民族感情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对美国而言，他劝说道，现在该利用对苏广播，告诉听众“他们自己历史的真实”，并延长宗教广播时间。索尔仁尼琴还在其他报刊上，其中包括纽约的俄文报纸《新俄罗斯言论报》和期刊《播种》上，撰文数篇，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苏联的听众可以被吸引过来，并受益于广播，克服由于严苛的审查制度带来的无知与孤立感，因为这种制度使苏联人民不了解国内

发生的事情，甚至不了解本地区及其邻近地区发生的事情。

在《致命的危险》一书中，索尔仁尼琴用相当长的篇幅探讨了作者本人在西方的言论中谈到的主题，即共产主义形形色色的“不宽容性”和缺乏理解力及勇气，以及西方在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中的严重无能等。索尔仁尼琴经常指出（或许在《致命的危险》中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共产主义的扩张主义及其在西方的反应与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人民的态度和命运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美国把共产主义政府当成被征服人民民族感情的真正代言人，这便否认了将来与被压迫人民的联合”，“从而把他们驱入共产主义的牢固掌握之中。”与此相关，索尔仁尼琴谴责“疯狂”的美国利用中国这块盾牌，反对苏联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依靠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反对中国和俄罗斯人民，到头来只能激起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的反对。

## 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巨人，从地位上讲，只有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可与之匹敌；而从英勇程度上讲，只有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及少数异常勇敢的人可与之匹配。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前景的设计师中，没有人比他阐述的思想更多、更恰切、更有生命力、更广泛；也没有人像他那样雄辩，具有说服力。然而，《废墟之下》其他一些撰稿人，特别是伊格尔·沙法列维奇和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也对以索尔仁尼琴为主要代表的观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索尔仁尼琴的合作者一一进行研究。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索尔仁尼琴的崇拜者。同著名小说家本人一样，奥西波夫是在劳改营中长期（1961

—1968）服役期间皈依基督教的，并成为俄罗斯爱国者。早在此以前，他就被卷入吸引了莫斯科部分青年学生的知识分子骚动中。在一篇发表在《大陆》（流亡国外人士办的杂志）上的奥西波夫小传中，流亡作家米哈伊尔·海费茨指出，奥西波夫已对民主（他放弃对斯大林的崇拜后转而信奉民主）失去了信念，但一起服役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囚犯对俄罗斯民族态度粗暴，毫无理解的表示，这使他“成为俄罗斯爱国者”。

奥西波夫最突出的贡献是编辑出版了地下杂志《市民议会》（以中世纪俄国城市中的人民大会命名）。自1971年至1974年3月，奥西波夫共出版了9期《市民议会》。之后，显然由于克格勃一手导演的阴谋，他被迫辞去编辑职务，并于1974年年底，在创办《土地》杂志后不久被捕，判长期劳动改造。据地下出版物的消息说，奥西波夫被释放后受到严重折磨。

奥西波夫通过其编辑工作为向本民族公民宣传俄罗斯的“斯拉夫”传统做出了重大贡献。《市民议会》和《土地》向读者介绍了大量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康斯坦丁·列昂捷夫、尼古拉·别尔德耶夫等民族中心论思想家的生平与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在苏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奥西波夫还向读者介绍了大量有关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历史，其编辑方针是博采广取。比如，他既让读者了解了苏维埃控制下的官方教会评论家的观点，同时，《市民议会》又发表了A·S·斯库尔托夫（阿纳托利·伊万诺夫的笔名）及其他仇外民族沙文主义者的作品。《市民议会》和《土地》的一贯主题是：西方对俄罗斯人民缺乏正确的理解。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奥西波夫和萨哈罗夫联合抗击苏联官方的压力，尽管两人在思想意识上也存在着许多分歧。事实上，在1972年，奥西波夫的思想与民主运动已经相当接近了，正如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言：“我们最同情民主运动。”他还说：“在

没有人权保障，没有宪法赋予的自由的情况下，文化抵抗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奥西波夫的刊物绝非“地下的”。这些期刊是完全公开的，而不像颇有声望的《时事纪实》那样，为保护提供消息的人，文章不署名。3年来，奥西波夫之所以能够刊载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很可能得到高层集团的支持，因为他传播“爱国”的思想。奥西波夫之所以倒台，很可能是由于保护他的高层人士已经确信，他已成为一种累赘，而不是什么财富，特别是在他一再向美国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索取物质援助，帮助他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更是如此。

伊格尔·奥古尔特佐夫及其在全俄人民解放社会—基督教联合会的同事都受到索尔仁尼琴、奥西波夫理论的影响。然而，与苏联其它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不同，联合会是唯一在理论上选择通过暴力达到目的的组织，其计划首先主张，若要把“各族人民从共产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需要建立一支“地下解放军，以推翻独裁，摧毁寡头政治的保安力量。”应该指出，全俄人民解放社会—基督教联合会实际上还从未策划过任何暴力行动，在它招募起1万人的地下军队(荒诞不稽的乌托邦计划)以前，更不用指望采取这样的行动。由于奥古尔特佐夫及其同谋从未采取过暴力行动(该组织自1964年创建至被克格勃发现3年期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1967年对其领导人严厉判决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撰文，表示抗议。奥古尔特佐夫在臭名昭著的弗拉基米尔监狱服刑7年之后，现仍被关押在集中营中。

该组织在被破获之前共有正式成员近30名，预备成员约30名。组织规模小，加之其地下特性，从而使它不可能通过地下出版物传播其主张，也就是说，全俄人民解放联合会对苏联舆论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索尔仁尼琴和奥西波夫大。但，其领导人却受到严厉镇压，表明当局确实对俄罗斯宗教民族主义对立的表现极为关

注（此处用对立，而不用持不同政见，因为联合会确实设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社会，改变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政策和领导权）。

全俄人民解放联合会的计划简而言之即别尔德耶夫和吉拉斯思想的混合物。它设想建立一个以别尔德耶夫“个人至上”原则或“社会—基督教”为基础的社会。它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虚假宗教”乃是人性丧失、贫穷，威胁世界和苏联的战争的根源。受到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其他事件的影响，人民解放联合会宣布：共产主义必定失败，主张建立社会生活“基督教化”的新秩序，建立由工人自己管理、利润分享并受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神权政治”、“社会”及“代表与大众”原则为基础，以人民议会为领导，国家元首具有巨大行政权力的新的国家体制。这一计划或宪法中没有关于政党的条款，但主张司法独立，废除极刑，建立符合“社会基督教精神与条文”的新的法律制度。

全俄人民解放联合会的计划对对外关系探讨甚少，仅在一部分中向那些临时驻扎苏联军队的国家许诺，在他们实现“自决”过程中，要给予他们援助。这一点以及提出解散共产党的要求是这份过激文件中诸多极端要求的一部分。部分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 would 提出这样一个激进的、旨在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改革苏联社会的计划，这肯定会使苏联当局感到震惊。

各种过激的、甚至有人说是怪诞的民族主义观点，时常出现在一些匿名的、危言耸听的、甚至有点稀奇古怪的文件中。但这些文件在西方很少能够读到。在《民族开始说话》一书（该书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自1970年12月开始发行）中，“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广泛探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了建立民主体制失败后专政的起源，并且预言，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丧失了民族自尊的话，那么将会使美国的工业潜能成为黑色种族统治世界的工具；



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由特权的精英阶层领导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该书以四分之一的篇幅研究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爱国者”们否认俄罗斯人统治了整个苏联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事实恰恰相反，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乌克兰人享有更大的特权。俄罗斯人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所有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作者们宣称，他们拥护沙皇提出的“俄罗斯统一不可分割”的口号，认为苏联的犹太人几乎垄断了苏联的科学、艺术。他们还认为，如果非俄罗斯民族行为适当的话，他们不必担心会被看成二等公民。

在简要探讨宗教问题的那一章中，作者宣称，世界是上帝的仆从和撒旦斗争的竞技场。他们攻击犹太人宣扬的平等主义及世界主义理论，认为这只会导致“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文件坚持认为，应该恢复民族国家，给传统的“俄罗斯宗教”（显然指东正教）以应有的光荣地位。

根纳季·希玛诺夫也曾阐述过类似的政治主张。他以前曾受到过精神治疗的迫害，当过军官并一度与布科夫斯基过往甚密，并且也是一位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多产作者，现在是电梯操作员。希玛诺夫把苏联描述成一个“神秘的有机体，他的观点为苏联记者亚历山大·亚诺夫大量引用。亚诺夫认为，希玛诺夫的观点是苏联的梦想，苏联是“上帝特选子民将来进行使世界‘俄罗斯东正教化’试验的试验室。”亚诺夫认为，希玛诺夫一直在努力说服苏联领导人，使他们确信，极权主义如果戴上宗教的面具首先能够改造俄罗斯，其次能够改造整个世界。希玛诺夫的观点和一些“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和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不谋而合，都相信必须通过受苦来获得拯救。他认为，由于俄罗斯人民经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他们已作好准备，领导拯救世界的运动。然而，与索尔仁尼琴不同的是，正如亚诺夫

所指出的，希玛诺夫一贯反对非俄罗斯边境地区脱离苏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列昂尼德·博罗金在《市民议会》于1974年被查封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希玛诺夫的观点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特别受欢迎”的原因。

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包括一些残余的反犹太观点，经常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如，以经济学家A·费季索夫为首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者”即为一例。上面提到过的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于1975年在《新杂志》上撰文，要求人们密切注意发表的一些反犹太小册子。阿古尔斯基在那篇文章中对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表示支持，宣称只有“基督的复活”才能把苏联的犹太人从“新纳粹的威胁”下拯救出来，但是，以主张族际团结或主张阶级合作的人为代表的运动(NTS)却恰恰相反。在苏联，支持这一运动的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而其同情者的数量则更多。

## 结 束 语

###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简述

或许，促使民族主义态度滋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无力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甚至连坚定的列宁主义者罗伊·梅德韦杰夫也在其1975年出版的《论苏联民主》一书中作出预测：官方马克思主义失去吸引力之后，政府必将越来越倚重于对苏联青年人进行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其1980年发表于《大陆》杂志上的一篇颇具洞察力的文章中指出：通过在苏34年的生活经历，他发现普通群众鄙视一般党员，憎恨区一级领导岗位上的那部分党员。他说他

仅仅遇到过一位坚信共产主义的苏联公民。布科夫斯基是苏联主要持不同政见者中最敏锐、最实际的观察家。当然，苏联政府仍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维护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保持其利用落后国家“解放”运动的能力。因此，苏联政府仍大张旗鼓地坚持高举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两面旗帜。然而，有关1969年莫斯科在《青年近卫军》民族主义问题上进行辩论的地下出版材料表明，兰希科夫（据一位消息灵通的移民说，他与克格勃有联系）等一些“权势”人物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利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使我们联想到第二个或第二类有利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因素，即对外部安全的忧虑。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特别是当这些威胁被认为危及苏联国家政权的存在的时候，苏联政府及其政策对民族主义的依赖性一向是非常大的。

人口众多、敌对的中国被苏联朝野认为是俄罗斯民族最大的潜在威胁，这是第二类因素。诚然，苏联70、80年代的反华宣传没有60年代那样强烈。1969年乌苏里江冲突之后，多年来苏联人相信，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1980年，苏联大肆公开庆祝库利科沃旷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俄罗斯军队击败了金帐汗国）600周年，以此唤醒人们，提防来自中国的威胁。

还有第三类因素，这些因素在某些俄罗斯人中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他们的民族比苏联的其他民族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处境更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不利于俄罗斯人的人口状况。众所周知，苏联的穆斯林突厥人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俄罗斯人。还有一种观点（显然并非没有根据）认为，在莫斯科（既是俄罗斯人的城市，又是共产主义的首都）以外的地区，俄罗斯人的生活远不如非俄罗斯人。面对如俄罗斯人所言的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境况，他们或许正在作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反应。

第四类因素，苏联各民族人民继承了沙皇时期的反资本主义传统，相信强大、中央集权的独裁国家及政府完全有能力指导民族经济的发展。这种遗产使苏联人民能够接受官方及不同政见者的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笔者同意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沙皇的专制统治（诚然在帝国统治最后几十年间变得越来越宽容）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专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几乎全然否认俄国历史上苏维埃时期与起码是彼得大帝以前的沙俄时期之间存在着任何连续性，在这一方面，他犯了个大错。

第五类因素，苏联领导人在宣传中，特别是在反西方宣传中，利用潜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其动机是由于他们一直担心对西方生活方式和商品的了解会削弱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形成的同一性。战后早期在英国大使馆任职的艾赛克·柏林爵士认为：1945年之后，在苏联传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对关于自欧洲归国的苏联军事人员令人不安的报道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而伪斯拉夫优越论的宣传部分地出于相似的动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苏联反对不同政见者的宣传经常指责他们是西方间谍机构的特务。尽管这些指责能激起人们对那些为了物质享受而出卖国家安全利益的嫌疑人员的义愤，但是这一切也同样表明：政府惧怕苏联人会受到西方相对物质繁荣的吸引。

无疑，有利于当代苏联民族主义意识持续滋长的因素还有许多。据笔者猜想，民族主义是靠由于道德上的妥协和耻辱而产生的低级自尊来滋养的，而道德上的妥协和耻辱又是由官方的价值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反差造成的。这是索尔仁尼琴在劝诫苏联人不要再虚伪做人时提到的一种现象。但，也有一些人（如希玛诺夫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到沙文主义那里去寻求庇护。正如小巴林顿·穆尔所言：“加入某一团体可使个人，特别是在感到机会渺茫的时候，省去在世上开辟有意义生活道路带来的烦恼。”

## “羁绊”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

“羁绊”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当然是指，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苏联审查通过的、被认为是有利的、有选择的官方民族主义。独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不能通过苏联的大众媒介传播，表达这种思想的人亦像其他有独立思想的人一样遭到迫害。索尔仁尼琴及其追随者对他们认为苏联过去和现在罪恶的东西果断地进行抨击，他们的新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哲学与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因极情愿的遵守官方的交流准则而免遭迫害。即使在他们闪耀出思想独立的火花时，也不对审查制度和劳动集中营提出批评。索尔仁尼琴加入了萨哈罗夫、恰利泽等人组织的莫斯科人权委员会，相反，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却态度谨慎，避免严重冒犯苏共中央内占支配地位的勃列日涅夫集团。20世纪70年代初对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的惩戒反映了政治最高层力量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意识形态多元化（后赫鲁晓夫时期政治的特点）逐渐的压制。因此，唯一被容忍的只有主张集权计划经济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美化俄罗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以常规的国对国的模式或在非常规的“世界革命进程”领域里的战争和外交上的胜利。总之，这是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两部发动机”（早在1948年梅纳特就把这两者比作苏联政治飞机上的两种驱动力）同步运行的一种新尝试。

毋庸置疑，国内外政策的需要迫使苏联政府又部分地回到了正统的路上来。在国内，莫斯科当局在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努力避免由此而引起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抵制；在外交方面，尤其考虑到第三世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强调具有普遍性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主题，轻视俄罗斯的具体问题的作法无疑被认

为是可行的权宜之计。

杰克·哈尼教授最近指出,《青年近卫军》等杂志60年代所突出的主题到70年代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出现的却是苏联武装部队的元帅、将军及司令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告诫青年人要有通常的爱国之心,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文章基本上没有涉及与苏联人民相抵触的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笔者通过研究1980和1981年的《青年近卫军》,确认哈尼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时,大量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章以及与之有相关主题的文章不断出现。1981年发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说,1980年,历史材料在《真理报》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80年出版(发表)的有关俄罗斯历史题材的作品有150多篇(部),其中包括诸如《我的祖国》之类的小说及有关沙皇时代的将军苏沃洛夫、“俄罗斯人民与莫尔多瓦人民友谊”、俄国历史教学、古俄罗斯市镇及著名俄罗斯肖像画家弗鲁布列夫壁画等题材的文章。

在全体苏联公民中进行俄罗斯和苏维埃爱国宣传的主要机构之一是全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协会。据《苏联大百科全书》1980年年鉴介绍,至1980年1月1日,该协会在88,500个“基层组织”中共吸收会员13,200,000人。年鉴还记载了保护协会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积极地参加庆祝俄罗斯和乌克兰“重新统一”325周年纪念活动和为修复文化艺术遗迹而进行的捐献活动。我们不应从表面上理解苏联方面对该协会活动的说明,但有关该协会活动及其成员构成的报告表明,政府认为在协会里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是完全值得的。

照乔治·克兰教授的说法,保护协会在1976年以前一直是个自愿的群众性组织,之后归并到文化部。克兰教授认为:“政府允许并支持协会的工作是出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这一断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该协会的政治意义。

文化部在接管保护协会的同一年,颁布了一项《关于保护和

利用历史文化遗迹》的法令。尽管条文中没有提及俄罗斯，然而，该法令似乎标志着苏维埃国家剥夺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历史与古迹的过程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近年来，从苏联携带肖像画出境已越来越困难。据我所知，就连一位科学院院士作为礼物送给一位美国科学家的肖像画也不允许带出国去。

在苏联，学校教科书是进行政治灌输的重要工具之一，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在向苏联儿童灌输较为原始的苏维埃俄罗斯爱国主义。例如，其中有一课的课文就是赞颂列宁和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两首歌曲。歌曲中，“伟大的列宁”被描述成模范学生和战斗中保卫了自己祖国的领袖；另一首歌则表达了苏联儿童对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的自豪之情。小学生都必须会唱这些歌。

有许多分散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材料证明：苏联官方的爱国主义灌输使许多苏联公民确信，苏维埃国家是人民的保卫者，能够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至少是新移民的证词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位犹太移民告诉我，有80%的俄罗斯人愿意与官方政策保持一致，这仅仅是因为这些政策是由官方制定的。还有一位先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说，普通苏联人不喜欢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们对其所接受的教育没有表示应有的感激（当然，这种情况反映的不仅仅是政治灌输的结果，而且反映出屈从主义的生命力。这种屈从部分地继承于历史，部分地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结果）。有相当证据证明，很多苏联人支持1968年克里姆林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且与克里姆林宫一样对波兰工人为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团结工会运动持敌对态度。我从一位前苏联公民、现为美国大学教授那里获知，他在莫斯科结识的一些苏联官员在私下谈话中将波兰称为“维斯瓦各省”。这一现象，或许多多少少与上述态度有某种联系。

## “俄罗斯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分歧？”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所写的《俄罗斯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分歧》（载《大陆》季刊第23期）一文是对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的，由移民物理学家、法学学者瓦列里·恰利泽所写的另一篇文章的评论。恰利泽在其《共产主义还是国家共产主义》的续篇中批评索尔仁尼琴，认为他的立场有碍于发挥持不同政见的移民对苏联政权的将来发展施加有利影响的有限能力。恰利泽认为，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及外交政策的批评在移民中激起了一种反西方态度，并且使苏联国内的人相信，政府的反西方宣传是正确的。他同时还谴责索尔仁尼琴鄙视法律和合法性，过分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政权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恰利泽对索尔仁尼琴的严厉批评，其实质是萨哈罗夫对这位大作家《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的评论的翻版。

此外，恰利泽认为，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关于在俄罗斯建立独裁秩序的建议极其模糊，他质问：应该由谁来作出决策呢？“是沙皇？还是大主教？抑或是至上的作家？”提到宗教，恰利泽说，正如希特勒时代德国亲法西斯的“德国基督徒”的作用一样，“政治化了的基督教固然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已不能再称之基督教。”他坚持认为，在苏联业已形成了一种较“弱”形式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它表现为在非俄罗斯共和国中居统治地位的精英人物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歧视。他宣称，民族主义在全苏联的胜利使共和国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焕发了生气”。恰利泽接着说，受索尔仁尼琴影响的“主张独裁的移民”提出的要求正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所求之不得的（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与西方的隔绝使人民免受西方自由与民权思想的侵蚀）。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可以欺骗性地接受宗教，“尽管



国家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共产主义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由于最严重的民族主义偏见而得到加强。”最后，恰利泽号召读者“要保持谨慎，并且牢记，靠外界宣传我们不仅能逐步改善那种制度，而且能将它搞糟，有可能搞得非常糟。”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民权运动的又一位著名老兵，可以说是一位一线战士，而恰利泽则更像一位理论家和学者。然而，布科夫斯基却批评恰利泽，说他受到了“知识界广泛流传的神话及恐惧心理”的影响。他明确表示，恰利泽对苏联公众舆论不甚了解，他幽默地说，恰利泽和他自己不同，他不曾与汽车司机共饮，也未曾在集体农庄与老奴一起种土豆。布科夫斯基坚持说，恰利泽认为普通苏联人甚或党的官员并不憎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恰利泽认为，苏联人民可以对苏联政权大发牢骚，这恰恰是它强大的证据。对此，布科夫斯基也持有异议，相反，布科夫斯基在文章中写道，口头上不满的增加反映了人们惧怕心理的减少。

恰利泽曾谴责索尔仁尼琴呈现出一幅与苏联报刊相似的西方生活的蓄意讽刺画，对此布科夫斯基提出挑战。他颇具讽刺意味地批评恰利泽所谓西方在贝尔格莱德赫尔辛基协定复议会议上表现软弱的态度，赫尔辛基协定恰好表述了被诸如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及已故的安德列·阿马尔里克等人权运动老战士所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尽管布科夫斯基也认为“法律领域并不是索尔仁尼琴的特长”，但与恰利泽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索尔仁尼琴对西方在恐怖行为上的态度的批评并非反西方宣传，而是号召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采取负责任态度的一种有效手段。布科夫斯基认为，移民对索尔仁尼琴批评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把小说家当成了政治家。假如他真正是一位政治家的话，布科夫斯基说，他就不会写出皇皇六卷本的历史小说巨著，而且他的社会活动亦不会仅仅局限于帮助政治犯一件事上——此处显然是指资助政治犯社

会基金一事。

布科夫斯基也认为，索尔仁尼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非常幼稚，他认为，依靠基督教决不能在从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转变过程中把俄罗斯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其理由是基督教既不能抵抗共产主义，亦不能防止法西斯主义。（这话极为有趣，在1977年同索尔仁尼琴的一次谈话中，小说家问他是否同意极权主义不可能直接变成民主制度这一观点。）

布科夫斯基批评国外的移民们过份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及自己的政治热情。他认为，移民（包括那些布氏认为是平庸之辈的人）能影响苏联政治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是恰利泽的信念而已。他批评恰利泽和索尔仁尼琴太武断，前者认为苏联“没产生过宗教运动”，而后者则声称宗教复苏是能够抗击苏联政权的唯一力量。布科夫斯基最后说：“捍卫人权的运动有责任和义务完成一切，甚至（完成）不可能之事，从而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有选择信仰的自由。我们没有权力忘记这一点。”

这样，尽管布科夫斯基有批判地接受了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但他承认小说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和索尔仁尼琴在某些问题看法一致，从而使他与一些移民（包括一些西方人士）所表现的倾向拉开了距离，把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和苏联官方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捏合到了一起。笔者认为，布科夫斯基的观点是公正的、现实的。苏联当局不公正地对待了索尔仁尼琴及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民族和宗教价值的代言人，无视索尔仁尼琴向俄罗斯人民提出的要他们“忏悔”和“自制”的呼吁，否定他对苏维埃帝国的谴责和他提出的应给予苏联边疆民族权力和自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索尔仁尼琴及其朋友的新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和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及中央集权统治经济——军国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及苏联民族主义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 未来的展望

可惜的是，苏联的政策及宣传最近的倾向似乎令人忧大于喜，至少在今后几年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治局的授意下，克格勃监禁或强迫向国内外流放了绝大多数公开的、活跃的、各种观点的不同政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科学院院士安德列·萨哈罗夫放逐到一个乡间小城——高尔基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西方开明思想的鄙视，这种情况在斯大林之后尚属首例。这种威胁之战更为丑恶的一面是对妇女抗议者，如韦利卡诺娃、塔季扬娜·奥西波娃等人进行的严厉批评。

强烈的清除异己的政策，加之斯大林时代以来极其激烈的反西方、反美宣传，预示着俄罗斯和世界暗淡的前途。通过削弱、有时甚至有效地禁止萨哈罗夫的民主主义及索尔仁尼琴主张的相对自由的民族主义，克里姆林宫用原始的俄罗斯沙文主义替代日渐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或许有所加强。然而，由于我已经指出过的原因，我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很快地退出历史舞台。公开表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甚至以此为基础确立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看来，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后果。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方式制定的、“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计划当然也是如此。如果责难在亚、非、拉冒险行为的相对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成为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话，世界紧张局势就会变得缓和。但，撇开第三世界不稳定因素的减少（这会减少混水摸鱼的好处）或苏联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会减少对外冒险的财源）不谈，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夺取权力，除非每个执政的联盟都认为这是唯一得救途径。

鉴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政坛风云变幻，上述设想亦益具尖刻

性。世界不仅应及时了解苏联国内的动向，在经济和战略上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且应给苏联国内及国外移民中的所有非极权力量以道义上的支持，尤其应全力以赴，支持布科夫斯基、恰利泽和索尔仁尼琴等一些人，用布科夫斯基的话来说，努力使“被堵住嘴的”人民“说话”，同时，完全有理由相信，构成苏联世界政策的仇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仍是敌视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主要表现。正如布科夫斯基所言，从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现在官方政策中唯一缺乏的就是种族大屠杀。

## 第三部分

### 民族问题与苏联经济、文化及人口



## 第七章

# 苏联民族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

## 苏联的民族政策

自从通过民族共和国的形式建立了对许多政权的霸权地位以来，布尔什维克为了控制多民族的帝国，既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也需要某些相应的政策。在社会经济范围内，列宁反复提及的“民族政策”为此提供了总的框架。根据列宁的论述，苏联各民族将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并以各种方式“接近”。所谓“繁荣”是指所有的民族将参与高速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运动，并从中获益。而这已成为苏联发展政策的要旨。因为原先各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极不平衡，据推测，“接近”首先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分配资源以缩小这些巨大差别。各民族间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别的缩小反过来也构成了缩小总的社会差别（男女经济地位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发展过程在强大的集权政府和单一政党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党和政府在所谓共同目标和共同任务的实现中起保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上一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残余的民族感情和明显的民族特征将逐渐消失。

在经济方面，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各民族发展水平的均衡（接近的一个方面）在70年代初以前一直是在政府政策声明中

反复出现的两个主题。这两个目标在战后几个五年计划（包括1971—1975年在内）的条文中都有明确表述，但后来均衡发展的主题却消失了。勃列日涅夫1972年11月在苏联建国5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措辞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书记在讲话中声明：“既然各民族共和国平衡发展问题从总体上已经解决，那么我们就能够从整个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解决提高苏联国民经济实力的经济问题。当然也要考虑到加盟共和国的特殊利益”。有关民族问题的学说和“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被苏联理论家接受，用以描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过程中现阶段的特点）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理论是在所宣称的“苏联人民”现在已经形成这一信念和为了保障经济发展、发挥科技革命巨大作用，苏联经济必须以单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形式进行管理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82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科学的指导过程中，党的民族政策首先要把苏联每个民族的利益与全体苏联人民的总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简言之，今后中央经济计划应面向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总产品。在此基础上，随着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和形式的多样化，社会经济将在所有地区持续发展。这样，民族的“繁荣”在这种理论中得到解释，那么，“均衡”是怎么回事呢？谢尔比茨基写道：

“此外，在目前条件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均衡发展问题具有新的含义。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任务是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问题是要在符合全体苏联人民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使各共和国的发展水平接近，实现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和谐发展，促进生产合理的专业化……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接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全面发展也决定着其对



苏联经济实力的贡献。苏联共产党就是以此理论为出发点的。”

1982年初通过的苏共有关苏联建国60周年的决议表明了在同工人中表现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主要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出发决定社会经济问题”的意图。新当选的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有关民族问题的首次讲话中甚至走得更远，强调说党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民族的日益接近，而且是它们的融和”。他也着重强调了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必要性。

正如其他许多人所指出的，估计苏联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果是异常困难的。首先政策的效果实际上规定了政策的实际目的，并把它用数字（尽管是粗略的）表现出来。例如，苏联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达到绝对平等吗？这一进程该如何评价？是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还是根据工业生产水平，抑或是根据人均消费？在既定政策目标的可行性问题上，在估计成功的标准选择以及对结果重要性的解释上，意见分歧很大。本人在文章中不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因为这往往需要有高度的专门知识，并侧重于对种种数据的解释和各地区间及不同时期的可比性；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苏联政府多年来的政策在控制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明显效果，本人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描述。我们将以加盟共和国及其命名民族为分析单位，以战后阶段为重点，对主要民族的地理位置与城市化，语言同化与教育，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诸方面的趋向依次加以考察。本文结论部分探讨了作为实现主要政治目标（对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民族主义的衰落）工具的社会经济政策与成就的重要意义，并对未来进行预测。

## 地理位置和城市化

占苏联人口90%以上的15个命名民族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中。而且，命名民族在每一个共和国的优势保持不衰，并有扩大趋势。1979年，90%以上的格鲁吉亚人、土库曼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像1959年的情形一样居住在自己的共和国内。除了亚美尼亚人和塔吉克人居住在各自共和国中的人口占其民族总人口的比重为66%和77%以外，其他共和国的命名民族都占本民族总人口的80—88%。1979年，居住在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和居住在西部3个共和国以及格鲁吉亚的命名民族的比例比20年前稍低一些，而其他命名民族的比例则稍高一些。然而居住在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却增加了10%。

命名民族在它们各自共和国全部人口中也往往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增长的趋势。1979年，俄罗斯人口占整个俄罗斯联邦人口的大约83%，比1959年略少。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也有所减少，1979年他们在各自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4%、79%和64%。然而，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其共和国人口中的比例急剧降低——前者由62%降到54%，后者由75%降到65%。相反，在外高加索、中亚和哈萨克诸共和国中，命名民族的比重大幅度增长，命名民族在立陶宛也有增加。1979年，除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民族外，命名民族占各自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通常是2/3，甚至更多。每个命名民族在各自的共和国人口中的比例在用各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数字估计民族本身所缺少的数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俄罗斯人在大多数非俄罗斯人共和国中是第二个人数最多的民族。然而，1959—1979年间，俄罗斯人在外高加索、中亚和

哈萨克诸共和国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在其他的共和国中大幅度上升，如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共和国中增加了6—7%。

在苏联发展政策的影响下，各加盟共和国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但是发展的速度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官方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区域上或者在时间上也许不完全可比较），1940年所有的共和国中城市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37%，而其中5个共和国甚至低于25%。1982年初，除中亚和摩尔达维亚外，各加盟共和国城市人口的比率超过半数。1959—1982年间，城市化速度最快的要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其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1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吉克和土库曼在这个时期城市总人口只增加了1到2个百分点。塔吉克，城市人口从1959年的33%增长到1970年的37%，但是1982年又下降到34%。

非俄罗斯人共和国中的命名民族趋向于居住在农村地区。1970年（1979年的数字现在尚未公布），除亚美尼亚外，非俄罗斯人共和国命名民族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在大多数共和国中，农村人口中命名民族的比例占70—90%。在中亚、哈萨克、摩尔达维亚的城市中，命名民族明显占少数；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人占城市人口近一半。假如这些数据非常可靠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城市化的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差别仍然很大。1982年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比例最小的是塔吉克，占34%；最高的是俄罗斯联邦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占71%。

根据苏联人种学家公布的资料，1970—1979年间，所有的命名民族，不管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都越来越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差别很大，土库曼城市人口比例只增长了1.3%，而白俄罗斯则增加11%。但是，在1979年差别仍然很悬殊。例如，与城市化比重为74.4%的俄罗斯人相比，只有19.6%的吉尔吉斯人居住在城市。

## 语言和教育

苏联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有力地促进了非俄罗斯民族对俄语的熟练掌握。俄语成为“民族间对话与合作的共同语言”。虽然普遍熟练掌握俄语的目标一直未变，但是对这一目标追求的努力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盛衰。尽管如此，实际的成就已经取得，而且在这一措施的推动下民族聚合力的增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据报道，到1979年为止，有13%的非俄罗斯人产生了实际的语言同化。也就是说，这些人把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而在1959年其相应比例仅为11%。这些非俄罗斯人大多数是斯拉夫人，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然而，绝大多数非俄罗斯人（1979年的比例为85.6%）仍把自己的语言当作母语。

两种语言并用制即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运动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9年有62%稍多的非俄罗斯人宣称自己已能够熟练地掌握俄语，而1970年仅为49%。然而，报告的语言水平和语言掌握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民族的情况亦迥然不同。据报道，1979年至少半数以上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能够流利地讲俄语。在中亚命名民族中，有49%的乌兹别克人声称自己掌握了俄语，而土库曼人只有25%。外高加索地区各命名民族掌握俄语的百分比为27—39%。最低的是爱沙尼亚人，从1959年的29%降至24%。除此之外，所有命名民族掌握了俄语的人数显著增加。人口调查资料表明，1970—1979年乌兹别克掌握俄语的人数从14%增加到49%，这反映了这些年乌兹别克大力推广俄语运动的成果。显然，1979年的数字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夸大了。另外，在分析有关俄语掌握情况的这些数字时，须记住，每个人对如何才算熟练掌握的理解

有很大不同。人们有时感觉到许多懂俄语极少的人却往往声称自己已熟练地掌握了俄语。

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从一开始起就是苏联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根据官方数据，1922年，9—49岁的脱盲率，乌克兰为63.8%，塔吉克只有3.8%。而当时尚未并入苏联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已超过80%。在所有共和国中，男子脱盲率远比女子高。至1970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已普遍脱盲。然而，如果把老年人也包括在内的话，脱盲率可能要低一些，而且因地区不同、性别不同而差别很大。

在所有共和国及其命名民族中，教育水平都有显著提高。虽然教育成就仍有很大差别，但已大大缩小了。1959—1979年期间，从整个苏联讲，在10岁以上（包括10岁）的人口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两倍；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增加了1倍，白俄罗斯增加了4倍。1979年，大学毕业生占1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塔吉克为4.9%，格鲁吉亚为10.3%。就中学毕业生人数而言，差别没有这么大。20几年来，上述两种情况本身的差别都缩小了。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男多女少，而且地区间差别也很大。各个加盟共和国男大学毕业生占1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从6.2%到11.2%，而女大学毕业生的比重从3.5%到9.4%。相对于男大学生所占比例而言，女大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土库曼为53%，立陶宛为94%。1959年至1979年女大学生的相对比重除塔吉克和土库曼下降外，所有的共和国都有巨大增长。总的说来，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共和国中，妇女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较大。

城乡居民平均教育水平的差别在缩小，但仍很大，而各加盟共和国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表一中，我用就业人口中中学毕业生所占的百分比来对这些问题作出估价。1979年，城市地区就业人口中中学毕业生的比例，最低的是立陶宛，为56%；最高

的是格鲁吉亚，为81%；而1959年的比例分别为24%和46%。在农村地区，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的比例，立陶宛是29%，为最低；最高的是乌兹别克，为62%，而1959年的比重分别为4.5%、15.8%。人口调查资料表明，20几年来城乡之间教育差别已大大缩小（见表一）。1979年，中亚和外高加索诸共和国的农业工人所受教育的状况要远好于其他共和国。在这3个人口普查年，这些加盟共和国城市工人的教育水平超过了苏联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很难弄清楚为什么7个较为落后的共和国中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反而较高。这些统计数字也许并不同样可靠，各地区的教育质量可能差别很大，经济和就业结构的差别也可能是能说明问题的可变量。就总的教育质量而言，苏联的报刊杂志上有很多有趣的事例说明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比城市学校的教育质量差得多。

1979年人口普查的民族教育资料还没有公布。战后前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15个命名民族的教育水平差别仍然很大，不过，这种差别正在缩小。例如，1970年，11%的摩尔达维亚人、40%的格鲁吉亚人完成了中学教育，而1959年的比例则分别为4%和28%。在这两个年度中，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受到的教育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这种排列次序无论对男女教育水平还是对城乡教育水平而言都是如此。除格鲁吉亚外，生活在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的教育水平比加盟共和国命名民族要高，而且通常要高得多。正如表一所表明的，与共和国全部人口相比，1970年命名民族的相对教育水平差异较大。1970年，4个共和国命名民族的就业人口中，中学毕业生的比例超过在全共和国人口中的比例，但是，在其他共和国中，命名民族的教育水平不如总体教育水平高。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差别并不大。城乡之间和男女之间的情况亦不相同。

表一 就业人口中中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

	城 市				农 村			
	全 部 人 口			命名民族	全 部 人 口			命名民族
	1959	1970	1979	1970	1959	1970	1979	1970
苏 联	26.1	42.9	61.8	—	9.5	20.1	39.9	—
俄罗斯联邦	24.8	40.1	58.7	40.0	9.7	18.1	34.2	18.4
乌克兰	28.2	49.0	67.7	46.6	8.2	19.6	38.5	19.4
白俄罗斯	28.4	47.9	67.7	42.9	7.3	16.7	33.4	16.0
乌兹别克	28.5	46.1	67.3	47.3	11.3	30.2	61.8	30.4
哈萨克	23.3	39.4	60.1	48.8	15.8	24.4	47.0	29.7
格鲁吉亚	45.8	65.6	80.5	76.1	18.6	35.9	55.7	39.3
阿塞拜疆	31.7	51.6	68.8	53.1	12.3	27.6	50.9	27.5
立陶宛	24.3	37.3	55.5	35.7	4.5	11.2	29.3	11.2
摩尔达维亚	26.5	43.5	64.7	32.2	4.9	11.9	32.6	10.6
拉脱维亚	29.8	44.0	60.3	44.0	9.3	18.3	34.4	20.2
吉尔吉斯	27.7	43.8	65.1	55.0	12.2	27.1	53.6	29.2
塔吉克	25.4	40.3	60.1	39.4	8.5	22.9	48.4	22.4
亚美尼亚	38.4	56.3	73.0	56.7	14.8	26.5	59.8	27.4
土库曼	25.0	40.1	59.7	37.4	10.1	25.8	54.3	25.5
爱沙尼亚	29.3	42.1	58.3	43.0	10.4	20.8	35.3	20.1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是根据《统计学通报》(1981年第2期，第63—78页)和《1970年人口普查》(第4册，第607—645页)提供的数据推算而来。

## 经 济 发 展

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化。自从1922年取得了统治各民族的霸主地位，建立了正式帝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虽然统计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很明显，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都有所发展，只是速度不同，形式各异罢了。但，同样明显的是，各民族经济发展仍有很大差距，尽管并不十分悬殊。另外，如果把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考虑在内的话，至少最近20多年以来，各共和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由于缺乏各个民族经济资料，笔者认为，某一共和国的发展趋势也可以合理地反映出那个共和国命名民族的情况。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将在本文中得到证实。

根据1922—1940年苏联官方的生产统计资料判断，区域发展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工业发展迅速，但是只有3个加盟共和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俄罗斯联邦；相反，非俄罗斯人各共和国（只有一个例外）农业生产发展比俄罗斯快得多。在各加盟共和国，直接用于发展工业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了20倍。全国各地都经历了城市化，其中俄罗斯和哈萨克的城市化速度最为迅速。另外，教育和公共衛生网也在各共和国相应地建立起来。从这一时期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加盟共和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资源则为这一目的的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是即使这些政策是成功的，似乎相对的发展差距可能和1922年的发展状况没有很大差异。在缺乏坚决的集权政府强有力的指导和对某些资源进行调配的情况下，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结果一定不会相同。



从战后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由于巨额投资和高速工业化仍然是国家发展政策的核心，因而1950—1980年间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不过增长速度有很大差别，土库曼增长了8倍，立陶宛增长了30倍，多数非俄罗斯人共和国比俄罗斯联邦增长幅度大。发展比较缓慢的农业部门也出现类似情况，中亚、外高加索和哈萨克发展比其他地区快些。资本形成继续迅速发展，但速度上仍然存在着差别。为说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表二中列举了1960—1980年间15个加盟共和国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品的人均增长的数字和其他有关的数字。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地区发展速度不平衡。在作出估价时，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些相对增长率是按苏联官方的衡量标准得出的有关国民收入（纯物质产品）和工业生产的数字。研究表明，按西方的概念和传统作法，这些数字在相当大程度上夸大了实际增长速度。至于各个加盟共和国夸大程度的差别尚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考察1950—1980年间总投资中各共和国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苏联在民族国家投资政策的目标。虽然有些波动，但总起来说所占比重还是相当稳定的。1950年以来，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投资占每个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59—65%，在这期间，50年代和60年代投入的少些，而70年代则多一些。在乌克兰的投资占15—17%，总的说呈下降趋势。1955年以来，在外高加索的投资保持在总投资额的3.5%左右，但是在中亚则从4%增加到6%。在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投资额稳步增长，由3%增至4.5%，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投资也增加了，由2%增至3%。而在哈萨克的投资占5—7%。这一投资分配方案表明，苏联的投资政策是从如下前提出发的，这些前提是：至少保证各加盟共和国的持续发展，照顾人口增长需要；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好、投资收效快的地区（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需要和能源、

表二 经济发展水平及速度指数

	国民 收入*	工业 产品*	全部就业 人口中 农业人 的比重 (%)， 1975年	人均国 民收 入 (苏联= 100) 1980	城市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	
					1959年	1981年
苏 联	4.9	6.1	28	100	48	63
俄罗斯联邦	5.2	6.0	22	116	52	71
乌克兰	4.5	6.1	36	90	46	63
白俄罗斯	6.6	9.2	38	111	31	57
乌兹别克	3.3	3.7	42	55	34	42
哈萨克	4.0	5.4	32	74	44	55
格鲁吉亚	5.7	6.4	41	88	42	52
阿塞拜疆	3.7	4.6	42	70	48	53
立陶宛	5.3	7.9	40	100	39	63
摩尔达维亚	5.1	7.5	50	81	22	41
拉脱维亚	4.8	6.3	28	132	56	69
吉尔吉斯	3.5	6.5	38	56	34	39
塔吉克	3.0	4.0	55	47	33	34
亚美尼亚	5.5	6.4	28	86	50	66
土库曼	1.6	3.4	45	56	46	68
爱沙尼亚	5.1	6.4	25	135	56	71

资料来源：

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品增长率是根据1970年和1980年在《苏联国民经济》上发布的官方指数及人口资料推算出来的。城市人口的比率则是根据发表在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第10—11页上的数据推算出来的。1959年的数字来自于1月15日的《真理报》，1981年的数字公布在1月1日的《真理报》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则是根据人口指数和国民收入指数及1971年在《拉脱维亚国民经济》第60页上公布的1970年国民收入总数推算出来的。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率则是根据国营部门就业数字和笔者发表在《苏联的第二经济》(格雷戈里·格罗斯曼编,伯克利和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中的《苏联合法私营经济的区域性》一文中的估计数字推算出来的。

\* 1960—1980年人均年增长率

原材料基地——西伯利亚开发的需要。苏联政府并未作出一贯努力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至少在人均投资方面是如此，这在苏联的投资分配中表现出来。这样，1951—1980年，人均投资额在外高加索和中亚诸共和国增加了1—2.5倍，在俄罗斯增加了2.5倍，而在最发达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增加了5—7倍。

虽然勃列日涅夫1972年宣称经济发展水平已基本上拉平，但是大量的官方材料表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对水平。那一年，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穷的共和国塔吉克的3倍。1960年以来，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名列前茅，而中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人均国民收入最低。尽管后者中多数共和国的国民总收入增长较快，但由于人口增长快，从而阻碍了其相对地位的提高。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相对地位大有改观。虽然苏联目前的区域性差距和国际上相比较还不算过分大，但很明显差距是存在的，而且没有缩小的趋势。

## 就业及其就业结构变化

出于自己的选择和必要，苏联的发展政策迅速动员了成年人加入劳动大军。目前，成年男子几乎普遍参加了工作。对苏联这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各加盟共和国都实行了这种政策，但结果并不一样。据麦考利估计，1975年16—54岁妇女的就业率在俄罗斯和西部各共和国高达82—91%，而1960年这数字是60—70%。相形之下，外高加索1975年的就业率是64%，1960年为53%，而中亚地区相应的就业率是65%和60%。虽然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成年妇女就业率

和其他共和国相比较低，但是妇女在劳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却在稳步增长，虽然1970年之后减慢下来了。在多数情况下，集体农庄的工人也增加了。各共和国中妇女往往集中在低工资的部门，从事技术要求低的职业。然而，毫无疑问，在集中各地区的妇女就业方面，像苏联的教育一样，苏联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苏联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苏联由农业占优势的社会向中等工业化社会的转变。1950年，苏联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各加盟共和国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比重，俄罗斯联邦最低，占46%，塔吉克最高，占84%。到1975年，这两个共和国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2%和55%。除爱沙尼亚之外，在这两个年度，非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工人的百分比比俄罗斯高得多。1975年的比例在表二中已经表明。农业中私有部门工人的比例，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则比其他地方普遍要大。虽然没有按民族统计的有关就业资料，但每个共和国中命名民族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全民族人口中的比例比农业人口在整个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这一结论似乎和命名民族往往居住在农村这一事实有必然联系。同样，命名民族在集体农庄中所占比例也往往较高。

1950年以来，各共和国中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反映了苏联全方位促进工业化的国家政策，但增长的速度因地制宜。1975年在这个部门就业的人口占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塔吉克是17%，俄罗斯为40%，而1950年两个共和国的比例分别为6%和29%。各共和国中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也增加了，1975年占摩尔达维亚就业人数的27%，哈萨克为40%（1950年分别为14%和23%）。劳动力部门分配的不同趋向和当今就业结构地区差异补充证明了我们的论点：苏联的民族经济政策虽有些浮夸，但其宗旨却是要促进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只是没有坚

持一贯，使它们达到同样的水平。

然而，审慎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各加盟共和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带来了工人、雇员（国家劳动力）和集体农庄工人（几十年来在各个方面一直被当作二等公民）比例的变化。根据人口普查，在全部就业人口中，集体农庄的工人1959年所占的比例，爱沙尼亚最低，为21%，摩尔达维亚最高，为72%；而1979年哈萨克最低，占5%，土库曼最高，占32%。他们所占比例在各共和国中都大大降低了。这不仅仅是农业的相对重要性降低的结果，而且是建立新的国营农场和把集体农庄转变为国营农场政策的结果。此外，1965年以来，集体农庄农民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得到国家制度的庇护，并像其他公民一样得到内部护照。集体农庄农民的经济地位也大有改观，这是由于采用有保障的工资制度和逐步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工资，使之达到国营农场工人工资水平政策的结果。这一过程的发展因共和国而异，但因为缺乏所需资料，目前尚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然而，有一点很明显，集体农庄农民收入的地区性差异仍然很大。

## 生活水平

由于各民族收入与消费的资料尚未公布，现在无法估价苏联各民族生活的相对水平。然而，我们可以根据各共和国的有关数据作出某些判断。表三列举了1960—1980年各共和国相对生活水平和趋向的三个指标。作为背景，我们应注意到1928—1950年苏联的教育和卫生设施虽大有改进，但人均家庭消费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没有增加。从那时起，苏联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据西方学者的调查统计，平均每年的实际增长率为3.5%。这个估价是生活水平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因为它包括含有商品和

服务在内的所有家庭费用和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开支。笔者考虑各共和国1960—1980年生活水平采用的就是这种估价，尽管在估计上存在着问题，但可以相信结果相当可靠。根据这些估计，各共和国的实际人均消费大幅度地增加了，年增长率从塔吉克的2.5%到摩尔达维亚的4.6%不等，俄罗斯联邦的增长率为3.3%，稍微高于全苏平均水平。多数情况下，60年代比70年代生活水平提高得快些。

各共和国1960、1970、1980年人均消费的相对水平见表三。这些数字是我在现阶段物价条件下，在对有关个人收入的各种数据，包括实物收入和政府消费开支，作出估计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这些各地区人均消费相对水平的估计正好与有关的一系列收入与消费的资料相吻合。尽管这些估计存在着缺陷，但它们是各共和国生活和收入相对水平的指标，比表二提供的官方人均国民收入资料更具有说服力。从这些数字显然可以看出，各共和国生活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除波罗的海诸国之外，1980年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大大低于俄罗斯联邦，中亚地区和阿塞拜疆大约低1/4以上。这一时期，各共和国的生活水平排列顺序比较稳定：波罗的海三国名列榜首，俄罗斯第四，塔吉克最低，只有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名次有很大提高。然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百分率以及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相对地位总的说下降了。总之，地区差别在70年代加剧了，变化系数1960年为105，1970年为107，1980年为142。

这些总的估价掩盖了各共和国之间一些有趣的差异。正如表三所表明的，1980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比人均消费水平较高的俄罗斯更大，同时，这两个共和国人均储蓄也高于俄罗斯联邦。然而就这两方面的数字而言，波罗的海诸国总的说来最高，而中亚和阿塞拜疆最低，这一情况与全部人均消费情况一样。其他指标，例如万人中医生的数目，亦具有类似的

情况。

我们对有关地区生活水平的估价根据于国营或私营合法经济的统计资料。无所不在的“第二经济”——非法的商品生产和服务、黑市、贪污腐化、盗窃国家资财——是什么样子呢？非法经济的影响范围在各个地区是否有很大的差别呢？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相当严重，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可得到的信息全是趣闻轶事，无法合计。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使我们相信，非法经济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我们从国营及私营人均商品和服务数据中推演出来的对生活水平区域性差异的估价。除主要为俄罗斯人所从事的非法酿酒活动之外，其他非法经济活动似乎还含有产品和收入在居民中的再分配，而非生产更多产品或提供额外的服务。而且，对大量私人服务的估计已包括进我们对人均消费的估价中。

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统计资料所表明的各共和国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反映出命名民族的情况呢？显然，情况因各共和国而异。也许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命名民族在整个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城乡之间的比例、教育水平及命名民族职业分布与共和国总体情况契合的程度如何。1979年，除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外，命名民族在各共和国中均占其总人口的54%以上。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立陶宛和亚美尼亚命名民族占74%以上。在4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4个命名民族总人数占每个共和国人口的61—84%。那么，以民族的人口比例为标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哈萨克共和国之外，各共和国的数据均能大致地表明命名民族的地位。

然而，197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命名民族的农村人口占本民族人口的比重高于共和国整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亚美尼亚和俄罗斯联邦是例外。命名民族农村人口的比重与共和国农村人口的比重的差别，立陶宛为最小，只有4个百分点；

表三 相对生活水平指数

	人均消费 (苏联=100)			城市住房面积 (人均平方米)			储蓄存款 (人均卢布)		
	1960	1970	1980	1960	1970	1980	1960	1970	1980
苏联	100.0	100.0	100.0	8.8	11.0	13.0	51	192	589
俄罗斯联邦	106.6	107.1	109.5	8.6	11.0	13.2	61	216	644
乌克兰	94.3	96.6	91.7	9.8	11.9	14.0	46	193	685
白俄罗斯	84.4	95.0	98.9	8.6	10.7	13.0	31	161	658
乌兹别克	80.4	78.1	77.6	7.8	8.2	9.3	23	78	212
哈萨克	95.6	91.2	90.6	7.9	9.8	11.6	32	138	402
格鲁吉亚	95.4	88.9	93.4	9.8	12.2	14.5	52	247	685
阿塞拜疆	74.4	69.4	67.7	8.1	9.3	9.9	30	101	268
立陶宛	109.9	118.4	115.9	9.4	11.3	13.6	31	236	925
摩尔达维亚	72.5	90.8	97.0	8.4	10.1	11.6	21	93	610
拉脱维亚	127.3	126.3	114.9	12.2	13.9	15.8	51	239	677
吉尔吉斯	74.7	76.1	72.7	7.4	8.8	10.0	30	102	274
塔吉克	70.5	66.7	62.1	7.9	8.8	9.8	22	86	194
亚美尼亚	87.0	85.9	84.4	7.9	9.6	10.9	44	249	637
土库曼	82.4	82.2	78.3	8.4	9.8	10.5	28	96	254
爱沙尼亚	130.2	132.9	131.1	11.5	13.7	16.3	59	295	759

资料来源:

1960和1970年的数据发表在我写的《地区生活水平》一文中(载《苏联的区域经济》,格特鲁德·E·施罗德和I·S·科罗佩克日主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1,第124—125页,129页,138—139页),资料来源与方法论文中均有阐述。1980年的资料来源与计算方法类似。人均消费的数字是笔者的估计;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和储蓄存款根据《苏联国民经济》上发表的资料计算得出。



哈萨克为最大，有24个百分点。从整个苏联来看，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可能是城市的2/3到3/4；从质量上讲，差别还要大。毫无疑问，在各个地区这种差别是不一样的。然而，由于农业在农村是压倒一切的主要职业，由于1950年以来农业收入比非农业收入提高得快，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仅就城乡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联邦外，命名民族的生活水平可能低于各共和国估计资料所表明的水平。这种城乡差别在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也许不大，在爱沙尼亚也许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农业收入往往超过非农业收入。而在哈萨克、摩尔达维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差别可能相当大。

从1970年人口普查中我们还知道，除了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外，命名民族的教育水平均低于各自共和国的教育水平。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不论是命名民族还是整个共和国，都大大低于城市水平。然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就业的命名民族人口的教育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同或者超过共和国中城市居民的总体水平。那么，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命名民族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城乡人口比例的差别比教育水平差别在估价各共和国命名民族平均生活水平时要重要得多。

总而言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有资料筛选出所有这些复杂变量，我们可能会发现：波罗的海人和俄罗斯人经济状况最好，至少按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是这样；中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经济状况最差。这是从对各共和国统计资料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我们肯定会发现，生活在他们自己共和国的各个民族中，男女经济地位和城乡生活水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 地区间的收入转移

收入转移（即，在一个共和国创造的收入以消费和投资的形式在另一个共和国使用）的特性和程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研究。虽然在资料获取、资料的有效性及阐释上存在的问题使人们找不到确定的、准确的答案，但总体轮廓还是一目了然的。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乌克兰向其他共和国转移了大约10%的收入（或者，也许最近几年达到14%），也就是说，乌克兰创造的国民收入超过本共和国用于消费和投资收入的10%。1960年以来，阿塞拜疆的收入也开始往外转移，不过直到1975年，转移的数量极为有限。然而至1981年，阿塞拜疆的国民收入超过本共和国使用的国民收入24亿卢布，或者说25%。虽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纯粹接受收入转移，但是最近几年来它们也向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转移收入，我们现有1979年和1975年两共和国这方面的资料。1960年以来，拉脱维亚也一直向其他地区转移收入，一般是每年5—6%，1980年的比率亦然。在很大程度上，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似乎一直是收入转移的接受者。有关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材料用以作出一般性的结论。

相反，中亚各共和国似乎自60年代（或许比这还早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其他共和国收入转移的接受者。例如，乌兹别克共和国，1961—1975年间所创造的收入低于在本共和国使用的收入2—18%，1978年的比率为6%，这是可获取的最近一年的资料。在这一时期，这一比率对其他中亚共和国而言显然一直比较高。哈萨克也可能一直是收入转移的受益者，但是由于没有确凿资料，我们尚不能完全肯定。总的说来，尽管最近几年由于开发西伯利

亚能源、原材料的需要，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俄罗斯似乎仍未成为收入转移的受益者。

总而言之，在苏维埃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收入再分配现象，中亚共和国，也可能包括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主要的获益者。对那些受益的共和国而言，资金似乎主要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也就是说，在那些共和国投资的比率可能高于其他方面的用途。虽然收入转移对发展那些共和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很明显，并没有直接提高它们的消费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年来，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对下降了。

## 结 论

苏联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的民族政策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的领导下，各民族本该“繁荣”、“接近”，从而削弱民族主义这股潜在的、具有分裂作用的社会政治力量。如果说“繁荣”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高速城市化的话，那么各民族明显是“繁荣”起来，而且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如果“接近”是指缩小教育水平差别，至少在最小程度上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保险，缩小男女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差别，那么“接近”的目的也达到了。如果像10年前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意味着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生产水平平等化，那么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各共和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及由此带来的命名民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仍然存在并且是很大的。不过，这一发展过程给苏联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利益，即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很大程度上的经济

一体化。现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既向其他共和国出口大量商品，同时也从它们那里进口大量商品，而且较小的共和国比大的共和国的贸易尤其是在投资贸易方面的依赖性更大。在前者，出口和进口大约占全部生产和供应的1/4。脱离联盟至少在短期内将付出巨大代价，除非苏联承认其独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并没有根除作为潜在分离力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情绪。俄罗斯化和同化的目标已证明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梦。即使苏联政策帮助中亚较贫穷的共和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使他们掌握了俄语，中亚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成为俄罗斯人的盲从者，其道德、文化、宗教特性仍然十分强大。另外，提供资金转移的各共和国的命名民族，尤其是乌克兰，毫无疑问怨恨被迫帮助那些不发达的共和国实现工业化。虽然波罗的海诸国按苏联的标准相对比较富，但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仍然很活跃。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其人民与苏维埃国家的一体化。简而言之，苏联的民族政策并没有铸造出一个熔炉。尽管如此，具有明显付诸武力意图的苏维埃国家应有能力将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既然苏联公布的总体发展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要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那么阐述一下民族现已取得的成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可以运用各共和国的调查资料、苏联人均消费和其他一些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作最近的国际比较，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些粗略的估计。这些比较虽然不足以说明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但毕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们表明1980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均消费低于被调查的（作为对比的）所有西欧国家如西班牙和爱尔兰1975年的水平，也低于匈牙利和波兰的水平。西部诸共和国、哈萨克和格鲁吉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水平。亚美尼亚与罗马尼亚的水平不相上下。中亚的水平接近或略低于伊朗、叙利亚和巴西的水平。然而，在估计这些调查结果中福利因素时，

我们必须考虑苏联收入和消费政策的特殊性。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人民都获益于普及教育和公共卫生保健事业，而不需要交纳或交纳很少的费用。他们不用害怕失业，国家计划提供各种退休金和其他津贴。虽然我们不敢肯定，但苏联各共和国个人收入（从合法经济中取得的）的分配或许较可比的市场经济平等些。然而，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不得不忍受集中的计划社会主义的弊端：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黑市、长队、商品零售方式落后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等。而且非俄罗斯人要被迫屈从于俄罗斯人的统治。

未来的10年或者说20年将肯定是苏联国家及其各民族的困难时期。从整体上讲，国家的经济将出现滑坡，这是因为：①由于受到人口增长率的制约，劳动力增长急剧下降；②利润的减少和原材料的匮乏使投资趋于紧张；③生产力发展缺乏动力。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和人口的持续不断增长，生活水平至多只能缓慢地提高，甚至停滞不前。这些都是西方的估计。而苏联的规划者却对此持一种乐观态度。第11个5年计划（1981—1985）决定加速工业发展。实际人均收入（按照苏联的生活水平标准）的增长仅稍慢于1976—1980年。正如以往的5年计划一样，它规定了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的发展速度，外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的发展速度规定得特别高。然而1981—1984年的实际经济发展表明这些计划难以实现。

在即将来临的经济困难时期，对薄弱的投资资金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苏联被迫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障各共和国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对新的资金需求尤为迫切，因为它们必须给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把他们迁移到劳动力资源贫乏的其他地区。但这种迁移已被证明是困难的，将来也不可能不如此。很明显，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

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然而，这些导致民族骚乱的潜在因素也许是令人烦恼（即使不严重的话）的问题，正是这些潜在因素使“内聚力”成为苏共关于庆祝建国60周年决定的口号。但这种强调含蓄地承认：在建国以来的60年里，在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上，公众意见并未达成坚固的一致，国家的目的也并未达到。

## 第八章

### 语言、文化、宗教与民族意识

1978年4月14日，第比利斯的大街上，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声势浩大的游行。约有5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在大学校园聚合后浩浩荡荡向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大厦开去。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新宪法草案取消了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示威群众。年青人的情绪尤为激动。《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由于一位主管安全的将军的出面，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当他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后，就建议在语言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求大全”。第二天，这条冒犯性的条款就得到了修正。很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中也作了类似的改动。

3年后，即1981年4月14日（这个日子已成为俄罗斯化的象征），持续了几个月的格鲁吉亚学生骚乱达到了高峰。许多年轻人试图在格鲁吉亚的旧都姆茨赫塔会集，为他们的民族共同祈祷。克格勃和内务部队得知这一计划后，封锁了通向该城市的道路。甚至不允许行人通行。禁止火车停靠在姆茨赫塔站。尽管如此，由于某种疏忽，大约有300名示威者还是成功地到达了姆茨赫塔古老的斯韦提特斯克河维里教堂。他们聆听完古老的格鲁吉亚赞美诗的录音后，便跪了下来，共同吟诵主祷文，为格鲁吉亚祈祷。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一排民兵和克格勃人员包围了这个城市的大教堂，不允许任何人入内，随后100多名学生联名给格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写了一封信，哀叹当局的行径。

卷入格鲁吉亚动乱的不仅只有学生。如在1976年召开的格鲁吉亚作家第8次代表大会上，列瓦兹·贾帕里泽严厉批评了格鲁吉亚的教育部长，指出今后诸如历史和地理这些课程也改用俄语教学的话，那么所有的教科书都是俄文版，学术论文和答辩也得译成俄文了。贾帕里泽的话获得了长达15分钟的掌声。听众们拒绝让部长作出回答。当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发言时，他力图减轻对俄罗斯化的恐惧，他的话被愤怒的吼声所打断。

这些事件表明，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性与当代格鲁吉亚人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最近的迹象使人感到，对苏维埃联盟的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以及传统的俄罗斯人这一重要部分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 语言问题

有人也许会问，苏联政府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企图去使这么一个古老且民族意识这么强的民族譬如格鲁吉亚俄罗斯化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解释要追溯到1917年以来苏联运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开始起，苏联的领导者就把苏维埃国家看成是一个统一体，其根本方针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允许有民族差异和民族理想存在。尽管在策略上存在着许多曲折，但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起，苏联领导人从未放弃过最短命的“各民族”的概念。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提出了激进的口号“融合”。暗示苏维埃各族人民的生物均化。赫鲁晓夫后继者的态度较为谨慎，使用了较为温和的措词如（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等等。尽管策略上有此波动，但勃列日涅夫政府对



各民族的兴亡亦未真正关心过。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曾说过，苏联领导人中充分意识到各民族的持久和倔强特性的是斯大林，他的工具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高压统治（必要时还包括对整个民族的灭绝），与赫鲁晓夫提出各民族未来“融合”的天真信念是相辅相成的。

假使有人接受这个前提，即民族是昙花一现的实体，那就是说他们的交流工具——语言也一样不会长久。植根于一种包容关于人和社会全部真谛的意识形态之中的统一国家，需要一种唯一的混合语言来保证思想控制和内部安全，以普遍地提高行政效率。通过一个国家的共同语言，公民们就会被唯一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塑造和改造。评论家们指出，俄语由于被利用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而使语言本身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乔纳森·普尔评论说：“俄文属于俄罗斯民族，两者一脉相承，但他也是‘列宁的语言’。”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克洛瓦则透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俄文已日益不被看作是俄文了，而是‘苏联的’，并且很多俄罗斯人也这样认为。事实上，俄语与官方意识形态关系甚为密切，其程度远远超过它与苏联其他非俄罗斯语言的联系”。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俄语经受了“第二符号体系的反作用及破坏性的影响。”

因此，意识形态是推动苏联领导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少数民族进行俄罗斯化的因素之一。但在今天，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或许更为重要。众所周知，俄罗斯民族和东斯拉夫人的人口出生率低于中亚地区和其他非斯拉夫人。苏联的工业和农业早已存在着严重的人力匮乏（劳动力短缺）情况。如果苏联要进一步扩张其军事工业，那么人力剩余的地区如中亚就必须成为人力匮乏的地区（如西伯利亚）的供应者。倘若非俄罗斯人要成功地融入苏联的经济当中，他们就必须学会俄语，最为理想的当然是被俄罗斯化，但197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却令人失望。苏联某

些民族，特别是中亚的伊斯兰民族，对把俄文看作第二语言来学仍显得非常勉强。由于它有可能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想，甚至与分裂主义倾向有联系，如任其发展下去，会成为危险的颠覆力量。因此，70年代苏联领导人决定强制推行且加速俄罗斯化的进程。

当然，长期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肆无忌惮地侵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例如，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第19条，即居住于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外来人)有权选择是否学习当地语言。因而不均衡地使用两种语言被看成是理想的规范。迈克尔·雷夫金评论说，即使是斯大林也不曾想过进行这种改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居住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以外的俄罗斯人必须学习当地语言。在拉脱维亚，第19条掀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国的舆论界争论得非常激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增加了共和国学校中拉脱维亚语的义务学习时间(1959年3月)。然而，拉脱维亚的“民族共产主义分子”被肃清后，赫鲁晓夫的主张在拉脱维亚及苏联其他地区变成了政策。1979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这种不均衡的结果导致仅有3.5%的俄罗斯人自称能熟练地运用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

至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政权明目张胆地制定了一项更为强硬的俄罗斯化政策。197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开除了波德戈尔内(他曾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同情者)，大概为这些措施扫除了最后的障碍。1978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颁布法令，规定苏联所有小学的低年级都必须开设俄文课程。由于其政治敏感性，法令只能秘密公布(这种程序丝毫不足为奇，如从1962年起就采用的较为重要的宗教新法规，直到1975年才在全苏公布)。有报道说，特别信使将1978年10月的法令送到各教育官员那里，令他们当场阅完并且背下来，然后交还给特别信使。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则依此发布详细的秘密法令。爱沙尼亚的法令最后泄露出

来，由瑞典的爱沙尼亚侨民刊登公诸于世。

1979年5月，苏联政府变本加厉，在塔什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理论会议，其议题是“俄语——苏联各族人民友好合作的语言”。这次也作了周密的策划，以保证会议议程不得泄露出去，如上面指示说会议的文件草案应存入保险柜（这一次是立陶宛人披露的），会议提出建议包括各地教育部门应对非俄罗斯幼儿园的5岁儿童实行俄文教育。这些建议超乎了语言教育的范围。学校的娱乐和各种课外活动都应用俄语，鼓励父母亲在家中也说俄语。学校的报刊、外出游览和讨论影视节目时都应当用俄语。

这些不寻常的措施表明，苏联政府并不是像许多西方分析家所想像的那样有顾虑，它根本不在乎共和国的精英们对这些粗暴措施的反应。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显然是要冒一次精心策划的险：肆意地进行俄罗斯化，以期恢复停滞的经济活力，挫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

因而塔什干建议在少数民族共和国引起了骚乱，这是可以理解的。5000名立陶宛人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请愿书，抗议这些建议。在就俄罗斯化发表的公开声明中，爱沙尼亚知识分子的公开信谴责了“这种推动学校和幼儿园学习俄语的夸大的且不合适的宣传运动”。

在这场高压的俄罗斯化运动中期，勃列日涅夫在语言前线上作了一次小小的战术撤退。1981年召开了第26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他竭力主张关心苏联迁居工人的语言和文化需求，从他的其他言行看来，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正试图鼓励中亚和外高加索民族的人民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这种不期而至的对移民语言和文化需求的关心并不能看作是对俄罗斯化势头的减弱。勃列日涅夫肯定意识到了，在语言和文化上，移民们比“居家者”更容易最终被同化，虽然从历史上看伊斯兰人民比其他民族要难于同化得多。

安德罗波夫本人在担任总书记职务的短暂时期，坚信在苏联这个大熔炉中，苏联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异都将消失。1982年12月，他发表了自任党的领袖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讲话，即他在苏联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安德罗波夫提出了极有争议的合并理论，即苏联各民族已结合成一个整体——苏联人。应当注意到，勃列日涅夫都曾小心地避开这个名词，无疑是因为它以前给赫鲁晓夫带来了很大麻烦。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俄罗斯化进程取得了哪些进展呢？从1979年人口普查提供的不完全数据得出的结论很复杂。非俄罗斯人的实际语言同化进展相当缓慢。（另外，犹太人的情况也表明，语言同化并不必然预示种族认同。）1959年，59.3%的苏联公民（其中俄罗斯人占54.5%）将俄语当作他们的母语，也就是说只有4.8%的人口在语言上被同化了。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3%，1979年则达到了6.2%。但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差异，以俄语为母语的 actual 人数与总人口相比，则略有下降，从1959年的59.3%下降到1979年的58.6%。

而在一些重要地区，语言同化似乎进行得相当迅速，现在1/4还多（1979年为25.8%）的白俄罗斯人已不讲他们自己的母语——白俄罗斯语，而1970年这个数字只有19.4%。关于乌克兰人，1979年82.8%的乌克兰人以乌克兰语为母语，与1970年的85.7%相比，下降了2.9%。个中道理非常简单，对东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化是该政府的先行之策。就拿乌克兰来说，谢列斯特事件表明，党的高级领导人可以公开表明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俄罗斯化无疑在与那些离心力量作一场特殊重要的较量。

从苏联其他民族看来，在抵制语言同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1979年人口普查所得的立陶宛人语言同化人口数与1970年的普查情况没有两样（97.9%的人仍以立陶宛语为母语）。以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为母语的人数仅下降了0.2%（各自分别为95.3%

与95%)。这些普查数据似乎表明,苏联政府俄罗斯化波罗的海各民族(尤其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其中有大批俄罗斯人)的期望,遭到了波罗的海人民的坚决抵制。

将俄语当作第二语言,这本身并不能认为是同化或民族认同。尽管如此,苏联政府还是认为这是愿望实现过程中必须采取的第一步,也是领导层迫切去促进的一步。一个惊人的例子是,乌兹别克将俄语当作第二语言却颇有成效。1970年,只有14.9%的乌兹别克人自称通晓俄语,197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9.3%,提高了34.4%。迈克尔·雷夫金提醒我们注意,评估俄语的掌握程度只能取决于被调查者本人,因此,“很有可能,人口兴旺的乌兹别克人具有种族安全感而易于夸大他们自己的俄语水平。”虽然如此,乌兹别克为提高俄语水平,在1970年—1979年期间,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乌兹别克人是中亚人口最多的民族,塔什干则是苏联伊斯兰世界的圣地中心。在苏联的所有民族中,乌兹别克人快速学习俄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出乎人们以及那些专家们的意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政府推行的俄罗斯化运动并不欢迎,就连俄罗斯化的强烈反对者伊万·久巴(著有创见性论著《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968年),特别给予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和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很高的评价,称他们是俄罗斯化的原则反对者。

实际上,今天所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都是“多中心”的民族主义者,即他们认为所有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都有内在价值。正如官方民族主义者伊利亚·格拉祖诺夫指出的:“我认为世界文化与世界语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综合。”《市民会议》杂志(重要的地下刊物,70年代早期曾充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论坛)的一位撰稿人抨击了试图创造一个“苏维埃民族”的愚蠢政策,以及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初级俄罗斯化政策”。

这些代言人强调俄语作为国家的语言无可非议，但俄语只不过是代表了一种被阉割的和累赘的世界语。很多人，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经常批评俄语在苏联时期的衰落和退化。

在党的领导人中究竟哪些是企图使少数民族俄罗斯化的呢？波诺马廖夫派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似乎对这个过程无所顾忌，热心于国防重工业的官员也是如此。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部俄罗斯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关系到军工企业的存亡问题……他们不惧怕苏联大熔炉，甚至没有传统俄罗斯文化也无所谓，因为这个大熔炉必定是属于他们俄罗斯的。”阿古尔斯基搜肠刮肚地想了一个词，称这个团体是“进步的”或“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笔者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是不能无视俄罗斯民族的人口、社会和精神状况的，亦不能无视其语言和文化。由于这一派最关心的莫过于苏联的军事和工业力量的扩张，不妨称他们为：“苏联的爱国者”更恰当些。

语言问题上还有一个细节应当指出来。西方对苏联的广播，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广播电台（BBC）、德国之声等等，一方面是苏联人民了解国内外大事的唯一可靠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西方促进苏联政治变革的工具。但是俄语广播又有特殊的问题。因为俄语是苏联的混合语，又是137,000,000俄罗斯人的母语，所以这些广播电台的台长无法确定他们的节目安排是为俄罗斯族听众，还是为全体苏联人民。结果常常是播出一些种族“中立”的节目，从而忽略或很少顾及苏联主要民族的文化和宗教需求。（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索尔仁尼琴，现在狱中的苏联保护信教者权利基督教委员会的创立者格列布·雅库宁神父，都就此矛盾发表过评论。）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西方的真正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 文化领域

如果说民族及其语言是暂时现象，那么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也只能具有相对的重要性。列宁本人详尽阐述了两种“源流”的理论，按照他的观点，一个特定民族革命前的历史文化“源流”与其革命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照此看来，1917年是跨入高一级优越的现实中的象征。一个民族的历史事件只有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联系在一起才具有重要意义。以俄罗斯为例，“12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由于他们至少间接地促成了十月革命，都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安德烈·鲁布列夫等一些，则避而不谈，因为他们属于革命前的“源流”，是应被遗忘的部分。

但是，正是在文化领域，政府面临着真正的困难，而且日益严重。阿兰·贝桑松引用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的话来说，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了一种冰冷的意识形态，“这种冷淡下来的意识形态要想唤起‘苏联人民的’热情甚至于单纯的信仰已无能为力了。”当然，正如贝桑松等人指出的，即使“冰冷”的意识形态，也能发出巨大的力量。虽说如此，在文化表现领域，这种意识形态业已毫无价值；没有了活力，它也就无法激励或振奋大众。那些体现《母亲》、《恰帕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精神的作品在苏联已完全没有市场了，尽管偶尔在当代文学和艺术中还能听到一些回音。

今天的文化表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依存之地和灵感，便倾向于反省、实验和西方风格的先锋派，或是民族主义和宗教。在文学界，安德烈·比托夫和尤里·特里福诺夫的作品

倾向于第一种方向。在其他领域，人们可以举出最近在莫斯科舞台上出现的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赛·雷布尼科夫的摇滚话剧，还有1981年“莫斯科——巴黎”现代艺术展览。

然而更突出的倾向似乎是，以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与宗教两者的结合取代日益无关紧要和冷淡的意识形态。例如，目前在苏联最受欢迎的两位作家，西伯利亚的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和吉尔吉斯作家兼电影制片人钦吉兹·艾特马托夫，都追随这种倾向。置身其中，我们感到距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如《道路和水泥》已是十分遥远了。

拉斯普京因其小说《活着，并且要记住》（1974）获得了声誉极高的国家奖。这部小说连续刊载在群众性期刊《小说》半月刊上；但是他的第二部作品《永别了，马特拉》则遭到当局的强烈反对；这部类似寓言的小说很有影响，它似乎是对苏联现代化造成的危险景象提出疑问。《永别了，马特拉》叙述了位于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中游的一个小岛——马特拉岛居民的命运。由于河流下游要修建一个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厂，马特拉及邻近的岛屿必须被淹没。居民们在夏季快结束时开始迁往内陆。我们认识的岛上居民大多数是年事已高的农民，他们已在马特拉度过了大半辈子，对即将迁往城市型的索弗赫兹村满怀忧虑。

《永别了，马特拉》清楚表明拉斯普京虽然是一位相对来说较年轻些的作家（出生于1937年），却对现代化工业化了的俄罗斯没有好感，至少就苏联目前的状况来看。拉斯普京笔下的人物——白发苍苍的祖母达里娅，认为现代人在想方设法脱去自己的“人皮”，割断他与大地、自然和上帝的联系。现代城市让达里娅想起蚂蚁的狂拥乱挤和侏儒的密密麻麻。马特拉这个地名源于“母亲”这个词；马特拉的洪水象征性地寓意民族杀母的过程。俄罗斯的土地、家族公墓和肃穆的教堂（马特拉的教堂已改成了储藏室，十字架被砸落在地）成了苏联的普罗米修斯们所兜售的



电力、华而不实的进步性崇拜物的牺牲品。拉斯普京坚信，现代俄罗斯仍必须植根于古老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和智慧中，否则，烈火和大水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生于1928年）在一夜之间成为苏联文学和电影界的顶梁柱，勇敢、富于创造力的天才。他的早期作品只是浅显地涉及到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譬如，吉尔吉斯村落伊斯兰妇女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决裂。但至70年代，他的作品则日益充满了叛逆性。《白色的轮船》（1970年）或许是他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作品。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公开称赞这部短篇小说是完美杰作。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名小孩，由于父母离异而遭到遗弃，与他的祖父莫蒙生活在一个边远山村的故事。祖父向他逐渐灌输先辈们的观念，讲述吉尔吉斯的历史传奇。莫蒙的女婿奥罗兹库尔是负责这个村落的苏联官员，他代表着社会的丑恶一面。奥罗兹库尔对自然是掠夺成性、不择手段，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无恶不作。这种性格与以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为代表的美德相提并论，具有惊人的效果。

综观艾特马托夫70年代的作品，N·N·施奈德曼评论道：“艾特马托夫近期的作品寓意十分清楚。其基本的理论观念根本不赞同我们的现代社会。技术及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使人类进步，相反，它们促使人相信自己是生活的主宰，这种盲目的错觉会导致许多危险的后果。”

尽管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而艾特马托夫是吉尔吉斯人，他们的作品主题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乃是有目共睹的。愚蠢无知的苏联普罗米修斯主义受到了严厉的谴责；苏联的官员们对待自然和地球的未来命运通常是冷酷无情的；宗教伦理的影响和奔放的民族主义（即民族的历史被视为革命的源泉，一种唯一的源流）构成了两位作家作品的主要特征。老人达里娅和莫蒙将他们丰富的价值观传给了子孙们。这正是苏联公众期望看到的严

肃文学。现政府似乎将陷入困境之中。

最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画家格拉祖诺夫（生于1930年）画展，也使人感到宗教和民族倾向的巨大诱惑力。1978年6月和1979年10月格拉祖诺夫展出了400幅作品，其中许多以俄罗斯民族为题材，通常都蕴含着对东正教的虔诚。两次画展在文化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性。为了一睹1978年莫斯科画展，60万名观众耐心地排起了罕见的长队。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列宁格勒画展是克服了列宁格勒地区委员会的粗暴阻挠之后才得以举办的，它吸引了746,000名观众。如果再加上来此地游览的观众，总参观人数估计在100万左右，相当于列宁格勒市1/4的人口。

两幅深受好评的作品是：以路加福音中的寓言为题材的《浪子回头》（又译，《归来》）和抨击苏联酗酒带来的灾难的作品《祝您健康》。前一幅油画中描绘了一个垂头丧气的年轻男子的形象。他光着脊背，穿着蓝色牛仔裤，双腿跪地。一个基督模样的人正在安慰他。在基督身后，站立着圣人和俄罗斯历史上的文化人物（如拉多涅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等等）。在画面的前景，即年轻人转过身去的地方，是野蛮放荡、苏联普罗米修斯主义和政治恐怖的景象。

有关两次画展的评论簿业已传到西方，并得以出版。绝大多数参观者对画展反应强烈，表示赞赏。（参见第九章：《俄罗斯民族感情：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译者注）

参观者所指的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并不是指1917年之后的新俄罗斯，而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俄罗斯，有修道院建筑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英勇战斗，如库里科沃旷野之战和鲍罗季诺战役。有关格拉祖诺夫画展的评论肯定了这一寓意，它满足了人们的强烈需求。但是人们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作品起初会被允许展出呢？是谁战胜了来自强大的列宁

格勒州委员会的阻挠呢？（现已为人所知，苏联意识形态监督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乃是格拉祖诺夫的保护者。）

列宁，特别是爱管闲事的影迷斯大林，对电影的重要性都是肯定的，电影界的形势与文艺界相差无几。自60年代以来，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都避开了“冰冷”的意识形态，往往表现出一点健康的民族主义和宗教，70年代最受欢迎的影片大概是瓦西里·舒克申执导的《红色的夹蒺藜》，片中的主人翁是一位被迫离开家园、半城市化了的农民。1974年，年仅45岁的舒克申不幸去世，160000名影迷致信，表示哀悼。

在1979—1980年间，两部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重要影片问世了：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孔恰洛夫斯基的杰作《西伯利亚人》，在1979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特别奖。另一部影片是弗拉基米尔·梅尼绍夫导演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获得了1980年学术奖。这些影片抨击了苏联普罗米修斯主义和轻率的现代化（如《西伯利亚人》），探索了城市化和西方化对社会、人口和道德的影响（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人们大概也注意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观众达1亿人）和《西伯利亚人》（8千万观众）一直是苏联电影史上国内票房价值最高的两部片子。

俄罗斯19世纪的经典作品在70年代亦成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有利工具。人们能举出的影片有《贵族之家》（1970年）、《罪与罚》（1970年）、《未加装饰的放机械钢琴的地方》（1977年，根据契诃夫的几部作品改编的）以及《奥勃洛摩夫》（1980年）（有人不赞同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契诃夫归于“民族主义”作家之列。然而，《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最有“斯拉夫优越论”思想的作品，而且现代电影制片人根据契诃夫和冈察洛夫的著作所描写的背景，即使有种种不足，也胜过单调乏味的现在，他们的作品允许制片人这样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米哈尔科夫兄弟（尼基塔和他的兄长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孔察洛夫斯基）在

复兴历史的过程中起了中心作用。由于他们是作家协会官员，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相对来说，就免去了那些来自当局的小骚扰。

最近几年还涌现了一批表现宗教和民族倾向颇有深度的影片，但是它们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搁置数年后才允许在小范围内放映。（然而，其水平已得到西方认可而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其中较突出的有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以俄罗斯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一生为题材的颇有争议的《安德烈·鲁布列夫》，以及从侧面反映俄罗斯民族命运的《镜子》（1974年）。此外，还有谢尔盖·帕拉贾诺夫的《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1964年）和《石榴树的颜色》（1969年）。

帕拉贾诺夫的情况相当有意思（并且骇人听闻）。他是来自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人，所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在国际上很有声誉，帕拉贾诺夫将此片的背景选在喀尔巴阡山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那里的居民都说胡特祖尔语（一种乌克兰山区的方言）。《石榴树的颜色》表现了18世纪亚美尼亚诗人萨雅特·诺瓦的一生，但被当局禁演。1974年，帕拉贾诺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判了5年徒刑，而他被逮捕的真正原因大概是他拒绝将乌克兰影片译成俄语。1982年，他第二次遭逮捕，人们猜想是因为帕拉贾诺夫对乌克兰民族主义采取了亲近态度而使当局对这位颇有才华的制片人厌恶至极。

帕拉贾诺夫在民族意识问题上的“多中心”思想对当代苏联电影制片人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乌克兰著名导演拉里莎·舍佩特克执导第一部影片就是根据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故事改编的，这个故事涉及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作用问题。她还推出一部优秀影片《攀登》（1978），该片根据白俄罗斯文化民族主义者瓦西里·贝科夫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舍佩特克的丈夫埃莱姆·克利莫夫拍摄了一部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的影片《痛苦》

（1975年），叙述了俄罗斯君主制度的崩溃过程，这部影片于1981年在莫斯科电影节上首次放映之后，于1985年才得到公演。乌兹别克族导演拉维尔·巴特罗夫影片《我们正在等你，小伙子》获得了好评。影片的编剧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孔察洛夫斯基。

这些影片虽然没有公开向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但往往都对它视而不见。由于电影对广大观众有直接的吸引力，苏联电影在灌输宗教和民族价值观念中起了重要作用。《共产主义》杂志可能还在宣扬列宁的名言，而苏联影迷则想要换一换全新的口味了，实际上他们通常都能如愿以偿。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还需要谈一谈60年代以来在苏联出现的志愿保护主义者协会。全俄历史文化古迹保护协会成立于1965年，至1982年会员人数达1470万人。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如索洛乌欣和格拉祖诺夫等为古保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该组织的目的是制止对俄罗斯古迹的（如修道院、大教堂、乡村的教堂）肆意破坏。在1959—1964年赫鲁晓夫反宗教运动中，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古保会为修缮工作提供资金，并组织学生自愿从事这项工作，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自然保护问题的讲座，促进有古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政府严格控制着协会，只允许它不定期出版刊物，不允许成立出版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现政府还试图同化它。波诺马廖夫之流的苏联理论家对这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方向极为反感。反宗教周刊《科学与宗教》多次对协会明显同情俄罗斯东正教的倾向和历史“唯一源流”的观点提出批评。在索洛乌欣以及其他人士看来，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成立的志愿保护主义者协会是促进古保会形成的催化剂。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东正教教派的持不同政见者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直到1978年被捕和后来作部分公开认错之时，一直活跃于格鲁吉亚古迹保护协会中。（加姆萨胡尔季阿是很偶然地接近这些“自由的”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雅库宁神父和伊戈尔·沙法列维奇等人的。)《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曾报道说，立陶宛地方学学生因涉嫌立陶宛民族主义而遭逮捕。所以，在俄罗斯联邦和一些少数民族共和国中，古迹保护已成为重要的民族主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群众性的民间生态保护协会也推行民族主义，反普罗米修斯的策略。如全苏自然保护协会即为其中群众性组织之一，它在70年代初拥有成员1900万人。)

总而言之，文化表现是反映当今苏联现实的一个侧面，也最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人民已失去了其吸引力。苏联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正日益谨慎地利用民族主义和宗教来填补这个明显的空白。文化领域中逐渐进行且不可避免的改革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剧烈变革。

## 宗 教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政府对于民族主义和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化表现的态度可用“反感”这个词来形容，那么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68年后“宗教残余”的憎恶，则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令现政府更为不安的是，在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西部，近来还包括俄罗斯本土，宗族和民族主义共生现象非常明显。这两者融合的幽灵或中亚地区的泛伊斯兰教运动同样令人伤透脑筋。

苏联官方对宗教在苏联所起的作用，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宗教在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前途。正如苏联问题专家鲍丹·保休尔基夫最近在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所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尚武的列

宁主义派的无神论不同于西方盛行的不可知论的无神论；前者是苏联官方教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宗教教义难免被当局看作是对立的、错误的、非科学的学说，宗教组织则是这些错误学说的传播者，而宗教信仰者则被视为与官方共产主义规范格格不入的人。”

持不同政见者的宗教哲学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弗拉基米尔·波列什（生于1949）在1980年对他的审判时这样说道：“实质上，我是因我的世界观而遭到审判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是极权主义，那么我的确因具有个人的世界观而违犯了法律……我只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死在监狱中”。1977年，苏联保护信教者权利基督教委员会的创立者们上书勃列日涅夫，抗议拟议中的苏联宪法草案：

“建设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及其赞同者的根本和最终目标……苏联共产党颁布的纲领毫无疑问地说明，只要今日党的理论家们仍然这样理解共产主义和宗教的地位……宗教必须被清除掉。苏共党章强加给每个党员的义务是‘对宗教的残余作坚决斗争’。反宗教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共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现政府通常掩饰其对宗教的最终意图。然而近来泄漏到西方的一份秘密文件极为清晰地暴露了现政权的真正面目。这就是1974年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富罗夫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作的关于俄罗斯东正教问题的报告。（知情者指出，这份文件实际上起草于1975年。）

富罗夫报告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宗教事务委员会对莫斯科主教施加的种种限制的程度。据称权威性的俄罗斯教会主教的宗教会议（这个机构在法律上有权作出所有重大决定）也处于委员会的

“控制”之下。会员的组成和职务分工也“完全”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宗教会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和即将作出的所有决定均须“事先”得到委员会的同意。

尽管这种控制已严格到了罕见的程度，富罗夫仍认为应当且能够进一步完善。他把俄罗斯教会的主教们分成三类：“好的”“一般的”、“有潜危险的”。好的主教是那些“明白我们国家对提高宗教地位不感兴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避免作出“任何可扩大东正教在公众中影响的特殊行为”。斯塔夫罗波尔的约那主教算得上一位好主教。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显得特别的热心”，他是这样总结自己简短、平淡的布道的：“号召信徒们和平相处，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为和平基金捐款，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报告赞许地提到约那主教7年间从未去过他的主教管区附近的教区。

一般的主教，如已故的列宁格勒大教区的尼科季姆主教，虽然“忠于国家”，却试图“鼓动信徒积极从事宗教活动，并且倡导扩大教会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潜在危险的主教，如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尼古拉大主教，即属那类“妄想规避有关礼拜法令的”人。富罗夫报告的作者满意地谈到，莫斯科教区的教士数量正在稳步地减少（在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迫害政策的高峰期，教士人数为8,252人，而到1974年仅有5,994人），并且暗示委员会将尽一切努力保证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他指出，48.5%的东正教神父和副主祭已年过60——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富罗夫报告多次证实了苏联政府对教会施加的控制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从尼古拉耶夫的管辖区，我们得知，1973年东正教布道共有21,590场次，1974年则为23,350场次——这个发展趋势是不受欢迎的（另据消息透露，当局要仔细统计全苏东正教教堂出售的香火圣饼数目）。富罗夫多次引用教会内部文件，证明教



会对于其监督者没有丝毫隐瞒（这一做法导致了1976年一起荒唐事件的发生。当时I·尤·邦奇科夫斯基所著的一本反天主教的论稿在莫斯科出版了。书中引用了罗马东方学院的米格尔·阿兰斯和列宁格勒天主教尼科季姆的私人书信。阿兰斯对此非常恼火；莫斯科主教也显得十分尴尬，并因此受到连累；负责教会事务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季托夫死于心脏病发作。书中还引用了教会内部文件的内容，从地下出版杂志《立陶宛天主教纪事》中，读者觉察得出，人们在担心当局会企图把立陶宛教会变成第二个俄罗斯教会。

人们或许会问，当局为什么不对宗教组织来一个斩草除根呢？教徒的数量众多是原因之一。据宗教问题专家威廉·C·弗莱彻的计算，教徒在苏联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37年的56%下降到现在的45%。但教徒的绝对数目实际上却从9500万上升到1.15亿。通过分析它的数字，弗莱彻估计俄罗斯地区继续信教的人占25%至35%，非俄罗斯地区则达60%。据另研究宗教的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尔·莱恩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得出的结果计算，仍然信奉东正教的苏联人占人口的20—25%，有5240万至6550万人。显然，由于信教者人数众多，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中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宗教与民族主义融合的地区，其结果使苏联官员们尤为震惊。立陶宛宗教和民族主义共生现象可与邻近的波兰相匹敌，这大概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现政权尽管做了巨大努力，但至今没有恐吓住立陶宛教会。立陶宛信徒1971年12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上有17,054人签名，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据称另一份类似的文件有148,000人签名。当局总是向教士施加特殊的压力。然而在1979年，522位立陶宛天主教神父联名抗议对宗教人士的迫害——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发展。在现政权看来，立陶宛几乎是失控了。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人近来对宗

教在其它共和国中的地位问题很感兴趣，特别对天主教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西伯利亚的地位尤为感兴趣。立陶宛宗教方面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自由派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被镇压之前（1979—1980），曾与他们密切合作，创建了基督教委员会（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基督教委员会也曾与格鲁吉亚东正教持不同政见者密切合作过）。

在俄罗斯联邦，东正教信徒也十分活跃。例如，高尔基市的教徒最近两次上书当局（两次请愿签名者分别为1500人和3000人），要求开放一个新教堂。这些努力的失败乃在意料之中。正如持不同政见者、数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对两位西方记者所作的评论：“或许在你们国家，这个数目（1500—3000）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我们国家却是巨大的。过去在有关人权的请愿书上签字的人数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的1/10。”虽然签名的人数明显低于立陶宛，沙法列维奇称之为“巨大的”也没有错，因为俄罗斯联邦的教徒在这类请愿书上签名所冒的风险远远超过立陶宛。高尔基市的例子并非独一无二。1970年在纳罗弗明斯克，1432名东正教教徒签名请愿要求开放那儿的一个教堂——教徒们为此目的已做了40年的不懈努力。1977年契卡洛夫斯克耶地区的教徒也有3146人签名，试图得到开放当地一家教堂的准许；他们的努力始于1952年，从未间断。

俄罗斯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如同立陶宛民族主义和天主教的关系一样明显。民族主义的地下杂志《市民会议》的一位撰稿人声称：“东正教是牢不可破的，这是上帝的安排。一个俄罗斯人只能成为东正教教徒。”格拉祖诺夫则这样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不是正教教徒就不是俄罗斯人。’”所有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索尔仁尼琴、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伊戈尔·奥古尔特佐夫、沙法列维奇、亚历山大·奥戈罗德尼科夫等人，都坦率地表露他们有关东正教教义

的观点。许多“官方民族主义者”，包括一大批苏联文学的主要流派“乡村散文”的支持者，也支持这种观点；当然不难理解他们表达上述观点时是更为谨慎的。

近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因1957年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乡间小道》而成为知名的民族主义作家）为修复奥普季娜·普斯琴小修道院所作的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果戈里都参观过这所修道院闻名遐尔的隐修士修道处。他的作品明显流露出他愿为促进对东正教的同情而努力。1982年初，索洛乌欣受到《共产党人》杂志的攻击，称他在“与上帝调情”，而且在《我们同时代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观念和情绪”。1981年，反宗教杂志《科学和宗教》3期连载一篇长文，抨击索洛乌欣及他对于可恶的修道处的迷恋。《文学报》也同样对索洛乌欣进行了攻击。令人惊奇的是，就在《共产党人》进行攻击之后，《我们同时代人》仍能继续发表索洛乌欣有争议的作品《手掌中的宝石》（1982年第3期）。然而，随后不久，《共产党人》设法迫使《我们同时代人》的编辑和党委会作出了道歉，之后索洛乌欣本人也作了道歉。从这一个小插曲中可以感受到1982年安德罗波夫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广泛且残酷的迫害。

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西部（受纯天主教影响的乌克兰地区），和立陶宛、俄罗斯一样，宗教和民族主义共生现象频频出现。在这方面，宗教联系尤为重要：70年代期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正教基督民族主义者与立陶宛和乌克兰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然而，新教教徒虽然积极保护他们的宗教权利，却对持不同政见派浸礼教徒和圣灵降节派的行动袖手旁观，似乎对民族主义事业不感兴趣。立陶宛、爱沙尼亚和伏尔加日耳曼人国家路德教会似乎也不受民族主义的影响。

至于苏联的伊斯兰教徒（人数估计约3500万），单看其表面

现象，很容易被迷惑。据官方材料，现正在使用的清真寺仅存300个，而1917年以前清真寺有24000个，注册的教士人数不足1000人。但是，正如亚历山大·本尼格森在其近作中所指出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苏联公开的材料来分析，在表面背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苏联的伊斯兰教问题专家公开表示他们对秘密组织——苏菲兄弟会的存在非常担忧。苏菲兄弟会在阿塞拜疆、车臣—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地区以及乌兹别克的卡尔卡拉帕克地区势力很强大。在北高加索地区，本尼格森说，活跃着50多万兄弟会的精干人员，“一个苏联法律禁止的地下组织竟有如此惊人的数目。”虽然据官方公布阿塞拜疆只有13座清真寺，但据报告，那儿其实有上百座秘密清真寺。因此，富有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教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仍然具有强大实力，是俄罗斯化的潜在对抗力量。不管伊斯兰教是否最终会与当地民族主义联合起来（后者在现政权看来危险性小于前者），还是它将以泛伊斯兰、泛突厥或泛都兰情绪的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很清楚，伊斯兰教徒似乎离转变成苏联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除苏联宗教信徒的绝对数量大和政府害怕因极端迫害而刺激宗教与民族主义共生的危险之外，约束现政权发动对宗教残余进行斗争的还有其它一些障碍和顾虑。第一，驱使宗教转入地下，政府更难于控制，产生反作用，如苏菲兄弟会和“地下”真正东正教基督徒就是前车之鉴；其次，在反驳那些指控苏联搞宗教迫害的人时，以及利用苏联主持的和平会议来达到政治目的时，官方的教会代表团能够起到很有价值的宣传作用；最后，就拿东正教教会这个最大的宗教团体来说，苏联领导人无疑会回忆起斯大林在抗击希特勒战争中的发现——该教会在爱国复兴中提供了重要的援助，帮助击溃了侵略者。举例说，在与中国的冲突中，这种支持会再次发挥其作用。有人觉得，宗教也会有益于克服日益猖厥的社会丑恶现象，如酗酒。1980年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东

正教教士季米特里·杜德科提出的这种建议遭到政府的轻蔑拒绝，而且政府至今禁止要求这种帮助。

## 结 论

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主题——当今苏联的语言、文化表现、宗教和民族意识代表着现政权面临的由主要问题组成的网。这些困难似乎在短期内就可以解决。如现政权可以在“冰冷”的但仍有效力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控制大众媒介，采取合理的有效的安全措施防止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失去控制（外国广播在此间起着动摇作用。但有人认为由于西方政府太胆小的缘故，同时也是对宗教和民族意识心怀疑虑的缘故，从而不敢在这方面采取有始有终的步骤）。应当记住，苏联的民族冲突不仅仅发生在俄罗斯人与“其他所有的人”之间，其他民族间亦存在着矛盾。例如，在外高加索地区，阿布哈兹人近来试图脱离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对他们居住在穆斯林阿塞拜疆的农民所受到的待遇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如认为现政权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利益，那也是错误的；要不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就不会百般阻挠和破坏1980年举行的库里科沃旷野之战600周年纪念活动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政权可在短期内控制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但有人补充道它们是不可能永无出头之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日益淡化，加上农业和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以及重大的人口、社会难题，仍实行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将来是行不通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果敢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必然会影晌此文探讨的那些问题。如果将来的领导人中包括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有

力的措施改善苏联俄罗斯族人民的条件，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撤离边境，放松对非俄罗斯地区的控制。这种让步减轻了压力，从而促进了真正的联邦制的产生，甚至导致某些边境共和国脱离联盟。“官方”和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诚布公地讨论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害怕它的到来。他们相信，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人口（有人估计占77%），能够形成一个大联邦国家的核心，此外苏联已俄罗斯化的地区和信东正教的地区，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也将加入进来。

然而，“苏维埃爱国者”是那些与国防重工业有密切联系的人，同时也包括新波诺马廖夫——教条主义者。他们为了促进苏联国家的发展，很有可能要推行最大限度的俄罗斯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臭名昭著的塔什干建议则是更严厉政策的前兆。对苏联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需要的严重忽视，特别是在发生重大惊人事件之时，如中苏冲突、食品骚动，就会引起民族主义全面爆发，从而导致苏联帝国的崩溃。

按照罗伊·梅德韦杰夫提出的路线，通过放松控制未必会真的产生但又有可能产生的“莫斯科之春”，会显著改善苏联人民的条件。然而，这种放松也会导致民族及宗教民族情绪肆意蔓延，淹没了梅德韦杰夫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相对而言，赫鲁晓夫在释放这种力量时的民主化政策也较为胆怯。回忆一下这一历史事实，对我们会有所裨益。

不管实际会发生哪种情况，苏联领导人和西方观察家都将密切注视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在本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我们探讨的现象有如此明显的活力，而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又如此微弱，因此，可以预料在80年代结束之前，这些新生力量就会显现出来。

## 第九章

### 俄罗斯民族感情：一次 非正式的民意测验

尽管西方学者最近开始注意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注意到其与官方“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不同，但他们实际上忽视了伊利娅·格拉祖诺夫现象。格拉祖诺夫是苏联画家，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初的倡导者。对这种现象缺乏学术兴趣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格拉祖诺夫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且还因为他被指责为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和克格勃的代理人。因此，他的名字成为一种禁区。我确信，这种禁区使我们不能更好地了解苏联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打算对唯一的苏联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以冲破这个禁区。这些资料就是苏联的参观者对格拉祖诺夫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两次画展所做的两本毫无保留的评论集。不顾当局的禁令，这两本评论集在传到西方之前就已被影印出来，在地下秘密流传。两书在西方以《艺术家与俄罗斯》为题公开出版发行。

我的分析主要侧重于格拉祖诺夫艺术的社会效应（即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艺术现象来对待。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艺术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联系起来，特别注意其对苏联公众的影响。所以，本文并不想从审美或者伦理的角度来对格拉祖诺夫作出评判。

伊利娅·亚历山大罗维奇·格拉祖诺夫于1903年出生在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遭受德国人的围困时期，年仅11岁的格拉祖诺夫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属（包括父亲，一位历史学家）由于饥饿而死亡的惨状。他自己勉强幸存了下来，仅仅是因为他被疏散到了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村庄里。在这里，他首次与俄罗斯农民文化有了接触。后来，他就读于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列平艺术学院。格拉祖诺夫于1956年在布拉格国际画展上被授予最高奖，至此他才首次得到承认。只是到那时，他才获得允许，于1957年2月在莫斯科首次举办个人画展。自那时起，他成为苏联艺术界一个肆无忌惮的人。

格拉祖诺夫第一次画展的作品以彻底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饥饿状况，从而遭到许多坚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攻击。他们指责他的作品缺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缺乏党性。在莫斯科晚间新闻发表的一封信中，苏联艺术家协会的雇佣文人称他的艺术是“值得怀疑的精神食粮”，与党的“审美观念”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还谴责说，他的俄罗斯主题“充满了神秘甚至是宗教暗示的色彩”。格拉祖诺夫自己在列平艺术学院的教师、院士B·约翰松也加入到贬低他的行列中。结果，他勉强毕业，之后，就被派往一所地方高中任教去了。

假如这一切都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期间，那么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注定要默默无闻，甚至更糟。然而，在后斯大林解冻的环境下，格拉祖诺夫得以卷土重来。他敢于摒弃传统、成规的精神与风格，引起骚动的年轻一代的注意。此外，一些艺术批评家甚至高级御用文人，如尼古拉·吉洪诺夫也在苏联报刊上为他辩护。60年代，格拉祖诺夫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俄罗斯民族遗产的主题思想。

尽管政府允许格拉祖诺夫在国外（1960年在波兰，1963年在意大利）举办个人画展，以宣传后斯大林政府的“自由”形象，



但他1964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次个人画展时再次受到官方批评家的攻击，结果这次画展只进行了3天就结束了。只是到了1976年，党的官僚在肯定他们已制服了格拉祖诺夫之后，他才被吸收为苏联艺术家协会的成员。为达到宣传的目的，格拉祖诺夫经常被派往国外（如1966年，越南；1967，老挝；1968年，法国；1973年，智利）。他既为苏联领导人，也为外国高级官员作画（如他曾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芬兰的乌尔霍·吉科宁、丹麦的奥托·延斯·克拉格、瑞典的金·卡尔·古斯塔夫、英迪拉·甘地、萨尔瓦多·阿连德等人作过画），逐渐地树立起自己“宫廷画家”的形象。而他自己仍根据俄国历史描绘风景和人物，并且为俄罗斯文学名著，特别是为他所称道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插图。

1977年6月，格拉祖诺夫取消了原计划在莫斯科中央展览厅举行的他最大的个人画展，向党的官僚表示反抗。他们原以为已经制服了格拉祖诺夫，但这次却痛苦地失望了。格拉祖诺夫之所以取消这次画展，是因为主办者拒绝展出一些他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作品，其中包括他的主要作品，一幅10×26英尺的油画：《20世纪的神秘》。

### 最有争议的三幅画

格拉祖诺夫称《20世纪的神秘》是“富有哲理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幅画中，他把列宁、托洛茨基、温斯顿·邱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及巴勃罗·毕加索等政治、文化界主要人物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等一些凶恶的人物相提并论，其目的显然是要通过这一手法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斯大林占据了舞台正中央，似乎控制了本世纪。但重要的是，在画家的笔下，斯大林是一具躺在棺架供人凭吊的尸体，身下血海一片。格拉祖诺夫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形象，这更显示出画家的哲理锋芒。沙皇怀里抱着被暗杀的王储阿列克谢，背景是一座正在坍塌的俄罗斯教堂，一个光环突出强调了殉难的王子的无辜。艺术家似乎在说，这正是20世纪血腥闹宴的开始。画面的右边是索尔仁尼琴的画像，而在左边则是画家本人的肖像画。这暗示画家与索尔仁尼琴有着共同之处，即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画中唯一明亮的地方是身着素装的救世主——耶稣，他始终在画面的上方盘旋。

尽管《20世纪的神秘》明显带有“反苏”的倾向，但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格拉祖诺夫不仅巧妙地躲避了惩罚，而且还获许在一年之后再次举办画展。当画展于1978年6月3日开幕时，《20世纪的神秘》并没有展出，但格拉祖诺夫设法展出了另外两幅极有争议的绘画，即《归来》和《祝您健康》。

《归来》的主题是一个浪子的故事。它描绘了一个身上只穿着牛仔裤的青年人跪倒在一个具有俄罗斯农民形象、基督式人物面前的形象。“浪子”的背后，画的前景中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农村荒凉、痛苦、渎圣、淫荡、犯罪、带刺的铁丝以及死亡的景象，所有这些都通过一张桌子象征性地表现了出来——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一个被割下的人头。这个场面似乎由一个半露笑容的魔鬼人物控制着。人们从画中依稀可以辨认出此人就是列宁。在这位“父亲”的背后，以及左上角的背景中，一些俄罗斯历史人物清晰可辨，其中包括圣徒谢尔盖（俄罗斯最早的圣徒）、像圣徒一样的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罗蒙诺索夫、柴可夫斯基、彼得大帝、俄罗斯美女及其他一些人。这幅画的象征性意义很明确：拯救今

日“挥霍的”苏联俄罗斯人的办法就是回到它那历史、文化和精神的根基上去。这幅画的底部暗示了避免苏联生活步入死胡同的唯一的另外一种出路。画面的下方，一个青年人似乎正从带刺的铁丝网下爬进一个饲料槽，3头大肥猪令人讨厌、虎视眈眈地览视着槽子。从画面上看，这些猪似乎都来自以摩天大楼为象征的现代化都市。这就暗示这个“浪子”不仅抵制了苏联生存中的苦难，而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拒绝了唯物主义者对此所作的抉择。画面右上角昏暗的天空为在刺目的红色船帆的指引下高高飞翔的导弹或宇宙飞船之类的东西所划破。这景观既充满不祥之兆，也无吸引力。

在《祝您健康》中，格拉祖诺夫描绘了一位典型的俄罗斯人的形象，他或者是一位集体农庄的庄员，也可能是工厂工人。他身着褴褛的棉工作服，胸前佩戴着勋章——表明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坐在一堵贴满宣传画的墙前面，看起来准备喝下一杯伏特加酒。他唯一的食品是放在报纸上的一只面包和一根黄瓜，报纸上的大标题《今日世界》赫然醒目。他生活艰难，但不屈不挠的精神仍从他那恶作剧般、冷潮的微笑中显露出来。画面上，俄罗斯人民的现状和宣传画上的浮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漫画达到了其主要效果。宣传画上的人物中有：马克思和列宁（两人一先一后，呼吁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起来）、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非洲人、宣布共产主义胜利的越南士兵、得意扬扬的苏联宇航员和两名幸福的工人（他们在互相祝贺，因为拖拉机代替他们，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画面还有画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国徽和折射在伏特加酒杯里的苏联护照，象征着作为苏联公民的骄傲，这幅画的寓意非常明确：苏联宣传吹嘘的所有成就是俄罗斯人这些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名副其实的牛马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用俄罗斯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说：“一个耕犁，七人等食”。这幅画提出了苏联政府是否关心劳动者健康这一问题。

上述三幅画表明了格拉祖诺夫艺术中的思想锋芒。显然，他的艺术不仅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相悖，而且具有强烈的“反苏”含义。不管怎样，它与苏联政府所容忍的程度相去甚远，更不可能让它公开展出。那么，为什么格拉祖诺夫是个例外呢？表面上看来合理的解释是：格拉祖诺夫在国内外声望很大，政府不能冒险行事，迫使业已成就的艺术家公开表示异议，以引起非议。另一种可能接受的解释是：格拉祖诺夫可能得到了克格勃、党和军队最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和保护。第三种解释（不排斥另外两种）是政府决意用他的画展进行民意测验，以便对作为政权凝聚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作出估计，以便对官方的族际主义意识形态作出修正。

总之，莫斯科的画展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仅仅是由于负责意识形态的监督者的疏忽而造成的。首先，这次画展按原计划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尽管由帕霍莫瓦领导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文化部努力取消它，或者说至少不允许展出那些最有争议的作品，但后者仍如期参展了。这只是在格拉祖诺夫再次威胁要取消画展之后，地方党组织的决定被某位高级官员否决，他的作品才得以全部展出。

## 两本评论集

在西方，两次画展都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是因为画展准许举办这件事本身，而且还因为它们它们是苏联艺术史上吸引观众最多的画展。莫斯科画展招来了大约600000名参观者，近100万人观看了列宁格勒的画展。两次画展中，参观者被允许在特别评论簿上写下自己的观点，这在苏联展览馆里是司空见惯的。多亏了基捷日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评论集，从而使西方了解两本书的内容。

无须说，在缺乏民意测验的情况下，评论集已成了独一无二的文献，它们给西方学者提供了从中窥探苏联人民精神面貌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这对大多数局外人来说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留言簿上的留言分别是1465条和622条，总共代表了2000多种评论的观点，大概是西方现有关于苏联艺术见解最大的统计数字。然而，应该记住，这些资料不易进行统计分析，因为举办人从一开始起就没有这方面的意图。首先，大多数留言者未留名字。通过抽查，我估计在莫斯科留言簿上留言的评论者有57%的人未署名，在列宁格勒相应的数字接近三分之二。尽管大多数评论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写下的，但也有许多人联合署名，还有一些评论提及到自己未署名的亲朋与同事，认为他们与他持有共同的观点。我们并没有试图依照性别、年龄、职业，或根据每条评论上签名者的数量来区别所有的条目。然而，假如我们把每条评论都看成是公民自由言论的表达的话，那么，全部评论理所当然地反映了公共舆论的总趋势。

自发性、直接性和表达方式的激情性是两本评论集的显著特点，它仿佛是舆论的火山，在苏联政权控制下经过60年的休眠之后，突然喷发了。那些曾长期保持缄默的人民突然之间有了说话能力。虽然绝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但并没有一丝苏联宣传机构强制一致的迹象。没有一幅作品是无关紧要的，画展所介绍的两极分化现象绝非是苏联社会的特点。评论本身长短不一，形式不拘，内容各异，语词亦相去甚远。有的是只字片语，如“伟大”、“谢谢”和“同意”等等；有的是对格拉祖诺夫及其作品的优缺点的长篇大论，有的甚至以诗歌的形式发表议论。显然，他们的语言已经没有苏联宣传机构通常所使用的假大空的语言了。

我们把所有的评论分为三类：肯定的、否定的和其他的（见表一）。

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这几乎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但争论

**表一 对格拉祖诺夫画展的反应**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总数	
	数量	百分率	数量	百分率	数量	百分率
肯定	1,174	80.1	428	68.8	1,602	76.7
否定	249	17.0	176	28.3	425	20.4
其他	42	2.9	18	2.9	60	2.9
总数	1,465	100.0	622	100.0	2,087	100.0

的余地仍然存在。在莫斯科，参加者中十有八九喜欢格拉祖诺夫；在列宁格勒，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热爱他。把这两个城市加起来计算的话，只有十分之二的人不喜欢格拉祖诺夫的艺术。

### 为什么一些人不喜欢格拉祖诺夫？

至于作出肯定及否定评论的原因，我只能用数字对后者进行分析。

**表二 否定评价的标准**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总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审美	123	49.4	109	61.9	232	54.6
意识形态	96	38.6	41	23.3	137	32.2
伦理	30	12.0	26	14.8	56	13.2
总数	249	100.0	176	100.0	425	100.0

多数否定的评论（425人中有232人，占54.6%）使用的是审

美的标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占32.2%）为不同的意识形态顾虑所支配；56人（占13.2%）从伦理的角度对格拉祖诺夫提出异议。

现在让我对每一种标准作一说明。在一篇署名为“K·B·卡萨特金，等人”的长篇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类的逻辑推理。卡萨特金嘲笑格拉祖诺夫，认为他没有看到“60年来马克思、列宁的教导在我们国家是成功的”。他还指责格拉祖诺夫醉心于俄罗斯过去，没有颂扬苏联军队的伟大。卡萨特金认为，“对我们这些参观者来说，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其他的事情比处于次要地位的旧俄罗斯的过去更加无比亲切。”他还谴责了这位艺术家“在当今世界继续进行的剧烈战斗，即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所持的“中立”立场。他套用高尔基的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究竟站在谁的一边，画家格拉祖诺夫？”评论的最后一句威胁性语言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时代：“不仅你的未来，而且你过去作品的命运都将取决于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位参观者并不反对格拉祖诺夫的俄罗斯主题，但他责备他在描绘“我们的时代”时过于悲哀、悲观。评论接着完全陷入想入非非之中：“假如你能使你的才能与党性融合到一起，效果就会极好”！一个匿名的莫斯科人希望格拉祖诺夫“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而这正是他在描绘当代生活中所极为缺乏的。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比他所描述的要光明得多。”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妇女基斯洛娃写道，她“以基洛夫工厂工人的名义”，对“格拉祖诺夫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及苏联人民所采取的态度表示不安和震惊”。她斥责他看不到“苏联生活光明、美丽的一面”，鼓吹“开历史倒车”。她认为格拉祖诺夫让苏联护照折射在伏特加酒杯的画法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尽管上述例子在137条否定评论中（占总数2087条的6.6%）具有典型性，它们为近似官方意识形态标准所左右，但运用苏联

宣传中诸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和“苏维埃制度”等陈词滥调的唯有上述几例。显然，这类陈词滥调已被用滥了，连那些最教条地贬低格拉祖诺夫的人也避免使用它们，免得使他们自己的论证缺乏说服力。

至于使用伦理标准而作出的否定评论，共有57条。没有人明确提到格拉祖诺夫与克格勃有联系，但很多人含糊其词地谈到他与苏联当局有某种交易。一位匿名的莫斯科人写道：“如果一个人主子的餐桌上吃得很舒服，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和先知”。另一位参观者，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穆欣娜工业艺术学院的学生明确表示，他“并不反对复古，不反对恢复宗教”，不过他提出质问：“当局怎么会允许你举办画展呢？你是怎样达到目的的呢？”然而，另一位参观者指出了格拉祖诺夫精神上的二难境地，认为他与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颇有相似之处，在一些评论中，参观者谴责了格拉祖诺夫道义上的妥协，但他们似乎准备宽恕他，因为他的艺术毕竟创了奇迹。正如一个参观者用诗歌写道：

你曾背叛和宽恕了你自己，  
你感动了神奇；  
你是自己的基督，  
你是自己的犹太。

大多数的否定评论(425条中的233条，占否定评论总数的54.6%)似乎以审美为标准。由于这些否定评论往往出自艺术家的手笔，否定的批评如同肯定的批评一样有力。最常见的修饰词语是“骗子”、“平庸”、“低劣的模仿”、“下里巴人的文化”、“亵渎”、“自我宣传”、“缺乏构思”和“缺乏职业训练”等等。甚至有极少数人责难格拉祖诺夫不遵循“苏联的艺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清规戒律。一条署名为“莫斯科大学众毕业生”的评论责成格拉祖诺夫要克服各种艺术上的“偏差”，以便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位匿名参观者谴责格拉祖诺夫打着



“爱国主义的幌子”，推行“平庸的东西”。他说，“苏联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更令人厌恶的事情”。由于这位参观者是极少用了“苏联艺术”的人之一，所以人们也许会怀疑他反对格拉祖诺夫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他以美学为武器，只是想掩盖其有利于苏联的偏见。

## 为什么这么多人热爱格拉祖诺夫？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评论（2087条中有1602条，占评论总数的76.7%）是肯定的。虽然我无法根据其主要观点再进行分类，但其中压倒多数的评论明显地受到了格拉祖诺夫俄罗斯主题的激发，这个主题可以被明确地解释为一种回到俄罗斯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上去的渴望。这些评论不仅数量大，而且具有强烈的激情，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阅读这些评论，人们就会有一种被感情的雪崩或澎湃的激情冲走的感觉。这一切如此强有力地倾泻到一个人身上，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它们一定是被压抑得太久了。如今才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迸发出来。在很多评论中，热情变成了狂热。大约有28个参观者激动万分，欣喜命笔，以诗歌的形式写下了自己的评论。此外，还有许多人从俄罗斯名著中引经据典，来强调这种或那种观点。很多解说员受到感动，使用了更具有旧俄罗斯特征的表达形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不再简单地说声“谢谢”，而是说“我们向你们鞠躬致意”。这些评论中充满了这样的词语，诸如“天才”、“魔术师”、“术士”、“俄罗斯骑士”、“先知伊利亚”等等。其他强调俄罗斯主题的典型评论是“俄罗斯精神的吟唱者”、“一切都具有俄罗斯的特点”、“感谢您使我们恢复了自我意识”、“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俄罗斯人的骄傲”以及“人们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真相”，

等等。但是，假如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俄罗斯主题的描述的话，那么它必定是许多俄罗斯童话的导言，“这就是俄罗斯精神，从这儿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俄罗斯。”

尽管多数评论从整体上看与画展有关，但相当一部分评论却只注重其各种俄罗斯主题（如感谢您描绘了“俄罗斯妇女”、“俄罗斯农民”，甚至“俄罗斯眼睛”）、或者赞扬某幅具体的作品，其中最受青眯的是《归来》和《祝您健康！》。人们常常强调这两幅画所起的关键作用。正如弗·亚努辛在评论中写道：

“伊利亚·格拉祖诺夫是一位天才的俄罗斯艺术家，长期多灾多难祖国的一位爱国者。即使一个人只创作了《祝您健康》和《归来》而其他什么也没有创作出来，人们也会为他的作品而倍感骄傲。在这两幅画中，他对祖国的过去和现在及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另一位参观者写道，由于这两幅画，格拉祖诺夫“获得了永生”。还有一位参观者则说：“《归来》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神化。”一条署名为“一位俄罗斯妇女”的评论写道：在《祝您健康》中，格拉祖诺夫“表现了俄罗斯人的精神”。“那位几乎把整个地球扛在自己肩上的俄罗斯男人是多么强壮啊！”

俄罗斯主题与俄罗斯艺术的主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这次展览常常被看作是一次“俄罗斯文化的庆典”，格拉祖诺夫被喻为瓦斯涅佐夫、苏里科夫及列平式的俄罗斯历史画派巨人。在当今画家中，他有时也被喻为米哈伊尔·弗鲁别利、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鲍里斯·穆萨托夫、鲍里斯·库斯托季耶夫、帕维尔·库兹涅佐夫以及尼古拉·列里赫。但在更多时候，格拉祖诺夫则被喻为中世纪肖像画家安德烈·鲁布列夫。这种比喻的深层含义是：鲁布列夫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俄罗斯人民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格拉祖诺夫则正在努力把俄罗斯文化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样，很

多参观者把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由于格拉祖诺夫在《归来》中运用了圣经的寓言故事，而使人们把他看作是“在气度上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的心理学家。”还有人在谈到其艺术的渲泄净化效果时，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说：“艺术将拯救世界”（此外，索尔仁尼琴也这样说过）。另外，还有一些人暗示，格拉祖诺夫与苏联乡土派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已故的瓦西里·舒克申，有契合之处，“因为这两者的艺术源出一根。”

大多数关于格拉祖诺夫艺术的言论主要是评论其主题思想而不是他的绘画技巧，一位参观者曾试图对此作些哲学解释：

“既然在所有创造性的劳动中（艺术、科学、文化），出人意料是最主要的东西，那么应该说，这次展览的成功是可以理解，也是当之无愧的。只要它具有活力，技巧便降到次要地位。”这位参观者不是别人，正是最最有名的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和尼古拉·古米列夫夫妇的儿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列夫。其父于1921年被处死。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他曾被关押过，但列夫·古米列夫通过努力终于成为苏联著名人类学家。

与那些谴责格拉祖诺夫置苏联现实于不顾的批评者不同，一位名叫马列尼奇的人争辩说，“我们的根基中包含了未来的青苹果”。“您的画并未导致悲观或信仰的丧失，因为它们描绘了胜利的伟大，这个胜利是在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之后才获得的，它们描绘了我们的先辈们，是他们为我们保卫了俄罗斯。您的画唤起了我们的高尚情感、尊严和道义的真诚。在这个怀疑的时代，这些正在渐渐变成一种力量。谁将获胜呢？是无数的罪恶强权呢，还是我们的人民呢？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您已经通过您的作品为我们作出了答案。”“让每个人都来回答您在20世纪艺术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吧！您是谁？是捡起鲁布列夫跌落的画笔描绘过去的伟大艺术家

呢，还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先知呢？”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上述评论没有政治意义，但批评的锋芒无疑直接指向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教义基础上的官方意识形态。假如他们提到任何形式的斗争的话，那么这就是反对罪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或阶级敌人的斗争。

并非所有敬慕格拉祖诺夫俄罗斯主题的人都像马列尼奇那样乐观。建筑师克柳恰列夫认为，格拉祖诺夫出现得太迟了，因而他的艺术对俄罗斯民族而言只是首“挽歌”。像许多其他参观者一样，他指出：格拉祖诺夫是“唯一一个提出民族主题的俄罗斯艺术家”。一名匿名参观者重复了这一令人忧伤的结论：“所有这些都具有俄罗斯特点，谢谢您！但我们现在几乎无话可说。这一切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艰难的！”这类评论（而且数量可观）看来坚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即尽管俄罗斯人在苏联政府中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感到自己就像任何少数民族一样在文化上受到压迫和剥削，他们对格拉祖诺夫的态度大概可用一位参观者的一句话来精辟地概括出来：“开阔眼界，深入人心。”

俄罗斯主题常常与精神宗教复活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基督和神圣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都缺乏东正教特有的含义，也没有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一项象征性地署名为信仰、希望和博爱的评论写道：“人们啊！相互爱护吧！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另一项评论跟着重复了同一主题。内科医生莱温说，观看展览，“人们对基督，我们这个贫穷国家的救世主，产生了深深信仰。”他斥责主办者不展出《20世纪的神秘》和有意限制人们接近评论簿，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可能写上更多的评语。”一条署名为“一群具有同样想法的学生”的评论写道：“谨以基督徒的名义表示万分感谢。《归来》是一幅天才之作。”在间接谈到《20世纪的神秘》时，这些学生对“其他

作品”没能在画展上露面感到遗憾。另一条评论写道：“谨以一群年轻的信徒——莫斯科洗礼会会员的名义，感谢画家对基督教的拯救本质作了极为卓越的描绘。”作者接着谴责了《归来》所描绘的“无信仰世界的卑鄙和恐怖”。他还许诺要把格拉祖诺夫介绍给所有的信徒。从一句简短的“以老信徒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您显示了俄罗斯的伟大和敏锐”评价来判断，格拉祖诺夫的艺术超然于俄罗斯教会各教派之上。

一位匿名作者责备格拉祖诺夫没有充分发掘俄罗斯救世主的主题，特别指责他没有在《归来》中描绘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形象，认为费奥多罗夫是画面上父亲般人物背后众俄罗斯名人的一员，（这些都是“我们归向”的人物）费奥多罗夫是19世纪俄罗斯哲学家，他认为死者的复活是活着的人的共同使命。这位参观者坚持认为没有费奥多罗夫，俄罗斯的使命，其‘思想’就不会有内容，或者说，其正统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完善。这几乎是唯一涉及到俄罗斯东正教的评论，但即使这样，如不把费奥多罗夫看成它的代表，这仍是对东正教的曲解。

虽然在画展的刺激下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但只有少数评论似乎是在大肆吹捧俄罗斯民族，谴责其他民族人民给俄罗斯带来的不幸，或者相反，用沙文主义和仇外措辞来解释格拉祖诺夫的艺术。谴责的矛头看来主要指向“外来的”俄罗斯的主人，尽管他们常常被隐蔽于“其他”外国人之中。一位名叫弗拉德琴科的人写道：“先是鞑靼人，接着是德国人，后来是法国人，以及所有其他种族的‘瑞典人’都曾经征服过我们……为了成功，有才能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忍受众多的痛苦，有时甚至献出了生命！虽然如此，我们仍和您，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团结在一起，不仅用热血和命运，而且还用信仰。我们坚信，俄罗斯民族决不会屈服于外国人的精神奴役……。任何一个精神还没有死去的人都不会以冷漠的态度来看待您的绘画。”

然而，格拉祖诺夫的艺术似乎更能激发人们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和自己民族的谦卑心理。正如一位参观者做结论说：“显然，人们应该欢迎居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的人民表达自己的民族尊严和自己文化的伟大。此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欢迎俄罗斯文化的复兴。因为我们——俄罗斯人，在很长时期内残暴地毁坏了我们特有的一切。”

尽管可以推测，多数肯定的评论是由俄罗斯民族人写的（或者是那些姓名常常与俄罗斯人难以分辨的东斯拉夫人写的），但在格拉祖诺夫的钦佩者中的有其他民族的参观者。仅莫斯科的评论簿上（据我计算），至少有30人的名字好像是非俄罗斯的。其中有7个外国人（有两人分别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名来自保加利亚，一名是西班牙人，另一人的名字是用英语写的）。3个人似乎是苏联的亚美尼亚人，3个人的名字表明他们是穆斯林人，其余的人似乎是苏联犹太人，或者是德国人。一位明显具有穆斯林血统的科学院哲学所研究生卡巴罕·施坦恰耶瓦所写的评论颇具典型性。他写道“我宁愿把这次画展称作一首心灵和美的赞歌。其形象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作品的道德作用如此强烈，离开画展后，人们的心灵几乎完全被净化了。”

## **格拉祖诺夫的艺术鼓舞激发了反犹太主义吗？**

由于有人指责格拉祖诺夫的艺术中具有反犹太成份，因此，我特别注意那些可能会被理解为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评论。在莫斯科的评论簿上，我找到了两条公开的反犹太的声明，其中一条是匿名的，上面写道“经过60年的犹太政权后（此处显然指苏联党政官员中犹太人占较大比重而言——译者注），人们终于开始嗅到了俄罗斯的味道。俄罗斯国家万岁！”显然不论这位反犹太

者是谁，但他毕竟把苏联人和犹太人政权等同了起来，认为格拉祖诺夫的艺术是以牺牲苏联犹太人为代价的俄罗斯民族复兴。当然，他高呼“万岁”时，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是想象中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国家。另一条反犹太声明包括在由一个叫伊万·拉卡维琴附加在莫斯科评论册后面的诗集里，作为他欣赏画展的一种表示，其一首诗《秘密列车》谴责了所有“不虔诚的犹太人”，尤其是谴责了莫伊沙·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夫·布龙施泰因（指托洛茨基——原作者注），因为是他们判处了最后一个沙皇家族的死刑。像那位匿名评论者一样，他似乎也把苏联人和犹太人政权等同了起来。

在列宁格勒的评论簿上，我仅发现一条反犹太评论。在这之前，编辑阿布拉莫娃曾谴责格拉祖诺夫塑造出“如此令人反感的俄罗斯人形象”。对此，后者提出质疑。由于起这样名字的人，很可能是个犹太人，这位被激怒的反犹太主义者错把她当成一个男子，使用了如此辱骂性的语言：“你这该死的犹太佬，妄想硬往我们身上屙臭屎！这样的编辑应该从他们的位置上赶下去！”

但是，约有六、七条评论表示忧虑，认为格拉祖诺夫强调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可能会激发反犹太情绪或法西斯主义。一位匿名参观者写道：“您的思想一目了然，而且直率得使人害怕。从表面看来，您拥护俄罗斯人，……。”他用删节号代替了所指的“犹太人”。列宁格勒的一位画家拉希莫娃说，这次画展“使我回忆起40年代德国的官方‘艺术’。”她的声明显然有意暗示格拉祖诺夫的俄罗斯主题可能会退化到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题上去。从《伊凡诺夫一家》这幅画，可以看出格拉祖诺夫内心的“反动、深刻的危机和对民族民主传统的背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走向法西斯主义。”评论中提到“民族民主传统”暗示了其官方路线有密切的联系。根据这一路线，苏

维埃政权代表了“进步、民主的”俄罗斯人的民族愿望。另一位匿名评论者指责格拉祖诺夫大肆渲染“卑鄙的情感，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始。”评论中的最后一句话令人捉摸不透：“在我看来你是位天才，但你为什么要阉割谢林呢？”此处显然指的是犹太音乐家尤里·谢林。格拉祖诺夫曾为他在莫斯科上演的依地语戏剧设计了一套布景。这句话可能是有意暗示：自从与格拉祖诺夫合作之后，谢林的犹太意识逐渐消失了。

那些担心格拉祖诺夫的艺术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评论被肯定的、甚至是狂热的评论所超过。从署名看来，他们可能具有犹太人血统。一位学钢琴的学生，M·L·拉比诺维奇称格拉祖诺夫为“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人和伟大的公民”。尤里·瑙莫维奇·坎托尔直率地说：“感谢您，因为您是受之无愧的”。来自鄂木斯克市的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扎克感谢格拉祖诺夫“给我们送来了生活的欢乐”，并且说他特别喜欢《俄罗斯的维纳斯》这幅作品。工程师捷佩尔鲍姆认为“应该建造一座宫殿来收藏伊·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工程师L·瓦伊斯曼感到唯一的遗憾是《20世纪的神秘》没能展出。罗扎·马尔科夫娜·施鲁格称格拉祖诺夫为“天才的艺术家”，感谢他的画展“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并自愿为他当模特儿。一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7岁的女工程师R·斯卢茨克尔写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时光中的一天。我为我与你同处一个时代而感到骄傲。你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光明”。经济学家亚·R·科甘把格拉祖诺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画家。”他为格拉祖诺夫作品的“优美画笔和充沛的情感”所打动。工程师V·瓦伊斯堡说：“终于，我看到了真正的、有创造性的、无拘无束的、人道的、富有哲理思想的和才华出众的俄罗斯艺术家。毫无疑问，您是当今俄罗斯最优秀的画家”。最后，E·梅金称格拉祖诺夫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天才”。



最后一条评论似乎是那些苏联犹太人观点的总结。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恰如犹太复国主义或苏联犹太人的移民运动一样是合法的，它不像官方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能包容反犹太主义。对尚未被同化的苏联犹太人而言，让他们像俄罗斯人一样对格拉祖诺夫的俄罗斯主题感到激动是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欣赏它。他们似乎并没有感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活将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 “苏维埃爱国主义”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吗？

在那些肯定的评论中，有些看来与官方路线相一致。苏联政府认为，苏维埃国家政权满足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愿望，因而“苏维埃爱国主义”与俄罗斯民族对他们过去的岁月里所取得成就的自豪是分不开的。其中评论之一称这是一种“伟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现象”。评论中写道：“格拉祖诺夫在其天才之作中描绘了长期受苦受难的越南人、古巴人以及进步运动中其他民族人民的形象，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评论的最后署名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一个老兵、坦克部队少将博尔久科夫”。另一位参观者强调指出格拉祖诺夫是“我们的俄罗斯苏维埃画家”。为支持这一点，他提到格拉祖诺夫对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工人的描绘。评论最后的签名为“特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国内事务总监、民兵中校斯托尼科瓦·恩格林纳\*（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转化而来，而不是天使）”。工程电力学家皮利皮科夫从格拉祖诺夫全部艺术品中，尤其是从《归来》和《祝您健康》中“看

• 恩格斯的名字在原文中与天使谐音——译注。

到了党性原则在艺术中的具体体现，用列宁的话来讲，即艺术家在人民面前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上述三种评论很特别，这表现在它们相当笨拙地试图把格拉祖诺夫描绘成“一种苏维埃俄罗斯现象”。此外，至少就皮利皮科夫而言，人们可能怀疑这类评论并非出自真心，其目的是要为这位令人猜疑的艺术家作思想意识方面的辩解。

这类评论大概有五、六条，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认为格拉祖诺夫的艺术是非苏维埃的甚至是反苏维埃的评论。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美术教师库拉诺夫勇敢地在自己的声明下面签了名。他认为，格拉祖诺夫的画展是“对60年来苏联政权的描写。在这期间，我们的蛊惑民心的政客们一直在高高的讲台上高呼口号，而地位低下的群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剥夺了各种权利”。在谈到《归来》时，一位匿名参观者说，“这群猪猡是首都莫斯科这座最具民族特色的俄罗斯城市的奠基者，而正是他们却在继续干着破坏莫斯科建筑的勾当。”他用现代化的象征来解释猪猡们所共有的摩天大楼，而这种现代化否定和蔑视俄罗斯人民保持民族建筑风格的权力。另一位参观者写道，格拉祖诺夫“是唯一一位不屈从于统治者的真正画家”。一些评论还批评画展的主办者不展出《20世纪的神秘》这幅画。工程师巴库耶夫指责当局不让人民了解格拉祖诺夫的艺术，“致使西方比我们苏联人更了解格拉祖诺夫”。他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内科医生扎伊采娃对政府破坏古代建筑遗迹的政策表示抗议，他警告当局说：“你们没有权利扼杀人民的灵魂，没有权利用推土机抹杀历史。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我们国家的头上，俄罗斯的农民会怎样为我们的国家服务。然而，他们的服务是要报偿的，即使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也把第一杯庆功酒献给长期忍受苦难的农民。”她建议：我们应该像波兰那样从废墟中恢复我们的历史！”其他的人，如工程师斯捷潘诺夫警告当权者，假如他们决定惩罚格拉祖诺夫，

那么，“我们，俄罗斯居民，决不会让他们伤害您！我们将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如口头、行动、信件等等来发出保卫您的呼声”。

最后，列宁格勒大学一位女学生写道，“格拉祖诺夫给了她新的力量，新的信仰，这是俄罗斯的再生。正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

“俄罗斯人将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当然，她引用的是普希金献给恰阿达耶夫的著名诗篇，而且每个苏联人都知道诗的结尾：“我们的名字定会写在专制的废墟上”。

## 结 论

格拉祖诺夫在莫斯科画展期间，曾在一次与西方记者的交谈中说，应该把他的画展看作是：“一种考察苏联艺术的新方法”。格拉祖诺夫抱怨说，西方记者眼中只有那些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部分都不喜欢他。他用布娃娃作比喻，极为形象地解释了他在苏联公众舆论中的相对地位。他说，西方人只知道“政府的外表和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但他们却忽视了重重叠叠一个套一个的处于他们之间的布娃娃”。几年后，当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于移民、迫害和萨哈罗夫的流放等缘故显然实际上业已终止时，格拉祖诺夫再次指责西方忽视了“其他所有的布娃娃”。他说，“来到这里的外交家和外国人都认为持不同政见者大部分是打算离去的犹太人”。接着他表明了自己及其支持者的立场：“另一类持不同政见者打算留下来”。

这两本评论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除了对苏联艺术状况发表了各种见解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所有其他布娃娃的政治立场，亦即介于政府和打算离去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部分人的观点。从苏联本国的评价资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间

的布娃娃”对目前官方在如何对待俄罗斯民族遗产问题上的作法表示极大的不满。他们渴望恢复民族自我意识，他们的不同政见最有可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而成功的系数也就越大。

显然，多数俄罗斯人（尽管可能不如赞成格拉祖诺夫艺术的人那样多达75%）认为他们的民族遗产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特征丧失了。由于外界常指责俄罗斯民族是苏维埃帝国的统治者，这种感情肯定会愈发强烈。事实上，他们仅仅是意见受到压制的多数而已。然而，由于他们渗透到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在各级政权中拥有紧密的追随者，他们便成为和平改变苏联社会（大概是沿着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暗示的路线行进吧）最大的潜在力量。

这两本评论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俄罗斯人中，盛行的民族主义感情严格地说其本质是防御性的，是以尊重其他民族为前提的。无论这种感情多么强烈，他们最关心的是生存，而不是扩张或对其他民族的俄罗斯化。尽管沙文主义的因素已经出现，但同长期与超级大国竞争的其他民族相比，其力量似乎并不那么强大。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似乎并非建立在种族或宗教优越的信念之上，而是由于受到因长期忍受苦难所产生的孤立感的激发而产生的。尽管令人遗憾的是，某些评论中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因素，但它在这个以具有官方和民间悠久反犹历史著称的国度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突出。与焦点主要集中在犹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上的官方反犹太主义不同，评论集中表现的仅仅是大众的反犹情绪，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犹太人在十月革命及建立“国际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问题上。这些反犹太主义者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即国家不仅反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且反对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族民主义。尽管一些苏联犹太人明显地感到格拉祖诺夫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崛起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在苏联的利益，但更多的人认识到

他的艺术削弱了束缚苏联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假使苏联领导人真的委派他们所信任的党的学者去分析这两本评论集，那么其结果一定会使他们大为震惊。官方对格拉祖诺夫的态度是容忍而不是赞成。这种态度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他们或许只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会自行消失。

亚当·乌兰在其收入《苏联外交政策的国内条件》中的重要文章《俄罗斯民族》一文中承认，尽管“嘲弄他（索尔仁尼琴——译注）的观点在西方的某些圈子里已很盛行”，但索尔仁尼琴却“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只有证明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不相容，共产主义在苏联的控制才能被瓦解”。这恰恰是这两本评论集所表现出来的讯息。总之，我对这两本书的分析支持了像唐纳德·特雷德戈尔德等等所坚持的观点，即“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全部遗产、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由渴望、前共产主义时期全部村社传统、仪式及艺术和其他因素一直未获许进行学术研究，并受到国家法律的直接攻击或故意荒唐的歪曲”。同时，我的分析还表明：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必定敌视苏联的其他民族，它应该被看作自由世界的同盟者。苏联政府之所以能够创造和保持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共存的局面，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由于西方不愿意承认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合法性造成的，因为西方毫无根据地担心，它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比共产主义更加可怕的东西。

## 第十章

# 从世界观点看苏联各民族的人口统计

### 南方和北方

拥有 2.738 亿人口（1984 年 1 月 1 日的数字）的苏联，可以说是世界人口的一种模式，它有以经济、文化发达的斯拉夫民族、波罗的民族以及其他欧洲民族为代表的北方。1979 年，这些民族占全苏人口的 77.0%，其在 70 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56%。但这种增长纯粹是由于人口高峰造成的，因为其人口出生率低于替代水平。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苏联的欧洲地区业已经历了人口萧条期，并最终面临人口长期持续下降的趋势。

苏联也有自己的南方，主要由突厥—穆斯林血统、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和俄罗斯联邦等地区的人口组成。1979 年，南方人口占全苏人口的 22.7%，70 年代其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2.14%，是北方的 4 倍。中亚土著居民的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3.29%，是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 5.4 倍。苏联南方人口的持续爆炸——尽管其经济亦发展迅速——类似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北方的人口萧条和南方的人口爆炸导致了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多食物少的矛盾，因为北方是这个国家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马尔萨斯困境”已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

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代与8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苏联各民族间的人口平衡亦岌岌可危。苏联人自身最关注的是未来北方人口的逐渐减少。据他们自己的估计，这将发生在2000年—2010年之间。

伴随人口爆炸的其他问题是人口流动性的减弱和为福利国家，特别是为社会福利部分提供资金方面出现困难。由于其就业制度效率低，苏联人几年前就已承认了目前美国和西欧社会福利大论战中正在争论的数学定理：出生率高时，社会对在业几代人的依赖性较重，但当出生率低时，其依赖性则更强。南方的人口爆炸和北方的人口减少都导致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增加、投资的扩大、与人力投入价格相比资源价格的上涨。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从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除了北方自身的问题外，人口迅速增长的南方现在和将来都必定要极大地依赖于北方，因此，形势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双方经济的长期衰退。

## 资料和方法

在对苏联各民族的人口作出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之前，首先必须解决一些纯粹技术性问题。资料的现状使我们在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之前必须对统计数字进行反复核算。苏联所有的区划单位，即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均代表不同民族的人口，而这些民族人口的重要资料往往参差不齐。所提供的数据必须经过重新计算，按民族分门别类加以整理。1959年、1970年和1979年3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既无系统性，而且前后矛盾，不能进行跨时期的比较，仅有1974年的区域性人口估计寿命表。这一年接近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顶峰。

由于缺乏相关的人口年龄分布资料，本文没有采用普雷斯頓和科尔共同创立的、用于计算人口出生平均寿命的新公式，所采用的是马祖尔提出的回归模式，以此来计算各民族的平均寿命。以这些资料为依据，运用科尔和德梅尼区域寿命表模型和稳定的人口模型（东方模型），我们推算出平均生育年龄妇女的存活率（各民族的平均值是从1975—1976年各民族特定年龄段生育率一览表中推算出来的）。这些数据经过校正恰好与已知的全苏存活率（来源于1959、1970和1979年3次人口普查资料）相吻合，并据此推算出人口普查间一些年份的数据，之后，再计算出各民族的纯人口出生率。

人口总出生率是用科尔、安德森和哈姆所描述的简单方法，根据他们对穆斯林地区少报人口的估计，并根据比拉本的计算对197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分布数据进行校正，把区划单位的数据转化为民族单位的数据，推算出来的。由于最近20年来，民族的空间分布变化不大，并未影响民族与区域人口出生率的比率，加之我们校正了1958—1959年、1965—1966年、1967—1968年以及1969—1970年之后穆斯林少报人口出生的数字，因此可以假定1969—1970年的人口出生率保持稳定。如果把科尔等人对1969—1970年的估计与70年代出生率表以及费什巴赫对0—9岁的计算（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资料）相比较，人们会吃惊地发现，70年代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登记没有任何重大改观。

15个主要民族以五岁为一年龄段划分的、特定年龄段妇女婚姻状况一览表是从197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推算出来的，适用于整个70年代（因为缺少197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尽管目前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已婚妇女的比例有所下降。在1970年特定年龄段婚姻状况一览表、民族/地区人口出生率以及按照邦加阿茨指数推算出来的地区特定年龄段人口生育率一览表的基础上，可以推算出15—49岁已婚妇女的比例指数以及本文中定义为



“按年龄累加的特定年龄段生育率”的总数，然后，运用科尔和特拉塞尔的出生率一览表模型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从而得出各民族中婚姻出生率和特定年龄段总生育率，使三个变量符合：（1）各民族的总人口出生率；（2）按年龄累加的特定年龄段婚姻出生率；（3） $m$ 的中值，即与人口自然出生率偏离程度的指数。这是用最小平方的方法推算出来的。

邦加阿茨的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控制模型经修正可用于计算各民族由于分娩和避孕、自然流产、人工流产以及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而中止怀孕的一览表。本文得出的结果较为保守，从所采用的模型中推算出人口总出生率和按年龄累加的特定年龄段出生率之间的比值，并以此作为目前已婚人口比例的指数。这个比值提供了流产及其后果和避孕的最小值。如果把婚姻指数转换成有生育能力妇女人口比例的指数，那么我们便会得出更为实际的值。如，把双方同意的结合以及其他情况的资料，连同平均性交频率，与特定年龄段婚姻率结合起来进行计算，即可得出这个值。为此目的，为能根据现有资料重列1979年婚姻一览表，可采用科尔和科尔—麦克尼尔模型。然而，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苏联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有关各民族的资料都是依据被调查者个人的报告统计出来的。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还会产生民族成份再确定这一重要问题。相应地，各民族人口所有重要比率都难免出现偏差（至于这一过程是一种真正的同化，还是一种理论上的变化，本文未作探讨）。为正确估计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区划单位内各民族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别，为使民族人口增长率和区划单位人口增长率协调起来，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这一方法较适宜于地区分布较集中的民族，结果颇令人满意（与用传统的方法得出的结果相对比而言）。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亚美尼亚、车臣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其结果令人失望，对民族混居的区划单位内的民族（如，哈萨克）而

言，亦如此。在这些情况下，必须用传统的估计方法，以使调整后的数据接近各民族成份再确定后的情况。我们运用先前创立的人口出生率模型和寿命表模型，对采用新旧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了对照检验。例如，用新方法计算，1979年俄罗斯民族的总人口为133,487,000人，用传统方法计算，其人口为132,964,000人（人口普查数字为137,397,089人，这说明俄罗斯人是主要内部同化对象）。计算得出的1959—1970年以及1970—1979年两个阶段的人口增长率给出了各次人口普查时各民族的校正数字。各民族人口的总和恰好是苏联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总数。

因为对民族成份进行了甄别，我们对1970年（这一年是全苏人口中主要生育年龄段妇女比例最低的一年）苏联各民族的人口分布作了校正，并根据校正后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按高、中、低三个序列对1984、2000和2050年等年份进行了预测。预测的方法和问题的各个方面参见布拉斯、凯菲茨、科尔、布尔茹瓦—皮沙等人的有关著述。他们的著述的某些前提，尤其是他们对人口生育周期的探讨都暗含在本文中。按照中期预测序列（本文只采用这一序列），估计到2000年，苏联的人口将达到2.99亿——比美国人口调查局外国人口分析处的常规预测数字2.795亿略高一点。

## 人 口 结 构

### 历史回顾

1917年前的俄国，拥有1.746亿（除去芬兰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的人口）人口，其中斯拉夫人、波罗的人和乌戈尔—芬兰血统的人占85%左右（见表一），是一个欧洲人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经过几次疆界变更、战争、国内破坏、饥荒和几十年的人

(表一) 某些民族在苏联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1917	1927	1937	1959	1970		1979	1984	2000	2050	2105	2200
				普查数字	普查数字	校正数字	普查数字 校正数字	预测	预测	预测	预测	预测
北方	84.71	83.07	83.36	82.86	79.87	79.52	77.49	75.46	70.18	51.56	39.82	26.21
斯拉夫人	74.51	77.98	78.53	77.11	74.62	74.07	72.68	70.54	65.63	47.79	36.22	22.79
俄罗斯人	45.38	52.91	58.41	54.65	53.37	52.28	52.35	49.94	46.42	32.22	22.60	10.55
乌克兰人	18.36	21.22	16.56	17.84	16.86	17.19	16.14	16.24	15.12	12.15	11.08	9.53
白俄罗斯人	4.01	3.22	3.11	3.79	3.74	3.86	3.61	3.66	3.44	2.90	2.68	2.31
波罗的各民族	2.71	.24	.18	2.26	2.11	2.18	2.02	2.07	1.97	1.74	1.71	1.72
乌戈尔-芬兰人	1.67	2.11	1.99	1.57	1.43	1.52	1.41	1.39	1.28	1.01	.89	.70
南方	14.67	16.56	16.62	17.04	20.02	20.33	22.27	24.25	29.52	48.17	59.90	73.48
西南部	3.23	2.83	3.13	4.08	4.32	4.36	4.46	4.64	4.97	5.74	6.41	7.24
亚美尼亚人	1.18	1.07	1.27	1.33	1.47	1.49	1.58	1.76	2.16	3.09	3.66	4.26
东南部	11.44	13.74	13.49	12.96	15.69	15.97	17.81	19.61	24.55	42.43	53.49	66.25
乌兹别克人	1.16	2.69	2.86	2.88	3.80	3.81	4.75	5.44	8.18	19.29	25.70	31.65
塔吉克人	.29	.67	.72	.67	.88	.90	1.10	1.32	2.02	5.66	7.62	11.12
哈萨克人	2.78	2.70	1.83	1.73	2.19	2.22	2.50	2.66	2.96	3.31	3.59	3.94
鞑靼人	1.78	2.24	2.54	2.38	2.45	2.55	2.41	2.63	2.62	2.52	2.62	2.84

资料来源: 1917年的数字, 参见1917年的人口普查: 《苏联历史》(双月刊)1961年第六期, 第97—115页和1980年第三期, 第88—89页。民族分布亦根据一战牺牲的人口作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参见M.

S. 伯恩斯坦载《信使》杂志第128期, (1979)第323—326, 353—354页。1927年的数据, 参见人口1926年的人口普查资料。1937年的数据, 参见1937年的人口普查(全苏总人口)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民族分布)。同时参阅《真理报》, 1940年4月29日第二版及其他的一些资料。由于1939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夸大了苏联的总人口和各民族的人口数字, 见1939年的民族分布情况是根据1937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估计出来的。1959年的数字, 见195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苏联》第一卷, 第184—188页。1970和1979年的数字, 参见表2。

口变迁之后，北方各民族的人口增长相对较缓慢，从1927年的约1.40亿（按现在的疆界）增至1959年的1.73亿。南方各民族（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和鞑靼人）的人口总和从1917年至1959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5.1%增至8.3%。

至50年代末，苏联现在的民族人口结构业已形成。北方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急剧下降，俄罗斯人口从绝对多数降至微弱的多数（1959年占总人口的54.9%，经过同化，1979年降至50.9%）。南方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59年的17%升至1979年的22.7%。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东南部地区其人口亦由13%增至18.2%。（穆斯林血统的人口，经过同化，1979年为44,545,000人，占全苏总人口的17%。）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的7个穆斯林民族（乌兹别克、鞑靼、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阿塞拜疆以及卡拉卡尔帕克）由1959年的1610万增加到1979年的3170万，20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

## 民族成分再确定中的几种倾向

对民族成分再确定中各种倾向的分析始于1959年，以前的同化现象完全未被列入考虑之内。这种分析有如下三个目的：（1）根据民族成分再确定的情况作调整，有助于真实地反映民族的数量及人口增长率，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人口生育趋势，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人口的预测；（2）根据民族成分再确定得出的数字是对苏联官方几十年来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的一种批判性的检验；（3）对突厥—穆斯林民族不断变化的民族再确定模式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出生率高、人口却在下降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能够揭示几种补偿性影响作用。

计算表明，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增长率在1959、1970、1979年

3次人口普查中均被夸大了，这是由于民族成分再确定中，许多民族，如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鞑靼人、楚瓦什人、亚美尼亚人、摩尔多瓦人、其他乌戈尔—芬兰人、日尔曼人、犹太人和波罗的人等(表二)都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如果1959年以前的民族身份再确定是既定事实的话，那么1959年以后的校正数字表明：至1979年，约有4000万其他民族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俄罗斯民族。因此，1979年俄罗斯民族的人口与人口普查登记的数字有较大差异，不是1.374亿(占人口总数的52.4%)，而是1.335亿(占总人口的50.9%)。

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民族已不再是苏联人口中的多数，而仅仅是苏联各族中人数众多的一个。然而，如果把50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同化亦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变化甚至早就发生了，而且俄罗斯民族的人口今天可能不会超过48.5%。

数十年来，同化是俄罗斯人口增加的重要根源。但是，至70年代，同化速度相对60年代而言减慢了一半，至80年代这一源泉可能会完全枯竭。如仅仅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俄罗斯人口将在90年代中期达到零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负增长。

但还有一种相反趋势特别值得注意。一些1970年人口普查中申报自己是俄罗斯民族的人却在1979年的人口普查中认为自己属于突厥族。这种民族成分再确定的逆向发展，许多观察家认为，是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表现，是合乎情理的经济选择。由于苏联在教育 and 就业机会方面有各种配额和积极的措施，因此，尽管有表面上的民族“融合”政策，逆向民族成分再确定实际上受到了激发。如此得体、理智的结果表明，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高生育率不仅合乎传统，而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既然苏联在教育 and 就业方面有各种配额和一些积极措施，因此，不管表面上的“融合”政策如何，逆向民族成分再确定实际上受到了支持。如此适当、合理的结果表明，突厥—穆斯林民族的高生育率亦为

合理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对传统的顺从。

由于要发放各种补贴，苏联中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其他社会所经历的生育率下降。中亚的突厥—穆斯林诸民族的逆向民族成分再确定和其他社会经济趋势（对人口外流的抵制，城市化速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对随着收入增加减少子女数量的抵制以及妇女在非农业部门的低就业率等）并没有对生育率下降作出解释。如果中亚突厥—穆斯林民族生育率已开始下降的话，其他极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力量必定在抵销无限制生育的收益。

## 移民、城市化及空间分布

苏联每年有1200—1600万移民，而70年代中期移民到城市的人口每年为190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农村。在南方，特别是在突厥—穆斯林诸共和国中，从农村迁出的人口微乎其微。中亚地区农村人口的集中过程使苏联有关方面感到震惊。1959—1979年间，俄罗斯非黑土地地区的农村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同时期，中亚地区的农村人口则增长了1.75倍以上。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农村人口的绝对减少、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以及突厥—穆斯林民族人口的双倍增长，都是苏联面临的主要问题——粮食生产与分配矛盾的根源。

1970年，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有1/2到2/3的人口实现了城市化，而中亚诸民族中只有1/4的人口实现了城市化。尽管官方大力推动中亚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高工资，但70年代中亚各共和国的城市化速度比60年代大大减慢。近几年来，塔吉克和土库曼两加盟共和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实际上下降了。由于同一时期内这些地区的婚姻出生率已开始下降，因此这一发展格外重要。

尽管苏联工业的发展需要人口由西向东迁移，而工农业的发

(表二) 民族成分再确定后某些民族的人口(以千人为单位)

	1959	1970	1979	1984	2000	2050	2105	2200
北方	173,033	192,222	202,106	206,642	209,872	171,566	117,417	57,120
斯拉夫人	161,023	179,054	188,793	193,185	196,273	159,021	106,810	49,680
俄罗斯人	114,113	126,363	133,487	136,749	138,828	107,233	64,881	23,001
乌克兰人	37,252	41,541	43,564	44,470	45,215	40,417	32,669	20,775
白俄罗斯人	7,913	9,328	9,855	10,040	10,287	9,651	7,890	5,037
波兰人	1,380	1,428	1,483	1,517	1,533	1,363	1,086	687
其他斯拉夫人	363	391	403	407	407	354	282	179
波罗的海各民族	4,714	5,259	5,531	5,667	5,901	5,775	5,057	3,748
立陶宛人	2,326	2,728	2,947	3,063	3,257	3,338	3,043	2,430
拉脱维亚人	1,399	1,481	1,498	1,497	1,492	1,299	1,028	649
爱沙尼亚人	988	1,048	1,085	1,107	1,155	1,137	985	669
乌戈尔-芬兰人	3,277	3,683	3,791	3,817	3,815	3,351	2,633	1,535
莫尔多瓦人	1,285	1,305	1,310	1,310	1,290	1,088	785	356
马里人	504	669	712	725	736	667	557	358
乌德穆尔特人	624	778	818	829	836	743	611	391
科米人	430	488	498	496	495	450	360	228
卡累利阿、芬兰人	259	265	272	271	269	233	184	116
其他欧洲人	3,887	4,072	3,830	3,812	3,714	3,251	2,765	2,035
犹太人	2,267	2,150	1,810	1,765	1,624	1,250	949	586
日耳曼人	1,619	1,921	2,019	2,047	2,089	2,000	1,816	1,449
南方	35,583	49,123	59,549	66,400	88,284	160,294	176,636	160,159

续表(二)

西南部	8,521	10,536	11,885	12,696	14,886	19,091	18,909	15,770
摩达维亚人	2,214	2,734	3,007	3,139	3,343	3,498	3,217	2,575
格鲁吉亚人	2,691	3,244	3,541	3,680	3,910	4,044	3,703	2,961
亚美尼亚人	2,786	3,607	4,314	4,813	6,446	10,286	10,805	9,295
东南部	27,062	38,596	47,663	53,704	73,418	141,202	157,727	144,388
乌兹别克人	6,015	9,212	12,452	14,908	24,464	64,198	75,784	68,970
塔吉克人	1,396	2,181	2,972	3,605	6,043	18,831	22,473	24,245
哈萨克人	3,621	5,372	6,583	7,294	8,850	11,020	10,597	8,584
阿塞拜疆人	2,939	4,368	5,385	5,963	7,284	9,128	8,785	7,118
吉尔吉斯人	968	1,502	1,939	2,248	3,239	5,588	6,253	5,495
土库曼人	1,001	1,530	2,029	2,389	3,629	7,683	9,573	9,630
卡拉卡尔帕克人	172	248	324	390	662	3,110	4,078	4,128
达吉斯坦人	944	1,352	1,630	1,781	2,231	2,797	2,667	2,156
车臣人	418	612	755	840	1,046	1,324	1,273	1,031
鞑靼人	4,967	6,171	6,838	7,211	7,848	8,371	7,724	0,188
巴什基尔人	989	1,238	1,378	1,446	1,566	1,668	1,540	1,233
楚瓦什人	1,469	1,785	1,889	1,926	2,090	2,166	1,970	1,572
总计	208,826	241,720	262,436	273,854	299,041	332,780	294,892	217,948

资料来源：1959年的数字见1959年的人口普查。1970和1979两年的数字分别见1970和1979年的人口普查（民族分布以区域为单位），并对资料根据同化程度作了校正。1984年、2000年等年份的数据是根据1970年民族分布情况进行预测和估计。



展都需要由南向北迁移,但移民的流向却恰恰相反。苏联人称之为人口的“盲目流动”,并公开指责那些根本不想迁移的中亚人,认为他们冥顽不化。然而,某些官方资料却对此作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政府以牺牲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利益为代价,以税收、农业工资、物价及其他救济、补贴等形式给南方以优惠——这是西方的福利殖民主义现象,因而出现了上述情形。

70年代,中亚所有突厥—穆斯林民族及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等民族在各自共和国人口中的比重均有所增加,而其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口中的比重则愈发少了。自7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和欧洲人离开哈萨克、吉尔吉斯,返回俄罗斯联邦。自50年代垦荒运动开始以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回流了287,000人。俄罗斯人从哈萨克农业区迁居到中心工业城市,使粮食问题更为尖锐。

## 增长差异

苏联人口从1959年的2.088亿增至1979年的2.624亿(亦即增长了25.7%)。同一时期,苏联北方人口由1.73亿上升到2.02亿(增长了16.8%),南部人口由3560万增加到5950万(增长了67.3%)。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东南部诸民族,人口由2710万增加到4770万人(增长了76.1%)。中亚和外高加索各民族的人口20年间翻了近一番,由1610万增至3170万。俄罗斯民族人口由1959年的1.141亿增加到1979年的1.335亿,增长了17.0%(见表二)。

中亚地区人口增长的势头仍非常猛。至本世纪末,乌兹别克人的年增长率将为3.1%,塔吉克人的增长率为3.2%。这势必会带来人口的持续爆炸,使人口在1979—2000年间再翻一番,是

1917年人口的12倍。由于人口惯性和净增长潜力仍将存在，因此，人口爆炸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俄罗斯民族、其他斯拉夫民族、拉脱维亚族、乌戈尔—芬兰族、日尔曼族、犹太族（即北方的多数）的人口根据预测，将从90年代末开始出现负增长。

## 人口转变的差异

苏联各民族人口增长的差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死亡率的下降以及死亡率与出生率趋势间各种类型的关系。其中一些趋势和关系与世界人口具有共性，其余的则是苏联所特有的。

人口转变的范围和数量上的目标（特别是极大地降低人口出生率）由苏联的北方达到了，而且速度大大超过欧洲。人口转变质量上的目标，诸如避孕术的推广、禁止把流产作为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仍完全没有达到。市场经济及伴随的竞争机制的出现，人的生命作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家庭经济单位的确立，营养的改善，医疗和儿童保健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西方人口平均寿命逐渐延长，出生率逐渐降低。社会化经济的出现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营养的恶化、家庭经济独立性的消失和急速的社会流动性。这首先带来了高死亡率，其次带来了大屠杀幸存者平均寿命的延长，最后带来了北方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

必须强调指出，特定同等的生育控制（亦即，父母双方在生了规定数量的子女之后为终止再生育而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因在1920—1936年这一时期内人工流产尚属合法而未得到广泛推行。事实上，和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反，在苏联北方的农村人口中20年代出现了一种控制人口生育向自然生育的转变

的现象。在乌克兰，现有的特定年龄段人口出生率和婚姻状况表表明，20年代中期与自然出生率偏离的程度实际上为零，然而20世纪初期其程度则稍高些。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1917年后恢复农村生产而造成的。30年代中期，土地再分配为农业集体化所代替，流产成为非法行为（1936—1955），出生率开始急速下降。

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的转让社会的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和西方都是一致的，尽管苏联只是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的结构，而未建立起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一发展使两代之间的转让失去了感情色彩，使父母提高孩子质量的愿望膨胀，从而削弱了家庭作为私人机构和经济单位的某些基本职能，使孩子成为公共商品，因而导致了始于60年代中期的生育下降浪潮。这一次，人口出生率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

依赖率（指儿童和抚恤金领取者总数与从业年龄人口的比率）升高，特定年龄段人口婚姻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同居成风，这些都是最近趋势的另外一些方面。在苏联北部，特别是斯拉夫民族中，人工流产（苏联人口下降的特点）达到世界历史最高水平（本世纪60年代的罗马尼亚除外）。不受控制的怀孕只受到病理性的继发性不育症的限制。不管苏联北方人口的出生平均寿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不同，双方都继续趋向于稳定的内部负增长（不是趋向静止人口转变的中间过程）。50年代，苏联采取措施降低了死亡率，但北部的人口出生率仅仅略高于替代水平，因此绝对不会带来人口爆炸。

苏联南方恰恰出现了人口爆炸，尤其是穆斯林各民族的人口。自30年代后半期开始，南方人口寿命开始延长；自50年代以来，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基于自然生育力的高出生率和年轻人口的低死亡率之间2—4%的差额为人口爆炸提供了先决条件。像世界的南方地区一样，已有的现代化的先进医疗条件使苏联南方

的死亡率下降。这在历史上类似于抗菌素的发明，几乎在发明抗菌素的同时，人类的寿命也开始迅速延长。

由于受到外部力量的诱发，人口爆炸并未以基于个人生命价值新态度的行为变化为先导。事实上，相应一代儿童素质的提高并未额外增加父母的负担，因为营养水平、医疗保健以及卫生条件都大大地改善了。妇女在非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机制也引入了穆斯林民族。这些因素使生育间隔从36个月缩短到30个月，因而人口自然出生率实际上提高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人口自然出生率，格鲁吉亚估计为9.000，中亚（包括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为9.144，70年代中期，增至10.023。

在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出现出生率升高这种现象业已成为历史上和现代世界人口发展的特点。例如，扎伊尔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然而，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出生率问题上的行为变化与其他多数不发达国家中所出现的死亡率降低并不一致。在苏联的东南部地区，津贴和两代人之间的转让很少，或没有激发人们以优育代替多生。外援和福利殖民主义导致了世界人口爆炸、饥饿和持续的贫穷。很难预料苏联将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和新的粮食—人口冲突，但这种势头正在形成。

## 平均寿命的不同与死亡率的不同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几十年高死亡率的后果逐渐消失，估计平均寿命逐步恢复到与苏联生活条件相适应的较低值（见表三）。许多因素也导致了不同年龄的人，特别是男人死亡率的提高。这两种趋势自60年代中期以来导致了和平时各民族（亚美尼亚人除外）估计平均寿命的缩短，这是前所未有的（见表三）。

**表三 各民族估计寿命表**

	1958—1960	1969—1970	1978—1979
俄罗斯	67.50	68.64	65.90
乌克兰	68.40	70.16	68.57
白俄罗斯	69.10	71.35	69.94
立陶宛	70.30	70.65	70.20
拉脱维亚	73.10	71.20	71.41
爱沙尼亚	72.80	70.73	71.14
摩尔达维亚	67.90	68.88	64.68
格鲁吉亚	71.20	70.98	70.85
亚美尼亚	69.40	72.74	72.80
乌兹别克	62.40	71.22	69.94
塔吉克	63.30	69.67	67.07
哈萨克	63.70	71.35	69.51
阿塞拜疆	64.80	67.90	67.70
吉尔吉斯	65.20	68.36	68.06
土库曼	61.90	67.73	66.44
苏联总平均	68.59	69.50	67.80

对毛死亡率和千人标准死亡率的研究亦得出与上述相同的结论。

近25年来，主要由于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及其他突厥—穆斯林民族的平均寿命显著提高，南北方的人口寿限趋于相同。另一方面，至70年代末，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等民族的寿命下降到低于各自50年代的水平。1958—1960年，中亚人的估计寿命最低（土库曼61.9岁，乌兹别克62.4岁、塔吉克63.3岁、哈萨克63.7岁），1978—1979年，除土库曼外，中亚人都达到了苏联的平均水平，而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则成为寿命最低的民族（分别为65.9岁和64.7岁）。虽然自60年代后期以来，突厥—穆斯林民族已与典型的西方人口趋于相

同，而俄罗斯民族却背道而驰。

在苏联，男性估计寿命从1969—1971年的64.8岁，降至1980年的61.9岁。60年代和70年代，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男性估计寿命比苏联的平均水平低三岁。苏联人口男女估计寿命之差由1970年的9.8岁，增至1980年的11.6岁。而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中部地区早自1970年就已经发生。俄罗斯男性估计寿命如今可能不会超过60岁。人口的不断老化导致了北部所有区划单位毛死亡率的显著提高。成年男子死亡率的上升、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尤其是老年人死亡率的上升（除亚美尼亚人外）使毛死亡率不断上升。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俄罗斯联邦特定年龄死亡率增长得最快。除人口老化外，这一趋势显然是俄罗斯毛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人口老化对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尚未完全产生影响。将来的10年里，当人口老化完全发挥威力时，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将由目前的11%增到15%，人口负增长将始于90年代中期。

## 导致死亡率差异的因素

苏联各民族人口死亡率的差异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是年龄分布不同：北方诸民族人口老化，而突厥—穆斯林人口则越来越年轻化。1979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俄罗斯人口的12.9%，而在乌兹别克，这部分人只占其人口的6.9%。

第二个因素是医疗保健。按时间系列和按民族疆界是不能对这一因素作出有意义的评价的。人均医生和床位数都在增长：北部一直水平较高，而南部则在迅速提高，呈现出趋同的倾向。然而，医疗保健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这也并非苏联所特有的现象。亚美尼亚医务人员水平最低，按人口计算医院床位数

最少，但它却是全苏人口中寿命最长、死亡率最低的民族。俄罗斯联邦的情形则恰恰相反。

第三个因素是长期酗酒成性。男性劳动力中酗酒人数已由1925年的3.5%增至70年代末的37%。因为酗酒者的寿命比正常人要短得多：苏联1/3的酗酒者将直接死于饮酒过量的酒精中毒，17%的人死于由于酗酒而引起的工作事故或交通事故，因此，这一因素已经使本来很高的死亡率进一步升高。由于心血管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从1970年的3.8%升至1980—1981年的5.4%。苏联有关方面认为，这些人中有1/3死于饮酒过量。在20—24岁的男青年中，死于因饮酒引起的心血管疾病、酒精中毒及因饮酒而引起事故者占这个年龄段死亡人数的80%。根据特雷姆尔·达顿和费什巴赫的研究，与酒精有关的死亡人数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尤其是俄罗斯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

饮食上的差异也是导致死亡率差异的原因。根据苏联官方的报告，苏联人每日摄入的热量，1965年为2700卡，1975年为2944卡，1979年大约为3000卡（美国1972年为3380卡，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水平过高）。由于许多地方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因此80年代居民的热量摄入量下降了。蛋白质和维生素严重缺乏是苏联饮食结构的一大特色。甚至面包（仍占40%的热量摄入）中的植物蛋白近年来也已大幅度减少。而且，有证据表明，苏联官方有关粮食生产和人均消费量的数字水分太大。消费量通常以人均占有量为标准，工农业用粮实际上也被包括在人的消费中。据估计，畜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也有27%的水分。

在高蛋白和维生素产品的消费方面，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别非常大。在波罗的海地区，人均肉类消费量比苏联平均水平高40—45%，牛奶和黄油消费量比平均水平高30—50%，蛋类的消费量高于平均水平15—30%。在多数突厥—穆斯林地区，上述

产品的消费水平低于苏联平均水平30—45%，但是，中亚和外高加索居民的高维生素产品，尤其是水果的消费量比较大。两项指标综合而言，俄罗斯联邦居民的水平显然最低。这也可能是导致其高死亡率的因素之一。

## 人口出生率的差别

苏联北部地区的总人口出生率是全世界和人口史上最低者之一；而苏联东南部，特别是突厥—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的总人口出生率则是世界和人口史上最高的。70年代，苏联各民族的毛人口出生率拉脱维亚最低，为11.4‰；塔吉克最高，为42.8‰。70年代中期，总人口出生率俄罗斯仅为1.9，而塔吉克则为8.2（见表四）。在两种情况下，各自的比率皆约为1:4。至50年代末，苏联各民族人口出生率最低者和最高者的比率为1:3.5。由此可见，由于中亚地区人口出生率的增高和北部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两者之间的差别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就已经拉大了。

按现有的估计寿命，整个北方人口净再生产率现已低于替代水平（爱沙尼亚除外，其人口出生正好和替代水平相同）。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口具有特殊性，它们在低出生率的基础上趋向于稳定而非进一步下降。这可能是自留地面积扩大的结果，它带来了高于子女费用的收入。

仅仅从毛出生率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波罗的海各民族，尤其是拉脱维亚人的人口出生率在苏联最低。但从内在的出生率来看，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最低，生育控制率最高。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共和国和民族人口出生率差异的专门研究，及1979年人口普查关于各共和国和民族15岁以上育龄妇女子女数量差别的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



近20年来，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人口出生率迅速降至替代水平以下。从内在比率来看，白俄罗斯是苏联各主要民族中出生率第二个最低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急剧持续下降，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净人口再生产率一直很低(见表四)。

格鲁吉亚的人口出生率居中，现已降至替代水平。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的人口出生率仍比较适度，但几十年来，亚美尼亚人正处于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时代，原来平均一名妇女生育5个子女，现已降至2.4个。其人口再生产率在20年间降低了一半，从特定年龄相对婚姻出生率来看，他们的生育控制指数全国最高。

50年代后期，哈萨克人的自然人口出生率在苏联最高，平均每名妇女生育7个孩子。经过20年急剧持续下降之后，哈萨克的总人口出生率下降为4.8，其净人口再生产率下降为2.2——这一比率仍然很高，高出北方两倍。阿塞拜疆的总人口出生率也已经历了持续但却缓慢的下降，由6.0降至3.8。上述两个民族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业已减慢，这可能是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其他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突厥—穆斯林民族未来发展趋势的先兆。

60年代中期以来，中亚4个民族(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生育控制水平得到稳步提高。自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总人口出生率下降上。然而，其总人口出生率仍然很高，在6.0—7.3之间，其相应的人口净再生产率在2.7—3.3之间。所有突厥—穆斯林民族的毛出生率仍高出现有死亡率水平条件下欧美或俄罗斯人口模式人口出生率的1—1.5倍。

**表四 各民族总人口出生率（总）及净人口再生产率（净）**

	1958—1959		1967—1968		1976—1977		1980—1981	
	总	净	总	净	总	净	总	净
俄罗斯	2.522	1.130	1.918	0.883	1.889	0.860	1.820	0.821
乌克兰	2.343	1.059	2.059	0.956	2.029	0.938	1.975	0.909
白俄罗斯	2.706	1.235	2.155	1.009	2.038	0.948	1.959	0.906
立陶宛	2.750	1.265	2.346	1.100	2.262	1.052	2.068	0.957
拉脱维亚	2.117	0.988	1.985	0.933	2.086	0.975	2.062	0.960
爱沙尼亚	2.069	0.965	2.111	0.992	2.228	1.041	2.157	1.004
摩尔达维亚	3.904	1.765	2.978	1.373	2.686	1.206	2.625	1.163
格鲁吉亚	2.545	1.181	2.494	1.171	2.410	1.126	2.214	1.031
亚美尼亚	4.876	2.225	3.656	1.720	2.800	1.336	2.411	1.154
乌兹别克	7.275	3.102	7.642	3.478	7.379	3.432	6.467	2.992
塔吉克	6.044	2.611	7.592	2.527	7.972	3.638	7.282	3.290
哈萨克	7.350	3.175	5.451	2.693	5.293	2.451	4.795	2.204
阿塞拜疆	5.965	2.610	5.875	2.693	4.555	2.102	3.846	1.771
吉尔吉斯	6.950	3.077	6.809	3.128	6.980	3.200	5.967	2.723
土库曼	6.533	2.785	7.645	3.463	7.228	3.285	6.274	2.840
苏联	2.848	1.288	2.416	1.122	2.394	1.099	2.278	1.039

资料来源：各共和国总人口出生率是根据《统计学通报》上特定年龄出生率的数据推算出来的，并根据少报人口作了调整。所得数据又根据本文描述的方法转换成民族的比率。总人口出生率根据中亚地区少报出生数字作了调整。注：总人口出生率指的是每个妇女在生育期内所生子女的数量。

## 导致人口出生率差异的人口变量

### 性别结构

苏联，特别是北方民族70年代持续增长的过高的男性死亡率

已经给苏联人口出生率造成了严重的压力。1979年，苏联0—50岁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大致相等，但在各民族中的分布很不平衡。1981年，俄罗斯联邦人口中男女比例为860:1000，中亚地区的比例为966:1000。由于中亚地区人口的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老年人中，由于年轻人中男性多于女性，那么，中亚地区育龄人口的性别平衡则意味着北方男性相对育龄妇女而言较为缺乏。

另外，俄罗斯人占绝对优势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受到苏联人所谓“有利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性别分布不平衡性的制约。他们在工业的一些部门中（如建筑、采矿、冶金、纺织等）建立起高度专业化的“男性城”和“女性城”。因为苏联的工人个人的收入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人们很少把配偶带到工作的地方或在工作的地方建立家庭。70年代，单性居住区扩大到俄罗斯联邦的某些农业地区。在农业劳动高度机械化的地方，小伙子很难找到姑娘，而当地的女青年则聚居在一些小城镇里，就业于各种工厂。因此，在评价苏联政府鼓励多生孩子的人口政策时，上述情况亦应考虑在内。

## 年 龄 结 构

年龄在15—49岁的女性比例在北方诸民族相对较高（因为南部人口中儿童所占比例较大），而年龄为20—29岁女性的比例南方较高。由于第一个原因，北部毛出生率的下降显然要慢于总人口出生率。然而，如同老龄化国家一样，第二个因素也非常之重要。大批在1960—1975年出生的突厥—穆斯林女性已逐渐进入主要生育年龄，育龄妇女的相对比例也将大大增加，这一因素是这些民族人口剧增的潜能。据苏联预测，至2000年，俄罗斯育龄女性只占全苏育龄女性的45%，生育的妇女只占整个生育妇女的30%。

## 婚姻与家庭

近来，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业已在发达福利国家人口中形成。结婚要求的迅速减弱导致了每个家庭孩子数量的减少。双方自愿的性交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业已作为婚姻的替代形式盛行起来。在美国，20—24岁的妇女中，已婚者的比例1960年为71.6%，1970年为64.2%，1975年为59.7%，1983年为44.5%。而在瑞典，其相应的数字为1959年44%，1970年40%，1980年28.1%。在拉脱维亚，1959年为42.4%，1970年为50.8%，1979年约为46.7%。尽管缺乏1979年的资料，但假如拉脱维亚的情况在俄罗斯联邦亦具有典型性的话，那么，根据1970年的婚姻一览表，俄罗斯20—24岁已婚妇女的比例已从1970年的55.5%，降至1979年的52.0%。

随着婚姻率的下降，北方各民族人口中私生子在近20年间激增。在俄罗斯联邦，每1000名15—49岁的未婚妇女中私生子的数量由1959年的14.4个，1970年增至32.2个。私生率（私生子与全部出生人数的比率）由1959年的7.3%上升到1970年的18.2%。斯拉夫和波罗的人口目前的私生率估计超过20%，高于美国。此外，从业妇女中私生率的急速上升肯定不是值得赞扬的现象，我认为这是苏联婴儿死亡率升高的最重要原因。

非欧洲式的或传统的婚姻模式（即20—24岁妇女已婚者占75—95%，45—49岁妇女中未婚者占1—3%），在50年代以前的中亚、哈萨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苏联东南部少数民族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但从那时起，婚姻逐渐走向欧洲化，只是欧洲化的速度在中亚4个民族中相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及一些外国人口（如朝鲜、摩洛哥、科威特）而言比较缓慢。

早婚现象的避免和初婚平均年龄推迟两岁（提高到19.8岁），

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实际上促进了中亚地区自然出生率的增长（以前13—16岁结婚实际上导致了生育能力的衰退和生育间隔的延长）。1979年人口普查总婚姻率和对几组早婚妇女的分析研究表明：突厥—穆斯林人口中的晚婚趋势缓慢向前发展。

近20年来，苏联的离婚率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家庭解体速度最快的国家。结果，离婚已成为影响出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报道，全苏离婚人口中有1/3是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采取的大都是分居的形式。还有1/3则是结婚1至5年的夫妻。而从分居到合法离婚之间的间隔估计约为2.9年。这一时期通常是妇女的主要生育期（20—29岁），而苏联离婚案一半以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从而使妇女的主要生育期缩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拉脱维亚的离婚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联邦亦赶了上来，离婚率业已超过爱沙尼亚。就千对夫妻的平均离婚率而言，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已远远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与西欧和美国不同的是，据报道苏联的再婚率极为低下，但这尚待进一步研究。苏联有关方面认为，这种离婚流行病是由于酗酒和婚外性行为造成的。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下述几种最根本的原因：（1）从婚姻中获得的好处减少（这是由于妇女就业和从孩子身上得到的益处减少而造成的）；（2）人们对适应于非人情化两代人之间转让的非婚姻关系的要求日益强烈。家庭作为一种私有机构业已被苏联人所谓的“国家细胞”所代替，尽管政府有各种支持家庭的政策。

## 人口出生率表和生育控制

70年代中期以前，生育控制的程度低，发展缓慢。通过对比研究民族与共和国特定年龄出生率及偏离自然出生率指数的增加

趋向，我们可清楚地看出：70年代后期，吉尔吉斯、土库曼的生育控制迅速加强；尽管乌兹别克、塔吉克的生育控制发展较慢，但亦有很大加强。自70年代中期以来，20—24岁的妇女生育率也有所下降，这导致了对近几年突厥—穆斯林民族与自然人口出生率偏离程度的某些估计不足。

同一时期，西南部所有民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等）以及哈萨克、阿塞拜疆（程度较弱而已）都经历过育龄妇女婚姻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和生育控制程度大大增强这一阶段。由于20—24岁妇女婚姻生育率在这些民族中仍较高，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与自然人口出生率偏离程度的指数最近甚至超过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相应的数字。

平均而言，斯拉夫民族30岁以上已婚妇女的生育率是波罗的民族的一半。因此，斯拉夫各民族的生育控制程度也相应地较高。斯拉夫民族35—39岁之间婚姻出生率和总出生率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的，婚姻出生率尤其如此：俄罗斯为19.9%，乌克兰为22.0%，而西德为25.5%，瑞典为32.5%。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的这一特征不可能是由于夫妻双方生育控制造成的，而是由于30岁以上妇女因连续使用刮宫术进行流产而引起的继发性不育症造成的。7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妇女经过人均5.95次流产之后（按保守的假设推算），有生育能力的只有52.9%。据苏联早在1968年的一份材料报道，俄罗斯联邦西北部各省中，约95.8%的妇女到33岁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同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工流产率最高。

主要生育期的缩短是苏联北部（及其他发达地区）生育模式的一大特色。在标准的自然生育中，只有42.4%的婴儿出生在母亲的主要生育期内（20—29岁）。在新的生育模式中，2/3至3/4的婴儿出生在这10年中：美国为62.5%，德国为65.4%，瑞典为67.0%，拉脱维亚为67.9%，俄罗斯为71.1%。

## 生育控制：流产与避孕

不管民族传统和发展水平如何，人口出生率从高到低的转变并没有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后期从流产到避孕的转变，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人口转变的特征。因此，夫妻双方的生育控制，除受到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限制之外，主要采取人工流产这一手段。制度性计划生育政策的缺乏为社会经济政策所补偿，从而使家庭成为“国家的细胞”，变相地控制了人类的繁衍行为，这是生育控制机构所做不到的。苏联的人口政策否认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因而对生育控制抱消极态度。同时，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妇女，都加入到劳动的队伍中，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即生孩子），控制个人，特别是妇女的社会自由。

结果，苏联政府对生育控制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然而，两个性质不同的变量构成了对生育控制的要求，它们是：①对避孕手段的要求；②对中止怀孕手段的要求。国家理论家（他们对提供非法流产的市场力量持怀疑态度）认为，后一需求似乎更易于控制和转化利用。因此，在国家控制医疗服务的条件下，流产自由相对提供避孕、流产和商品竞争信息的自由市场而言，实际上是不自由的、非人道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生育控制的需求可以以商品的形式（避孕药物）或以服务的形式（流产）来满足。而这两者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经济中都极为匮乏，而且质量低劣，但服务最需要的是劳动力和可重复使用的工具（如手术器械），并且这一要求比设计、生产、推销和散发避孕药具（消毒后可再使用的除外）更容易满足。社会化医疗保健制度下的流产比避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后者只是个人家庭内的行为。实际

上，这种以人工流产为主导的生育控制制度对国家而言是极为不合算的，妇女的工作时间受到影响，个人不付服务费用，而由国家统一规定价格的避孕药物则可为国家带来一些物质上的利益。这一例证证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偏好压倒了实际利益。

在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苏联，避孕药物普遍受到冷遇，这与多数落后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20世纪70年代世界生育连续调查的结果，在斐济和哥斯达黎加，15—49岁已婚妇女百分之百掌握了避孕知识；其相应的数字，菲律宾为95%，叙利亚和土耳其为90%。1976年，对莫斯科已婚妇女（其中40%为大学生，58%为医护辅助人员）的调查结果表明，80—90%的人没有明确的避孕知识，80%的人不知道有出售避孕药物的地方。

现在掌握的60、70年代关于避孕方法使用、避孕效果及流产的资料前后矛盾。例如，据报道，拉脱维亚78.8%—79.8%的已婚夫妇使用避孕药物，根据理论推断，其有效性为82.4%，而每名妇女在其生育期内的流产次数为3.0—4.3次。然而，如果避孕药物的使用情况和有效率如同报道的那样高的话，那么流产次数不会超过一次（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或按照不那么保守的估计，应不会超过2.4次。俄罗斯联邦的数据也同样矛盾百出。据报道，俄罗斯联邦60%以上的妇女使用避孕药物，有效率为70—80%，但每年的毛怀孕率超过5.5%，约90%的妇女流过产，其中6—16%的妇女一年内连续流产。既然2.25年内流2.5次产才能避一次孕，那么避孕的作用几乎等于零。据说，乌兹别克至少受到过初级大学教育的城市妇女中，有25%的人采取了避孕措施，但结婚不到10年，平均一个妇女要生4个孩子，3次人工流产。这也表明避孕的有效率几乎等于零。

事实上，苏联使用避孕方法的人中能够经常和恰当地使用的不足一半。不规律性增加了避孕失败的概率（使实际使用者减少了一半），使用不当亦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减少了实际有效性的



一半)。无论实际中使用哪种方法(避孕套、化学手段、避孕膜、体外射精等),都不能单纯地使用,而须与生物周期相结合。例如,体外射精并非在整个周期内都使用,而只用于危险期,按月经周期推断安全期的方法并非对具体人的科学估计,而是取周期的中数。即使在安全期前后偏差的几天时间里,人们亦不按生物周期的要求避免性交,而是采用其他避孕方法,其中最多用的是体外射精。苏联人的这一普遍做法是完全出于对性生活现实的无知。苏联官方有关避孕人数的统计数字完全没有说服力、无关主旨,因为它没有根据偶尔使用者的比例和复杂的失败的可能性作出修正。

总之,避孕的最后指数(经常、恰当、有效使用避孕药具的人数)非常之低。这是自然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知道避孕药具的存在之前不可能要求了解这些商品的性能及使用。避孕知识的缺乏限制了人们对避孕药具的选择,从而使人流成为完善的替代形式。

根据苏联公布的大量零星资料,可以肯定,人工流产近年来甚至在中亚突厥—穆斯林土著居民中广泛流传开来,但多数材料都低估了其程度和范围。这可能是由于非法流产的剧增而造成的,因为苏联的医疗条件差,合法流产的质量低,而且人们也不愿把这种事曝光(这一点在突厥—穆斯林妇女中尤为重要)。根据尚未证实的材料,在苏联的城市中,第一胎流产的妇女中有70%的是到非法机构作的人流,而在农村这一数字高达90%。60年代,俄罗斯联邦非法流产占总流产数的16%,而70年代,比率因地而异,低者为18%,高者为79%。因此,苏联官方关于人工流产的大部分资料毫无意义。

关于我们根据苏联人口出生率、避孕、医疗因素经过独立的数学计算得出的结果,参见表五。详细资料和推算方法另有专文探讨。人工流产与生育的比率因民族而异,塔吉克为0.137,乌兹别克为0.201,爱沙尼亚为1.220,拉脱维亚为1.404,乌克兰为2.481,俄罗斯为3.206,全苏总平均为2.044。妇女平均作人

表五 1969—1980年某些民族出生率及生育控制表

	年份	总出生率	婚姻比例	婚姻出生率	避孕指数	继发性不育症患者比例	总流产率*	流产与生育的比率
俄罗斯	1975—1979	1.858	0.571	3.250	0.125	0.207	5.950	3.206
乌克兰	1969—1979	2.063	0.594	3.473	0.210	0.174	5.118	2.481
白俄罗斯	1969—1979	2.107	0.575	3.664	0.190	0.172	5.056	2.400
立陶宛	1969—1979	2.301	0.539	4.269	0.298	0.115	3.518	1.529
拉脱维亚	1969—1979	2.152	0.516	4.171	0.352	0.097	3.021	1.404
爱沙尼亚	1969—1979	2.261	0.504	4.486	0.360	0.088	2.759	1.220
摩尔达维亚	1969—1979	2.734	0.601	4.564	0.105	0.186	5.420	1.976
格鲁吉亚	1969—1979	2.437	0.563	4.329	0.220	0.143	4.273	1.753
亚美尼亚	1969—1979	2.898	0.625	4.637	0.140	0.178	5.195	1.793
乌兹别克	1969—1979	7.381	0.804	9.180	0.050	0.045	1.486	0.201
塔吉克	1969—1979	7.866	0.832	9.454	0.040	0.032	1.076	0.137
哈萨克	1969—1979	5.298	0.689	7.689	0.093	0.097	3.033	0.572
阿塞拜疆	1969—1979	4.677	0.696	6.720	0.100	0.136	4.083	0.875
吉尔吉斯	1969—1979	6.858	0.779	8.804	0.080	0.059	1.920	0.280
土库曼	1969—1979	7.228	0.808	8.946	0.060	0.057	1.843	0.255
苏联	1969—1979	2.399	0.570	4.209	0.164	0.167	4.903	2.044

\* 总流产率指平均每个妇女流产的次数。

流手术的次数，塔吉克为1.076次，乌兹别克为1.486次，土库曼为1.920次，哈萨克为3.033次，阿塞拜疆为4.083次，格鲁吉亚为4.273次，亚美尼亚为5.195次，爱沙尼亚为2.759次，拉脱维亚为3.021次，立陶宛为3.518次，白俄罗斯为5.056次，乌克兰为5.118次，俄罗斯为5.95次。

## 生理后果

普遍使用（或滥用）的生物节律与体外射精联合避孕方法具有恶劣的生理后果。因为采用这两种方法一旦失败，非常受孕的可能性则更大。反过来，这又导致了自然流产率的上升（至少上升25%）和胚胎染色体畸形，特别是会导致婴儿精神疾病。70年代早期，苏联有关研究表明，第一代及遗传性染色体畸形的新生儿增加了，乌克兰的情形尤其如此。这一因素导致了婴儿死亡率的上升（染色体畸形的婴儿中一年内死亡者占53%）。这种遗传性破坏作用对那些避孕比例相对较高，但使用不经常及使用不当者较高的斯拉夫民族的影响特别大。此外，自然流产比例的增加引起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从而限制了人类繁衍的潜能。

苏联研究者认为，苏联妇女超量、危险的工作也导致了头胎不育和二胎不育症的超常发病率。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化工生产及其他非技术性工作的妇女头胎不育率特别高。二胎不育多产生于那些从事建筑、制造、金属加工、木材及纺织行业工作的妇女。但，从就业趋势来看，妇女从事重体力、危险性职业的比例越来越高。男性转向高技术工作时，妇女取代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81年1月，苏联颁布法令，禁止妇女从事460种繁重的危险工作，但实施这一法令则需要用10多年的时间。就业于这些部门的多数仍是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的妇女。

对流产的过量需求加重了苏联医疗卫生设施的负荷。因为人

工流产要有3天的住院治疗时间，加上70年代俄罗斯联邦的流产率较高，仅流产一项就需要305000张病床，但妇科病床总共只有213000张，其中一些还要用于其他患者，如生孩子的、患其他并发症的等等。俄罗斯联邦的医院从设备、服务及器材方面仅能满足一半的需求。对此，人们怨声载道，据官方报道，这是非法流产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使用的对妇女以后生育没有危险的现代人工流产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尚未被采纳。苏联的报道中很少提到可防止继发性不育症、无害的真空吸出法，显然多数人工流产都是用刮宫的方式完成的。

除引起不育症外，多次刮宫加上性病、危险的工作、营养不良等因素，会导致自然流产、子宫萎缩和宫外孕发病率增高。这些并发症虽不会直接引起不孕症，但会使妇女生育发生障碍。高出平均水平的自然不育和自然流产等妨碍生育的各种复杂因素被定义为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表五是我们对各民族这种情形的推算结果。70年代，俄罗斯育龄妇女中有20.7%的人患有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其他民族中患此症者的比例为：摩尔达维亚18.6%，亚美尼亚17.8%，乌克兰17.4%，白俄罗斯17.2%，阿塞拜疆13.6%，拉脱维亚、哈萨克9.7%，爱沙尼亚8.8%，吉尔吉斯5.9%，乌兹别克4.5%，塔吉克3.2%。

尽管突厥—穆斯林各民族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可能会逐渐减弱，但要提高俄罗斯人的繁衍能力需要用避孕代替流产，或废除刮宫流产法及减少妇女就业。这种变化不可能期待得到。这需要改变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

## 经济变革与出生率下降

### 城乡人口出生率的差别

在本世纪最后的25年间，除传统的俄罗斯北部地区和俄罗斯

联邦中心地区外，所有区划单位的人口出生率，在生育力强的民族中城乡差别小，在生育力弱的民族中城乡差别大。这种模式是多数国家人口（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墨西哥、印度、叙利亚、加纳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特征。70年代，日本、英格兰、威尔士、芬兰、法国、卢森堡、挪威和白俄罗斯的总人口出生率城乡无甚差别。事实上，70年代中期，日本和白俄罗斯在农村人口出生率低于城市人口出生率，其比率分别为63.4：65.4，54.6：62.3。

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对俄罗斯联邦人工流产的大量抽样调查发现，城乡妇女平均流产次数几乎相同（城市平均为1.16次，农村为1.15次）。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业已实现，苏联人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这仅局限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

## 收入分配

收入、生活水平、税收、公共福利和财富再分配与人口繁衍及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经济人口统计学上最复杂的课题之一。收入对人口出生率是具有积极影响，抑或是具有消极影响，这是自30年代以来在苏联经济和人口统计文献中颇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目前苏联人之所以对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政策效应表示怀疑，是因为他们缺乏家庭微观经济效用理论。

然而，这一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苏联人。收入的增长对发达的、人口出生率低的北方和对发展中、人口出生率高的南方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前者为纯收入影响，后者为替代影响。但，甚至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也受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挑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20年来，苏联各地的工资和家庭收入均有较大增长。但，这并没有阻止同一时期所有低生育率各民族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收入的增加并未改变下降的出生率，肯定有其他强有力的因素抵消了收入增加对人口出生趋势的积极影响。中亚和外高加索各突厥—穆斯林共和国的情形亦如是。但是，中亚地区的各种发展补贴，尤其是教育补贴和社会流动补贴，与收入变化一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这些补贴使预期的孩子的质量高于传统的生活水平，使人口出生率保持高水平上；另一方面，中亚社会中家庭间的各种转让计划，例如，集体农庄的社会保障等，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每个家庭子女的数量减少了。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谈到。

## 住 房

对于人口出生率低的苏联北方各民族而言，人均住房面积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着极强的对应关系。本世纪最后25年间，人均住房面积在所有共和国中均有所增加，尽管速度比较缓慢。与此相对应，这种趋势本应带来北方人口出生率的提高。然而，期望得到的住房面积和实际居住面积之间的差距严重地阻碍了人口出生率的增长。这一差距相对期望的生活水平而言增加了孩子的费用。1922年，苏联规定，人均住房9平方米为“生物满足水平”，然而至1982年这一目标仍未达到。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差别与他们人口出生率的差异及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相对应（见表四）。

在人口繁殖力较强的突厥—穆斯林各共和国中，住房面积对人口出生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可以从哈萨克共和国的资料中看得出来，并可据此推断中亚其他共和国的情况。然而，住房的类型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突厥—穆斯林诸共和国中，70年代，

有30%—40%的城市住房和所有农村住房实际上属私人所有。之所以能拥有私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提高中亚地区农业产品的价格带来的结果。

北方住房在面积上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南方的私人住房则继续享受补贴，这一过程对出生率的提高应是一种刺激。苏联各民族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再次说明，其他因素业已抵消了住房对子女质量与数量的影响。

## 妇女就业

妇女就业率的日益提高反映出两种行为偏好，一是希望得到较高的家庭收入，这对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因为这提高了家庭对孩子的负担能力；二是为了寻求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立，这显示了妇女对家庭和子女依赖程度的减弱，因而对人口出生率有消极作用。从理论上讲，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对人口出生率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这对人口出生率只有消极作用。

苏联人口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妇女就业相当普遍。俄罗斯联邦16—54岁妇女的就业率，1960年为66.7%，1975年增至86.1%。有关妇女就业的大部分资料是各共和国的资料，不能完全反映出各民族妇女就业情况的差别。例如，土库曼加盟共和国1970年16—54岁妇女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率为44.8%，而土库曼土著妇女的就业率只有21.5%。总之，突厥—穆斯林民族人口中，就业年龄妇女在非集体农场的全日就业率约为25%，而在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人口中，其比率约为85%。后一数字表明，苏联北方人口中几乎所有的育龄妇女都有工作，而正是这些工作使妇女从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

70年代和80年代，妇女就业和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复

杂。60年代与70年代初，苏联北方妇女就业率的迅速提高显然引起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低于替代水平）已不能再归因于妇女就业的影响，因为妇女业已普遍就业。然而，过高的妇女就业的负作用，比如，作为一种机构的家庭的根本性变化，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妇女就业趋势而言，中亚的情况特别引人注目。60年代，中亚各共和国中妇女在非集体农庄部门就业的人数迅速增加（如，乌兹别克共和国妇女就业率，1959年为29.8%，1970年增至43.6%）。但是，至70年代，这一趋势停止了。尽管70年代就业年龄妇女的供求都大大增加，但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妇女的就业率只增加了2—3%。事实上，甚至这种较小的增长也是以前增长的一部分，这可能是由于非土著妇女就业的增加和妇女在集体农庄中就业的下降造成的。

60年代，中亚妇女在非集体农庄部门就业率的迅速提高对人口具有积极作用。由于20—29岁新就业的妇女较早地给孩子断了奶，生育间隔的时间缩短了，生育间隔的缩短又使特定年龄出生率大大提高。增加的数字高于35—49岁妇女节育造成的人口减少的数字。结果，总人口出生率实际上增加了，达到世界上生育率的最高水平。然而，尽管70年代妇女就业率下降，但由于生育控制开始普及，人口出生率亦显下降趋势。

## 当代的趋势与未来的估计

长远预测的主要目的是用数字结果来阐释理论假设和技术程序，而这些假设则以我们对当代趋势及其原因的理解（或曲解）为依据。长远预测的效用常引起争议，但对这些预测的需求量仍



然很大，尤其是金融机构和政府更需要大量准确的预测。我们的预测是根据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预测模型、运用苏联民族资料而做出的。

根据模型我们预测，苏联高生育力的突厥—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最终会发生负增长（尽管是在遥远的将来，即21世纪人口持续爆炸之后）。生育控制的增长、特定年龄出生率的下降、估计寿命的缩短以及由此产生的净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所有这些趋势都证实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见表四）。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突厥—穆斯林民族人口正在增长和人口出生势头方面仅仅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已，而非真正的负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因素的扩大对突厥—穆斯林人口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实我们提出的人口将出现下降趋势的预测。

第二个引起争论的预测是，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人口将以大大高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速度迅速减少。斯拉夫民族的估计寿命相对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言正在缩短，人口正增长的势头逐渐消失，年龄分布尚未对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口的毛死亡率的上升和毛出生率下降发挥其全部影响作用，但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消除了城乡出生率的差异，是苏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民族人口所特有的现象，使它们成为最发达福利国家的人口类型。等于或略低于替代水平的总人口出生率是波罗的海人口的典型特征。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总出生率正在迅速下降，低于替代水平，而其净人口再生产率则下降得更快。

在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条件下，苏联的生育控制（我认为这是另一个持久的因素）不会大幅度地降低斯拉夫特别是俄罗斯人口现今人工流产和继发性不育症的比率。几十年来，流产方法完全

没有改善，亦未采用有效的避孕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人口政策的框架内，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将来亦不会有什么改观。波罗的海人口，由于个人具有使用完全控制生育方法的要求，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某些进步。然而，就继发性不育症的指数而言，俄罗斯人还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流产与生育的比率稳定增长。

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北部人口的减少速度可能比西方福利国家要快，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家庭事务的干预对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人口出生率表内人口结构因素对这种趋势也产生了影响作用。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时，晚育（现在欧美已成为特定年龄人口出生率表中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实际上减缓了负增长的加速度。用阿瑟的话说，“这种从表面上看自相矛盾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因为晚育意味着下一代到来时间的推迟。由于新一代小于老一代，数量的减少亦发生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因此下降的速度不会很快。”部分地由于用刮宫的方法进行流产会导致病理性继发性不育症，后期特定年龄人口出生率稳定迅速下降是苏联北方人口，特别是俄罗斯人口的特征。在这种条件下，人口负增长速度可能会加速。

西方学者和新闻媒介业已开始注意到苏联旨在通过向生育一胎、二胎和二胎的妇女发放一定数目补助金（分别为50、100、200卢布）提高北方人口出生率的措施。1981年，苏联政府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允许在职母亲歇一年的产假。但，正如麦金太尔所言，这些措施并没有扭转北方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只相当于收入20%的少量补助金并没有考虑到北方的高生活费用和南方的各种补贴。因此，大部分现金流动都集中于南方，而南方即使没有补助（南方的产妇补助制度延长了两年之后，于198<sup>3</sup>年底才取消），其人口出生率也很高。

同时，国家预算中儿童保健设施的支出分配仍对俄罗斯极为不利。1979年，苏联每年用于儿童保健的费用平均为328卢布，

其中乌兹别克共和国为228卢布，乌克兰为219卢布，俄罗斯联邦为182卢布。这项政策是抑制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的另外一个因素。

从短期来看，鼓励生育的少量补助和就业照顾给北方某些人带来了边际利益。对那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而言，这些边际利益可能会超过家庭经济中的边际花费。这将有利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而从经济上看，这些家庭早就希望再有一个孩子。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措施只是将生育时间提前了而已。从眼前来看，这将提高人口总出生率，但却不能改变整体的累加出生率。鼓励生育的补助措施和就业照顾将促使私生子的增加，这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结果。强烈要求至少有一个孩子的独身妇女从新政策中获益最大。收入开始低于孩子的花费时，这些较小的出生率变化将逐渐消失。

所有这些人口、经济、政策的现象表明：苏联的民族构成将在下个世纪发生重大变化。至2080年，7个主要突厥—穆斯林民族（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卡拉卡尔帕克）的人口将达到1.329亿，占苏联总人口的41.8%；3个斯拉夫民族的人口将降至1.302亿，占苏联总人口的41.0%。至2050年，斯拉夫民族的总人口将不再是苏联人口的多数，整个北方的人口将勉强为多数。1984年，俄罗斯人口业已失去其多数地位，至1995年，俄罗斯人口将开始负增长。至2025年，乌兹别克将超过乌克兰，成为苏联第二大民族；而到22世纪初，乌兹别克将成为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俄罗斯降为占人口总数第二位的民族（其人口分别为7580万和6490万）。至2080年，苏联将成为一个突厥—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俄罗斯人口将从1984年的1.388亿下降到2000年的1.367亿，2025年的1.283亿，2050年的1.072亿，2080年8480万和2100年的6490万，（即在100—120年的时间内，它将不再是世界主要的人口群体）。如果这一趋势继

续下去的话，至2200年，俄罗斯人口将降至2300万。

只要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假设仍然成立，那么，这些结论亦成立。人们或许仍记得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的预言：共产主义革命给俄罗斯所带来的结果与野蛮征服给古罗马带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彭斯格勒说，22世纪将没有俄罗斯人，就像17世纪不再有罗马人一样。

## 讨 论

对苏联决策者而言，主要的人口和经济问题与南北人口增长的差异有关。然而，对经济人口学家而言，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北方的人口出生率低于替代水平，和如何在中亚土著民族中推行节育政策。

### 中亚的人口膨胀

如前所述，中亚的人口转变已脱离了传统的轨道。中亚人并没有接受通常被认为是夫妻双方节育措施的前提或伴随物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他们没有经历被认为是与人口转变相一致的内在的社会习惯变化。在中亚，人口控制的开始及仍很高的人口净增长率是由于增加补贴和家庭间转让（主要以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形式）的抵消作用而造成的。

这种混合的变化影响了中亚的人口生育趋势。在哈萨克，50年代垦荒计划的副产品——国营农场扩大了，当地许多家庭被置于向国营农场工人支付几代人的社会福利金的体系中。结果，早在50年代末，哈萨克人口开始转变，而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和

吉尔吉斯的人口在15年之后才开始转变。但，另一方面，中亚的自留地则有助于保持高出生率。然而，这种情形在阿塞拜疆没有发生，那里自留地的农业生产只有哈萨克的一半。

据估计，70年代，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有60%的人口是集体农庄成员，对他们而言，这一时期唯一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革是集体农庄的农民亦得到了社会福利津贴。1964年，苏联颁布了第一个有关集体农庄庄员享受社会福利津贴的法律，它规定，集体农庄庄员可得到相当于先前收入50%的退休金，金额从每月12卢布至102卢布不等。然而，70年代后期，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平均退休金为每月22卢布。当时，苏联人均最低生活水准为每月51.4—59.4卢布。苏联，特别是中亚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仍主要来源于自留地。1964年的法律没有改变中亚的经济和人口变量，对人口出生率亦无多大影响。

1971年，集体农庄庄员的平均退休金提高到每月20卢布。此外，退休金按用于国家职工的可调比例计算。至1974年，集体农庄庄员的平均退休金为每月33卢布。这仍低于人均最低生活水平的36—44%。但，1974年的变化对中亚的人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由于家庭规模大，中亚各共和国的人均个人名义收入向来低于苏联平均水平（1960年人均收入为每月30卢布，1970年为每月45—49卢布）。因此，70年代中期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至少相当于60年代的平均收入，加上自留地的收入，他们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的总和高于当地70年代人均生活水平。这种发展恰好与中亚地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步。

同时，农村家庭对自留地的依赖性加强了。家庭成员，包括子女，是自留地的主要劳力（雇佣劳动力实际上并不存在，法律亦不允许）。苏联产品匮乏，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的黑市价格。对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个体生产的限制不同，实际上是对中亚从事私有农业生产那部分人口的变相补贴。由于国家预算对教育和医疗

实行了补贴，发展中地区抚养孩子的费用降低了，因此，孩子带来的边际利益超过了个人边际花费。这有利于保持高出生率，却无益于人口控制的发展。

赖德和考德威尔提出了几代人间的转让由积极到消极的转变〔据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中禁止雇佣童工，加上昂贵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包括教育）的蔓延，抚养子女的费用增加，这是转变的根源。〕会限制出生率这一当代的著名假说。但，中亚人口的转变以数字批判了这种理论。就中亚而言，社会福利和公共教育因其父母及转让周期的原因开始影响儿童的质量之后，尽管自留地扩大了，加之使用童工有利可图，尽管医疗保健和教育补贴降低了孩子的费用，人口出生率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 苏联北方的非替代人口出生率

自6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北方人口出生率与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趋同迫使我们对于苏联与非苏联人口持久的低于替代水平的出生率作出解释。把人口出生率下降完全归因于苏联的特殊情况，认为住房相对拥挤、收入水平低、人工流产合法化过早、妇女就业率过高、酗酒成风等因素会导致出生率降低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些因素可用以解释苏联各民族人口出生趋势的某些差异，但却不能解释这些趋势本身，即非替代性人口出生率。

由于苏联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生活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微观单位（家庭与子女）与宏观实体（市场和制度）之间关系上迥然而异，若要做出综合、全面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应当看到，在谈到苏联北方人口的同时，把它与其他低出生率的人口作一比较会有益处。苏联和非苏联社会经济变量的比较至少有助于弄清什么因素没有引起发达国家当代的人口下降。例如，苏联北方人口估计寿命的缩短和特定年龄死亡率

的上升表明：其他发达国家非替代人口出生率与这些统计资料的进一步完善没有什么关系。

西方时常讨论的导致人口低出生率的因素不适合苏联的情形。这些因素包括避孕革命和相对男性而言妇女工资的提高。然而，如果女性的工资趋势与男性的工资趋势无关，而只与女性家庭活动的价值趋向有关的话，我们可以再次强调一下后者（这是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的支柱之一）的作用。如果家庭活动的价值降低，或者相对于女性的工资而言没有提高的话，那么家庭生产中妇女边际产品的价值就低于市场工资，由于生孩子而造成的机会损失的代价可能高于妇女再生产行为带来的好处。

导致西方非替代人口出生率的其他重要因素在人口出生率高于替代水平的几十年里（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一直存在于苏联北方人口中。这包括妇女的高就业率（育龄妇女就业人数占育龄妇女总人数的2/3至3/4，高于非替代人口出生率的任何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丹麦、芬兰、瑞典最近的情况除外）。男女地位平等，亦为其中因素之一。教育费用不断增长的现象在高出生率时期也产生过，因为在30年代子女上高中、大学需要交学费。

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在与当代世界生育趋势的关系中无关紧要。它们不仅是主要原因，而且同时也是选择变量。这些变量与非替代人口出生率都是由真正的内源变量而引起的。

强调这些因素或许非常有益，因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低于替代水平的人口之间才产生了差异，但却不是导致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①死亡率进一步下降；②避孕革命；③城市化的日益发展；④男女作用平等和妇女地位的提高；⑤妇女的自我提高；⑥与男性工资相比妇女工资的提高；⑦妇女就业率的提高；⑧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⑨教育费用的增加；⑩资本主义及其富有；⑪社会主义及其贫困；⑫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⑬集体主义的社会文

化。出生率的下降亦并非是由于时间价值的提高而造成的，这一因素在苏联经济及日本农村人口中并无重大意义。非替代人口出生率不能归因于整个的或相对的世俗化以及宗教生活的减少，这一因素不适合波兰、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情况。这当然也不能归因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削弱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日本，非替代人口出生率与扩大的家长制家庭和复合家庭并存。

苏联和日本的经验证明：目前的人口萧条不仅仅是内源人口出生周期的低谷。内源生育周期是生育总趋势之内的自生机制，其形态（时间、持续时间、程度、方向以及与低谷相对的高峰形态）受总趋势和外源变化的制约。70年代和80年代初，以前生育周期完全不同的发达国家在下降趋势上却出现了惊人的趋同。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人口萧条现象必须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特定民族的内源生育率周期的解释，尽管后者仍然是下降趋势的内在因素。

目前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出生率的周期假设（伊斯特林假设）赋予收入的相对减少以特殊的解释意义。根据这种解释，当代年轻父母的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相比相对较低，因而对其家庭具有依赖性。因此，和老一代相比，他们宁愿少生孩子。尽管伊斯特林假设具有说服力地解释了生育高峰这一现象，但经验的证据表明：70年代美国的相对收入实际上并未减少。就苏联北方人口而言，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上在1960—1983年间增长了1.6倍。

人们广泛争论的另一个影响目前人口下降的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自身的惯性和不可逆转性，或者无限的人口转变。根据早期的人口理论，转变被理解为一种净人口再生产率的自我平衡调节。这种理论没有解释趋于零人口再生产的人口出生率的无限下降，只解释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王国发展的再生产的调节作用。它是一种自足的人口模式，死亡率下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



的结果，但生育控制则绝对是内源的。这种解释符合生育率经济理论，认为对孩子的喜爱和需求是稳定的，对孩子质量的要求代替了数量要求。

然而，最近的转变理论认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人口统计学上讲是独立的，不受外在的节育技术的控制。这可能是由于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美、法早期人口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两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先于人口死亡率下降。根据这些解释，除避孕知识外，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经济变革毫无关系。然而，这些解释在解释当代人口下降方面与避孕革命理论毫无二致。上文谈到的苏联流产和避孕的历史状况并未证实这种理论。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用外在技术进行的人口转变的新模式可能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孩子，无限的生育率下降也只是一种假设。用考德威尔的话来说，“人口出生率是非理性的。”舒尔茨强调指出：“人口转变理论的极端解释不仅否认了在孩子需求方面最适宜平衡水平的可能性，而且完全置人类的选择权力于不顾。”

## 转让社会和人口下降

对非替代人口出生率的解释应从主要独立因素中寻找。这些因素对所有受其影响的人口而言都是共通的，同时对由父母选择所决定的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的最佳平衡有外在的影响作用。我发现，新型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唯一的这种因素。在这种制度下，国家通过强制的跨家庭和跨时期的财产转让手段向个人和家庭提供福利。

笔者认为，转让社会的大量成分，如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保健、公共教育等，往往都会降低出生率。应该强调指出，跨家庭、跨时期的财产转让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长期人口生育转变的继续，而

是边际的。低于替代水平的人口出生率逐渐代代降低，因为每一次转让都有一个部分抵销跨代补偿的机制。

强制的跨家庭、跨时期的财产转让比各种单纯的国家福利计划更为普遍，其中一些计划并不存在于所有出生率低于替代水平的人口中，例如，在苏联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式的福利项目，即失业救济和低收入家庭困难补贴。在日本，老年赡养费并不完全源自公共福利金，而且社会福利体系的资金来源于强行征来的个人所得税。苏联的公共教育经费并不来源于地方财产税，而是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和营业税（包括营业额和其他间接税收）。为了资助少数家庭成年人接受高等教育，多数家庭中儿童的消费水平降低了。

因此，苏联的公共智力投资并非是积极的人口因素，能够补偿威利斯模式中儿童的私人和社会边际费用之间的差额。此外，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与这种模式的论点大相径庭。根据这种模式，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不仅是跨代财产转让非感情化的结果，而且是领薪付税制度的结果。在所有社会福利中，子女的私人边际花费都超过对父母的私人边际利益。多生的孩子并未给父母增加很多社会福利金。同时，子女赡养父母的能力受到了强制财产转让（工资税，间接税，或者为自己的养老金进行的强制储蓄）的极大限制。

由于向年轻人强制课征社会福利税（无论是为自己将来养老，还是为目前的退休者提供资金），其父母不得不增加向下一代的个人转让，延长转让的周期，以帮助子女生育、抚养孙子。这是转让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这样，对子女而言，儿童的私人边际花费有所增加，或勉强等于私人边际利益。

同样，在公共教育体制中，年轻父母必须负担其他家庭大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小孩子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通常低于大孩子，公共教育可以被看成是年轻父母向年长父母的收入转让。可

以说，即使对那些最终以自己子女公共教育的形式得到补偿的家庭而言，他们也在生命周期内最宝贵的时间进行了非自愿的转让。社会福利和公费教育也可能削弱父母对子女花费分配的控制及对子女质量的控制（除非个人在教育以及诸如此类事情上的意愿与政府的一样）。

尽管儿童在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功能已经失去，但跨代相互抚养的不成文契约却依然存在。因此，作为一种意外保险（即养老送终），儿童的投资功能仍然存在。随着跨家庭、跨时期财产转让的出现，这些关系削弱了。

整个生命周期内跨代互惠具有超出经济交换的价值。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说，父母从子孙身上估价骨脉延续及性格延续的前景。社会福利和公费抚养子女降低了这一因素的作用，并要求父母增加保证子女质量的费用。于是产生了以质量代替数量的情形。家庭和社会对孩子的分割可能会导致孩子与其他功利的交换，因为从个人价值极大化（如教育、职业等）来看，这些功利能够体现更高的个人价值。以质替量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模糊的利他主义行为：父母不愿生出以他们的观点来看不理想的孩子。为保证子女的相对质量，父母在低于平均生育水平时便停止生育，以此作为对各种非自愿跨家庭、跨时期财产转让的反应。当相对需求而言期望的机会和利益不再增加时，每个孩子的额外花费必定引起对这种变化的补偿。

在转让社会里，孩子仍然是由家庭私人生产的公有产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条件下的生产一直不够理想。如果生产得到补贴，生产将大大高于社会要求的水平（例如：中亚的情况及美国福利接受者中私生子的数字）。如果受到纯税收的制约，出生率将低于替代水平。

依赖率，即纯消费者（按苏联的经济分类，指1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纯生产者（15—59岁的在业人口）的

比率，随着出生率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以加速度迅速升高。人口出生率低于替代水平越多，人口总依赖性的增长就越快。这种增长越快，强制性跨家庭转让就越多，从而使人口再生产进一步受到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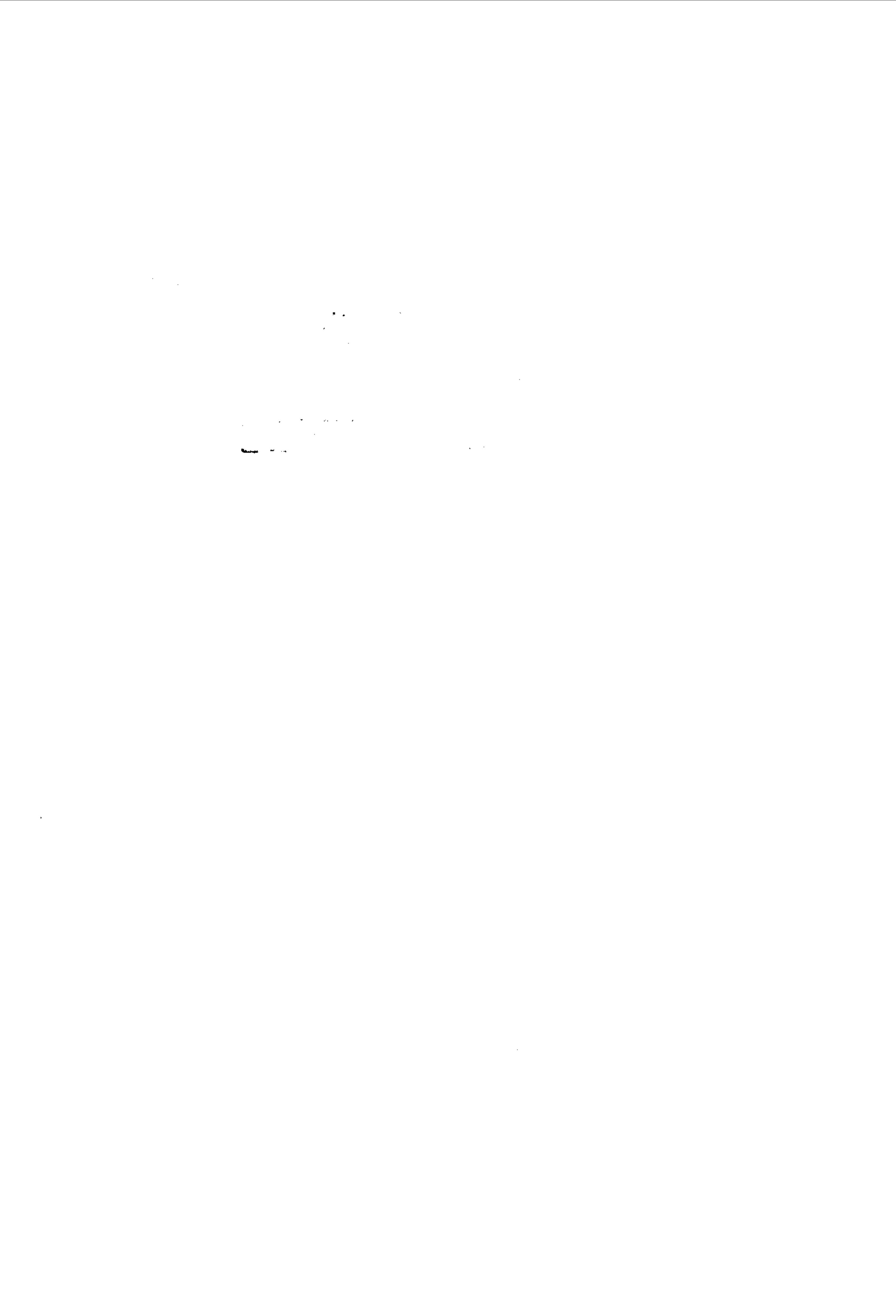
在有社会福利和公费教育的情况下，青年人同时还要供养他们的前辈（或者就日本而言，他们自己，未来的退休者），为其他青年人进行智力投资，并负担孩子的养育费。这是跨代转让自然周期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有关文献的关注。在自然条件下，40—65岁收入较高的人既须赡养其父母，又必须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储蓄资金，他们承担了老年保险费用的全部花费。在这个年龄段内，人们还须承担子女教育费用的大部分。在当代转让社会里，这种费用的大部分都花在年轻父母身上及其子女的消费上。

然而，假如跨代互惠转让继续下去，将会出现浮动转让现象。中、老年人要补偿其子女，从而对社会福利和公费教育产生一种自我补偿机制。然而，问题在于，如果非替代性人口水平持续下去的话，祖父祖母必须负担5岁左右孙子的部分费用。

费用因时而异（从小孩到学生，从青年至中年），这意味着仅仅部分补偿将通过浮动转让实现。在非自愿转让和部分补偿这种连锁信式的模式中，年轻家庭的境况比老年家庭更坏，每一代人都不如上一代。由于花费的变化，所期望的孩子的质量一代不如一代。这反过来又使年轻父母以减少生育数量的方式来补偿孩子下降的质量。尽管浮动转让可以部分地抵消跨家庭、时代转让的反作用，但年轻父母将逐渐地减少生育。

## 第四部分

### 苏联各地区的民族问题



## 第十一章

### 乌克兰和俄罗斯

苏联是一个帝国的观点在今天已取得广泛的共识。许多作者认为，苏联的帝国特征不仅反映在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中，而且也反映在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中。乌克兰是如何适应这一整体的呢？在苏联这个框架内，其依附性有什么具体特征呢？

#### 俄罗斯必须与“乌克兰”联合

一个民族及领土与其他民族及领土的相互依赖关系有许多形式：即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依赖。在这些方面，乌克兰所面临的形势与形成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情形极其相似，它们都被置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之下。同时，由于乌克兰的人口、地理、经济和战略因素的作用，乌克兰的地位非同一般。简而言之，即没有乌克兰，苏联就不会成为超级大国。乌克兰人是苏联最大的非俄罗斯民族（共有4230万人，其中3650万居住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而且乌克兰共和国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中人口最多（达5000万人）。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是苏联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乌克兰最大的城市。在乌克兰，诸如此类的大城市还有：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敖德萨和顿涅茨克。乌克兰的工、农业潜力是众所周知的。乌克兰党组织不是苏共最强大的也算是最大的地区性力量，它的首脑通常在苏共政治局占有一席之地。在所有共和国中，只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及其附属结构的成员国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无论在世界舞台上它们的实际作用是多么的名不副实，但对某些乌克兰人来说，上述事实似乎确实有重大影响。就苏联与东欧的关系而论，毋庸置疑，乌克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方对乌克兰的研究极为深入，有关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人口统计的英文文献汗牛充栋，这是不足为怪的。

英国社会学家雅罗斯拉夫·克列伊奇和维捷斯拉夫·韦利明斯基认为，苏联是一个“控股公司的联邦”。他们指出，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很早就发现：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更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充分利用了“控股公司的原则”。即“在一个有许多子公司的母公司中持51%股份，其51%的股份会使帝国缔造者拥有更为有效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要比它实际的金融实力大得多”。

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认为，俄罗斯人在苏联贯彻了此项原则：俄罗斯人在母公司——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占多数，而俄罗斯联邦反过来又控制了苏联。再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支配性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从狭义上讲包括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及蒙古和阿富汗；从更广泛意义上讲，还包括古巴和越南，而后者与苏的关系更为松散。据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推算，1970年俄罗斯人占俄罗斯联邦人口的82.3%，居绝对支配地位。占苏联总人口的53.4%亦为多数。俄罗斯人占狭义的苏维埃集团人口的36.7%居少数，但若从广义上理解苏维埃集团，其比例则降至28.8%。但这一切并无损于其支配地位，“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非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71.2%，占苏联人口的46.6%，但谁是有效的操纵力量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一位名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最近发表的评论，与两位社会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一篇很有特点的题为《苏联世界大国的灾难性困境：新类型帝国的局限性》的文章中写道：

“苏联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大俄罗斯人支配着这个拥有2.7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苏联；而且他们通过国家政权和对苏联资源的占有，进而控制了一大批在地理上与之毗邻、人口达1.15亿的国家。实际上，1.35亿的大俄罗斯人从政治上控制了累积达3.85亿人口，占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

考虑到俄罗斯人只勉强构成了苏联人口的多数（1977年人口统计数字为52%），可以说俄罗斯人要想在数量上保持对苏联的控制（这种控制将影响它在整个苏维埃集团内保持控制地位的力量），那么乌克兰人在一定程度上亦包括白俄罗斯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学者都承认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著名的苏联政治地理学家V·V·波克希舍夫斯基称，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地区，如在中亚或波罗的海国家，扮演着俄罗斯人“旅伴”或“伙伴”的角色。美国学者约翰A·阿姆斯特朗把这两个民族视为俄罗斯人的“小弟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本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苏联民族政策主要的方向……要将小弟弟们（特别是乌克兰人）变成居支配地位的俄罗斯人不可分离的“小伙伴”。

自谢列斯特（1972年）倒台之后，苏联实行了乌克兰俄罗斯化的政策，这完全证实了阿姆斯特朗20年前所作的预言。对莫斯科而言，苏联穆斯林人口的大爆炸和波兰的政治及社会动乱再次

证实了与“乌克兰联合”的重要性。

## 乌克兰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关于乌克兰，尽管语言上的同化似乎是苏联政府的主要目标，但莫斯科明白：乌克兰和俄罗斯两民族语言的不同，不是乌克兰作为单独的政治实体而存在的唯一理由，甚至也许不是最根本的理由。西方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沃克·康纳认为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语言主要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莫斯科大概也同意他的观点，只是没有公开承认罢了。

如果真如此，那末是什么使得乌克兰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对任何一个像乌克兰一样能够成为自治体的集团（民族）而言，似乎过去的记忆和历史是这个集团必须具备的必要因素。卡尔·W·多伊奇已经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系统阐述了人类本能都能理解的东西，“从长远来看，自治取决于往昔的记忆。”一个自我驾驶的社会必须接受大量的信息，不仅包括过去的，而且也包括外部世界、自身及其部分的信息，必须“进行广泛的回忆和重组”。如果其中一条信息渠道被切断了，那末“社会就成为机械的东西……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

生活在西方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笑话和遗忘》中通过其中人物之口说出这样一段精辟的话：“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是抹掉它的记忆，毁掉它的书籍、文化和历史。然后让某个人写一部新书，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编纂一部新的历史。不久这个民族将开始忘却它过去和现在，它周围的世界将会遗忘得更快。”在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说：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是一场记忆同遗忘的较量”。

苏联政府利用其权力去阐述被置于它控制之下的各民族的历史

史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本文主要从苏联政治的角度探讨乌克兰的历史，换句话说，我要从特殊的但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角度——即从官方对历史控制的角度，去考察一下乌克兰在苏联帝国中的地位。在所有的现代帝国中，苏维埃制度的非常特别之处在于：它一直注重对历史思想的控制。而其他帝国的统治者则常常满足于控制其臣民的现在与未来，而不是过去；只满足于控制其躯体和物质资源，而不是他们的心灵和记忆。

历届俄国政府（这也适用于苏维埃政权以前的沙皇）对乌克兰历史问题的关注超过了仅仅控制乌克兰人的目标。正如我要显示的那样，事实上乌克兰的历史（也包括白俄罗斯的历史，可惜的是，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作深入探讨）与俄罗斯历史中的中心问题，即与俄罗斯民族特征这一更广泛的问题相关联。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把重点置于从表面上看是边缘性的或勉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之上，是正确的。

从摘录的多伊奇和昆德拉的文章中，我们很容易搞清楚苏联领导人在试图塑造乌克兰和其他被控制民族的历史意识的过程中，究竟在干些什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控制这些民族“过去”的信息，缩小乌克兰人“回忆和重组”的范围，以达到最终剥夺乌克兰人自我驾驶能力的目的。莫斯科已经剥夺了被俘虏民族对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现在它正试图抹掉这些民族的历史，而历史则被视为他们保持精神独立的仅存的一种因素。一旦他们把官方的历史观作为审视自身的框架，他们将失去其民族的特点，进而失去独立行动的能力。因此剥夺一个民族人民历史这样一种殖民主义要比掠夺一个民族的矿产，强加给它不平等贸易条款，解散其军队及行政机构，或在所有领导岗位上安插外国人这样的殖民主义更恶毒，更具有毁灭性。

在乌克兰历史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尤为激烈和残酷，究其原因有两种：第一，因为俄罗斯历史的概念和俄罗斯作为国家的概念与

乌克兰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并且乌克兰的历史实际上对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因此苏联的大国地位需要乌克兰依附于莫斯科。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国。在这方面，乌克兰根本不同于苏联的其他民族，正如它在1917年以前的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就根本不同于其他民族一样。对此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早在1911年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他说：“波兰人、亚美尼亚人、芬兰人的问题及其他问题都是表面的，即次要的问题”，但“乌克兰”的问题却在“它成为大国之初就对俄罗斯构成危害”。与乌克兰不同的是，“波兰、芬兰和其他邻国并不能使俄罗斯更加强大”。

敌视乌克兰为独立民族的观点并非反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专利。彼得·施特鲁韦这位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赞同萨文科的观点。施特鲁韦认为，乌克兰人的意图是企图实现俄罗斯族的空前大分裂，我深信：“这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名副其实的大灾难。边界问题与之相比变得微不足道。”他警告说：“如果白俄罗斯也追随乌克兰的话，俄罗斯文化已不是会出现两分支的问题，而是‘三支’”。

列宁似乎采取了与施特鲁韦相对立的立场，更不用说萨文科了。毕竟列宁已经承认了俄国所有民族，其中特别应包括乌克兰民族都有脱离权利在内的民族自决权力。但是，在1917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那时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否定了这种权利），由于列宁坚持帝国所有民族的工人，特别是乌克兰工人，必须有一个公开跨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当然即列宁的党），他做出的让步实际上被否定了。

列宁的立场与恩格斯在对待爱尔兰和社会党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恰恰相矛盾。恩格斯相信：如果波兰的社会党人加入统治被瓜分民族国家（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社会党，这样他们就是默认和接受了对波兰民族自由权利的否定。非常相似的是，

恩格斯认为，爱尔兰社会党人不应该成为更大的英国社会党组织的一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具有广泛的意义：“如果委员会要求波兰党承认彼得堡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要求普鲁士、波兰、北石勒苏益格、阿尔萨斯各支委屈服于柏林的联邦委员会，人们会说什么呢？然而对于爱尔兰而言所要求做的事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如果征服民族要求被征服的民族继续忘掉自己的民族和地位，‘消灭民族’差别等等，这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向他们说教，要他们屈服于枷锁。这正是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企图为征服者辩护并使其占领永久化。”

可以理解，无须恩格斯告诉这个道理，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领会了列宁的“国际主义”的内涵。有一位名叫列夫·卢尔凯维奇的乌克兰人曾以L·雷巴尔卡为笔名撰写文章，就这个问题向列宁发起挑战。回顾过去，笔者只得同意查尔斯·哈莱里的观点，认为，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沙皇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力图摧毁的社会）所赖以维持的原则。但是，列宁主义的立场并不是奠定在对意识形态的抽象考虑的基础之上。卡济米尔兹·凯勒斯·克劳兹是波兰主要民族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于1901年从伦敦向他的波兰同志报告说，伊斯克拉集团（他与之保持联系的集团）的俄罗斯社会党人都坚决反对建立独立的乌克兰社会党——尽管他们准备容忍波兰、芬兰甚至立陶宛党的存在。允许乌克兰建立自己的政党“将是政治自杀”。（正如我们上面所阐述的，这也是施特鲁韦和萨文科的观点。）

许多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政治独立持坚决否定态度，这不仅仅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造成的，亦即担心若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变得更加软弱。具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拒绝与俄罗斯民族一体化（这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现象所持有的观点），对此俄罗斯人的反应是敌对（甚至可以说是狂怒），因为俄罗斯人自己也未解决自身现代的民族性问题。在这方面，理查德·派普斯的观点

颇有启发性。他写道：若要理解苏联民族问题的特点有必要回顾一下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俄罗斯民族形成的特殊性。派普斯将西方和俄罗斯民族建立过程作了比较，指出：西方帝国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由于地理的原因，“欧洲帝国穿洋过海，向其他大陆扩张，因此，毋庸置疑，殖民地和宗主国在空间上被隔开了。总之，西方帝国的建立过程，亦即对其他众多民族吞并的过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讲，都始终不同于民族国家本身的建立过程。”

但是，这些过程在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它是沿着其领土边界进行扩张的。它逐步征服吸收了大量外部民族集团，以芬兰和突厥各民族为先导，最后还征服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民族。“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帝国的建立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是彼此衔接的，这混淆了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界线，从而使俄罗斯人对民族问题的感觉异常迟钝。”派普斯指出：“甚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各党派都忽视了民族问题，而且把“各民族提出的扩大民族自治权的要求看成是反动的和蓄意与俄罗斯为敌的”。

笔者同意派普斯的观点，认为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相比较，俄国成为多民族的帝国，换句话说，成为殖民大国发生在现代俄罗斯民族形成之前，这就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由于逆向发展过程（即帝国的形成早于民族的形成）的作用，俄罗斯人自己从来不能确定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地盘，究竟哪里是俄罗斯本土，哪里不是俄罗斯本土。相反，即使是狂热的法国沙文主义者也清楚地意识到：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不是法国本土，它们不同于香槟省（法国北部一省）和勃艮第地区（法国东南部一地区），正像英国人知道加尔各达不属英国本土，而曼彻斯特则是一样。（为了对俄罗斯人做到公正合理，人们可能回忆起，不久以前一些法国人为建立“法属阿尔及利亚”而战斗的情形。）

在俄罗斯，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即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

形态，阻碍了不同于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兴起，从而使人们的思想愈加混乱。由于问题非常复杂，所以有必要将它简明地阐述一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出现了独立于君主而存在的社会实体。由于在公开场合，君主作为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与他作为所有者的地位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而使社会向着这一方向发展。尽管在西方也产生过把王位视为王子遗产的趋向，“但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在西方扎下根。在西方，理论家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所有者与权威者之间，垄断权与执法权或司法权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一位中世纪的法官所指出的，帝王“从政治上讲是君主，但从所有者的意义上讲却不是领主。”换句话说，他有对其臣民有执法权或司法权，但没有垄断权。

在莫斯科公国，主权具有“继承权或支配权的属性，亦即对土地和居民的全部所有权。”莫斯科崛起的过程从外部看来是其统治者获得历史上其他公国主权的过成。因此伊凡三世的外交官们声称：当时被立陶宛占领的基辅和斯摩棱斯克是沙皇的遗产。后来，当伊凡四世侵占立沃尼亚（它从来不是基辅公国的一部分）时也声称，这里是他的遗产。既然在俄国缺乏国家的概念，由此推论，作为国家的产物的社会的概念也不为人所知。派普斯认为，虽然社会的概念出现于17世纪中叶，但至今“尚未完全被接受”。

沙皇政治制度不承认沙皇的臣民有任何独立的法律身份，因此这种制度对延缓现代俄罗斯民族形成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凯瑟琳二世改革之后，现代俄罗斯民族才开始形成。19世纪上半叶知识界和政界之间的大论战（推行西化的人和斯拉夫优越论者之间进行的辩论）是对俄罗斯民族界定问题的争论。正是在19世纪，沙皇统治者也被迫承认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其发言人以由东正教、专制、民族三者组成的“官方民族”的公式为武器作出了反击。

由于人们简单地认为19世纪甚至现代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民族真正特征问题上的争论一直是斯拉夫优越论者与推行西化的人之间的争议，因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本质问题上产生了许多混乱。事实上，凡谈到俄罗斯民族特征问题及其相伴随的俄罗斯民族问题，特别是提到乌克兰的问题时，我们都必须考虑到那些争论中尚存在第三种观点，即国家（专制的和帝国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基本标志。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俄罗斯民族中存在强大的国治主义或帝国国治主义的概念和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官方宗教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他就会对1917年革命前俄罗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历史产生误解。

官方的意识形态以沙皇“收回”五朝的遗产为理由，使瓜分波兰合法化，使整个白俄罗斯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但不包括1772年被奥地利占领的加里西亚）并入俄罗斯。基于同样的理由，理论家们同时还认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正统的罗斯人，他们都是基辅公国的后裔。

因此，很显然，官方的民族理论与实践没有向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奉献任何东西。相反，它恰恰以王朝大同的原则为根据完全否定了他们作为独立实体存在的权利，他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基辅公国的继承人——沙皇索回的遗产。尽管某些乌克兰人和绝大多数白俄罗斯人在与西方（波兰）交往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皈依了天主教，但这并未遏制沙皇政府的所做所为，圣彼得堡一如既往地强令这两个民族重新皈依东正教，以适合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乌克兰在与波兰——立陶宛长达几个世纪（此乃所谓被迫脱离沙皇时期）的交往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制度亦得到同样的待遇，遭到压制。这就是沙皇政府在逐渐破坏了海特曼奈特和塞契（自17世纪以来，这两个乌克兰地区一直是莫斯科所统治下的自治体）自治之后的所做所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准备承认乌克兰（更不用说白俄罗斯人，在那个时代



很少提出这个问题)与俄罗斯享有平等的地位。乌克兰人于1654年同沙皇代表签订的值得称颂的勃拉茨拉夫协定也被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作了解释。

## 乌克兰的历史意识

如前所述,沙皇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渐渗透到俄罗斯民族意识中,按照这种意识形态,沙皇分别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是其收回遗产的过程。但是,当民族主义作为政治上合法的原则开始代替王朝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时,俄罗斯人越来越乞灵于所谓基辅罗斯人是同一民族的原则,以此来证明,他们的领土要求与对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独立民族特征的否定是正确的。到19世纪,俄罗斯大众开始以民族为理由将那些土地视为俄罗斯的领土。反正,他们不是波兰的,不是吗?

人们时常认为,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与俄语之所以会产生差异,其原因在于前者因受波兰语的影响而遭污染的缘故。因此,自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用这一论点来为压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独立的政治、宗教特征的行为进行辩护。总之,无论是沙皇官方的俄罗斯的概念,还是自然的民族主义俄罗斯观都认为,不论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独立于俄罗斯人而存在的历史如何,它实际上是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是历史的“空白”,应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

1795年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存在了,在这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它继续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是波兰的领土。着手彻底研究这一事实的意义会使我们偏离本文的主题。与俄国不同的是,1795年后的波兰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而俄罗斯则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得更好听些,是一个没有民族的帝国。19世纪

(或许包括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的俄波关系是一部为控制那些领土而进行的斗争史。不像俄罗斯人,波兰人对其领土的要求是以波兰民族的政治概念为基础的,那就是波兰民族是一个由共同的权利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由所谓种族和语言的亲近及统一性而结成的共同体。因此,我们必须提及与波兰的关系,因为乌克兰的民族特征是在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争吵中形成的,而此时,俄罗斯是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民族,波兰人是一个民族但失去了国家。

在19世纪民族复兴时期,乌克兰人创造了自己的民族历史概念;他们把民族历史视为自己内部动力作用的进程,而不是俄罗斯历史主流的变异或分支。乌克兰历史进程的概念——民族神话——是经过几代学者精心研究的结果,而且在本世纪米海洛·赫鲁舍夫斯基(1866—1934)著作中得到了最为恰当的详尽总结和阐述。

冒着过分简单化的严重危险,笔者冒昧地作出以下结论:以历史思想为基础的现代乌克兰民族特征掺入了下列关键的概念,从而使它与俄罗斯人的历史概念相区别开来,并互相排斥(关于白俄罗斯人的情况也能找到对照面)。首先,乌克兰人的历史思想中并没有接受基辅罗斯是一个在民族上同一和同质的实体的观点;其次,在乌克兰历史思想中不承认莫斯科公国是基辅公国的主要、更不用说唯一的继承者,当然也完全否认潜在世袭国家概念中的所谓罗斯人是一整体的思想。相反,这种思想坚持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全基辅罗斯的历史,与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民族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

显然,乌克兰人对国家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当然更不用说沙皇国家没有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任何好处。不论彼得大帝、凯瑟琳二世,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做出过怎样的重大贡献,但对具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

而言，彼得大帝和凯瑟琳二世意味着对乌克兰人自由的践踏（任何一位读过舍甫琴柯未被删改的著作的读者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人们之所以记得尼古拉二世，是因为他作出决定禁止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柯在被囚禁和流放期间拥有写作的权利。在乌克兰的历史记忆中，“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是与他颁布的一系列禁止在出版、学校和舞台演出中使用乌克兰语的法规（1863年和1876年）相联系的。

正像俄罗斯共产党人赞成沙俄的外交政策、战争和征服一样，许多俄罗斯反共产主义者也承认苏维埃政府在某些方面及行为中，至少是一股民族的力量。例如，甚至一些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敌人也认为苏联军队是俄罗斯的一股民族力量。对于具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来说，去接受对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纳希莫夫和其他沙皇时代的人物的崇拜，或把苏联国家和苏联军队视为乌克兰民族的制度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人视自身为历史的受害者，被压迫者。当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民族的命运相比较时，乌克兰将目光转向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过去与现在地位的认识恰恰相反：他们意识到，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大国，总的说来他们为此感到骄傲，甚至在不支持某些特定时期政府或某些具体政策时亦如此。而乌克兰对民族世界的看法与俄罗斯人不同，因为他们有着很不同的与异族生活的经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早在500年前，即在“鞑靼——蒙古人的枷锁”被打碎之时他们就结束了外族的统治，在俄罗斯集体意识中，鞑靼人的统治是一场十足的灾难。甚至苏联官方的宣传（在寻找俄罗斯人对非俄罗斯人统治的好处方面很在行）似乎也没能发现鞑靼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带来了什么好处。后来，俄罗斯民族扩大了自己的版图，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俄罗斯民族成为帝国的坚强支柱，并把一直在扩大的国家视为自己的祖国。曾长期生活

在俄罗斯西方邻国（如：波兰——立陶宛或瑞典）统治之下的俄罗斯人为数极少，这似乎对俄罗斯人西方态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以暂时入侵者的身份（但从未以长久统治其人民的权威的身份），在战争中了解了西方。“西方”只是当人们出国旅行时才被了解。这一因素似乎导致了俄罗斯政治思想中俄欧（俄西）分离观点的产生。

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在其所生活的国度里仅仅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却从来不是那些国家的统治民族，但他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被压迫的民族（如在波兰——立陶宛）。波兰和奥地利是统治乌克兰的欧洲大国，但是乌克兰人并没有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即与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的要求）归罪于欧洲。

俄罗斯社会和政治思想使俄罗斯和西方处于对立面的地位上，区分两个世界的差别之一，即所谓的国家作用的不同：俄罗斯国家作为一种力量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欧洲国家则从属于社会。这就是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试图用来解释俄国历史出现专制现象的方法之一。不论那些解释有何优劣之处（正如前面引证的作品所表明的，也存在着某些合理性），但在乌克兰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伊凡雷帝的情绪”（引用了亚历山大·亚诺夫论文的题目）。相反，乌克兰的民族神话把哥萨克统治时代理想化，称之为自由的时代，是社会高于国家而至高无上的时代。

最后，在俄罗斯，宗教和民族在国家这个共同的存在体中统一起来，成为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成为东正教徒（可以相信，天主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和穆斯林都是沙皇的臣民，但他们不是俄罗斯人）。甚至信仰其他宗教或其他教派的老信徒，虽然也是俄罗斯人，但还是被排挤出官方的教会，并且由于这种原因受到国家的迫害。许多宗派主义者被迫离开了俄国。16世纪一些有影响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承认教皇权威时，乌克兰的基督教会早已分

裂。在那个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一些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保持着强烈的宗教和文化统一感，但他们的东正教与莫斯科公国的东正教不同。直到18世纪，与罗马的联系才深入到公众意识中。至此，在东正教已经站稳脚跟的俄罗斯控制区内，俄罗斯东正教会迫使基辅的东正教大主教教区（1685年以前，基辅一直处在君士坦丁堡首脑的控制下）臣服于自己，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宗教事务方面压制乌克兰的自治，帮助国家建立帝国。波兰被瓜分之后，俄国政府强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天主教教徒信奉东正教。但是，天主教在加里西亚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罗塞尼亚）的乌克兰人中一直生存到二次大战后。因此，乌克兰宗教的二元性以及政府对官方的宗教缺乏支持，是近几百年来乌克兰的历史事实。

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进行比较。认为，乌克兰民族在那些允许其从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国家中通过各种组织网络，已起到了有组织实体的作用，但这一实体在那些不能容忍其政治、文化、宗教等志愿组织的国家中实际上日趋衰微。成千上万移居西伯利亚、远东和俄国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民族特征，被同化了。而那些移居到美洲去的乌克兰人设法保持甚至发展了自己固有的传统，这要归功于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多元化。甚至在奥地利和波兰这些比美国和加拿大自由程度低的社会里，乌克兰人仍建立起许多社会、经济（生产者 and 消费者的合作社）宗教和政治组织，并形成完整复杂的体系。只有当乌克兰人在有结社自由的地方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俄罗斯国家对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抱有公开的敌意。

## 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演变

只要对乌克兰历史意识的一些基本特征简单地总结一下，就可以使我们更易于理解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人，例如，像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米海罗·德拉霍马诺夫(1841~1895)和保守的君主主义者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1882~1931)都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乌克兰的民族特征，而且强调乌克兰同西方的关系是其民族形成的因素。因此，根据德拉霍马诺夫的观点，“直到18世纪，亦即在俄罗斯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前，乌克兰和西欧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解释了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之间存在的大部分民族差异。尽管双方的关系曾因鞑靼人的入侵受到阻碍，但乌克兰仍参与了欧洲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利平斯基基本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乌克兰和莫斯科之间的根本差别并非存在于语言、种族和宗教之中……，而是存在于长期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结构，不同的精英组织方式以及不同的上、下级社会关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差别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差异而不是种族和语言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观点在一篇题为《两个俄罗斯民族》的论文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这篇文章由迈克拉·科斯托马罗夫撰写，于1861年发表在乌克兰一家杂志上。多罗申科说“在很长时期里，这篇文章被看成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福音’”下面是科斯托马罗夫文章中的一段话：

“个人主义是乌克兰人的特征，而集体主义则是大俄罗斯人的特征。……在政治领域中，乌克兰人能够创造出自由的社会形式，并把它控制在生存所需的范围之内，但它在不侵犯个人的自

由的条件下，保持着强大的力量。相反，大俄罗斯人则企图建立一个稳固的渗透着一种精神的集体主义结构。乌克兰人的奋斗目标建立联邦制，而大俄罗斯倾向于建立专制社会和坚强的君主制社会。”

科斯托马罗夫还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间信仰、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及对财产的态度作了对比：

“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大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信仰。将个人统一到整体中去的要求、以社会需要为由对个人利益的否定以及对社会评判的极大尊重等，所有这些特点体现在大俄罗斯人的大家庭生活中以及为社会牺牲个人的行为中。大俄罗斯人的家庭是一个财产共有的单位……。另一方面，乌克兰人憎恨这种制度……，他们把自己非情愿但又必须承担的共同义务看成是一种沉重的包袱，而大俄罗斯人愿以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来完成这些义务。对乌克兰人来说，土地被强迫集体使用和众人为一个人承担责任是最糟糕、最不公正的奴役。乌克兰的历史没有教导他们压制获得私有财产的情感，或把自己看成是一些抽象的公社的奴仆并对公社的其他成员负责。”

尽管在语言上乌克兰人更接近于俄罗斯人，但非常有趣的是，科斯托马罗夫声称：他发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民族特点有某些相似之处。作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据认为乌克兰人主张实行民主制，而波兰人主张实行贵族制。但是，波兰人的贵族制是“非常民主的”，而乌克兰人的民主制却“带有浓重的贵族制色彩”。

至1917年，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在沙皇俄国，他们的政治生活受到限制，行政

当局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实际上一直到1905年革命才解禁）。甚至在1905年以后，俄国乌克兰人的组织生活仍受到政府的极端限制。所有这些都反映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时期的乌克兰政治中有所反映。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经临时政府同意建立的自治的乌克兰、乌克兰党在全俄立宪会议上竞选的胜利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1918~1921年内战期间为建立独立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这三件大事显示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提出政治方案和动员大众方面的能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奥地利成为一个立宪制国家，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未能保住独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19年）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波兰人决心占领整个加里西亚，及共和国领导人犯了错误而造成的。

民族主义的大理论家和实践家 托马斯·G·马萨里克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论述颇具指导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在为同盟国领导人准备的备忘录中，他评论道：

“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必须仔细地将语言和民族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问题在于：乌克兰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还是俄罗斯的一个部落？乌克兰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俄语的一种方言？甚至语文学家们（斯拉夫人）在这一点上亦有分歧。但是，与其他民族相比，即使承认乌克兰语是俄语的一种方言（这是我的观点），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可能使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马萨里克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评述应该同他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的论断作一比较。在同一部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一段



话：“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尚未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有自己的宗教观点，同时知识分子，虽然它已社会主义化了，却没有感受到民族意识的存在。”俄罗斯人的政治落后是由于不断受到沙皇统治的政治冲击造成的，这种冲击直到沙皇的倒台仍然存在（这是在1918年初写的）：“罗曼诺夫的沙皇统治是没有文化的残酷统治，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变得不那么具有毒害性（同维也纳和柏林更危险的专制统治相比较，因为它利用了科学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俄罗斯大众和革命家的专制统治则更糟；他们赶走了沙皇，但是没有消灭专制统治。”

1917年以后时期的历史，人们已经非常熟悉，本文只作最为基本的概括。最初，布尔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革命仅仅看成是更广泛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奠定在反民族主义原则之上的无产阶级联邦。列宁认为，1922—1924年由形式上平等的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即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为其成员之一）只是权宜过渡步骤。他主张，俄罗斯应从形式上承认自己与乌克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欧亚”新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斯大林却赞成把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列宁的观点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最初的跨民族革命的理想，而斯大林则公开要恢复一个囊括沙俄所有领土的俄罗斯国家。这些领土正是布尔什维克设法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地盘。

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斯大林提出的——只是被列宁否决的——正是1945年后获得权力的各民族共产党实际做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近指出的：“自二战以来，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用民族的字眼来加以界定。”安德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例作了说明。他指出：

“每个民族都把自己坚定地建立在其从革命前继承下来的领土和社会空间内。相反，苏联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一样不用民族来命名其国家。这一事实表明：苏联既是19世纪民族形成前王朝国家的继承者，又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

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开创了似乎有道理的“国际新秩序”近70年之后，苏联人是怎样找到一个足以与民族形成前王朝国家相比拟的政体的呢？安德森所持的观点绝非他一家之言，我曾在文章的开头提到过的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两位作者指出，在1914年前存在的所有帝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奥斯曼、荷兰、奥匈帝国和俄国）中只有俄国存在至今。他们认为：对其成功的原因，人们会产生种种疑问，这是自然的。问题之一是：“当其他帝国崩溃的时候，俄罗斯人是怎样设法使帝国运行的呢？”第二个问题是“俄罗斯的超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后者与合法性的原则有关。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简明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设法保住了其属地，因为“其他帝国并没有做到”（他们用希特勒在二战中对乌克兰完全错误的管制为例解释了其他帝国失败的原因）。至于超凡力量问题，他们认为俄罗斯人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两种超凡力量。一种用于“国外消耗”，另一种用于“国内消耗”。

“国外消耗的超凡力量”并不涉及俄罗斯民族的特殊性，而只强调苏联共产党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社会主义两个方面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因此，如果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除历史条件造成的细小偏差外，其他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与这个普遍适用的范例有多大差别。

克列伊奇和韦利明斯基认为，另一种力量即“国内消耗的力量”。在新闻媒介中虽不容易识辨出来，但它在家庭、学校和军队“这三个相继塑造俄罗斯思想的机构”中被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而予以接受。部分官僚也接受了此真理。国内的力量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不仅为官方而且也为持不同政见者所接受。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苏维埃政权“超凡力量之一，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混合形式，即通过“苏联人民”这个概念，呈现在占苏联人口一半的非俄罗斯人的面前。但，尽管如此，上文的提法仍需修正。照官方的解释，“苏联人民”乃是一个历史共同体，是由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组成的非民族实体，尽管它还有某些民族特征，例如，俄语作为“民族间交流”的媒介。

国内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超凡力量和占苏联人口一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超凡力量有着重要的共同性，即两者不仅都认为民族和人民都通过国家而存在，而且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为了与著名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学派的观点相区别、相对照，现今苏联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沙皇“官方民族”理论世俗化了的翻版，或是集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变种。

给沙皇俄国“正名”，进而将它融化到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加速于30年代，即在斯大林公开谴责以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先前被视为正统的共产主义路线之时。波克罗夫斯基非常激烈地批判了沙俄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也是列宁的观点），认为沙皇不仅是国内工人阶级的压迫者，而且是国外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和征服者。

在乌克兰，马特维·亚沃尔斯基提出了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乌克兰历史编纂理论，他被称为“乌克兰的波克罗夫斯基”。同时，乌克兰也容忍了其他历史学派的存在：现代乌克兰历史编纂的奠基人，革命时期乌克兰反布尔什维克政府首脑——赫鲁舍夫斯基也获许著书立说，出版书籍。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唯一一段把乌克兰历史作为一个自治进程来看待的时期。在这个进程中，乌克兰与俄罗斯并肩发展，而不是充当俄罗斯地方性和地区性的角色。就此而言，正如那个时期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如何对待乌克兰的历史同是否承认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苏维埃联邦内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相一致。

30年代初，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在俄国遭到谴责。甚至在此之前，已有人向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发起攻击。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些进展成为苏联更大变革的一部分，此时的苏联开始与斯大林主义概念联系起来。遵照斯大林的直接旨意，在苏联的历史学中提出了一个崭新、明确的俄罗斯中心主义的概念。尽管所使用的是“苏联各民族的历史”这样中性字眼，但，很显然，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人已经恢复了其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在这新路线的统治之下，沙皇俄国被视为保护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免遭外敌侵犯的一种力量。因此，通过某种奇怪的逻辑，俄罗斯族——这个非俄罗斯民族的征服者莫名其妙地摇身一变，不再是乌克兰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民族的“异族”主人。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极端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激情有了缓和，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地理编纂理论的基本前提仍未受到威胁，人们仍然认为，与沙俄及共产主义俄罗斯的联合，对于“苏联各民族”来说，向来是绝对有益的经历。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恢复对乌克兰历史（在所谓的谢列斯特时期）的真正研究（尽管在范围上受到限制）已成为可能之事。

从当今的历史观点来看，谢列斯特政府的政治公式就是：通过向现在及历史研究中的乌克兰的文化个性作出真正的让步，来换取其对整个苏联的政治上的忠诚（甚至不怀疑俄罗斯人的支配地位），使苏联政府在乌克兰爱国主义者眼中享有合法性。用法默

的话来说：谢列斯特时期的民族政策是与“文化多元论者”的立场相呼应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以阶级统一为基础的真正的多民族和文化多元化的联邦，这个联邦的凝聚力量来自大众，而非联邦机制。他们的立场有别于赞成所有非俄罗斯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实行俄罗斯化的“同化主义者”，也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对后者而言，独立的文化身份是政治上脱离俄罗斯统治的证明和基础。但谢列斯特时期（与斯大林主义时期和谢列斯特倒台之后的时期相比较）的相对自由政策并不标志着要重新回到20年代的思想上来，它仍继续标榜沙俄在乌克兰历史中的积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它成为几个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谴责的主题。这些批评家包括60年代的伊万·久巴和米海洛·布赖切夫斯基以及最近更尖锐的批评家尤里·巴齐奥。他们就现代乌克兰的地位问题首先向官方集权主义历史解释提出挑战。这些批评家认为，那些历史解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甚至不符合列宁主义。

当然总的来说，这些批评家的努力是成功的，谢列斯特被解职（1972年5月）后，谢尔比茨基出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乌克兰共和国的文化领域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在各个领域中，特别是教育系统和宣传领域中全面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再用法默的话来说，可以说同化主义者基本上赢得了胜利，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单一的、文化上相同（不仅在政治上一体化）的苏联。这些同化主义者确信：文化多元化从原则上讲将危及苏联（沙皇帝国继承者）的政治统一。

正如刚才阐述的，苏联人民这个概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带有人为杜撰的痕迹，从而受到非俄罗斯人的极大怀疑。这种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认为，在把苏联人民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共同体来谈论的背后，有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图谋——即把苏联的所有民族变成俄罗斯政治民族的愿望。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使早期俄

罗斯民族主义者感到困惑的目标。负责制订民族政策的苏联智囊团头目、苏联科学院院士尤里·V·布罗姆利几乎承认了大部分事实。最近在一篇权威性的声明中，布罗姆利宣称：从类型上讲，“苏联人民”属于“历史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包括诸如“印度人民”或“印度尼西亚人民”等实体。布罗姆利还认为，从类型上讲，与苏联的情形相同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正在形成的共同体。

这似乎正是彼得·施特鲁韦的方案，只是缺乏后者的政治自由思想。但是由于这一政治因素，布罗姆利的“苏联人民”概念似乎剽窃了N·V·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观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是1917年后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他就谈到苏联正在出现一个“苏维埃民族”。乌斯特里亚洛夫感到：统一在俄罗斯人控制下的共同国家的名下、在意识形态上被马克思主义凝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民族的出现，将会由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的胜利而遇到阻力。他暗示，这将削弱俄罗斯人在扩大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

形成一个苏维埃民族的思想是苏联统治集团部分人愿望的反映，它表明：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获得权力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超越传统的国家形式和民族特征。因此已经出现的情况不仅驳斥了1917年及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提出的预想，而且也是对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历代共产党人理想的嘲弄。《共产党宣言》宣布民族冲突，甚至民族差别即将被消灭。

很明显，莫斯科并不欣赏苏联是19世纪帝国现代翻版这一提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梦想已经破灭，莫斯科在1917年以后阻止了旧罗曼诺夫帝国各民族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尝试，现在苏联领导人面临着一种选择：他们要么推委延宕给非俄罗斯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的平等权（这也许会导致分裂），要么去消除现存

的紧张局势，他们将不得不剥夺这些民族的民族地位，铲除其根源，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在对待民族问题上有一种紧迫感的话，那是因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认为是遥远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特别是在东欧和中国的胜利导致了对旧民族特征的肯定，给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提出了新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必须和要求他们完全融合到俄罗斯政治民族中去是同义语呢？如果波兰人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能有呢？有证据表明：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心东欧国内生活的发展会产生“溢出效应”。

由于现已一目了然的原因，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一样）也许特别易受“波兰的感染”。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同俄罗斯人语言上的密切关系，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似乎被挑选来作为加速俄罗斯化的试验品。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解释（也适用于白俄罗斯的历史）比在斯大林时期更加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带着设计好的目的走进乌克兰过去历史中，今天官方党的发言人声称：在苏联的东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早期历史记录中，已经发现了所谓的民族统一的证据。特别提到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的联系，而且用以支持这些观点的论据带有明显的民族倾向。

在对苏联政界和学术界最近的言论作了仔细的回顾之后，罗曼·索尔查尼克认为，现在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解释归根结蒂只有一点：“同俄罗斯和俄罗斯人‘重新统一’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在地球上出现唯一原因。其结果是，乌克兰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的权利”。这位学者还把苏联领导人“追求统一”看成是这种历史观点的根源之所在，他暗示：苏联领导人也许正试图用这种方式防止波兰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邻邦的潜在冲击。

从长远来看，莫斯科消灭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这个政治和文化上富有意义的实体的目标，其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这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也许是最重要的，要看乌克兰对莫斯科政策反应如何。乌克兰人会认为自己基本是一个语言和文化实体吗？他们会为自己的语言而战斗，或者干脆接受俄语在乌克兰的传播这种实际上等于消灭自己的做法吗？抑或乌克兰人会将语言看成是重要的而且是表明乌克兰特征的几大成份之一（那些成份包括扎根于历史之中的政治信息——为自由而奋斗）吗？

第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由于某种原因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在内的俄罗斯人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俄罗斯国家集权主义形式的反应。不仅一些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而且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爱国人士都已经不相信政府所宣传的帝国是俄罗斯人民必不可少的东西的神话。那些反对帝国的俄罗斯爱国人士会设法在他们的同伴中寻求足够的支持来迫使政府放弃现行政策吗？

就此而言，著名的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消灭苏维埃帝国是俄罗斯民族解放的前提条件。他的观点或许有道理，也可能不很有道理，现摘录如下：

“我唯一关心的是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我希望俄罗斯人得到教育、培养和充满自信，以便能够分享世界文化的宝藏，并对它作出贡献。我要使俄罗斯人从几个世纪的落后和被支配的地位中摆脱出来。在苏维埃帝国内上述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可以确信：马萨里克已经懂得了季诺维也夫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什么比大帝国对人类的繁荣和自由更加有害了”）。但是，季诺维也夫在接受采访时还发表了大量稀奇古怪的言论，甚至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季诺维也夫为30年代杀气腾腾的集体化



政策辩护，声称“没有它（集体化），我们的国家将会瓦解”。难道这就是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一个民族要为国家而存在的吗？

最后，中亚还存在着对苏联领导人的努力进行抵制的问题。在那里，已经展开了为过去而进行的斗争。同时还有东欧，特别是波兰可能起的作用问题。波兰会鼓励苏联的抵抗力量并可能帮助改革派的力量制定出少一些压迫的政策吗？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这显然是乌托邦的妄想，但是近几年来东欧相当一部分知识界名流表露出这样的思想：从长远来看，东欧人也许会遭到乌克兰和立陶宛两民族同样的命运。

## 第十二章

###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

#### 抵抗与支持

(1940—1941和1944—1952)

共产主义在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传播和影响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一直是很小的。的确，要使共产主义信条在仍然是农业和宗法占优势的社会中深深地扎根，那是相当困难的。而对于公开倡导国家苏维埃化和最终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各国的共产党来说，要从还是在不久前通过战斗、牺牲才从俄国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民族中获得大量的支持，就更为困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为他们新近建立的民族国家，感到无比骄傲。

在1933年以前，波罗的海共产党是由一些仅仅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有联系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纯粹宗派组织。只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罗的海自身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体的建立，才使得波罗的海社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与共产党合作——这样就为波罗的海共产党提供了某些（尽管很狭小）民族的基础。

1933年之后，面对日益增长的纳粹威胁，一些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并入“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苏联比被希特勒第三帝国所消灭是更为可取的，甚至是诱人的。因此，他们开始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并给予支持。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现在强烈赞成保卫“进步与正义”，抗击法西斯的威

胁，甚至参加了共产党。麦奇斯·格德维拉斯就是这样一个恰当的例子。麦奇斯·格德维拉斯是一个完全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立陶宛社会活动家，他于1933年秘密加入尚处于地下状态的立陶宛共产党，后来于1940年8月，成为立陶宛苏维埃政府的首任首脑。一些人证实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例如，另一个著名的立陶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彼得拉什·列昂纳斯教授亦抱此态度。1938年当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支持共产党时，他回答说：“立陶宛正处在陷入德国统治和俄罗斯占领之间的十字路口。以迂腐为特点的德国将在大约25年内消灭我们的民族。俄国是一个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和组织涣散的国家。如果被俄国占领，我们就更有机会较长久地生存下去。因此，从这两个魔鬼当中我们选择了俄罗斯民族”。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积极倡导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投合了这种态度，不仅在（所谓无党派类型）知识分子个人之中，而且在波罗的海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某些部分中都获得了积极的反应。这些党的一些成员，对其领导人不愿接受与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作为党正式的政策感到失望，甚至试图离开党而直接加入共产党。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劝告继续留在他们各自的党内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贾斯塔斯·帕莱基斯是自由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他成为“人民”立陶宛的代总统，后来担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多年。他在回忆录中回忆了1940年8月他是如何参加共产党的。

“在1940年前许多年，我就提出了入党问题。但是梅斯考斯金纳[独立时期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回答……我留在党外对党会更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中，有大量像帕莱基斯一样的共产党同情者和秘密共产党员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在没有很多（在爱沙尼亚几乎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情况下能够组成共产党政府。

这种倾向不单单限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些由于1934年—1936年波罗的海各国的独裁专政而在社会政治生活舞台上消失的右翼政治家，试图通过与共产党的紧密联系和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国家的颠覆性活动，报复并重新分享政权。在这一类人中，有诸如著名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诗人柳达斯·吉拉之类的人物。他是立陶宛反共秘密警察的创始人，直至1935年离任之前，一直是官方机构的领导人。另一个是立陶宛律师和历史学家波维拉斯·巴卡克里斯，他是立陶宛前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领导的执政党——民族主义党内公开的法西斯和支持纳粹派忠诚坚定的成员之一。

当然，也有一些苏维埃政权的直接代理人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安插在波罗的海各国政府所有机构里，甚至极右翼的机构里，（苏联情报机构，在20年代，特别是在1923年他们计划的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就已经养成了向这些政府进行渗透的习惯，正如吉姆·菲尔比，理查德·索尔格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当然也不例外。）这些苏联代理人在这一时期加强共产党在波罗的海社会中的影响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些波罗的海少数民族的成员，特别是犹太人，较小程度上包括俄罗斯人，一直是波罗的海共产党的核心部分。当然，只是这些少数民族中的极少数——数百人而不是数千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但是在规模很小的波罗的海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参加的比率都是不相称地高。30年代中期，希特勒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波罗的海各国的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种族民族主义倾向自然使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支持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共产党队伍的扩大。

30年代中后期，共产主义者在波罗的海国家设法获得了至少某些社会支持，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在任何重大的意义上改变他们

的影响。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够了：按照苏联官方的资料，到1940年6月苏联占领时波罗的海共产党的规模分别是：立陶宛，1500名党员；拉脱维亚，少于1000名；爱沙尼亚，只有130人。当时，在共产党员队伍之外，也没有很多积极的支持者和同盟者——只有几百人或者最多几千人。

苏联人非常明白这些人的支持是多么微不足道，而这些国家赞成抵抗任何潜在占领力量的民族是多么的顽强。因此，苏联当局早就提前制订好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在于粉碎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对苏联统治的抵抗。为此早在1939年10月11日，即在苏联和立陶宛互助条约（三个条约中的最后一个）签订后的第一天，苏联真正占领立陶宛前11个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沃德）便发布了第001223号令即：“关于对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所有反苏和社会异己分子进行清洗”的命令。这一个命令的唯一目的就是准备清洗波罗的海各国中所有可能会组织和参加抵抗苏联统治运动的人们。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941年5月19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发布了放逐波罗的海人的命令。1941年4月和6、7月之间，梅尔库洛夫的助手谢洛夫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详尽并且绝密的“关于实施流放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反苏分子方法的指示”。1941年6月13—14日夜，强制流放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同时开始。在战争爆发（1941年6月22日）前的一个星期内，从立陶宛流放了34260人，拉脱维亚15081人，爱沙尼亚10205人。这次大规模的清洗达到1940至1941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不断发生的镇压浪潮的顶峰。这些镇压活动（规模较小）的矛头直指那些独立时期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人士，并且更有选择地指向那些涉嫌有抵抗或敌对行动、制造反苏宣传或者直接拒绝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人们。据估计，1940—1941年被镇压和疏散到苏联的人数：立陶宛为39000人，拉脱维亚为35000人，爱沙尼亚（在这里，苏联军

队驻扎时间最长，有些人被征召参加了红军）为61000人（这些数字不包括被苏联当局关进监狱、在苏联从波罗的海撤退之前既没被枪毙，又没被流放的数千人）。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残酷的镇压整个说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们产生了反作用。这些措施表明了苏维埃政权对许多在苏联统治的开始阶段不猜疑的、完全中立的人们的残酷性和狡猾。因此，镇压反而使抵抗者人数增加，决心增强。苏联的镇压运动规模大，不分青红皂白，伤害了许多无辜，但实际上并不能摧毁大批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增无减。的确德国一开始进攻苏联，波罗的海各国人民爆发了反对苏联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规模大，求胜决心强，组织协调得有条不紊，从而使撤退中的苏军无法将它平息。

当然，由于动荡的国际局势，由于波罗的海人民一致坚信苏德日益迫近战争将迅速结束苏联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抵抗苏联统治的情绪极大地增强了。在德国的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流亡者成功地组织和协调了他们各自国家抵抗组织的行动。这一事实使这一信念有所强化，并且具体化了。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明确认可和直接的支持，他们甚至一定不能发起这样的活动。德国确实对这些政治流亡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给予了他们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以及把供应物资运往苏控波罗的海地区的手段）。德国人力图保证当他们进攻苏联时，苏联战线的后方燃起起义的熊熊烈火。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反对苏联统治的起义和抵抗组织的全部情况，在立陶宛有最详尽的记录，曾组织和领导了柏林抵抗组织的卡齐斯·斯克伊尔帕上校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中包括了所有关于抵抗组织和起义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透露，早在1940年7月，斯克伊尔帕就在柏林忙于建立立陶宛活动分子阵线(LAF)——一个联合立陶宛所有非共产主义政治势力的反

苏抵抗组织。卡齐斯·斯克伊尔帕和他同伴的这些活动是在德国外交部通过它的联络员P·克莱斯特博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导下进行的。立陶宛活动分子阵线于1940年9月17日正式建立，当准备在苏占区开始战斗活动时它又被置于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OKW)领导的情报部(Abwehr Amt)的监督和指导下，中校格雷博接替克莱斯特博士成为与立陶宛人的联络员。很快，在德国—立陶宛(今苏联)边境的情报系统内部建立了4个特别联络站，以便保持柏林的活动分子阵线中央机关和其国内分支机构的经常联系和物资供应线的畅通。正如斯克伊尔帕所强调指出的，这些邮站总的说来在保证抵抗组织特别是1941年6月23日的起义取得胜利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立陶宛的情况如此，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尽管很难找到确证的文件。毫无疑问，德国的支持在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成功地组织抵抗和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个因素。因为如果没有当地广大群众参加抵抗力量的真正决心，没有他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正是这种忠诚保证了抵抗运动广泛组织网的生存，尽管苏联统治当局有几次成功地破获和逮捕——那么整个事业，无论有没有德国的支持，都不会发动起来，即使发动起来了，其结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只是部分有组织的抵抗力量与设在柏林的协调和供应中心有直接联系。另一些这样的组织独立地产生并从事活动，而不曾与这些中心建立任何联系，或者也许甚至不曾知道它们的存在。例如，以柏林为基地的立陶宛活动分子阵线的国内联系网在1941年约有36,000人参加了起义，而参加1941年6月立陶宛起义的有组织的战斗员总数约有100000人，即“约为由立陶宛活动分子阵线领导的地下组织成员人数的3倍”。因此，尽管不能否认德国的支持在波罗的海各国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仍不能不得出

如下的结论，即德国的作用在本质上是次要的、补充的，不能决定甚至不能有力地影响这些活动的产生和壮大。

1941年6月在波罗的海3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1941年6月23日，即德国入侵后的第二天，立陶宛爆发了起义。接着起义者又奋战3天，把整个立陶宛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立陶宛一些地方在德国先遣部队到达前的一周就已经解放。6月23日起义中建立的立陶宛临时政府立即宣布恢复立陶宛的主权，并有效地掌管了国家事务。的确，当德军占领立陶宛时，使第三帝国统治阶层吃惊和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在合法民族政府有效控制下的国家。纳粹当局花了6周时间才消灭了这个政府（它于1941年8月5日被解散），并把立陶宛置于德国占领行政机构的控制之下。临时政府（除3名成员外）拒绝加入纳粹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约有60,000名抵抗战士参加的拉脱维亚起义接踵而来。1941年6月26日，里加的一个苏联官方电台不得不承认“拉脱维亚处于公开暴动中”。6月28日，起义者把红军驱逐出里加并宣告拉脱维亚政府成立。然而，苏联军队在第二天重新控制了里加，并粉碎了拉脱维亚政府。尽管如此，拉脱维亚反抗苏联的武装斗争一直持续到1941年7月1日德军占领里加。

爱沙尼亚爆发了类似的起义，参加者约有50,000人。爱沙尼亚的起义具有更持久、更隐蔽的性质。起义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进行的是游击战，而不是与优势的红军直接对垒。但是，爱沙尼亚游击队在这种战争中表现出色：在战斗中，他们击毙苏军4800名，俘虏14000名。他们自身在战场上牺牲了541名战士。在1941年7月7日，德军穿过国境线时，他们发现他们所到之处，到处飘扬着民族的旗帜——爱沙尼亚游击队力量的象征。的确，在爱沙尼亚南部大部分地区，游击队在德军到达前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就已经驱逐了苏联地方当局，而代之以爱沙尼亚自己的政权机



关。“7月10日到28日，塔图完全或部分处于爱沙尼亚人的控制之下。”苏联军队和行政当局严密控制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以及整个北部地区。这部分地解释了爱沙尼亚为什么没有试图建立爱沙尼亚政府。然而战争刚刚开始，被占领前爱沙尼亚最后一任总理于里·乌卢奥茨领导的爱沙尼亚抵抗力量行动协调委员会就宣告成立了。

这些民族起义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统治的非法性和反人民性。苏联当局声称其政权的建立符合“人民的共同意志”。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玩弄了虚假的选举及其他鬼把戏，但所有这些不久以后就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换言之，1941年6月的大规模起义说明：波罗的海各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毫不含糊地坚持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民族的共同意志——恢复他们的非苏维埃的、1940年以前的主权国家地位——就这样被积极地表达出来。然而，1941年这种意志又为新的主人——纳粹所漠视和践踏，就像1940年苏联所做的那样。

苏德战争期间，波罗的海各民族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一种最独特、最令人讨厌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站在交战国的任何一方，他们都不能追求他们的民族理想。R·西尔德—卡尔克林斯尖锐地指出：“他们必须抵抗德国和苏联两个帝国的计划，因而面临着受到两面夹击的危险。”抵抗这两个国家的任务确实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不愿为德国利用来作他们的炮灰，并努力破坏导致这种结局的任何企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为了民族自身的未来而利用希特勒战时政府对征募士兵的迫切需要，这就是在德国的保护下（但是，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公然反抗德国的方式）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在德军撤退后，这支军队就能够参加反抗苏联进攻的斗争。通过谋求西方对这一斗争的支持，这支军队就有希望阻止苏联在波罗的海各国重新建立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国家就有希望重新出现在世界地图

上。

实现这个计划的努力可以从发生在立陶宛的例子中得到说明。立陶宛临时政府解散后，德国动员立陶宛人到德国军队中服役，到德国工厂中去做工，但这种努力被有效地挫败。正如E·J·哈里森指出的，到1943年底，立陶宛已经挫败了几乎所有旨在利用他们为德国服务的计划。的确，招募立陶宛人去德国做工的最初计划只完成了5%，后来（1943年3月）组建立陶宛民族党卫军团（据认为，不少于150,000强壮士兵）的努力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接踵而来的对立陶宛人的残酷镇压，也没能改变其失败的结局。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运动，德国决定改变方式，试图通过运用“合作”的策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他们允许立陶宛人组成独立的国土防卫军，并承诺这支军队将只在波罗的海地区（沿纳尔瓦——维尔纽斯一线）使用。德国人也同意任命深受欢迎的民族主义者波维拉兹·普莱哈维西乌斯将军为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普莱哈维西乌斯于1944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日）发出呼吁，号召立陶宛青年参加这支部队，对此反应强烈，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几天时间里，就有30,000人志愿报名参军，而更多的人被拒之门外。然而，这支军队一经形成和取得战斗能力，德国人就背信弃义，强行把国土防卫军并入纳粹党卫军。这样，这支军队就被置于德国人的直接指挥之下。

事件的发展激怒了普莱哈维西乌斯，他断然拒绝服从这些命令，并发布了自已的解散防卫军的命令。结果，盖世太保逮捕了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把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并不加区别地杀害了100名士兵（其余被捕人员中有3500人被迫加入德国空军，送往德国西部的机场服役）。这支军队的主要部分约30000多人，身着戎装，手握武器成功地隐蔽起来，后来成为以立陶宛自由军（LLA）闻名的立陶宛游击队的主体，这支军队与苏联进行了8年

多的战斗。

爱沙尼亚发生了相似的事变。1944年2月，苏联占领前的最后一任总理乌卢奥茨发布了与普莱哈维西乌斯相似的呼吁，并获得同样巨大的反响。即使那些先前因逃避德国征兵而逃往芬兰的爱沙尼亚人也自愿回国（在获得德国人的宽恕之后），参加新建的爱沙尼亚国防军，保卫爱沙尼亚免遭苏联进攻。在拉脱维亚，事态有些不同的变化（因为德国的控制扩展到库尔兰），但其结果大体相同。

1944—1945年，3个波罗的海国家就这样获得了一支象征性的军队。这支军队从任何标准来看都装备差、战斗力弱，但这对于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已经足够了。通过进行这样的战争，波罗的海诸国可望能够吸引西方对他们独立事业的支持，并最终取得胜利。

据估计，游击队最初的规模是：立陶宛30000人，拉脱维亚15000人，爱沙尼亚在10000—15000人之间。而积极的支持者、联络员及其他“业余”游击队员的数量则又高出几倍。自1945年始，游击队的力量稳定增长，那些秘密组织起来同德国纳粹作斗争，在德军撤退后继续同苏联人斗争的武装，同原来的游击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后来，大批人员逃往山林参加游击队。按米西乌纳斯和塔格佩拉的划分，这些人有如下几类：

1. “自愿和非自愿的德国合作者和被征入伍者”；
2. “逃避苏联征兵者和红军开小差者”；
3. “苏维埃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重建措施”的受害者；
4. “苏联清查和流放运动的”直接和潜在的受害者；
5. 受到1949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威胁或逃避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农民（流放运动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相联系）；
6. “公民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其他人。

在役游击队员的绝对数字一直大大超过其最初数字。米西乌

纳斯和塔格佩拉令人信服地解释道：“由于受伤、疾病和回归平民生活等原因，据估计，山林兄弟会生涯的平均时间为2年”，因此，“在长达8年多（1945—1952年）坚强的游击战争中，立陶宛约有100000人可能曾经参加进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山林兄弟会成员在某一时间可能曾分别达到40000人和30000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罗马斯·萨尔迈蒂斯间接地证实了上述结论。在一次与美国新闻记者乔治·韦勒的谈话中，萨尔迈蒂斯指出，在立陶宛的8年游击战争中，20000名游击队员和几乎同样多的苏军战士死于战场。

最后一次平民（逃避集体化和被流放的农民）大规模加入游击队的情况发生在1949年。这一年游击队运动达到了顶峰，但此后不久，游击队开始迅速衰弱。1950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全国性运动。到1951—1952年，立陶宛只有约5000人还在战斗，而且，到1952年年底，立陶宛自由军（LLA）联合指挥部发布命令，号召自由军战士和所有立陶宛人，用和平手段继续为自由而战斗。

经过8年不间断的，浴血奋战之后，波罗的海的游击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波罗的海各国进入了与苏联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时期。

毫无疑问，在开始阶段，游击队几乎博得全民族的支持，波罗的海各国绝大多数人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代表游击队执行某些任务；帮助隐蔽游击队员并为他们提供食物；以及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因此，在游击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当局只是紧紧控制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农村几乎完全属于游击队。

在与游击队的斗争中，苏联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直接的军事交锋是最不重要也是最无效的手段。他们一次次“搜山”，但他们镇压的重点却放在摧毁有助于游击队活动的居民环境上。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1945—1951年，每年都有大批波罗的海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与游击队员亲近的亲属、以及“被剥夺财产的城乡资产阶级”分子，最先受到影响。最大规模的流放运动发生在1949年，那时所有的“富农”和“自由民”阻碍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总的来说，1945—1951年，从波罗的海地区流放到苏联西伯利亚和同样荒凉的（或者甚至是无法居住的）地区的当地居民不少于600000人（或者约占全部当地居民的9%），其中约有一半是立陶宛人。

老百姓与游击队有任何联系，都会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判25年苦役。即使那些被迫无奈在死亡威胁下才帮助游击队的人也不得饶恕，因为苏维埃公民应宁死不屈，决不为虎作伥，帮助敌人。1944年9月，苏联发布了内务部队可以当场枪决任何嫌疑分子、烧毁窝藏“匪徒”的任何房屋、农场或村庄的指示。以后几年中，这一指示得到彻底贯彻执行。这些空前严厉、真正种族灭绝的措施，最初刺激了游击队力量的壮大，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则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在大规模镇压的同时，苏维埃政权也作出种种努力以扩大当地民众支持的基础。他们设法保留了起初赞助其事业（其中一部分是在独立年代反政府的知识分子）的弱小组织。如果像有的人那样，认为诸如彼得拉什·斯维尔卡或者安塔纳斯·温科洛瓦、维利斯·拉西斯或奥古斯特·基尔肯施泰因斯（拉脱维亚）、约翰内斯·瓦列斯——巴尔巴鲁斯、约翰尼斯·森珀，阿图尔和尤金·卡普斯（爱沙尼亚）等著名领袖毫不含糊地选择支持苏联政权仅仅是出于机会主义或野心家的动机，那也许是错误的。起初，他们的动机大概是真诚的，并且确实是有宏大理想。那么，后来呢？后来无论如何都太迟了，也许留在里面诱人地舒服，也许太令人恐惧而无法停止活动，或者两者都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独立时期曾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而在苏维埃现实

更加严酷的形势下，甚至变成更不可救药的实用主义者。

仅能依靠这些人，他们巩固与代表苏维埃政权（尽管是一种重要财富）远远不足以使苏联当局对波罗的海各国的统治感到放心。因此为了牢牢地控制这一地区的权力，苏联人迫切需要更多真正基层的波罗的海居民转向他们一边。为此目的，他们用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的观点解释事物的办法是非常有效的。的确当地大量居民，特别是那些在传统波罗的海社会中地位较低、发展前途有限的居民，通过官方的宣传，他们相信，在他们国家进行的斗争与民族自由无关。所谓“民族自由”，那只是先前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恢复失去的特权的外衣。

当然，在“二等俄罗斯人”（战争结束，苏联人重返波罗的海地区后建立的政权）统治下，首先参加到苏联支持者行列的，有大量的唯命是从的人和追求名利者，有那些恐惧国家政权的力量或者“为了一块金子、为了一匙美味”（立陶宛诗人温卡斯·库季尔卡的诗句）而支持任何统治者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站到苏维埃一边是因为他们被真正地转变过来而相信它的“真理”性。苏联当局慷慨提供给出身卑微富有野心的年青人以充分地升官（大多数人在过去或许连做梦也不曾想到过）机会，这一事实被一些人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因此，由于获得这种机会，这些人便自认为他们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建设共产主义和真正公正、富裕的社会。事实上，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已为新专制政权的惯用伎俩所蒙骗。为了弥补政权缺乏的合法性，他招募人民中最底层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一支新的军队——一种已经绝迹的古罗马禁卫军式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是容易操纵的，因为为了地位、为了特权、而且为了纯粹的生存，它完全依赖于这个政权。

1944—1945年，红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一建立，就为招募“禁卫军”（或如官方宣传的那样，

为赢得“波罗的工人、劳动农民的儿女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而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以新建的教育设施最为著称。所谓的“速成高中”(为学员提供生活津贴的速成全日制高级中学结业课程)在各主要城市建立起来,其服务对象是那些热情的追随者。以青年工人为对象的高中夜校网(在这里,人们可以取得高中学历而不中断工作)逐渐扩展到面向有热望参加的人。从这些教育机构毕业的学生,可优先录取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学校,这些高等学校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机构内部的专家”,却不考虑他们的学术水平如何。

对于有功的积极分子——那些参加苏联军队,同意在“灭绝人的军队”(由当地人特别组成的同游击队对抗的准军事组织,后来更名为“人民防卫队”)服役的人,或者在其他方面愿意为苏维埃制度——特别是为“速成教育”服务的人,都得到了安置。

“速成教育”有如下两种形式:一是在几个月内,把仅仅有阅读能力的人训练成法官、检查官、安全和军事部门的官员、经济管理人才等等的“学院”;二是培训经过挑选进入党和政府重要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校。

通过这些措施,苏维埃政权在几年之内培养一批忠诚的、富于献身精神的民族干部。这个进程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比在爱沙尼亚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爱沙尼亚,“民族干部”主要是“叶沙尼亚人”即居住在俄罗斯被同化了的爱沙尼亚人。1940—1941年和1944—1946年,这些“叶沙尼亚人”被派往爱沙尼亚占据重要岗位,保证了国家苏维埃化的顺利进行。这样的人也被派往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但是在那里,特别是在立陶宛,他们更平等地与真正的当地干部结合到了一起。

提拔那些决心通过苏维埃化途径“由卑微上升到富裕”的当地人的政策,取得了相对成功。这种政策除保证了苏维埃政权为其事业必需的当地工人之外,也在波罗的社会中产生了真正的意识

形态分裂，从而使先前被占的波罗的海民族同外国占有力量之间的直接对抗转化为波罗的人口中的少数派（仅有几千人，他们出于理想主义或机会主义理由而拥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目标）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和对民族独立的思想和目标的始终不渝）之间的真正对抗。

在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游击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内战。的确，只要政府和游击队（或敌后游击队）之间的公开战斗在继续，它就为积极表达真正人民的观点和目标提供了一个联系环节和结合点。波罗的海民族矛盾的政治态度在这种战斗中完全无疑地暴露出来。无疑，只有极少数转到新主人一边，而绝大多数人则仍然在抵制他们。

抵抗的情绪，初始时势不可挡，以后逐年减弱。得不到西方（它们宁可无视波罗的海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更不用说帮助，越来越多的波罗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孤立地对强大的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民族自杀。因此，他们渴望通过任何手段来结束这场战争。持这种看法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例如立陶宛的约纳斯·杰克斯尼斯、米奥泽斯·马库立斯和科斯塔斯·库比林斯卡斯。由于知道不能说服抗抵运动领导层中的同伴停止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变成了克格勃的秘密特务，积极地协助（主要通过提供重要的情报）从内部破坏抵抗运动。与克格勃合作的结果是，几千名先前的朋友和同事连同他们的家属被枪决或被长期关押在苏联劳动集中营里。但是，他们仍不悔悟，说如果这是为保证民族生存所付的代价的话，那是值得的。

这样，经过8年的殊死武装斗争之后，公开抵抗开始日渐衰退。但抵抗并未因为苏联对抵抗者的决定性军事胜利而最终结束。毕竟，以前游击队虽然几次受挫，但每次都有新的志愿者补充进来，恢复了他们的队伍。然而，在50年代，主要是由于上文



所解释的原因，不能再征募到志愿者以继续这种无望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开抵抗的新生力量没有出现，而且，整个公开抵抗运动在渐趋消亡。但这种事实，丝毫不意味着波罗的海民族已从内心里向苏联政权投降或者已经决定全心全意地接受它。而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在东西方和平共处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直接反对占领不仅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带来许多毁灭性的后果。因此，波罗的海人民停止反抗苏联占领的战争并不是出于默许，而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有了新的、经过痛苦求索才得出的现实主义的认识，不是苏联也不是波罗的海各国，而是政治现实主义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因此，战争远未结束；停火，即使形势平静，也不一定意味着和平。波罗的海各国只不过把他们的与占领者斗争的最后行动推迟到更好的时刻，因为他们清楚，这些更好的时机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能获得的。当今的比赛就是忍耐，比赛地点在莫斯科，在那里，帝国将在所有被压迫民族（也不排除俄罗斯民族本身）的压力下崩溃。

## 屈从与抗议

（1952—1982）

武装抵抗结束，屈从成为今天的社会秩序，民族独立理想的声音连同抵抗运动组织网一起消失了。这些理想，从可见的社会表层以破碎的形态隐入每个波罗的海人的内心世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垄断位置占据了社会舞台。结果，后者尽管从未深入到广大人民的“内心”，但它却是把波罗的海社会连结在一起的唯一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纽带。不用说，这种形势使大多数波罗的海人与他们被迫生活在其中的官方社会拉大了距离。这种距离终究会变小并最终实现真正一体化的愿望是徒劳的。事实

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会越来越拉大。而且，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现在，这种距离已达到了它以前从未达到过的绝对、广泛的程度。

的确，苏联当局最初在波罗的海地区所获得的有限意识形态支持在恐怖时期保持了下来（甚至有所增长），但在1952年之后人民与政权和平共处时期这种支持却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这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却是真实的，苏联共产主义对波罗的海社会表面上的完全胜利在波罗的海人民的道德和政治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同等程度的逆反作用。

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或者，至少是愿望）的波罗的海人已经依附于新政权的理想和期望完全没有成为现实。现在，有的是更少的自由和更多的非正义：由于农业集体化，贫困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急剧增强了，但除了极少数上层的共产党官僚外，它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明显的是无可挽回了。血流成河，却完成了一个任务：为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新的权贵、老党棍及其新征募的“禁卫军”设置席位。对民族、个人权利的亵渎已不能再用战争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在这方面，新形势给原先那些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以特别强烈的影响，使他们清醒了过来。他们认识到现实背叛了他们所相信和希望的一切。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使共产主义同情者发觉要忽视它是不可能的。

尽管新权贵（或者，像米洛凡·吉拉斯所称之为“新阶级”）有这种认识，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愿意继续地坚持下去。大多数人出于纯粹的私心和野心家的动机，诸如害怕和贪心，坚持了下来。有一些人则怀有复杂的目的，决心运用他们新获得的影响地位为他们的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最天真和理想主义的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适应现实，从而与政权的苛刻要求发生冲突，他们被新制度清除或抛弃了。

一些“头脑现实”的学会了如何避免冒险，继续恭顺地为政

权服务。他们或许对身处的环境感到最为耿耿于怀。毕竟，正是他们，在日常活动中，不断经受着莫斯科令人窒息的权力的压制，经受着被剥夺任何独立意志、被降到盲目执行上面任何专断、高压决定的机器人地位的屈辱。无论他们维护其新贵权职位的动机如何，他们的雄心业已受到重挫，内心的不满和失望更是势不可挡。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在波罗的海土著人中失去了它真正的、意识形态上的最后支持。到50年代中期，这种支持完全消失了，代之以纯粹的机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势必产生某些至少是半公开的冲突。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爱沙尼亚。它以1946年爱沙尼亚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此之前，他是“人民”政府的首脑）约翰内斯·瓦列斯——巴尔巴鲁斯的自杀开始。有充分证据证明，瓦列斯自杀的原因是他对爱沙尼亚本来的期望（这种期望驱使他成为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和他所领导的苏维埃爱沙尼亚现实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即使不是全部的话，也有许多土著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具有相似的感情。他们在其职权范围内运用各种温和的手段努力保持爱沙尼亚的国家地位。瓦列斯的自杀引起了克里姆林宫对这种态度的警觉，他们严密监视着爱沙尼亚共产党，并在1950年发动了一次对党内民族领导人和党员的清洗。大量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古拉·卡罗塔姆、部长会议主席阿诺尔德·魏莫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爱德华·帕尔—奥尔，被指责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虚饰的分离主义错误，陷入了狭隘的本质上是非社会主义民族传统主义的泥潭。结果，爱沙尼亚党的领导层和整个爱沙尼亚政府机构较以往更为“叶沙尼亚化”和俄罗斯化。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另一个几乎不懂爱沙尼亚语的“叶沙尼亚”约翰尼斯·卡宾接任，他的任务就是保证在将来不再发生“偏离”。他的确尽全力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58—1959年，拉脱维亚也发生了相似的思想崩溃现象，主要罪犯是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前里加市委第一书记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和他一起被清洗的还有拉脱维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平斯基斯，拉脱维亚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A·鲁斯库利斯以及大批其他著名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被指责有“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向”。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奥佐林斯也在这次清洗中失去了权力，由被免去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的亚尼斯·卡尔恩别尔津斯接任。卡尔恩别尔津斯从1940年到1959年被清洗一直担任第一书记职务（作为对党负总责的领导人，组织认为他犯有错误）。一个拉脱维亚血统的俄罗斯共产党员阿维兹·佩尔舍成为拉脱维亚第一书记，并出色地执行了60年代初期撤换所有身居高位的土著拉脱维亚人的任务。（甚至经验丰富的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拉西斯也被解除职务，而他明显与“倾向主义者”没有关系，并积极地谴责他们）。尽管如此，17位拉脱维亚老共产党员写信（他们宁可匿名）给世界上的几个共产党，不仅公开为别尔克拉夫斯路线辩护，而且强烈地谴责了苏联在拉脱维亚的政策，要求“兄弟党”谴责苏联共产党在拉脱维亚对“列宁民族政策”的粗暴破坏。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尽管受到压制，土著拉脱维亚共产党组织的民族理想比以前更加旺盛。

立陶宛发生的事件表面上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立陶宛没有发生对党的清洗，也没有指控任何党员持不同政见或者偏向。这主要是因为，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安·斯涅奇库斯与他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同行不同，他是一个以强硬、资格老和专制著称的领导人，从1926年开始，一直任第一书记，实际上他独自掌管立陶宛共产党，并完全控制其中的每一个人。无疑，立陶宛党内任何人的言行都必须得到斯涅奇库斯的许可。他对他的同伴有完全的权威，他也试图在与

斯大林以及整个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关系中行使这种权威。斯涅奇库斯的无情和不宽容具有传奇色彩。在流放和镇压时期，他甚至没有饶恕最亲密的亲属，更不用说其他人。斯大林本人对斯涅奇库斯的行为有深刻的印象，甚至曾说过他们两人在当时是整个苏联所剩下的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被从莫斯科派往维尔纽斯任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陶宛局主席，其工作是监督立陶宛共产党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帮助”他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苏斯洛夫不仅完全崇拜斯涅奇库斯，而且深受他的影响。斯涅奇库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他1974年的逝世。这就解释了他如何能够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自巍然不动。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人，其党内的生涯亦早就告终了。

然而，最终对苏联现实的失望情绪，就像对其他波罗的海土著共产党员的影响一样，影响到了狂热的斯涅奇库斯。但是，他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因而没有公开偏离莫斯科的路线，他懂得如何在卡罗塔姆和别尔克拉夫斯的失败之处取得成功和求得生存。

一位与斯涅奇库斯密切交往的苏联秘密出版物作家 T·任科利斯（笔名），在为斯涅奇库斯写的讣告中证实，在斯涅奇库斯在位的最后20年左右（从40年代后期或50年代早期开始），他变得难以辨认，“起初，莫斯科甚至想象不到能在立陶宛找到一个更坚定地执行它的意志的佣人”。任科利斯写道，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可以从斯涅奇库斯的行动中察觉出一种民族倾向，一种对立陶宛特殊利益的保护，一种首先是促进国家正确发展和繁荣的努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进化，这种进化导致了对苏维埃制度的幻灭，导致了人们对为之服务的假上帝的幻灭，这甚至影响到最忠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确实，仍然有些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不再把他们的信仰和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到50年代前半期，已经不再有出于理想和信仰而继续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土著波罗的海人了。波罗的海人中不再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由苏联政权所代表和实行的那种共产主义。因此，表面的屈从之后隐藏着同等程度的内心异议。无疑，内心的异议往往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屈从的彻底性。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基本的屈从和彻底的异议之间的特殊结合，直到今天，这个结合已成为波罗的海人民和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独特特征。为了理解这种结合在实践中如何起作用，有必要把波罗的海人的目的论政治态度和实用主义政治态度区分开来。

目的论的政治意识与人们对他们自身，他们的民族，他们周围世界的理想政治前途的积极看法相一致。因此这也意味着要有一种政治变革计划，没有这种计划，未来的目的将仍然不能达到。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波罗的海人民的目的论政治意识具有一致性和明确性，从而可以得到恰当的界定。今天，每一个波罗的海人，甚至包括政权的最积极合作者，都具有这种目的论的政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普遍性。如果下一个定义，它具有下面5个方面的特征：

1. 在民族疆界内，每个波罗的海民族重新建立真正自由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2. 把现行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转变为符合如下条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a)符合民族传统；(b)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c)能够为个人和他们自由形成的组织行使独立的动议权，提供充分的余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发挥他们在生活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中的潜力。

3. 与西方世界建立直接的、紧密的和持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消除对人们出国旅游的限制，并最终实现波罗的海国家与西方文化一体化。

4. 在各波罗的海国家领土上恢复民族上、语言上和文化上紧密联系——如果不是完全同族的话——的民族社会。（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中，这被看成首要的问题，而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更为突出。在这两个国家中，俄罗斯人和其他异族人占全人口的近50%。在立陶宛，非立陶宛人只有约20%。）

5. 在民族上紧密的社会结构内，提倡彻底的宗教和文化自由。

这种目的论倾向是如何转变为对社会现实之实用主义态度的呢？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人们日常的政治行为（这仍然以对苏维埃统治的基本屈从为特征）。屈从要求所有波罗的海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服从主义，虽然这种服从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不一。在完全的服从和彻底的反叛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波罗的海人的现实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的确，把自己整个生活和事业完全建立在对政权绝对服从基础上，为了安全、权力和舒适完全背叛了目的论倾向的彻底服从主义者非常少。那些服从于政权的绝大多数波罗的海人试图把服从主义和被称之为自然保护主义倾向，或者自然保护主义结合起来，这种倾向表现在运用官方地位去做任何能够保护民族特征、民族的自然和精神资源，保护民族统一、完整以及能增进相对福利的任何事情。在某些情况下，保护主义者超过了官方容许的限度，倒向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分子一边。

超制度活动分子的不同政见（反对当局的某种政策或要求变革）早在1956年（军事抵抗结束后四年）就在波罗的海开始爆发了，并从此有增无减。正是在这种爆发中，波罗的海各民族真正的目的论政治倾向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现实实用主义和目的论政治倾向之间的接合点越来越多。换言之，1956——1982年，民族的自我维护（通过抗议、要求、地下出版物和独立行动各种形式）日益增加，并在所有波罗的海共和国中

不断缓慢地发展。

在最后10年里，特别是60年代后期以来，波罗的海国家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各种出版物中有详尽的记载。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自发的群众性表现形式以外，有组织的抗议行为只是偶尔发生，并着重于一些特殊问题（宗教权力、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后来逐渐侧重于民族和个人权利等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上。不同政见以各种团体、委员会以及定期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形成了固定的格调。

在立陶宛共建立了两个与政权公开对抗的委员会，一是所谓的立陶宛赫尔辛基组织(1976)（这是那一年在苏联建立的几个这样的组织之一）和保护天主教权利委员会(1980年)。赫尔辛基组织尽管遭到政府的镇压，损失了其大部分积极分子，但仍然在努力吸收新成员，维持自己的生存。从1983年开始，保卫天主教权利委员会遭到了当局镇压性的攻击，这种攻击以1983年5月对其领导人阿尔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由于反苏宣传而被判7年拘禁和3年国内流放）的审讯而告终。尽管如此，委员会仍然保存下来并坚持活动。1983年5月—6月，71个教区有41,905人签名（其规模是空前的）为斯瓦林斯卡斯和塔姆克维秋斯辩护，这对继续活动是极大的促进。在立陶宛，也有一些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他们不公开活动，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出版了一些地下出版物。后者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在拉脱维亚，1975年出现了3个这样的组织：拉脱维亚独立运动，拉脱维亚民主青年委员和拉脱维亚基督教民主组织。1976年，他们开始协调行动，联合向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澳大利亚总理（马科尔姆·弗雷泽）以及其他人发表呼吁。另一个更激进的组织——拉脱维亚独立组织，组织了贯穿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的各种抗议行动、请愿和提出各种要求。



在爱沙尼亚，1970年有两个这样的组织脱颖而出，爱沙尼亚民主运动和爱沙尼亚民族阵线。1974年，爱沙尼亚爱国者也建立起来。政府破获了较早的反对组织之后，于1976年关心爱沙尼亚人协会也诞生了。除了上面提到的组织，1978年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组织——白钥匙兄弟会和马加玛。这两个组组主要关注文化自由问题。

立陶宛地下期刊不仅在整個苏联而且在东欧都是最多的。除了《天主教会纪事》（1982年庆祝它连续出版10周年），至少还有20种其他非官方的期刊在这个加盟共和国发行。《黎明》是一种世俗的地下期刊，自1975年起一直定期出版。1976—1979年间，出现了大量宗教的和世俗的地下杂志。在宗教类中，值得一提的有：《上帝和祖国》和《悲伤的基督》。在世俗类中，从1977年开始出版的《钟声》，坚持立陶宛自由传统；《校歌》（1979年）讨论高等教育问题；《避难所》和《展望》杂志讨论文学、哲学和艺术问题；一些其他的杂志，诸如：1976年开始出版的《真理之路》和《自由号角》没有什么特色。但是通过探讨各种不同的主题，代表立陶宛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些期刊中有几种被当局关闭，编辑人员受到严厉惩罚。然而，《展望》和《上帝与祖国》在短时期（1981年）停刊后又重新出现。同年，一种崭新的地下期刊《民族之路》出现了。

在爱沙尼亚，1971年，《爱沙尼亚民主主义者》期刊开始出版。随后不久，《爱沙尼亚民族之声》也出现了。爱沙尼亚地下期刊所特有和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俄文版的。《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出版俄文本，还有一种专门俄文期刊《自由之路》。另一种爱沙尼亚地下期刊《半日报》，在1978年开始出版，但一年之后被苏联当局查封（仅仅出版发行了6期）。

尽管当局已经实行（并不懈地继续实行）残酷镇压摧毁有组织的波罗的海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政策，但它不仅坚持而且发展了

新形式的组织行动。重要的是,近几年来,所有3个波罗的海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已开始统一协调,联合进行冒险行动。例如,1979年8月23日(著名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40周年纪念日)一个由3个共和国45名代表签名的联合请愿书在莫斯科发表。请愿书要求苏联和两个德国宣布把波罗的海国家转让给苏联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无效。这次请愿有其特殊意义,不仅因为它是波罗的海的首批演习之一,而且由于它标志着波罗的海持不同政见者政治新的开始。自从武装抵抗苏联统治斗争结束以来,完全恢复波罗的海三个国家民族独立地位的要求第一次强有力地由准备承担这种行动全部后果的人们以清楚、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事实上,当代波罗的海的持不同政见者已经以团结的方式接过了他们的前辈——游击队战士的旗帜,并且将它高高举起,进行和平斗争。这样波罗的海各国的抵抗运动,按照公开宣布的目标,在1979年回到了它1940年的出发点,尽管在1950年,它近乎已经被不可逆转地粉碎了。

积极的波罗的海持不同政见者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日益加强的合作,也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确立了共同的目标,波罗的海人已经加入俄罗斯人争取苏联民主化的斗争,具有民主思想的俄罗斯人也把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事业看作是他们自己在整个苏联实行民主改革计划的一部分。1979年8月23日,由波罗的海各共和国45名代表签署的要求恢复波罗的海国家主权的请愿书,得到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马尔瓦·兰达、维克多·涅基别洛夫、塔季杨娜·维利卡诺娃、萨哈罗夫和阿林娜·金兹伯格的支持,他们亦在另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以表示声援。

然而波罗的海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合作的历史在此以前很久就开始了。1968年6月,一份代表大量爱沙尼亚技术界知识分子撰写并签名的题为《希望还是行动》的文件对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表示同情,同时对此作出批评性

的评价，并从整体上系统提出了苏联民主改革方案。作者认为这一方案被认为是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获得自由的先决条件。一个相似的文件，《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民主主义者方案》通过地下出版渠道大约与上述文件同时发行。

在拉脱维亚，1968年伊万·雅克希莫维奇斯抗议莫斯科对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和尤里·加兰斯科夫进行审讯，同时抗议对俄罗斯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和迫害。与彼得里·格里戈连科及其他人一起，雅克希莫维奇积极参与了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关于其他问题的抗议活动。在被捕前（1969年3月25日）的一个声明中，雅克希莫维奇向伯特兰·拉塞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格里戈连科、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以及其他人发出呼吁，表示他不仅赞同拉脱维亚，而且赞同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其他地方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

接着，萨哈罗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从60年代后期开始了争取释放波罗的海政治犯的斗争，并经常表达他们与波罗的海各国自由事业同患难、共甘苦的决心。波罗的海人民呼吁书和地下出版物的宣传材料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新闻媒介中公开发表，可能是因为莫斯科持不同政见者把这些东西传播给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缘故。（应该注意的是，197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表了请愿书，而1976年立陶宛赫尔辛基组织也在莫斯科建立。）波罗的海流亡者的文学通过莫斯科的“传送点”进入波罗的海共和国。莫斯科《时事纪事》经常报道波罗的海发生的事件，登载波罗的海共和国地下文献的摘录，并着重摘录《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的报道。1975年12月发生了对莫斯科派主要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科瓦列夫在维尔纽斯审判事件。其罪状之一即他通过《时事纪实》及其他手段传播《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克格勃也对另一个著名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特韦尔多赫列博夫提起诉讼，指控他帮助传播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1976年建立的赫尔辛基组织

与莫斯科类似的组织密切合作，开展工作，甚至波罗的海和其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是在劳动集中营形成的，在那里，他们曾一起服劳役。

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波罗的海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已完全把自己看成是广泛的苏联民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相信这一运动支持波罗的海各国争取独立与自由的事业。正如《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为立陶宛所做的工作就是“使立陶宛天主教会俄罗斯民族另眼相看。他们的牺牲对于所有受迫害的苏联人民来说是必要的，对于立陶宛天主教来说，也是必要的”。

这些进展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罗的海人民今天确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目的不能通过孤立的局部行动来实现。只有与相邻民族，包括与俄罗斯民族合作，他们才有希望恢复自由，因为只要莫斯科政权还保持稳定，他们不这样做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波罗的海人现在懂得，如果他们抱有实现他们政治目的的任何希望，就必须保持内部团结，而且要团结所有真正受苏联统治的其它各族人民，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极权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基于这种意识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并在波罗的海共和国生活中获得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更大的程度上，自然保护主义，群众的内心不满，呈现出日益增长的严峻和挑战姿态，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更是如此。然而，只要莫斯科政权保持稳定，波罗的海各国表面上的屈从和内心的不满之间的相互关系必定基本上保持稳定，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人民的大多数中现实实用主义倾向仍占主导地位——自然保护主义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情绪之间仍然具有相对的界限。这种形势可能持续到波罗的海之外的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使这种界限成为多余之时为止。外族压迫统治下的极端困难和长期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波罗的海各民族的政治理想主义将几乎不能证明行为或行

动的不同进程。但是，这同一种政治理想主义使每一个具有现实实用主义政治倾向的波罗的人、自然保护主义者、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只要有就会为他们认为是可以达到的目标采取独立的姿态。这种普遍对独立和自由的准备是最近30年的结果，在这30年中，波罗的民族已经从苏联政权统治下的军事挫折和种族屠杀中恢复过来，并试图（尽管相差很远）恢复自立、充满活力和牢固存在。这种存在曾经牢不可破，以至于除了实行真正的种族灭绝的屠杀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削弱它。

## 第十三章

# 苏联的穆斯林边疆地区

### 引 论

自从大游戏开始偃旗息鼓，俄罗斯在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确立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以来，苏联穆斯林地区和战略边缘地区几乎没有引起研究者（除个别外）的重视，更未受到决策者及政治家的关注。自然，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地是由于英国身兼英勇的战士、探险家和学者三种角色阶层的消失造成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是他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信息）；部分地是由于苏联防止外界窥视努力的结果。西方政府避免进行详细研究的明确的或含蓄的决定使苏联的意图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只是到了今天，新一代专家才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熟谙这些地区的语言、历史及文化。这新一代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几位有关的、学识渊博的学者，如亚历山大·本尼格森等，努力将重大事件陆续公诸于世的结果。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才认识到穆斯林问题研究上存在的断层，而正是这种断层导致了一些观察家不能对其作出缜密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现在，苏联穆斯林边疆地区的问题既不是帝国分崩离析的导火索，也不是对成功的御用社会科学理论的完美阐述。有人会认为，苏联的穆斯林民族已经历了苏联式的社会政治动员，其精英分子同化了，许多人在当今苏联政治经济

制度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被增选到政府中，从而使严重的反苏的不同政见被横加排斥。

苏联的穆斯林民族是非常有生气的民族。他们是光辉的伊斯兰文明的继承者，完全有根据认为他们曾经是伊斯兰世界的智慧之源。他们的人口正在经历快速增长和变迁的剧痛，并受到边境地区政治、宗教和军事骚乱事件余波的影响。所有这些力量与其他力量结合起来，塑造了苏联穆斯林民族的同一性和政治观。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如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阿塞拜疆族或一些较小的穆斯林民族。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视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想为洪水猛兽，危及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定。20、30年代，为了削弱苏联穆斯林与上述两种思想的联系，苏联政府努力在穆斯林人中间制造一种虚假的忠诚，结果造成了他们的上述政治同一性。当然，民族或部落差异始终存在，苏联当局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难使其人民坚信他们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那种人。然而，滑稽的是，近来苏联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穆斯林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因而，他们自己也应受到应有的谴责。

另一方面，苏联穆斯林仍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并不会由于最近民族差异的产生而被否定。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乌兹别克人，又是穆斯林，正如一个人既可以是沙特人，又是穆斯林一样。但是，一个人可否既是穆斯林，又是新型的苏联人呢？在多数情况下，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但如果说成为新型的苏联人意味着俄罗斯化，那答案就是否定的。这里指的是伊斯兰更宽广的范围。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历史、社会传统。甚至在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中，伊斯兰教也构成了他们大量社会活动的文化基础。从真正意义上讲，伊斯兰传统已成为对抗俄罗斯文化同化的坚固的文化堡垒。这使那些企图同化穆斯林民族的社会工程师大为不悦，他们只得

承认要达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正是由于这一堡垒作用，才使那些从未进过清真寺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和俄罗斯人保持了相当大的心理距离。不像苏联其他许多民族，苏联的穆斯林民族所寻求的不是为了缓和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集新型苏联人各方面的特点于一体的民族同一性。他们遇到的并不是同一性危机，因为他们只能是穆斯林人。

不幸的是，伊斯兰教在苏联穆斯林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同一性中所起的作用常常被人所轻视，其政治意义也被人忽略了。这种情形的发生部分地是由于西方多数专家往往通过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与组织来考察苏联穆斯林的情况造成的。几乎没有人从系统研究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入手研究穆斯林问题，而这些准备工作使人增强逻辑上更有辨别力的直觉。另一方面，苏联人的宣传也起到一定的迷惑作用。长期以来，苏联的宣传人员一直在暗示，苏联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是由老年人和宗教狂组成的，尽管有证据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而且，凡是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伊朗—土耳其—伊斯兰1400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并不会在68年之间被由俄罗斯人支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涤荡干净，这种文化的精华代表了勃列日涅夫全部著作的内容。难道苏联毫无例外地用反面例子来称呼其他民族文化的行为如此有效吗？专家们大都会承认波罗的海民族对自己历史特性执著的留恋及其重要性，而和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相比，波罗的海民族的历史并不那么盘根错节，纷繁复杂。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否认或忽视伊斯兰的重要性而重视后者呢？

在今后的20年中，苏联的穆斯林将会受到帝国内及非苏联边境地区重大变化的影响。只有那些最乐观的决策者才看到了突发性变化的潜在因素，并仍然相信苏联的穆斯林跨入21世纪之后仍会保持现今的状况。可以肯定，诱发变化的力量多种多样，极为复杂；没有必然性，只有或然性，这或许会给苏联领导人带来希



望，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安慰的话。

## 人口的压力

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为苏联内政、外交带来了新的潜在压力，其程度或许比其他任何的内部发展更为强烈。今天，苏联是世界上第5个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截止到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穆斯林人口的净增长远远低于斯拉夫人，1926—1959年（这两年都是人口普查的年份），苏联总的人口增长（42%）和大俄罗斯人口的增长（47%）相比，穆斯林人口增长较为平缓（41%）。或许由于1945—1959年间没有进行人口普查的缘故，苏联穆斯林民族的人口爆炸被掩盖起来，直到1970年普查结果公布才为人们所知晓。1959—1970年，苏联穆斯林人口增长了45%，而全苏人口增长为16%，大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13%。尽管1979年人口普查的详细资料尚未公布，但现在已公布的材料足以证明，1970—1979年，整个苏联人口增长了8.4%，大俄罗斯人口只增长6.5%，而穆斯林人口则增长了23.2%，并且继续保持其高出生率趋势。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1995年，显然苏联的穆斯林将成为其间唯一人口持续增长的民族。苏联的一些人口学家估计，到2000年，穆斯林民族的人口将达到1亿左右，约占苏联总人口的1/3。这一数字可能估计得过高。西方一些分析家认为，其人口总数很可能达到6500万—8000万人。即使按这一较缓慢的比例增长，到本世纪末，苏联公民中有1/4或1/5的人口是穆斯林。

人口的增长本身未必会预示苏联内部民族间或地区间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也不会预示俄罗斯控制的直接衰退或者苏维埃俄罗斯帝国的分崩离析。然而，综观有着同样人口发展状况的其他

帝国的历史，苏联领导人从中几乎不能得到慰藉。正如鲍尔·约翰逊在其当代历史中所指出的：“附属国人民的高人口出生率是殖民主义的死敌，这是20世纪的教训之一”。因此，像苏联穆斯林人口这样巨大和迅速的增长情况至少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在制定关键性的全国及区域决策时采用新的标准。这种变化的后果从长远看确实会改变俄罗斯中心区域和穆斯林边疆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随着穆斯林人口增长的作用日益直接化，任何胡乱对付、避免重大决策转变的希望都破灭了。

有利于苏联穆斯林的人口发展趋势突出了一系列越来越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地方及军事决策者们正在努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比如，苏联的欧洲部分是苏联绝大部分重工业的基地，是技术发达的地区，但一直缺乏劳动力，到90年代末，问题会更加严重，然后才会开始有所缓和。而苏联的穆斯林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劳动力大量剩余，而且在不断增加。如果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奏效的话，大批中亚或其他地区的人会离开家乡，到苏联西部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去工作。然而这种情形迄今未发生。许多苏联和西方人口学家都指出中亚人不情愿迁居，这一事实使苏联政府深为不安。除用强制手段迫使中亚人西迁之外，政府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局限性，才导致了芬兰、保加利亚、朝鲜以及最近北越劳工的输入。

因此，苏联的决策者正面临着困难的选择，是对产业重新配置优先发展中亚地区的工业呢，还是继续努力将中亚的劳动力动员到现存工业中去呢？任何一种选择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迫使中亚劳动力迁移的做法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来看都会是反生产性的。而且，这也直接违背了苏联领导人68年来所声言的苏联各民族平等发展，消除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剥削的原则。迁移一些现存的工业和在中亚及苏联穆斯林边疆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其费用极其昂贵，从而使苏联决策者们望而止步。此外，中亚地区的劳

动力大都没什么技术，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进行教育和技术培训。甚至在中亚地区内部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也极其有限。因此，计划者们又面临将工业建立到远离原料产地、交通不方便的穆斯林乡村地区这一难题。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苏联的决策者在开发中亚边疆地区中还遇到了另外一种永远存在的限制，即缺乏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源。20年来，苏联高层领导曾就使西伯利亚中部几条河流改道，向中亚地区提供所急需的水源的可行性进行过讨论。然而，直到今天，改道工程仍未开始。中亚地区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受到限制。这些地区的当地领导人常常坦率地提出这个问题，近来在公众论坛上，许多人要求拨出巨额资金进行河流改道工程。他们的请求多少带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俄罗斯人不情愿答应这些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据几年前官方的估计，整个工程需耗资1000亿卢布，加上物价膨胀因素，现在肯定远不止这个数目了。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可能希望把这部分钱花到社会福利上，或用到离家乡近的一些项目上。而且，他们知道，一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这些巨额的投资项目（在中亚）会受到中国战略武器轻而易举的攻击，因此，俄罗斯人的忧虑是不可能消除的。

没有新的水源，中亚最大的产业——棉花种植业即使有发展，也不会超出现在的界限太多。假如中亚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继续加剧，而又不能建立新的农业企业，闲置人员会越来越多。当然，农村的失业人员及冗员相对城市而言更易于消化，因为城市里人口高度集中，共同抗议的机会似乎更多。

如果说苏联从事劳动力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已关注变化中的人口平衡及其对非军事性产业后备军的影响的话，军事决策者们，尤其是那些负责为军队输送人力的人，更为这种发展趋势感到不安。穆斯林人的高出生率和斯拉夫人的低出生率正在迅速地

改变后备役人员的组成。苏联的穆斯林人口比斯拉夫人口年轻得多，到90年代，穆斯林18—19岁的青年人在后备役人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截止到80年代末，穆斯林青年人占后备役人员的约 $\frac{1}{3}$ 。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人一直企求用斯拉夫人（在穆斯林中极少例外，最明显的是伏尔加鞑靼人）充实武装部队，这一做法在苏维埃时期尤其明显。苏联的穆斯林由于许多原因在多数情况下被排除在技术性和政治敏感的岗位之外。原因之一是最终忠诚问题。二战期间，几万穆斯林与德国人合作，非常突出。事实上，有许多人加入了希特勒的“东征军”，在反苏战斗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毫无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忘记这一教训，其实，当代苏联军队人员配备及部署的实践表明他们记得很清楚。原因之二，穆斯林人可能是各个民族中俄语（命令语言）掌握最差的。许多人参军时一点也不懂俄语，且丝毫没有学习的愿望。原因之三，除伏尔加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苏联穆斯林人口总的说来技术教育水平比较低，从而使他们不可能担任需要技术的复杂工作。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心理因素。苏联的穆斯林不愿当兵，因为他们显然是官方和非官方民族种族歧视的目标。除个别人被当局象征性地挑选出来参加检阅之外，几乎没有人成为军官。几乎没有一个人选择报考军事院校，尽管既定的行动计划似乎对他们有利。义务兵役期期满（通常是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人重新入伍。大多数穆斯林士兵被分开编入士兵部队，根本谈不上军事训练，指挥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军士——他们说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不是俄语。这些部队中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苏联的宣传机器向外界及穆斯林士兵宣传其军事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社会和民族中起到了巨大的平衡作用。部队被描

述成一个大熔炉，来自各民族的人在这里融合到一起，在他们离别时个人的、民族的偏见被淡化了，相反兄弟般的情谊、“苏联人的友谊”观念加强了。但是实际情况却几乎与此恰恰相反：穆斯林士兵像其他少数民族应征入伍的士兵一样在退伍之后民族感加强了，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个人和群体的目标与俄罗斯社会目标的巨大差异。有的军队中的穆斯林士兵天天受到地位低下的屈辱，他们时常感受到他们虽然在帝国军队中服役，但仍然是殖民地人。人们一定会奇怪怎么会会出现这种相反的情形呢？

假如苏联领导人企图保持跟现在水平大致相当的军队（据多方面估计大约有450万人，也有人估计有600万人），假如军队在穆斯林人员配备和军队驻扎方面的政策大体保持不变，有人或许会严肃地问今后15年中应征入伍的斯拉夫新兵怎么会满足需求呢？苏联军方及非军方人士都担心，军队中斯拉夫人大幅度的减少在80年代中期就可能发生。假如担心变成现实（我认为肯定会成为现实），苏联人将会面临一些困难的、不愉快的政策抉择。这包括：①把更多的穆斯林人招募到技术及政治性的岗位上来，不惜付出削弱俄罗斯人在那些地区的控制的代价；②延长兵役期，这虽肯定能达到为部队提供足够斯拉夫军人的目的，却也同时延长了劳动力缺乏的民用工业缺乏青年工人的时间；③裁减军队，努力用现代科技弥补人员的空缺；将穆斯林工兵部队转入非军事部门，从而使更多的斯拉夫人入伍。此外，还可以设想其他解决途径，抑或可将上述的各种办法结合起来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采用任何方法都要直接付出相当的代价，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检验苏联制度的能力和重点。而且，对这个问题任何明显的解决途径都要求苏联当局对其军事制度及其与苏联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战略估价。

对苏联穆斯林在军队中的作用估价，以纠正应征队伍中民族成份不平衡状态，或策划新的军事行动机会，都必须对穆斯林在

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中的行为予以考虑。几乎从任何方面讲，穆斯林士兵都是首批派往阿富汗的占领军中的一部分——这明显背离了以往苏联推行的在边境军事行动中努力排除与被侵占国家人民有民族或宗教联系的士兵的政策。尽管这方面的资料较少，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次之所以打破先例是基于实际的考虑：为了较快地组织好对阿富汗的入侵，须将靠阿富汗边境最近的部队调集起来，并补充从地方来的后备役军人（在这次入侵中，补充进来的是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中亚人）。当然，苏联领导人可能从中取得意外的政治收获，也就是说，最终结束了第一次入侵浪潮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穆斯林人因其能够和自己的同族人（占阿富汗兴都库什北部地区人口的大部分）交流而减弱了进攻的残酷性。但是，考虑到苏联当局为了防止伊朗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革命影响苏联南部边境的穆斯林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难以想象同一当局会对大批苏联穆斯林和阿富汗人——世界上最虔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面对面的交锋感到放心。

不管他们起初派穆斯林人去阿富汗是基于何种理由，但几个月之后的1980年2月苏联领导人把绝大部分穆斯林士兵从阿富汗撤了回来。各种媒介、流亡者及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报道都坚决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苏联穆斯林士兵在同自己兄弟作战中表现得不够可靠。据报道，在苏联穆斯林士兵和阿富汗人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兄弟般的情感，通往苏联穆斯林地区的可兰斯交通拥挤，穆斯林后备役人员擅离职守，拒绝履行职责，不愿同阿富汗游击队作战。（据许多未得到证实的报道，苏联军官和步枪班跟随在首批入侵的部队之后，旨在击毙临阵脱逃者，这是二战期间惯用的政策。）

最终导致苏联穆斯林撤退的原因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失利，这无关紧要，因为，如果没有军事制度的根本改变，两者

都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改变。因此，苏联军政领导人不仅面临必须向部队补充更多的穆斯林普通士兵以达到既定的人力定额的可能性，而且确实担心他们对军事行动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条件。如果苏联的穆斯林士兵在阿富汗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可靠的话，那么苏联领导人怎么能够在不放弃其他非常需要集中斯拉夫部队而人力配备严重不足的战区（如中苏边境、波兰）的情况下，筹划对穆斯林人占统治地位的波斯湾采取军事行动呢？

## 帝国的边疆

事实上，苏联所有的陆地边境线都有与邻国共同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一点在苏联南部及东南部的高加索—阿尔泰山脉一线上表现得最为显著。这条边境线蜿蜒曲折，沿途有许多不同民族，其中多数是突厥—穆斯林人。因此，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及其他民族不仅大批地居住在苏联，而且居住在中国、阿富汗和伊朗。尽管那些地区均由克格勃边防军严密防守，而且有些地方还埋设了地雷，然而这并非是牢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可以抵挡住无线电广播和外国游客的进入，因此也就不能抵御住异己思想从外国的流入。进入苏联的大多数的国外思想可能会令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青团员极端厌恶，却可能在穆斯林社会中引起现实的或潜在的共鸣。

伊朗的伊斯兰骚动和大部分是由伊斯兰教激发起来的抗击苏联侵占阿富汗的抵抗运动，为伊斯兰思想向苏联传播提供了时机。尚无证据证实有大规模的传播，但从苏联的行为来看，来自伊朗及阿富汗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副产品已经渗透到了苏联。

自伊朗革命开始以来，特别是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苏联在穆斯林地区的新闻媒介反复警告当地人戒备伊斯兰思想传播的危险。伊斯兰教首次被看成是一种以反社会、反社会主义为特点的宗教，并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及人类组织的反动基础而受到批判。在此之前，一些反对宗教的苏联学者曾努力找出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合逻辑的地方，对伊斯兰教进行批判。同时，苏联报刊上反伊斯兰宣传增加了。

苏联对边疆地区伊斯兰骚动所采取的另一项有力措施是反对“平行伊斯兰教”。平行伊斯兰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地下秘密宗教。因为伊斯兰教（至少是逊尼教派），与天主教和东正教不同，它不需要专门的教会人员来举行宗教活动，几乎所有懂得一点伊斯兰传统的人都可以主持一些规定的仪式（如葬礼、割礼等）。平行伊斯兰教虽受到苏联当局及塔什干穆斯林组织的责难，却为苏联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和不得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举行了各种仪式，使他们从精神、文化上都得到了满足，这是官方批准的有限几个清真寺或政府许可的传教士所不可能做到的。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那些常常是略通伊斯兰教义的秘密巡回教士替代了国家许可的穆斯林组织的雇佣人员，他们常在遍布苏联穆斯林乡村的地下清真寺中传教布道，举行宗教仪式。

50年来，平行伊斯兰教有了很大的发展。苏联当局对穆斯林传教士采取的高压手段（多数人清洗），使这种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官方对传教者实行制裁，对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教育运动，但它仍继续急剧发展。

平行伊斯兰教早就在阿亚托拉·霍梅尼革命以前就已经产生，但是，正如苏联官方传播媒介所表明的，后者无疑为它增添了新的活力。（据土库曼一则报道说，一些穆斯林教士充分利用电子技术的进步，把霍梅尼的讲演灌制成盒式磁带，以便于在信徒



中广泛传播。报道对此表示痛惜。)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自从伊斯兰宗教狂热加强以来,苏联领导人已授权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开放了许多清真寺,其意图显然是为了把信徒从秘密清真寺中拉过来,以便于监视和控制。

此外,官方打击的矛头还指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兄弟会。同世界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一样,苏联是许多传统地下伊斯兰团体或兄弟会的东道国,这些组织公然反抗政府消灭它们的企图。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中,泛神论神秘主义者通常被看成“宗教狂”,有时则被描述成“宗教恐怖主义者”,暗示他们的活动有时可能带有暴力因素。但是,泛神论神秘主义兄弟会并不代表苏联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制度,其成员也并未自命如此。苏联的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更广泛的联系中。这些秘密组织的目的是要通过组织和纪律约束的手段来维护真正的信仰。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在穆斯林边疆地区保存了数以百计的圣地,这些都是伊斯兰教在逆境中生存的明证。过去,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在高加索北部及中亚地区反俄、反苏抵抗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上述兄弟会最近在反对苏联军队的阿富汗圣战组织中亦起突出作用。因此,尽管我们还不能说泛神论神秘主义者代表的是反苏恐怖主义组织(个别情况除外),但他们在危机到来时可能会成为穆斯林反抗苏联统治运动的催化剂。除此之外,这些兄弟会从政治上讲对其秘密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它们显然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抵住了苏联政府企图消灭它们的运动。它们为泛神论神秘主义者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而神秘主义者则通过讲道和保存圣地—伊斯兰教权力存在的象征,把自身贡献给伊斯兰群众。

## 中国因素

许多到过塔什干及中亚其他主要城市的旅游者都听人提起毗

邻的中国人，谈论他们将如何逐渐地把俄罗斯人从中亚赶出去。

“等中国人来了，他们会让你们尝尝厉害！”人们常这样威胁说。然而，凡是懂一点近百年来中亚历史的人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威胁性语言。况且，所有苏联的中亚人都清楚地知道，几乎所有逃离专制的移民都是从中国流向苏联的（尽管苏联人无疑是从多方面鼓励这种断断续续的移民）。拿中国人来威胁俄罗斯人，从中亚人的角度讲纯粹是一种反俄罗斯主义，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宁要不知晓的魔鬼，而不要已熟知的魔鬼。

所有这一切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国一直采用了苏联的民族关系模式，即将少数民族强制同化到多数民族中去。而现在，中国的政策似乎正在经历实质性的变化。如果中国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对新疆的政策完全得到实行的话（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承认这是困难的），它将会为苏联的中亚人提供某些诱人的政治选择。

中国政府最终意识到他们的民族生存并未受到占全国人口6%—10%的少数民族的威胁之后，已经开始改变几十年来实行的使少数民族特别是新疆穆斯林疏远的政策和作法。强制性的汉语培训已经削减；政府宣布居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并迅速修缮或建立起了许多清真寺；许多政治、文化界的著名民族人士得到平反昭雪；地方性的事务逐渐转移到当地管理者手中。新政策特别有吸引力的方面是，它要求将不顾当地居民强烈抗议安置在新疆的汉族干部调离至少50%。所有这些变化，肯定会在苏联中亚地区引起巨大的反响，不管这一政策能否实施。大多数穆斯林无疑也欢迎苏联政府作出类似的许诺。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举动，这无疑取消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殖民者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居住权。

几十年来，中苏边境上展开了一场时强时弱的宣传战。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忠诚起着存亡悠关的作用，他们是对方营垒中潜在的“第五纵队”。即使在没有完全实行新政策以前，中国人

已经具备了赢得战斗的强大心理武器。而且，他们有意把伊斯兰教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许多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利用伊斯兰教向苏联人发起新的进攻。（近几年来，尤其是苏联侵占阿富汗以来，中国首席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获得了游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特权。他的言论是支持伊斯兰教，反对苏联人的）。自从苏联侵占阿富汗和1980年9月塔什干伊斯兰会议失败以来，苏联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显著减弱了。中国已开始利用苏联的挫折，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向苏联的穆斯林直接发出呼吁，并会在实践中得到强调。那时，苏联对穆斯林地区会更加担心：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与之有几千英里国界线和许多共同民族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会制订并实施有利于穆斯林的具有挑衅性和竞争色彩的民族政策。不久以后，苏联领导人便会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并明白其明显的含义。

## 结 论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帝国，它同样也受到毁灭其他多民族帝国的内外部分裂力量的影响。苏联的穆斯林边境地区是帝国典型的最易受到攻击的薄弱地区。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这个地区要求变革的压力大或事件发展的速度快。这一系列的压力（有些本文已讨论过）及其化作真实力量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地、也许甚至会加速游戏规则的变化。

当然，有人会认为，苏联的穆斯林已经顺从了苏联的社会制度，现在他们已成为那种制度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益处。按照这种观点，利益取代了不满。无疑，苏联帮助中亚发展了经济，但这种发展却让穆斯林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及人性的代价。而且，很难说苏联穆斯林民族在另外一种政治制度下不会发

展得更快、更好，因为在苏联的统治之下，他们从来没有过政治选择的自由。由于中亚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为苏联式的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人不允许他们选择其他发展方式，因此，得出结论说苏联的穆斯林民族“同意”这种制度，那实在是非常荒谬的。

也许，苏联的穆斯林已变得非常循规蹈矩，在莫斯科建立的有限的选择范围之内相安无事地生活。他们为什么不该如此呢？尽管游戏不是他们创造的，但他们目前只能容忍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明智地利用手中的工具以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不应把他们对制度的利用误认为是“同化”或“一体化”。事实上，苏联穆斯林在现存政治制度下的发展，可以从恰恰相反的方面来解释：他们正在静静地、逐渐地索回20年代被俄罗斯人剥夺的部分权力和权威。比如，最近有关乌兹别克干部招聘及调动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化”倾向，也就是说，过去由可靠的俄罗斯人及其他斯拉夫人担任的许多部门中的权威职位逐渐由中亚当地人担任。然而，俄罗斯人依靠新形成的地方性职位（在这些职位上，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权威），仍然掌握着最后的权力。此外，据一专家说，俄罗斯人现在已不是首领，而是看门狗，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利于乌兹别克共产党精英的进一步变革不可避免，这会把俄罗斯干部未来的作用降至与乌兹别克发展更相适应的水平。”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一倾向，注意中亚人利用现存的制度在许多方面摆脱俄罗斯人控制的政治含义。我们在对这一进程进行估价的时候，应该认识到，一旦时机成熟，“屈从”的殖民地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向主人反戈一击。这种情形历史上不乏其例。

苏联的穆斯林边疆地区不应该与具有战略意义的、从中国西部至安纳托利亚西部更广大的中亚地区割裂开来。这一地区被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从中国穆斯林地区

的政治改革到伊朗的宗教改革到土耳其的经济改革，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影响苏联南部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俄罗斯人对这些趋势所做出的反应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他们竭力破坏与其穆斯林地区接壤的国家内部的变革，直接参与或支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宣传 and 颠覆（新疆和伊朗）、实行恐怖主义（土耳其）、进行军事干预（阿富汗）等活动。认识到苏联人在致力于改变在整个这一地区已占优势的社会、政治、经济趋势，我们应该对他们为苏联中亚地区（他们努力保护和使之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忧虑，保持警觉。

苏联作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由于西方对苏联各民族特别是穆斯林民族区别对待政策而产生的战略机遇的考察早就延宕已久了。拥有如此漫长的易受攻击地带的苏联边疆地区受到各种压力的影响作用，中亚地区可能成为最后帝国根本性政治变革的催化剂。对各种变革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为实现这种可能性制订计划将是我们的优势。

## 第十四章

# 苏维埃帝国民族主义中的反犹太因素

### 反犹太主义与民族主义

反犹太主义是革命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必然组成部分。同样，否定反犹太主义则是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思想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对于旧俄立宪民主党而言，这种观点甚至以明显的亲犹太人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像列乌捷尔恩和斯托雷平（他们像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者一样爱国）这样的开明政治家，尽管不如自由派那么豁达，但也强烈谴责反犹太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任何真正法律秩序产生的障碍。

共产主义政体在俄国的出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并加入了新的内容。俄国社会民主传统中并没有反犹太成份，——在这方面，和人民革命运动形成了对照。1900年以后，列宁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一再谴责反犹太主义，尤其是1900年发生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反犹太情绪大爆发使列宁极为震惊。有趣的是，列宁对这一事件的论述在1959年前出版的著作中一直没有出现。斯大林也当然地是一个热烈地反犹太主义者，这在他上台以后的政策中有所反映，但是，除开了孟什维克一个小小的玩笑以外，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观点。

在苏维埃统治的早期，反犹太主义几乎没有暴露出来，诚然，由于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明显有密切联系，因此，一旦出现，苏维埃当局完全有理由对其进行严厉镇压。然而，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反犹太主义已经广泛流行，而政府也没有试图去掩饰其对日益高涨的反犹太情绪和行动的关心。反犹太主义盛行，尤其是在工人中盛行的文章在苏联报刊上频繁出现。苏联当局未必感到震惊，斯大林在其发动的反对托洛茨基及左翼反对势力的运动中随心所欲地利用俄罗斯沙文主义，激发工人的反托情绪。正如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这是由他的民族出身所决定的，“他肯定是善于投机钻营”，他及其支持者“在俄罗斯精神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政府对反犹太主义声称表示关注，但事实证明，30年代，政府并未在扼制反犹太主义方面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有关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文学作品及宣传也完全销声匿迹了。即使在30年代以前，所受理的反犹太案件数量也极少，效果甚微。1927至1928年间，70多名被告中正式在法庭上受理的只有38例。70人中，有10人被宣布无罪释放，30人被处以罚款，12名被判强制劳动，14名被监禁。1931年，斯大林在给犹太人电讯社的声明中承认：在苏联反犹太偏见受到严厉打击不是事实。30年代，犹太人的宗教也受到压制，政府在某些文化领域（并非全部）执行的是歧视犹太人政策。

诚然，反犹太主义是斯大林恐怖统治中的重要因素——列宁早就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位格鲁吉亚人身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迹象。但是，尽管犹太人都被从政府机关高层中排挤出去，战争期间反犹太主义却更加猖獗，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由于政府战时宣传激发了赤裸裸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感情。犹太人获得的军功章以及战争伤亡数字表明，反犹太主义者指控犹太人在军事行动中消极抵抗乃是不实之辞。但是，战争确实为官方所容忍并受其鼓动

的反犹太主义奠定了基础，从此，反犹太主义成为苏联社会的一大特征。例如，正是在战争期间，政府第一次发布了有关歧视犹太人的命令，并制订了重要职位限额制度。另外，还有其他许多迹象。反犹太主义在军队中，特别是在敌后游击队中肆意泛滥，但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扼制措施，官方对纳粹反犹太政策完全保持缄默。苏联对纳粹残酷杀戮犹太人的漠视态度，甚至使德国人都感到吃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任何人都不得提及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镇压。德国入侵苏联以后，残酷杀戮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对此，苏联当局仍保持缄默，而把它们描述为德国人对苏联大众所犯下的罪行（当然也有例外，如莫洛托夫1942年1月6日、12月19日以及1944年8月的笔记）。这种沉默或许可以用苏联不愿支持德国人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宣传来解释，但却找不出类似的借口为苏联当局面对德国人的进攻未能疏散犹太人作辩护。只要有点计划，总可以比在最后关头实际采取的无计划步骤要挽救更多的生命。

## 苏联现代反犹太主义与反犹太运动

苏联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滋长主要是由于他们惧怕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会日益增强。战争中设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乃是一种宣传，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动员非苏联犹太人从政治上和财力上支持苏联的战争。该委员会成员一再声明，苏联不存在反犹太主义，面对德军的进攻已作好充分准备，疏散犹太人。但这些声明全是谎言。然而，在当时狂热亲苏的情况下，这些声明在犹太人中引起强烈反响。结果，委员会却成了犹太人民族感情的刺激因素。委员会主席，著名电影演员及制片人所罗门·米克赫尔斯成为苏联犹太人有口皆碑的英雄。他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反复强调，



苏联犹太人在忠实于苏联公民的同时，也是世界犹太民族的一部分。苏联人越来越怀疑委员会成员中有民族主义倾向，这与许多国际因素相一致。至1958年，苏联企图把新的以色列国家变成亲苏卫星国的希望化为泡影，苏联已不再那么担心美国的入侵，因而苏联已不再迫切要求得到西方犹太人的支持。另外，1948年夏，第一任以色列驻苏联大使抵达莫斯科，激发犹太人自发地上街游行示威。1948年9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伊利娅·爱伦堡否认犹太民族存在的著名文章，标志着一场苏联文化界反对“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的反犹太运动的开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会员被逮捕，其中大多数在受到秘密审讯后于1952年8月被枪杀。米克赫尔斯在此前即于1948年1月底已被内务部秘密处决。

斯大林正准备发动一场彻底的旨在将犹太人全部从大城市驱逐出去的反犹太运动。这种迹象至1952年底已经明朗化了。国家安全部意图已经非常明显。1953年1月13日公开的所谓“医生案件”第一次公开向米克赫尔斯发起攻击，控告他为被指控的医生联系过犹太人的经济援助（米克赫尔斯的姓氏沃夫西恰好与被指控的医生之一的姓氏相同）。这是苏联当局第一次公开坚定地实施反犹太政策，尽管我在其他文章中曾表明：医生案件中的反犹太因素乃是斯大林企图搞垮贝利亚主要意图的偶然产物。

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也或多或少带有公开的反犹太倾向，这种政策迄今仍然如此。赫鲁晓夫在与来访的社会主义者的谈话中，例如，当他解释自建国初期（那时党和国家领导层中有大量犹太人）以来，怎样造就出了“新型”干部（在场的另外一位党的领导人强调说，所谓的新干部指的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时，表现得确实很坦率。赫鲁晓夫接着指出，党政机关中犹太人太多的话，会产生反犹太主义，因为一旦他们当上干部，总要“把一批犹太同事拉到自己周围”。同时，苏联当局还故意刺激

反犹太人的民族感情，把犹太人视作外来的非苏联社会群体，这种现象在1961—1965年间表现极为突出。那时，苏联社会上经济犯罪普遍猖獗，为此政府进行了一次严厉打击运动，犹太人成了打击的目标。大批犹太人被指控（为被告人数的50%，其中80%在乌克兰）的同时，苏联也展开了一场宣传运动。所有这些使国际律师委员会认为，政府有意识地将经济犯罪的耻辱转嫁到犹太人头上，为的是掩盖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违法现象。

1963年是苏联公开反犹太主义激烈化的一年，自此反犹太主义实际上再没有减弱过。这一年开始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究其实质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及其统治者的进攻，而且还是对世界各地（包括苏联）整个犹太民族的进攻。《赤裸裸的犹太教》一书的出版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由乌克兰科学院出版，书中有插图。作者是一个叫 T·K·基奇科的人。该书作者认为，犹太教是一种颂扬虚伪、贪婪和高利贷剥削的信仰，它与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犹太银行家在同一个大阴谋中联系了起来。基奇科的著作激起外国的抗议，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抗议，并且受到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温和的批评，说它“可能按反犹太主义的情绪被理解，”但此书没有被查封，后来作者还受到了奖励。

从此，这种反犹太运动一直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幌子下继续进行，并随之出现了一批此类问题的专家。事实上，反犹太主义已成为一项既得利益，出现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非常希望反犹太主义存在下去。有一位名叫瓦莱里·叶梅利亚诺夫的专家甚至敦促中央委员会设立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无疑自己想当该所所长），但是，这种想法没有得到实现。大批专著（出版量很大）、小册子、文章、电影、演讲及电视节目自1963年起始终不断问世，特别是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期间更为集中。又例如，在1975至1978年的4年间，研究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专

著达50种之多。这种宣传的中心是：犹太教是邪恶之说，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在从事不道德的罪恶活动。他们指责他们通过剥削他人获得了巨大的财政力量。据说，他们利用颠覆和谍报活动以及国际金融等手段操纵了整个世界。在苏联人眼里，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类似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甚至控告犹太复国主义者挑起反犹太主义，与纳粹勾结杀戮自己的犹太兄弟，他们被当作苏联国家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过去的反犹太主义有其合理的部分，因为犹太人剥削穷人。

## 当代苏联反犹太主义概况

当今苏联反犹太主义的表现形式可分下列几种。首先，许多领域都广泛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歧视——特别是在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业里，在大学以及学术机构里。这些单位在录用人员或招生时对犹太人都会有一个秘密限额。例如据对苏联统计资料的分析，苏联的犹太籍学生人数在1970到1976年间减少很多，而且据近期报道，减少的数字还要大。其次，有一些审判显然无视事实。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审判只是迎合了低级的政治观念。例如，施泰恩博士之所以得以释放，是由于国外特别法庭着手调查此案而促成的。施泰恩一被释放，1977年3月7日《消息报》马上发表文章攻击犹太人活动家阿纳托利·夏兰斯基，诬陷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施泰恩的审判法官私下告诉他说，指控他的罪名都是捏造的——这一点从苏联对此案的报导中也清晰可见）。第三，苏联一直在努力压制任何能激起犹太人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的东西。这包括：禁止所有用依地语（更不用说希伯来语）从事的文化活动；通过控制中学及大学的课程来抹煞犹太人的历史；审查

有关论述纳粹统治下犹太人命运的书刊杂志；严格加强对犹太宗教的控制；否认任何公共组织被允许参加教会活动。

由于外来的抗议，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允许用依地语从事一些小型文化活动，希伯来语也作为一门学术课程在莫斯科大学讲授。一直有反犹太倾向的《十月》最近刊载了一部描写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生活的小说。作品不仅描绘了纳粹的压迫，还从正面描述了犹太人抗击法西斯的活动。

1981—1982年间，在苏联，又有迹象表明，对犹太人镇压的措施有所加强。犹太人曾一度获准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表面上是移居以色列——实际上大多数移民现在都在别处安身），现在移民人数锐减。一家曾一度发行几年、研究犹太人历史文化的地下刊物被查封。1980年10月至1981年12月间，大批犹太活动家遭到逮捕和审判，这是以前多年未曾见过的。显然，外国对苏联的抗议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苏联对犹太人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到1980年底，这种影响已经起不到原有的作用了，这可能是苏联当局在估计了美国及西欧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平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两大事件的反应情况之后，认为他们已不必再害怕西方而造成的。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已没有后顾之忧，西方强权已是强弩之末，因此苏联政府可以安全地消除异己而无需顾及外国的反应如何（非犹太教的其他宗教也受到压制）。

苏联反犹太主义的理由何在？反犹太主义与民族主义又有何种联系呢？从其反犹太宣传的形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反犹太主义的作用之一即是激发苏联的民族主义，促进苏联人民团结在苏联“统治集团”的周围，反对异己的、危险的敌人——国际犹太人。民间的反犹太主义在苏联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共和国中，尤为盛行，并易于利用。至于其成效如何，则难以判断。例如，或许犹太人向国外迁移及对移民的指责已经产生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反响，即：“他们将我们卷进共产主义的

泥潭，现在他们正在逃离，而我们却必须要留下。”反犹太主义也是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有力武器，它在忠诚的俄罗斯民族或苏联公民与“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全是犹太人）”之间钉进一个楔子。这种做法的收效也无法说清。当然，反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作为苏联阿拉伯政策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它可用来在国际范围内动员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舆论支持。亚非团结运动是苏联利用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的形式动员各方舆论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收到极好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犹太主义作为苏联中东战略的一个部分，也是苏联调动世界舆论支持巴解组织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是成功的。

但是，不管苏联从鼓励反犹太主义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无疑这种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苏联已经失去了外国共产党人及左翼集团的支持。虽然就苏联严重衰落的力量而言，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作用不应夸大，但无论如何，它一直是令苏联人非常讨厌的因素。多年来苏联靠谎言来维持自己的形象，把自己装扮成其他国家应努力仿效的完美的社会，但这种表面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直接结果是苏联不得不加强其冥顽不化的代理人工作，用以取代那些想入非非的笨蛋的无谓的活动。在国内，最重要的事实是，反犹太主义赢得了那些不体面的知识分子的拥护，这类知识分子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中起了巨大作用（并且1917年前在俄国也有相当影响），其代表者都是一些意识形态部门的败类或不受群众欢迎的作家。就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而言，有证据表明，他们极为讨厌反犹太运动。安德烈·萨哈罗夫曾反复对反犹现象进行抗议。据一些报道，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机构曾努力机智地避开录用人员时对犹太人的限额规定。1976年2月，犹太复国主义研讨会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举行。据一则秘密报道说，与会的学者并非都能接受官方的政策，并且对政府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中的反犹太主义观点表示不安。著名的反犹太主义批

评家、科学院院士科罗斯托夫采夫抨击最有影响的“官方”反犹太主义者之一的叶夫谢耶夫，说他是一个“新闻界廉价的反犹太主义小商贩。”另外还有一些人，多多少少隐蔽地，特别是以听众意见的形式对叶夫谢耶夫进行攻击，尽管也有部分人为他辩护。会议结束时，会议主席告诫人们，在谈到犹太历史与文化时，禁止使用过激或侮辱性的语言，但他的这种告诫在随后几年里并未起多大作用。

就苏联知识界最令人尊敬的那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而言，反犹太主义没有赢得真正的拥护者。对民主人士来说，这种偏见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时常为反犹太主义而悲叹，萨哈罗夫也多次抨击反犹太主义。我们许多有关官方反犹太主义行为的信息都来自持不同政见的《时事纪事》。即使在大肆宣扬民族主义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也并非每个人都支持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应该提防所有俄国民族主义都是反犹太主义的这种一再重复的假定。回顾历史，我们发现，19世纪中叶在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亲斯拉夫分子的观点中没有反犹太主义因素。亲斯拉夫主义的后继者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这种因素开始渗透到俄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去。这些人比其前辈更关心的是沙文扩张主义，而不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当今有两种情况并存，即与那些宗教和精神方面的民族主义相比，反犹太主义更为那些政治上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所推崇。例如，在索尔仁尼琴一案上，对他的反犹太方面的反复指控都是捏造的。当然，在一些民族主义宗教集团中也有反犹太主义者，然而，总的说来，这只是一种例外，而非普遍现象。或许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的不同政见者圈子里受到舆论气候的制约。甚至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谴责反犹太主义。最激烈的秘密反犹太主义来自那些对教会也进行谴责的民族主义集团，人们怀疑他们是受了克格勃的指使。这一点或许是值得注意的。

民间的反犹太主义在苏联不可能消失，而政府倡导的反犹太主义，只要当局认为这种独裁者用来愚弄其愚昧臣民的并经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政治工具对他们有用，将继续存在下去。或许令人欣慰的是，那些坚持文明行为原则者断言，一度在俄国某些知识圈子里享有相当威望的反犹太主义，将失去其这种尊望。至少对那些通过苏联的审查制度，成功地提高了声誉的人来说是如此。





## 第五部分

### 苏联民族主义对东欧和世界的影响



## 第十五章

### 苏维埃帝国内的东欧

当斯大林“解放”东欧国家的时候，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正在扩展苏维埃帝国的领土。尽管他百般掩饰这一点，但这不仅在某些实际问题得到解决的方式上，而且在斯大林谈论它的时候，都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有助于慰藉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相信，与之交往的是社会主义帝国而非资本主义帝国。

即使在当时，即1945或1946年，在处理与罗马尼亚的关系、解释苏联与被解放国家之间的真正关系时，毫无顾忌的维辛斯基说错了话。在同南斯拉夫外交官阿莱什·贝布莱尔谈话时，维辛斯基说：“西方国家想要什么？他们统治的时间够长的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维辛斯基在坚持西方大国曾统治过东欧这点上，歪曲了历史。更确切地应该说：西方大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对某些东欧国家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然而，苏联解放东欧后不久，不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感到苏联真正统治了这些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祖国”的“兄弟般援助”的牺牲者，许多共产主义者也有同感。

##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对东欧的统治，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国内的变化以及二战开始时就已经形成的苏联外交政策，紧密相关。尽管内部的变化和某些外交政策的调整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最终、实质性的变化却发生在斯大林时期。这些变化在内部表现为一党专政制度建立，而在外部则表现为扩张主义外交政策（1939年与希特勒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国家；进攻芬兰）。

“斯大林主义”是一党专政与军事帝国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斯大林只是合理解释并组织了“社会主义革命”向垄断结构及扩张主义的自然发展。为了使多民族的、社会结构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能继续存在下去，通过斯大林的政策，革命选择了与官僚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相结合的、沙皇传统的政治官僚中央集权制。因为与之相伴随的是工业改革，而工业的发展宣告了苏联幸福日子的到来和全球霸权的取得，因此这甚至受到热烈的欢迎。所有这些发展使统治阶级能够窃用更为持久，或者说，更为永久的源泉，从而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因此，苏联的扩张主义既获得了民族的灵感，又奠定了其社会与物质基础。

苏维埃东欧的出现实质上是苏维埃体制内部变革和外部目标的延续。斯大林和苏联领导集团相信，东欧的“解放”不仅是他们影响的扩大，而且也是苏联党和政府机关控制范围的扩大。大多数共产党几乎都在履行苏联指定的职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除外。它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具有自我意识的阶层。我记得，1948年初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领导集团就在考虑东欧国家与苏联在形式上统一的问题。这将发生在苏联自身重组之后，从而使东欧各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共和

国统一起来。这反过来又导致苏联要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统一起来。

对东欧来说，这一征服过程中，列宁主义作为统一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意识形态，起着特殊的作用。但是，这种精神纽带，如果没有民族官僚阶层的切身利益，更确切地说，没有这些官僚中极权主义潮流的培育的话，是不可能有效果的。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应当把自己的存在与“社会主义”的生存归功于苏联。

因此，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是大苏维埃国家的扩张主义和民族政党官僚阶层权力垄断相结合的产物。东欧与苏联形式上的合并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它除了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外，还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斯大林的霸主地位不仅遭到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力量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南共日益增长的抵制。这一切已非常清楚。

假如苏维埃体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当代变化形式的话，那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东方帝国内的关系。这种体制的共同特征是都有一个上帝般的君主或领袖，国家间的关系，包括商品交换，没有法律可循。

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遭到谴责的时候，东欧间接的政治依赖性和通过政治压力进行的经济剥削（作为斯大林时代的特征），已变得毫无理性、无法容忍。由于自身的需要，这迫使苏联向外部世界开放。然而，只是在东欧暴乱和抗议之后（其中最残酷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是1956年匈牙利暴乱），苏联官僚集团才愿意改变它同东欧的关系。但即使在当时，赫鲁晓夫统治集团也没有正式放弃帝国的霸权地位，相反霸权却适应了改变了的情况，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寡头政治。斯大林去世后，

“电话命令”的时代结束，苏联中心与臣属的东欧政府“协商”的时代开始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市场价格，逐渐接近了世界市场价格。东欧国家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地由附庸

卫星国成为“共同体”独立的成员国，但仍属从于帝国的统治，并对其有依赖性。

由此东欧国家开始分化。本世纪60年代末，尽管东欧国家都顽固地保留着整体性的基本特征，但各国内部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明显地产生差异。他们都按自己的方法，即按照传统和“自己”政党允许的范围发展经济，重新发现更有效率的形式。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国家都保留了一党制的体制，控制着民族生活的某些趋势。

各个国家都必须实行一党制，在此限制内才有自主权。无论自由趋势出现在哪里，甚至出现在某个共产党内部，如果有哪个国家敢于跨过这条具有魔力的界限，削弱党的领导，苏联就将进行干预。如有必要，将通过武力进行干预（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然，苏联的干预满足了民族共产党内极权力量的愿望和利益：“社会主义的团结”是相互的，例如，“有限主权”不仅是强加给这些国家的，而且也被“自愿”地接受了。

苏联采用典型的军事帝国的作法，即在行政及文化上实行自主。它允许东欧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有经济及其他一些能动性，但所有这些是有限度的：任何国家不得逾越党至上的原则，也就是说，应毫不动摇地依附于苏联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华沙条约之外的国家，如古巴、越南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和共产党依靠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经济和战略比较虚弱。他们通过扩大自身和支持苏联的“革命影响”来弥补这一点，而这是他们无法独立完成的。同时，这也揭示了苏联在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它在世界的影响时，在僵化的苏维埃帝国内仍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在一定时间内，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已经不是

我们一见就能看得出的表面差异。他们依赖苏联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尽管他们都受到强制性的限制。

罗马尼亚是最有独立性的一个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民主，而是恰恰相反。一党专制转化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和家族专权，从而使罗马尼亚更为独立。因为罗马尼亚体制是苏联模式更为呆板的翻版，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绝对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等，从而使这种独立性更易于实现。由于担心他自己的政府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1968年华约对捷克的干预。但他对波兰团结工会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批评却更加尖刻。为了尽快地证实他对华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齐奥塞斯库经常显示他的独立性。他对欧洲的核武器持反对立场，但不久，他又对苏联针对欧洲城市部署 SS-20 导弹表示理解。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在煽动和惧怕、许诺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苏联对罗马尼亚的这种政策感到不满。但苏联领导集团现实地权衡利弊，认为没有必要对罗马尼亚进行军事干预。暴虐的国内制度足以保证罗马尼亚不会摆脱苏联帝国及意识形态的制约。

保加利亚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和最始终如一的门生。保加利亚领导集团一直在为使其国家与苏联帝国完全一体化而努力。这甚至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希望。保加利亚领导集团把与苏联一体化看作实现其霸权主义意图的基础。保加利亚仅仅在它对其邻邦——主要是南斯拉夫的要求中是独立的，对苏联来说，这与东南亚的越南和拉美的古巴起的作用类似。由于其民族要求，保加利亚使苏联能够渗透巴尔干诸国，破坏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在保加利亚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国有化了，保加利亚是苏联模式最完整的翻版，为了巩固这一模式，甚至不惜对这个自豪而倔强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巧妙的压制。在保加利亚没有苏联军队——人们可以说保加利亚自己主宰自己。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是所谓

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这一模式被当成唯一可能（而且已经实现）的模式。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保加利亚出现了经济改革及民族自决的明显趋势。进行经济改革是经济困难的一种表现；为了减轻民族觉醒带来的影响，党努力把民族感情导向过去光辉的历史，以及两次解放保加利亚并作为保加利亚保卫者的苏联（1877年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1944年从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它的状况，尽人皆知，毋需详细阐述。1968年苏联军事干涉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又恢复到原来的卫星国地位。在所有卫星国中，捷克斯洛伐克理论家走得最远，证明了他们对苏联附庸地位的顺从性。继1968年苏联入侵之后，他们杜撰出一个关于共同“社会主义民族”出现的理论。他们也很快把它忘却了，因为，苏联扩张主义者没有表露出放弃他们意识形态——民族优势的倾向。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是苏联意图和威胁的鼓吹者。从长远看，捷克斯洛伐克仍没有逃脱“土豆牛肉式的社会主义”，甚至，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技术高度发达，也只能倒退到效率低和浪费严重的状态中。然而，无须怀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知识界，包括政界和文化界，仍保持着独立意识和民主精神。

东德由于二战后被苏军占领，可能已被完全置于苏联控制之下。此外，它对苏联也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然而，东德实行的是苏联式最有秩序的经济体制。东西德之间的某些合作，以及人们对高水平生产和组织的固有观念，都有助于达到这一高级阶段。或许是因为东德最为顺从，所以它成为苏联扩张主义的有力助手，为非洲支持苏联的革命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援助和顾问人员。东德的理论家发展了一种关于两个德国民族，即社会主义德国和资本主义德国的荒谬理论。这种理论不久便被放弃，因为在与资本主义的西德民族进行更为积极的合作过程中，这一理论已



变得不切实际。

匈牙利和波兰是苏联集团中自主权最大的国家。这种自主权是人民起义和精神抵抗的必然结果。但匈牙利的自主和波兰的自主（我指的是1981年波兰军管法实施前的波兰自主）是不相同的。匈牙利的自主主要表现为民族的独立和知识界的独立。随着部分市场经济的引入，也就是说，给经营者更大的自主权和鼓励私有“小经济”的发展，匈牙利成功地创造了“灰色计划经济”的环境，达到了相对的繁荣，使自己向世界市场开放。与这种政策相反，波兰在继续工业化和保留官僚管理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负下沉重的债务，从而导致了经济崩溃，进而使官僚政治陷入绝境。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家坚信：这样的危机对资本主义而言是自然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匈波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波兰在扩大与苏联集团以外国家的联系上，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但非常谨慎，不超出苏联的利益范围。

波兰是唯一爆发过真正、独立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同时，团结工会成为民族和政治活动的焦点。波兰工人阶级抛弃了所有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教诲。腐败无效率的执政党——共产党在工人阶级的猛攻之下土崩瓦解了。波兰展现出了独立的前景。新波兰与苏联关系的基础将是地缘政治的现象，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对苏联的从属关系。但是，在苏联的压力和积极参与下，波兰的民族民主运动将受到遏制。党的政务会通过的军管法是苏联干预的另一种形式。对波兰民主运动的镇压，同时意味着对要求国家平等愿望的压制。这一行动导致了企图使苏联体制趋于合理、逐渐使苏联放弃在东欧帝国统治以及要求缓和幻想的破灭。这一发展在波兰和欧洲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波兰人为了争得自由，将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而欧洲则陷入动荡与战争戒备状态。

东欧国家的暴动和抵抗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历史、文化、经

济、宗教、民族以及发展水平等等，这一切都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我认为最后两种原因在当今是最主要的，因为它们特别不易消除。我没有把这两种力量同其他原因截然分开，也没有低估其他原因的作用。在特殊条件下，其他因素甚至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维埃帝国的共产主义者，完全没能力去理解民族一词的本质，因此，也不可能领会民族运动的决心和顽强性。思想上的盲目性起源于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他们相信，随着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消失，即随着“物质起因”的消失，民族敌对也随之不复存在。

但人民和民族是自发产生的，远比资本主义历史更悠久，而且正因为如此，精神、人种、历史、经济及其他特征上才都带有独特性。各民族倾向集居于世界某一地区，以保存和加强自己的独特性。苏联领导人从自身经验中得知，“民族偏见”是顽固和持久的。通过沙皇多民族国家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通过妥协和镇压兼用的手法，这些偏见也能受到限制。但由于东欧民族有着古老的民族意识，这些方法在东欧不适用，既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也不会带来安定的局面。东欧各民族在欧洲也有他们的地位。苏联企图用把他们合并到帝国范围内的方式来限制他们，阻止他们向前发展。东欧民族不可能接受这一切，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允许苏联控制他们的生活。因此骚乱和抵抗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会来自其他方面，也至少会在东欧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内部产生。

现在苏联领导人正面临无法摆脱的厄运，使他们不可能控制东欧，也就是说，东欧国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比苏联发达。甚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也比俄罗斯更接近欧洲。而且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超过欧洲平均生活水平。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针对落后

地区而产生的，但在剥削的同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在东欧却发现相反的情况：在那里，意识形态这种无形的力量充实了征服者的虚弱和落后。

## 苏联与东欧经济关系

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在斯大林时期，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苏联企图通过蛮横的政治手段，剥削被征服的东欧诸国，并将其并入帝国之内。那个时期，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它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反，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之上，而是以官僚协议为基础建立的。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随意规定贸易条件。但东欧的叛乱和抵抗，加之斯大林时期和其去逝之后苏联经济的虚弱，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些关系。从赫鲁晓夫执政开始，苏东经济关系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因素开始起更大的作用，但政治压力并没中止，供求规律亦未得到普遍运用。现在的政治压力表现为给苏联需要以优先权，即要求同苏联经济保持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的统一。供求为官僚机制的优势作用所变更。

由于东欧动荡不安，苏联被迫给予东欧政府某种自主权。在经济生活中，满足这些国家的某些要求，允许他们同外部世界，主要是同西方进行一定数量的经济来往。

但是，苏联最初的目标没有变，只是完成这一目标的策略更为现实，计划所用的时间更长一些罢了。因此，可以说，苏联并没有把东欧的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机制中，但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对苏联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在原材料方面。

这种关系无疑是现今苏联取向的结果，但也是东欧国家内部

政治经济条件的结果。在本质上一党制列宁主义国家的欧洲政府只有依赖苏联才能求得生存，其经济发展，像工业封建主义一样，注定生产力低下，质量低。

除此之外，东欧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陷于危机中，拖欠西方和苏联高额债务。当前这些危机更清楚地显示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苏联政府利用这些国家的困难来加深和加强他们对苏联的依赖性。

根据1982年2月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上公布的数字，1980年，罗马尼亚外债增至110—120亿美元，而生产仅增长2.5%，比计划少6.3%。这一切及另外一些经济困难迫使罗马尼亚加强与经互会的合作，而且也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贝尔格莱德NIN（1983年12月13日）公布的数字，过去罗马尼亚是参与经互会合作最少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贸易额从70%下降到40%，但现在，罗马尼亚成为联合投资银行的股东之一，参与开发原材料的联合计划。两伊战争爆发之后，罗马尼亚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60%，不得不寻求其他来源。罗马尼亚向苏联寻求援助，1979年从苏联获得140万吨石油。1981年11月27日齐奥塞斯库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们提议（苏联集团）党的领导人会晤，……但被告知，兄弟党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但我们认为，对共产党来说，这里不可能有比经互会中的合作更为重要的事情。”

根据弗兰克·利普席尔斯的说法（载于《国际先驱论坛报》1982年2月17日），1980年东欧国家向西方举债37亿美元，向苏联举债230亿美元。捷克总理抱怨苏联石油涨价。匈牙利被迫削减向西方的出口以满足苏联需要，用以支付从苏联进口的原材料。匈牙利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按照利普席尔斯的说法，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找一条退路，以防“苏联经济伞漏雨”。波兰军管法宣布之后，匈牙利也重新调整

自己的政策，加强与苏联的贸易往来。

根据利普席尔斯的观点，强制实行军管法之后对波兰的制裁，也削弱了摆脱苏联，争取更大经济独立的努力。无疑这些困难也是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比如，对西方的超额债务和缺乏购买原材料的货币手段。苏联通过特殊装运，向波兰提供它急需的原材料，从而使波兰更依赖于苏联。根据赫德里克·史密斯提供的数据（《国际先驱论坛报》1982年3月18日），1981年苏联给予波兰大约10亿美元价值的进口信贷。史密斯引用了万诺斯的说法，1981年波兰人从苏联进口了大约40亿美元的产品，此外，苏联在那年与波兰的贸易中有40亿美元贸易顺差（苏联向波兰出口60亿美元的货物，而波兰向苏联出口额则为20亿美元）。

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试图在同苏联进行贸易中提高其消费品的价格，但他们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卖给东欧国家原材料价格比东欧国家卖给苏联消费品价格增长幅度要大得多。这既是东欧消费品质量低劣的结果，同样也是苏联“缺乏理解”的缘故。玛丽·拉维涅在1982年1月法国《世界外交》月刊上发表看法，指出，东欧国家被迫储存部分投资基金以备从苏联进口原材料（这部分用于正常生产）。另外，苏联用不可兑换的卢布来支付从东欧购买的商品，但它出卖大量重要原料来换取硬通货美元。因此，苏联把这些国家作为经济抵押，窒息他们同西方的贸易。

东欧国家对苏联原料和市场的依赖性正在增强。尽管经互会困难重重——无法增加生产合作或产生一个共同市场，无力将卢布变成可兑换的通用货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迫使东欧国家从经济上从属和依赖苏联的战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但是，苏联霸权主义者的成功却孕育着危险：在某些方面已得到减缓，在其他领域几乎阻止东欧人民内部潜能的发展。

## 结 论

对于东欧国家的将来，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结论：鉴于它依赖并同苏联内部的发展连在一起，东欧国家的将来尚难预料。更确切地说，只要苏联还存在党的官僚垄断和扩张主义统治，东欧国家则没有脱离苏维埃帝国即获得真正独立的机会。

这完全正确，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苏联官僚阶层很久以前就不再关心或担心苏联的迫害行为和对东欧的干涉是否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分裂。但，恰恰是因为帝国利益凌驾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苏联领导集团势必会对另外一些超级力量——美国和西欧，以及其他民族的意图格外注意。苏联怀疑的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而是可预测的实用主义方面的事情。他们计划每个步骤是否会比另外的步骤付出的更多，干预会引起何种反应，最后敌手的优势及弱点能否被准确地把握。所有这些意味着，东欧的抵抗与动乱不仅取决于苏联内部的条件，而且也取决于苏联的全球关系，首先是苏联同西方和中国的关系。换言之，如果所有这些关系变得不利于苏联（现在看似乎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苏联发觉它在东欧的统治和干涉“没有奏效”，东欧国家从苏联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将变得更为现实。如果苏联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使民主力量涌现出来，并意识到扩张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东欧国家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就更为现实了。

遗憾的是，事实上东欧国家的未来仍取决于全球的发展，尤其是取决于苏联内部的发展。这不仅对经互会成员国如此，而且对成功脱离苏联帝国控制的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亦是如此。

因此，未来的前景似乎并不光明，因为，在苏联内部没有任何力量能向着民主体制的方向发展，改变内部发展的轨道。外部世界也没有完全团结起来，以强力迫使苏联官僚阶层放弃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而且，最近，尽管苏联体制效率低下，但苏联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小了而不是大了，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和对东欧的统治亦有增无减。对阿富汗和波兰的干涉是有说服力的例证。这仅仅又一次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官僚政治，由于其封闭的社会结构，能抵抗根本性的变化，也是促进扩张主义计划生长的肥沃土壤。

但是，尽管如此，东欧并非一切都那么令人失望。

东欧国家——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差异越来越大：他们获得了自己的自然形式和真正的特殊性。这些国家固有的精神（某些国家快些，其他国家慢些，但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在发展）征服了新的领域，削弱了垄断官僚政治带来的附庸地位。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力量正在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等待着“找到自己灵魂”那一天的到来。过去的反抗和骚动并非徒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良心，为变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东欧国家不仅能够生存；而且，即使他们受到一点压制，他们也已经主宰了自己的生活。

尽管受到官僚军事帝国的压制，但东欧国家仍然是欧洲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前途未卜、动荡、危险的世界。但当今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好于以前的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东欧国家不能在不久获得彻底的胜利，它们仍将为最后的独立而斗争，并逐渐获得成功。

## 第十六章

# 苏联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 引 论

苏联的民族主义问题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几次世界范围的思想运动，以及美国和西欧的对苏政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争论相当激烈。本文试图对问题的某些方面作出解答，并从中得出谨慎结论。

民族主义虽已有明确含义，但也表现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因素。这种关系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而言，差别是相当大的（记住，俄罗斯人，更确切地说，大俄罗斯人现在正在逐渐失去其占大多数的地位）。许多权威人士既没有明确区别，也没有着重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联政权利益之间的差别。然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很容易察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并易于将其作为对政权的一种威胁进行分析。

塞韦伦·比亚勒曾指出：“当代苏联的主要特征是国家与社会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和积极的民族性。”他除表明了所谓消极的保守主义和“积极”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激烈的较量之外，似乎也否认了在当代苏联，民族主义可能是对其制度的一种主要威胁，而不是其主要的特征。

若要探讨这个问题，或许最好的方法是从少数民族研究入



手，而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西方人知之最少的（指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是穆斯林民族。他们多数讲突厥语，因此，我们直接按种族特征称他们为突厥人。亚历山大·本尼格森1971年曾指出：如果穆斯林人口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至2000年，土耳其一穆斯林民族的人口将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从此之后，这一前景已为西方所熟知，同时也引起了苏联统治者的极大关注。

美国人对苏联穆斯林地区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了解有限，就如它不能够理解最近伊朗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件一样。我们知道，霍梅尼及其毛拉\*获得联邦政府最高权力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伊斯兰教事业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世俗化进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要是能懂得伊斯兰教中宗教与民族性之间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据认为这类态度便会迅速消失。用罗纳德·夏皮罗的话讲，有这么一种信仰即：“摩门教世界中，进步必将战胜反动，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甚至最基本的知识也仅仅局限于15个共和国中的命名民族，即其名字为共和国名称的民族，只有犹太人等1、2个民族例外。

甚至这些民族的称谓都令人生疑。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哈萨克和塔吉克这些并不是古代连续民族实体的名称。比如，塔吉克起初是信异教的突厥人用以指包括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在内的穆斯林的一个术语，后来用以指保存了自己语言的伊朗人，而土耳其斯坦的伊朗人因其土耳其化而被称为萨尔特人。萨尔特一语起初只用以指伊朗人，后来指伊朗人和突厥人，最后仅指突厥人。乌兹别克人是由14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命名的。哈萨克人从乌兹别克人中分离出来，他曾一度被称为吉尔吉斯人，而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卡拉—吉尔吉斯人。

当然，民族连续性既然不存在，民族政策制定者们也不能创

---

\* 某些地区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一译者注。

造出来。问题在于，中亚人的特征首先是和穆斯林宗教相联系，其次从语言上，如突厥语和伊朗语上看得出来。起初，莫斯科想把这两种因素从他们的意识中抹掉，因为他们所更为关注的是与邻国宗教、语言联系的影响，而不是向这些民族输出社会主义。指责5个共和国政府违法荒谬并不难，难的是指明它们该做什么。研究苏联伊斯兰教问题的最优秀学者似乎会描绘出如下的一幅图画：苏联的穆斯林大多是逊尼派教徒，几乎全部奉行哈乃斐派宗教仪式（除达吉斯坦人遵守沙斐仪教仪式外）；但是，苏联约5000万穆斯林中有300万是什叶派教徒，其中主要是阿塞拜疆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抗（当今由于伊朗革命而加深，并日趋激烈）是一个因素。第二种因素是，最早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特别是土耳其斯坦人、伏尔加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与近两个世纪来皈依的、伊斯兰化程度低的人（诸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一些高加索山地人）之间的差异。

19世纪，俄罗斯人利用这种差异，挑起哈萨克人和南方邻族之间的纠纷（至少，沙皇政权在努力分裂两者，把北方的游牧民族紧紧地拉向俄罗斯人）。他们的所做所为得到绍坎·维利哈诺夫和易卜拉伊·阿尔京萨林等一些土著领导人的某些支持。宗教差异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之间（即萨尔特对北部中亚人）的差异基本一致。无疑，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认为他们同属一个从种族上讲属于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从宗教上讲属于伊斯兰的共同文化。大概，多数人把对氏族或部落的忠诚以及对宗教的忠诚看作是衡量问题的标准，而不会去过度地考虑自己的民族特征，更不用说与遥远的阿拉伯人或较近的波斯人及土耳其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了。

然而，这些情感和事实虽错综复杂，但和某些特殊地区的民族组成相比，这仍然是简单的。最突出的是北高加索地区，容纳了苏联近200个民族（按照一般估计）中的50个民族。这里，部落打破了民族界限，比如乃蛮部落的哈萨克人认为自己 and 同一部落

的诺盖人有亲缘关系，但和不同部落的哈萨克人却没有。高加索群体按语言可再分为卡特维尔人（多数为格鲁吉亚人）、阿巴兹—克尔凯特人、车臣—达吉斯坦人；突厥人亦有几个分支（阿塞拜疆人及其他）；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包括分散（但有影响）的俄罗斯人、东斯拉夫人、一些小的伊朗族群体及亚美尼亚分支。据一位研究这方面的学者说，革命前，这些民族中的许多民族并无明确的民族概念，它是后来从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外来者那里引进的。自我介绍往往先讲自己居住的地域，比如，家庭所在河谷或村庄，氏族或部落等。（可以肯定，古代欧洲农民及其传统行业的人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同山那边的邻居区别开来，除此无其他分类方式，也不兴于此道。）但是，人们却有高加索山里人的观念，北高加索民族有相同的男性服饰。其中有5、6个民族信基督教（它们是阿布哈兹、明格列尔、斯瓦内特、乌定、南奥塞梯、巴茨比）；其余的皆为穆斯林，威克斯曼认为一个穆斯林的北高加索民族正在形成。高加索山脉以南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族和两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即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确实应当说他们是两个文明的民族，其文明程度大体在700年以前就像俄罗斯民族现在这个样子了。

苏联西部边境地区从南到北总共有6个民族。首先是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接受基督教和文明的日期尚有争论，但很明显他们不承认俄罗斯人比他们更为文明。其次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构成苏联人口的1/4，并和俄罗斯人有着共同的宗教、文化遗产，尽管他们有根据地称自己和俄罗斯人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最后是3个波罗的海民族，这里的问题也很复杂。从历史上讲，自14世纪以来，立陶宛人一直和波兰人关系密切，并以罗马天主教为纽带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拉脱维亚人在日耳曼人统治下生活了700年之久（日耳曼人是基督教十字军的战士，后成为土地所有者），最后才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

治之下。拉脱维亚人接受了德国君主的新教，像立陶宛人一样其语言属于波罗的海语族。爱沙尼亚人也处在德国人统治下，和拉脱维亚人一样皈依了新教，但讲的却是与海湾对岸的芬兰语相关的乌拉尔语系中的一种语言。

可以肯定，只解释现状是不够的。无疑，苏联当局对此一清二楚，尽管他们只是以歪曲的形式，部分地承认，或者根本不承认。但是，政府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甚至提出似乎支持这种观点的根据，比如，共产主义总是从苏联向其他许多国家传播，无一例外。因此，各种趋势都需认真的研究。其中一些趋势会表明民族问题将会减少，相反另外一些趋势则表明民族问题将会增加。

## 苏联民族问题现状

从现状来看，波罗的海各民族的前景似乎并不光明。1979年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爱沙尼亚人占共和国人口的65%，拉脱维亚人则占54%，自1959年以来，两者的数字都急剧地下降了。相反，立陶宛人则占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的80%，自1959年以来，升降一直维持在一个百分点之内。然而，3国在国外同胞很少，没有同族邻邦关心他们的命运（爱沙尼亚人除外，1965年以来，爱沙尼亚和芬兰有渡船直接沟通，但芬兰决不去骚扰苏联），国外也没有信奉同一宗教者的特别关注。立陶宛之外的罗马天主教在苏联如何对待那里的教会问题上可能有某种影响，但罗马现在忙于波兰的事情，受到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发展状况的制约，因而变得谨慎起来，正如权威人士所言：勇敢的立陶宛天主教徒，“可能寄予了梵蒂冈过高的希望。”立陶宛游击队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前后，但今天却不存在了。因此，减轻波罗的海3国的压力的希望是渺茫的。

西方几乎从未听说过白俄罗斯主张民族政治独立者的存在。

在乌克兰，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统治了若干年，现在在乌克兰语使用和乌克兰民族性表达方面似乎仍占支配地位。提出这些问题的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如伊万·久巴和维亚切斯拉夫·绍尔农维尔早在60年代末，就被捕入狱，或销声匿迹了；一些取乌克兰名字的人被擢升到苏联高层机构之后，民族感情可能有所削弱。具有一定规模的乌克兰共同体的存在逐渐地为美国及加拿大人认识到，但是，几乎看不出近年来外国的压力使苏联的民族压迫有任何减轻。

有关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或亚美尼亚人的情况毋庸赘述，美国人对前两种人几乎一无所知。罗马尼亚人对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的同胞非人的不幸境况深为关注，但他们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许多事情上除使莫斯科感到不安外，别无其他。据研究者认为，在苏联之外，现在没有人与格鲁吉亚人有什么关系，北美多数基督教徒只知道佐治亚\*（格鲁吉亚）是吉米·卡特等一些名人家乡所在的州名。亚美尼亚人知名度略高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知名度部分地是由于亚美尼亚恐怖分子的名声而获得的，他们有计划地谋杀土耳其官员。自从伍德罗·威尔逊曾一度地对亚美尼亚一战后的福利产生过兴趣以来，美国政策没有明确注意过亚美尼亚，近期内也不可能注意到。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谈穆斯林时，少数民族前景变得更加光明了，而莫斯科的前景却变得黯淡了。全苏约有5000万穆斯林。在苏以外，有1亿土耳其—伊朗人，他在苏联境内有自己的同族兄弟。据最近对宗教信徒的估计，全世界有7000多万穆斯林。苏联的穆斯林能被用来向他们同族人或者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居住的地区渗透吗？或者相反，后者能左右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吗？

显然，这个问题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和权威发言人的关注。人们常常首先提到一个问题，即反对共产主义和其它世俗化运动的伊斯兰教复活及其可能的趋势问题。苏联人正在耐心地等待由阿

\*在英文中，格鲁吉亚和佐治亚是同一个词。一译者注。

亚托拉·霍梅尼选拔的反动毛拉组成的伊朗统治集团垮台，他们指望利用由此带来的危机。他们的耐性或许会得到报偿，但是德黑兰教士政府可能首先会有组织地消灭极左分子。不管伊朗有何变化，沙特阿拉伯皇族似乎极端地反苏，而利比亚独裁者则相当地亲苏，但两者对宗教态度都是非常珍重和严肃的，都没有简单地因袭西方政府指点的开明的自利原则。伊斯兰教现代化或强烈地反现代化浪潮会冲垮苏联边境这条堤坝吗？尽管接待（国外伊斯兰使者）经常是冷淡的，但莫斯科也不断派中亚毛拉到穆斯林国家首都出访，带去苏联式和平与伊斯兰教宗教自由的信息。宣传通过描绘穆斯林地区的成就达到了目的。不过，这并不会提供可靠的保障。

苏联穆斯林可以从北到南越过边界，但阿富汗持续的战争经验令人对其结果，无论是已产生的还是潜在的，产生怀疑。1979年12月主要由中亚人组成的军队入侵阿富汗。然而，早在1980年2月，苏联当局命令部分或全部由中亚人组成的部队撤出，代之以部分地由斯拉夫人组成的部队。同时，在阿富汗政府部门工作的中亚公民则由俄罗斯人或东德人代替。显然，人们认为阿富汗人和苏联穆斯林之间的接触对其中任何一方或许双方都有一种危险的或者有害的影响，双方都可能认清事实，进而采取不利于侵略目标实现的态度。肯定地说，并非所有的阿富汗人都对北方的邻居有类似的反应。普什图人看不起苏联突厥人，而阿富汗的非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土耳其人和哈扎拉人）往往表现得很友好。至于苏军指挥官是在入侵以前，还是在战斗打响一段时间后，认识到这些差异，尚不得而知。但他们不希望再去碰运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及这个或那个阿拉伯国家在任何阶段所享受的思想自由都不会比苏联大多少。但与那些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统治以后的阿富汗除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对穆斯林的重要影响在于：苏联在加速宗教灭亡（当然中亚的

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它执行了一系列旨在压制伊斯兰教，缩小其影响，阻止其发展的政策。在国外的苏联穆斯林可能会虚假地证明或暗示：“在他们的共和国内有宗教自由，而且可以准确描绘在苏联统治下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去苏联访问的国外穆斯林可能会受到蒙蔽，但最终总会明白过来，不会上当受骗。根据亚历山大·本尼格森的观点，只有斯拉夫人才被利用来压制苏联穆斯林动乱，他可能是对的，但自从苏联形成以来，在阿富汗事件之前，斯拉夫人还从没对付过苏联以外的穆斯林动乱。引人注目的是，据报道俄罗斯军官告诫他们的穆斯林士兵，他们在阿富汗打的是异教徒，不是穆斯林。这种谎言很难产生什么效果。

这一切表明，苏联伊斯兰教问题绝没有解决，也没有抑制，更不可能削弱。无论中东或苏联东北部或南部边境何种宗教和政治力量在起作用，人口统计无可挽回地预示着莫斯科处境极为糟糕。这里我们只列出妇女和儿童之间的比率的数字，它和人口增长的关系，无须过多的解释，下面是一些民族中妇女儿童之间比率的一些情况：

族 别	每千名妇女中儿童的数字
俄 罗 斯	863
乌 克 兰	710
白 俄 罗 斯	836
美 国	1114
土 库 曼	1809
乌 兹 别 克	1878
吉 尔 吉 斯	1885
哈 萨 克	1896
车 臣	2202

俄罗斯人口中儿童与妇女之间的比率和世界上最低的法国相同；而车臣民族的这个比率是整个世界上最高的。无论是规劝还是计划生育政策，或者5年计划，都不能明显地改变上述几个数字所表明的无情的前景。

## 苏联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影响

当休厄林·比亚勒谈到苏联的“民族主义本质”时，他的脑子里一定有形形色色的或各种各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苏联“民族主义”（如果没有民族性，民族主义可以存在的话）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否能等同和谐起来，或以某种方式相互促进呢？民族主义必须以民族为基础。斯大林提出民族的4个标准是：共同的地域、语言、历史和心理素质，这4条足够了，当然，俄罗斯人具有符合上述4条标准的特征。问题不仅在于俄罗斯是否一个民族和存在民族主义，而且在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维埃意识是否是等同的。后一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只有一个字：不。两者不可能是一样的。从15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起，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由于东正教的力量而定型了。其文学和思想、道德观和谚语中都充斥着宗教因素。从历史的角度讲，列宁和斯大林不会同保利斯及格列勃、帕尔姆的斯蒂芬、素拉的尼尔、拉顿涅日的谢尔丘斯、吉洪·扎顿斯基、萨鲁弗的谢尔费姆及科降斯塔德特的约翰神父这些圣徒言和，更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秋特切夫，列斯科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及继任者都做不到。所有民族都有其宗教背景，但在高低层文化中的成分未必相同，中国人的宗教背景似乎更弱些，俄罗斯人的宗教因素最浓。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与其说会导向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倒不如说会倒向帕



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对此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会表示惋惜，但不会否认事实。这种传统不需要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它肯定比俄罗斯内部外部任何可称之为民族主义的东西要早几百年。它构成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最近提出的所谓“宗教、民族（不是民族主义！）复兴”的基础。这种觉醒在当代苏联或许只影响到一部分知识分子，但在各行各业普通俄罗斯人中有一种潜在的反响，从而从根本上危及共产主义社会精神气质。尽管政府努力消化它，如保护和修复古代的历史遗迹，但民族传统最终是不能与共产主义和谐共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政治局成员面罩的掩盖下，将自己的观点不露声色地隐瞒起来，并将要掌握整个国家。他们的民族主义幽灵仍然没有显形。

民族主义在近几年中的作用只有通过各种变形棱镜才能部分地为人们所明白。苏联存在着地下出版活动，有时甚至还有秘密集会，从事这些活动的大部分人不应被看成是革命者，而是内部的流亡者，尽管两者的区别并不能使苏联当局感到放心。这可能最明显地反应在最高领导舞台上的紧张气氛中。这一点只有那些西方苏联政策或动向的专家才敢于探索。

自斯大林逝世后，民族问题似乎只有3次被提到政治局研究策略的议事日程上来的例子。1953年3月，拉夫连季·贝利亚公开站出来反对对乌克兰民族感情的肆意践踏（有些人从正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说他反对的是夸大了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当时，执行这种政策的主要人物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麦利尼科夫。同年6月麦利尼科夫被解职，由第二书记阿历克谢·基里琴科继任，在许多共和国中迄今为止一直由俄罗斯人担任的共和国第二书记职位转移到本共和国成员的手中，但贝利亚下台后，因他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培育民族主义势力而受到攻击。

然而，作为贝利亚反对麦尔尼科夫非民族化政策象征的基里琴科却幸免未被牵连。但好景不长，1960年他被从负责干部的位

子上撤了下来。努里特金·毛希丁诺夫1957年6月在中央全会上，对所谓的反党集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的指控之一，就是他们犯有民族“沙文主义”罪，即俄罗斯民族粗暴地对待少数民族。但是，两种危险即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的民族主义，总是可能受到攻击和反对，同时反对两者或一次反对一种。米歇尔·塔图指出，以前赫鲁晓夫的忠诚的支持者基里琴科的垮台“使赫鲁晓夫的统治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就是说，这对有抱负的、非常需要但不能再在主席团中找到像他这样可靠同事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来说不啻是一种沉重打击。无论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温和政策导致了基里琴科的垮台还是恰恰相反，边疆地区陷入了灾难。拉脱维亚首当其冲受到政府领导人变更的冲击；强硬派阿维兹·佩尔舍成为镇压的象征，爬上苏联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高位，一直得1983年5月去世。

第3个例子与谢列斯特有关。民族主义、自治主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度递弱）这些普遍性问题似乎又一次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格外强烈。一次关键事件诱发了当局最高领导层一政治局（1966年主席团改名为政治局）一位成员的去职。最近，一位调查人员宣布：谢列斯特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自治主义者，“为保护决策自主权不受莫斯科干涉，他在乌克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其中包括许多具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1973年，以批判他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基辅，1970）为开端，向谢列斯特发起了进攻。然而法默却作出结论说，谢列斯特倒台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之争，争斗的结果，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获得了胜利。

一些乌克兰流亡者夸大了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倾向，事实表明高层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另外一些流亡者则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是克格勃或党的领导机构培植的，或者依附于他们。因此作出肯定的结论是危险的，但是

我们可以绝对地说，意识形态和权力往往紧密相连，盘根错节。人所竭力以求的权力，以思想地位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于人是否深信这种思想则是最不重要的。约瑟夫·舒姆彼得过去常说，他们不相信公共事务中虚伪的概念，因为人常常逐渐相信自己所不断主张的东西。的确如此——或许并非总是如此，但肯定经常如此。人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那种能理解并清楚地描述自己的动机的人才是幸运的。

## 西方对苏联民族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苏联面临诸方面问题都不熟悉的现象。苏联在世界上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民族帝国，一个由宗主国民族和若干殖民地民族组成的帝国，尽管有几个民族可能比俄罗斯民族要先进。无论苏联及西方采取何种政策，某种吸引力和压力同时并存。苏联少数民族的经历冲击到与苏联毗邻的国家，这在阿塞拜疆及中亚诸共和国南部地区尤其如此。俄罗斯人的经历也影响到迁居国外的，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在西欧及美国的俄罗斯人。俄国犹太人的经历也影响了许多以色列人。结果导致了对立态度的产生，但我们不应被这一事实所蒙骗，从而完全否认积极感情和颂扬、模仿及重复性冲动的存在。

本文将着重探讨其他方面的压力。不管政府采取何种措施，美国的流行音乐、时装、通俗书刊杂志甚至吸毒都渗透到了苏联，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无线电广播加速了这种倾向的发展，并传播国外、尤其是苏联国内的消息。但是很难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苏联民族问题上（俄罗斯与非俄罗斯）形成了什么明确的模式。公然肯定俄罗斯传统，对抗苏联，削弱以至消灭它的企图，这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似乎太冒险了。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西

方政府很少能做出明智的决策，该期望什么，提倡什么。比如，美国几乎没有格鲁吉亚问题的专家，更不用说美国政府内了。研究苏联突厥人的专家也极少；知道普沙夫人和巴茨比人为何许人并能在几百英里范围内指出其居住的方位的美国官员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缺乏促进决策或表达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完美形态的手段。

这么几条粗线条根本不足以勾勒出所必需的政策和理想的目标。然而，从下面三个方面可以略见一斑。

## 语 言

“政治语言学”，最近曾有一位作家写道，“它代表了莫斯科最成功的成绩。”苏联政府鼓励使用少数民族的地方方言，并为他们创造了新的书面语言并将其吸收到教育体系中来，结果，到了30年代初期大约存在130种语言。今天，苏联存在的语言不足70种，或者正好有70种，然而，我们不应由此作出结论，认为这个数目很快还会进一步减少。操俄语人的比例基本未变，余留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也相当稳定。主要的发展在于两种语言并用制的推行（两种语言并用制即既会讲少数民族语言，又会讲俄语，或者用主要语言代替少数民族语言）。但变革是双向的，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俄语正在取代当地的语言，但在大多数穆斯林中（不包括哈萨克人，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中也是少数民族）俄语越来越没有市场。在文化发达民族中，许多波罗的人把俄语当成第二语言，但格鲁吉亚人很少这样做。附带说一句，社会是互相联系的，不能把某种特殊的过程或因素分离开来，作为这种变革的可靠预测。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似乎一些革命前没有书面文学，甚至连口头文学都极少的小语种从某种程度上讲并未被苏联文学成功地

接纳、吸收。一些较古老、较大的语种有自己的文学，因而会对共产主义的社会精神气质构成危险，不管文学现在可能会多么亲俄。最后再谈谈俄语，许多西方人士并没有认识到俄罗斯文学中有多少成分，有多少作家是反苏维埃的。实际上当代苏联人也不知道。出版计划完全有余地出版一些这类书，在不惹起政治麻烦的情况下，唤起人们对那些作品本不该被忽视、遗忘的兴趣。

## 自我意识

弱小民族语言的消失实际上可能会意味着那个民族的消失。苏联或许并未主动地那样做。的确，事实恰好相反，官方耗掉巨大的人力、财力努力给小民族以真正的民族地位。但，在这方面社会学的规律又一次没有起作用，以犹太人为例，1897年，有96.7%的人以依地语为母语，至1970年以依地语为母语的仅占17.7%。现在，72.8%的犹太人把俄语当成自己的母语。依地语地位的降低，俄语地位的提高是否意味着苏联犹太人消失了呢？显然没有。日耳曼人和鞑靼人较大程度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但他们操两种语言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使犹太人的情形并未显得多么特别。而且也不存在与其他因素自然的对应关系。比如，犹太人的宗教岌岌可危，但民族意识却异常活跃。

在这一领域里，由西方提供引导是危险的。众所周知，犹太人正面临着困境，善意的帮助事实上只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人们或许会这样说。但，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正在发展的历程。西方极少有人知道苏联有日耳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由于官方的某些意图只是被简单归入喀山鞑靼人，这种处境使他们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强烈要求苏联当局允许他们重返家园或收回他们失去的财产。

## 宗 教

对于苏联近300万犹太人来说，只有60—90个犹太教堂实际开放，尽管布达佩斯有一所专门培养犹太教教士的学校，但苏联却一所也没有。总之，苏联犹太教的命运未卜。全苏有5000多万穆斯林人，开放的清真寺却不足200个，而且在伊斯兰各民族中的分布也极不平衡，但，这些数字比起对犹太人或基督徒来说甚至更不能说明问题。和革命前相比，俄罗斯东正教及其他基督教徒的状况是令人痛惜的，但考虑到苏联长期的无神论运动，这又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宗教领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例如，70年代初，一位美国记者在十月革命节前夕曾问一些乌兹别克人，他们一律回答：结束莱麦丹月\*。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苏联各族人民的宗教历史都是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而这种历史在苏联的教育及大众媒介中都受到鄙视，这对外界人士而言，是一个值得研究、促进和宣传的极为广阔的领域。现在尚不存在犹太教可能被用以反对西方的危险。虽然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可调和，但苏联人却通过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员向西方的立场、价值和原则发起进攻，从而影响这两种宗教，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巴西或萨尔瓦多的罗马天主教比立陶宛的天主教更有接近美国报刊的机会，“解放神学”只存在于前者，而不存在于后者。苏联的毛拉游历于中东，苏联的官员在今天的南也门、叙利亚，或许在明天的伊朗受到欢迎。西方的穆斯林朋友（即穆斯林宗教人士及团体，而不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人员）微乎其微，西方伊斯兰国家问题的专家只是一个受到挑战处于守势的小团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西方的一些东正教徒曾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企图通过新成立的

---

\* 即斋月，指伊斯兰教历太阴年第九月，该月内教徒白天禁食。

美国东正教会完全进入西方民族的生活之中，但远远没有达到目的。美国许多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沉醉于改革本国政府与社会的一些弊端。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因为许多美国东正教徒拒绝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才使他们未被美国宗教文化所同化。一些东正教组织极端反共产主义，是极端的保皇主义者，宣布最后一个沙皇及其支持者为圣徒；不管他有何优点，这样一种精神和其他温和的东正教组织相去甚远——更不用说普通美国人了。

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的学者、研究人员及国际法研究人员或许会在公共或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支持下，可能注意到本文所提出的一些情况。此外，西方各国政府也应当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因为这样可以产生如下几种结果：第一，在宣传或信息交流中，应该理解语言、宗教和民族传统的存在及其本质，并对有关的民族，起码对一些较大的民族，可能的话，经常给予同情。这未必要激发苏联所有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起来革命或产生民族对立。表明外部的关注和尊重是明智的，这样可能会，至少勉强地，引起国内的关注。第二，在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及其他形式的往来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西方的代表不应听任苏联嘲笑西方为帝国主义，而不指出苏联也是帝国主义，对西方过去殖民地的攻击应用苏联当代的殖民政策予以还击；对西方种族、民族及其它歧视的批评应用苏联的种族歧视来进行反批评。尽管在与第三世界的外交人员及知识分子交往中保持极大的克制是审慎的，但有时我们也有必要提醒他们，他们思想上的错觉可能会受到事实和不同解释的挑战和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与世界其它国家之交往中，西方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对所有文化抱着尊重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对苏联各民族的文化。否则，则会有以政治目的为动机的选择之嫌，这并不是我们要采取的普遍态度。凡是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根本不善长这一行的人不

应从事国际关系工作，而应从事其它能力所及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教条主义者叫嚣取代理性的言论是司空见惯的。他们确信，权利和道德完全在他们一边（但未必是他们国家的一边，往往恰好相反）。在联合国中，在所有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中，在一些国家的传播媒介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和自决。正如埃利·基都里所指出：这种教条的特征就是“不顾自然历史的限制，相信只要良好的愿望就能创造出奇迹来”。但是，假如一个人现实一些、理智一些，他会希望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民族，尊重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迫使苏联及其它国家的政府减轻（哪怕稍微减轻一下）他们的负担。



## 英汉译名对照

### A

Abdurrahman of Sogratl, Sheikh,	索格拉特尔的阿布杜尔拉赫曼教 长
Abortion,	流产
Abramov, Fedor,	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苏联科学院
Afghanistan,	阿富汗
Afro-Asian solidarity movement,	亚非团结运动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农业生产
Agursky, Mikhail,	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
Aitmatov, Chingiz,	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White Steamboat,	《白色的汽轮》
Alcoholism,	酗酒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All-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全俄立宪会议

All-Russian Social-Christian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ASCULP),	全俄人民解放社会—基督教联合会
All-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全苏自然保护协会
Amalrik, Andrei,	安德烈·阿马尔里克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Andrei Rublev,	《安德烈·鲁布列夫》
Andropov, 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
Anti-Islamic campaign,	反穆斯林运动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Anti-Western attitudes,	反西方态度、反西方观点
Anti-Zionism campaign	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Arab-Israeli War	阿以战争
Arkhiv samizdata,	《内部参考》(一种地下出版物)
Armenia,	亚美尼亚
Arms control,	军备控制
Armstrong, John A.,	约翰A·阿姆斯特朗
“As Breathing and Consciousness Return: Postscript, 1973,”	《〈苏醒的时候〉1973年跋》
ASCULP(VSKHSON),	全俄人民解放社会—基督教联合会
Assembly of Muslims of Central Asia,	中亚穆斯林会议
Association of Concerned Estonians,	关心爱沙尼亚人协会

- Astaf' ēv, Viktor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August 1914, 《1914年8月》  
 Azerbaijanis, 阿塞拜疆人
- B**
- Baikal-Amur railroad(BAM), 贝加尔—阿穆尔铁路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Basel” socialism, “巴塞尔”社会主义  
 Basmachi movement, “巴斯玛奇”运动  
 Begun, V., V.别贡  
 Belgrade review conference, 贝尔格莱德复议会议  
 Belorussians, 白俄罗斯人  
 Belov, Vasily, 瓦西里·别洛夫  
 Benes, 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ria, Lavrenty, 拉夫连季·贝利亚  
 Berlin, Sir Isaiah, 伯林爵士  
 Bilingualism, 两种语言并用制, 双语制  
 Bociurkiw, Bohdan R., 鲍丹·保休尔基夫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Brest-Litovsk, treaty of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Bromlei, Yuli V., 尤里V.布罗姆利  
 Brzezinski, Zbigniew,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Bukovsk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  
 “Why Do the Russians Quarrel?” 《俄罗斯人为什么会产生分歧?》

Bulgakov, Mikhail,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Bulgaria, 保加利亚

## C

Catherine II,	凯瑟琳二世
Caucasus,	高加索
Ceausescu, Nicolae,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Central Asia,	中亚, 中亚细亚
“Khomeinism or National Communism,”	《共产主义还是民族共产主义》
Chalmaev, Viktor,	维克多·恰尔马耶夫
“Exalted Aspirations,”	《崇高的愿望》
“Inevitability,”	《必然论》
“Chego zhe ty khochesh?”	《你究竟需要什么?》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
Chivilikh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奇维利欣
Christi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Believers’ Rights in the USSR,	苏联保护信教者权利基督教委员会
Christian Democratic Organi- zation (Latvia),	基督教民主组织(拉脱维亚)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	《时事纪事》
Chronicle of the Lithuanian Catholic Church,	《立陶宛天主教纪事》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Colonization,	殖民化

Comecon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Cooperation),	经互会
Comintern Seventh Congress,	共产国际七大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ights of Catholics (1980),	保护天主教权利委员会 (1980)
“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of Youth and Literature,”	《文学与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
Congress of Russian Muslims	俄罗斯穆斯林会议
Conservationism,	自然保护主义
Contraception,	避孕
Council for Religious Affairs,	宗教事务委员会
CPSU congresses,	苏共代表大会
Cvirka, Petras,	彼得拉斯·斯维尔卡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D

Deksniys, Jonas,	乔纳斯·杰克斯尼斯
Demichev, Petr,	彼得·杰米契夫
Dementev, A.,	A.杰缅甸季耶夫
Democratic Youth Committee (Latvia),	民主青年委员会 (拉脱维亚)
Deutsch, Karl W.,	卡尔W·多伊奇
Djaparidze, Revaz,	列瓦兹·贾帕里泽
Dnieper,	第聂伯
Doob, Leonard W.,	列昂尼德W.杜布
Doronina-Lasmanis, Lidija,	利季贾·多罗尼娜·拉斯玛尼斯

Dostoevsky, Fedor,  
Drahomanov, Mykhailo  
Dubcek, Alexander,  
Dunlop, John B.,  
Dziuba, Ivan,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海罗·德拉霍马诺夫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约翰B.邓洛普  
伊万·久巴

## E

Eastern Europe,  
East Germany,  
East-West détente,  
Ehrenburg, Ilya,  
Emelianov, Valery,  
Engels, Friedrich,  
Estonia,  
Estonian Democratic Move-  
ment,  
Estonian National Council,  
Estonian National Front,  
Estonian Patriots,  
Ethnography,  
Ethnos,  
Eurasian movement,  
Eurocommunism,  
Evseev, E.,

东欧  
东德  
东西方缓和  
伊莉娅·爱伦堡  
瓦莱里·叶梅利亚诺夫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民主运动  
  
爱沙尼亚民主委员会  
爱沙尼亚民族阵线  
爱沙尼亚爱国者  
人种史、人种论  
民族, 种族集团  
欧亚运动  
欧洲共产主义  
E.叶夫谢耶夫

## F

Farmer, Kenneth C.,

肯尼思C.法默

Fedorov, Nikolai,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
Female employment,	妇女就业
Fertility,	出生率, 生育率
Finland,	芬兰
First Rifle Regiment of Model Revolutionary Discipline,	革命纪律模范第一步兵团
From Under the Rubble,	《废墟下》
Furov Report,	富罗夫报告

## G

Gagarin, Yuri,	尤里·加加林
Gajauskas, Balys,	巴雷斯·加贾乌斯卡斯
Galanskov, Yuri,	尤里·加兰斯科夫
Galicia,	加里西亚
Gamsakhurdia, Zviad,	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
Gasprinski, Ismail bey,	伊斯梅尔·贝伊·加斯普林斯基
Gedvilas, Mecys,	麦奇斯·格德维拉斯
Georgia,	格鲁吉亚、乔治亚
German-Soviet war,	苏德战争
Ginzburg, Aleksander,	亚历山大·金兹伯格
Ginzburg, Arina,	阿林娜·金兹伯格
Gira, Liudas,	柳达斯·吉拉
Glazunov, Ilya Aleksandro- vich,	伊利亚·亚历山大罗维奇·格拉 祖诺夫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 Vyacheslav,	维亚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
Gorky, Maks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Gotsinsky, Najmuddin,	纳吉穆金·戈辛斯基
Great Purge(1936—38),	大清洗(1936—38)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苏联大百科全书》
Grigorenko, General Petr,	彼得·戈里戈连科将军
Gumilev, Lev Nikolaevich,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列夫
Grishin Mikhail,	米哈伊尔·格里申

## H

Haji, Sheikh Tasho,	塔绍·哈吉教长
Haji, Sheikh Uzun,	乌尊·哈吉教长
Haney, Jack,	杰克·哈尼
Helsinki Accords,	赫尔辛基总协定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ungarian uprising(1956),	匈牙利起义

## I

Iakunin, Father Gleb,	格列布·雅库宁神父
Ilminsky, Bishop N. I.,	N.I.伊尔明斯基主教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fertility,	不育, 不育症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国际律师委员会
Ioganson, B.,	B.约翰松
Iskra group,	伊斯克拉组织
Islam,	伊斯兰教
Israel,	以色列



Iurkevych, Lev,	列夫·卢尔凯维奇
Ivanov, Iu.,	尤·伊万诺夫
Ivan the Great,	伊凡大帝
Ivan the Terrible,	伊凡雷帝

## J

Jadidism,	现代主义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JAC),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Jewish Section,	犹太人办事处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犹太人电讯社
Jews,	犹太人
Jurasas Jonas,	约纳斯·米拉沙斯

## K

Kabin, Joñannes,	约翰尼斯·卡宾
Kalnberzins, Janis,	亚尼斯·卡尔恩别尔津斯
Kapitonov, Ivan,	伊万·卡皮托诺夫
Kapps, Artur,	阿图尔·卡普斯
Kapps, Eugen,	尤金·卡普斯
Karamzin, N.M.,	N.M.卡拉姆辛
Karotamm, Nikolai,	尼古拉·卡罗塔姆
Kasymov, Khan Kenesary,	克涅萨里·卡苏莫夫可汗
Kaufmann, General Konstantin,	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
Kazakhs,	哈萨克人

Kelles-Krauz, Kazimierz,  
Khomeini, Ayatollah,  
Khrushchev, Nikita  
Khudozhnik i Rossiia,  
Kichko, T. K.,  
Kiev,  
Kievan Rus  
Kirchensteins, August,  
Kirichenko, Alexei,  
Kishiev, Kunta Haji,  
Kline, George,  
Kochetov, Vsevolod  
Kogan,  
Kolesnikov, Iu.,  
Kommunist  
Kontinent,  
Korostovtsev, Academician,  
Kostomarov, Mykola,  
Kosygin, Aleksei,  
Kovalev, Sergey,  
Kozhinov, Vadim,  
Krejci, Jaroslav,  
Kubilinskas, Kostas,  
Kukk, Juri,  
Kuleshov, Vladimir,  
Kulikovo Field,  
Kundera, Milan,  
Kuznetsov, Feliks,

卡齐米尔兹·凯勒斯-克劳兹  
阿纳托利·霍梅尼  
尼基塔·赫鲁晓夫  
《艺术家与俄罗斯》  
T.K.基奇科  
基辅  
基辅罗斯  
奥古斯特·基尔肯施泰因斯  
阿列克谢·基里琴科  
库恩塔·哈吉·基希耶夫  
乔治·克兰  
弗谢沃罗德·科切托夫  
科甘  
尤·科列斯尼科夫  
《共产主义》杂志(苏)  
《大陆》季刊(法)  
科罗斯托夫采夫院士  
马科拉·科斯特马罗夫  
阿列克谢·柯西金  
谢尔盖·科瓦列夫  
瓦季姆·科日诺夫  
雅罗斯拉夫·克列伊奇  
科斯塔斯·库比林斯卡斯  
朱里·库克  
弗拉基米尔·库利绍夫  
库里科沃旷野  
米兰·昆德拉  
费利科斯·库兹涅佐夫

## L

Labor distribution,	劳动力分配
Lacis, Vilis,	维利斯·拉西斯
Landa, Mal'va,	马尔瓦·兰达
Language Policies,	语言政策
Ļanshchikov, Anatoli,	阿纳托利·兰希科夫
Latvia,	拉脱维亚
Latvian Independence Move- ment,	拉脱维亚独立运动
Lebedev, Vasily,	瓦西里·列别杰夫
Lefortovo prison,	列福尔托沃监狱
Lenin,	列宁
Leningrad,	列宁格勒
Leonas, Petras,	彼得拉什·列昂纳斯
Leonov, Leonid,	列昂尼德·列昂诺夫
Letter to the Soviet Leaders,	《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
Letters from the Russian Museum,	《俄罗斯博物馆信札》
Levin, F.,	F·莱温
Lezhnev, Isaiah,	艾塞亚·列日涅夫
Life expectancy,	估计寿命
Lithuania,	立陶宛
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 (LAF),	立陶宛活动分子阵线
Lithuanian Helsinki Group (1976),	立陶宛赫尔辛基组织(1976)

Lithuan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立陶宛临时政府
Living standards,	生活水平
Lobanov, M.,	M.洛巴诺夫
Lumumba University,	卢穆巴大学
Luxemburgists,	卢森堡主义者
Lypynsky, Viacheslav,	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

## M

Maarjamaa,	马加玛(运动)
Maksim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
Markulis, Juozas,	朱奥泽斯·马库利斯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saryk, Thomas G.,	托马斯G·马萨里克
Medvedev, Roy,	罗伊·梅德韦杰夫
Mehnert, Klaus,	克劳斯·梅纳特
Melnikov, Leonid,	列昂纳德·麦利尼科夫
Mensh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门绍夫
Merkulov, Commissar,	梅尔库洛夫人民委员
Meskauskienè,	梅斯考斯金纳
Mikhalkov-Konchalovsky,	安德列·米哈尔科夫—孔恰洛夫
Andrei,	斯基
Mikhoels, Solomon,	所罗门·米克赫尔斯
Minority nationalism,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Mirasism,	“遗产继承主义”
Misiunas, R.,	R.米西乌纳斯

Missionary Congress of Kazan	喀山传教士会议 (1913年)
(1913),	
Mitaev, Sheikh Ali,	阿里·米塔耶夫教长
Mixed marriages,	通婚
Mladorossy,	“青年俄罗斯人”
Mohammed of Balakhany,	巴拉哈尼的穆罕默德教长
Sheikh,	
Moldavians,	摩尔达维亚人
Molodaia gvardiia,	《青年近卫军》杂志 (苏联)
Molotov-Ribbentrop Pact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1939),	(1939年)
Molotov, V.M.,	V.M. 莫洛托夫
Mongols,	蒙古人
Mortality rate,	死亡率
Moscow,	莫斯科
Moscow Does Not Believe in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Tears,	
Moscow Human Rights Com-	莫斯科人权委员会
mittee,	
Moskva,	《莫斯科》文学月刊 (苏联)
Mtskheta,	姆茨赫塔
Muscovy,	莫斯科公园
Muslims,	穆斯林人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 N

Napoleon,	拿破仑
-----------	-----

Narod,	人民
Nash sovremennik,	《我们同时代人》杂志(苏)
National Bolshevism,	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N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民族一体化政策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tionalities issue,	民族问题
Nazis,	纳粹
Nekipelov, Viktor,	维克多·涅基佩洛夫
Neo-Stalinists,	新斯大林主义者
NEP,	新经济政策
Nesterov, Fedor,	费奥多尔·涅斯捷洛夫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I,	尼古拉二世
Nikonov, Anatol,	阿纳托尔·尼科诺夫
NKVD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	恩克沃德(内务人民委员部)
Novyi mir	《新世界》杂志

## 0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Ogonek,	《星火》画报(苏)
Ogorodnik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奥戈罗德尼科夫
Ogurtsov, Igor,	伊格尔·奥古尔佐夫
Oktiabr',	《十月》月刊(苏)
OKW (High Command of the Armed Forces),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德)
On Soviet Democracy,	《论苏联民主》

- “On the National Pride of the Great Russians” , 《论大俄罗斯民族自豪》
-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onumen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关于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迹》的法令
- “On Values, Relative and Eternal,” 《论相对的和永恒的价值》
- Organization for Latvia's Independence, 拉脱维亚独立组织
- Osip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
- Osipova, Tatyana, 塔季扬娜·奥西波娃
- O Ukraine, Our Soviet Land, 《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
- Ozolins, K., K.奥佐林斯
- 
- Pact of Mutual Assistance, 《互助条约》
- Pakarklis, Povilas, 波维拉斯·巴卡克里斯
- Paleckis, Justas, 贾斯塔斯·帕莱基斯
- Pall-all, Eduard, 爱德华·帕尔—奥尔
- Paradjanov, Sergei, 谢尔盖·帕拉贾诺夫
-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 Pas Sovietica, 苏联统治下的和平
- Peace of Tilsit (1807) 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
- Pechenev, Vadim, 瓦季姆·佩切涅夫
- Pelse, Arvids, 阿维兹·佩尔舍
- Pereiaslavl, agreement of (1654) 勃拉茨拉夫协定(1654年)

Perevédentsev, V.I.,	V.I.佩列韦登采夫
Pestel, Pavel,	巴威尔·比斯杰尔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Petkus, Viktoras,	维克托拉斯·佩特库斯
Pinskis, A.,	A.平斯基斯
Pipes, Richard,	理查德·派普斯
Plechavicius, Povilas,	波维拉兹·普莱哈维西乌斯
Plyushch, Leonid,	列昂纳德·普柳希
Pokrovsky, Mikhail,	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
Pokshishévsky, V.V.,	V.V.波克希舍夫斯基
Poland,	波兰
Ponomarev, Boris,	鲍里斯·波诺马廖夫
Populist Party (Liaudininkai)	民粹党
Poresh,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波列什
Prague,	布拉格
“Prague Spring” (1968)	“布拉格之春” (1968年)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Program of the Democrats of Russia, the Ukraine, and the Baltic Lands,”	“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民主主义者方案”
Proletariat,	无产者
Proskurin, Petr,	彼得·普罗斯库林
Protestantism,	新教
Pseudo-Slavophiles,	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
Pseudo-Slavophilism,	伪斯拉夫文化优越论
Pugachev, Emilian,	埃米利安·普加乔夫
Pushkin, Aleksandr,	亚历山大·普希金



## R

- Radianska Ukraina, 《乌克兰光辉报》(苏)  
 Rapprochement, 接近  
 Rasputin, Valentin, 瓦连京·拉斯普京  
 Razin, Stefan, 斯特凡·拉辛  
 Russian Orthodoxy, 俄罗斯东正教  
 "Repentance and Self-Limitation in the Life of Nations," 《民族生活中的忏悔与自我限制》  
 Rogachev, P.M., P.M.罗加乔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RSFSR, 俄罗斯联邦  
 Rublev, Andrei, 安德烈·鲁布列夫  
 Ruskulis, A., A.鲁斯克库利斯  
 Rusov, Nikolai, 尼古拉·鲁索夫  
 Russell, Bertrand, 伯拉兰·拉塞尔  
 Russian empire, 俄罗斯帝国  
 Russianism, 俄罗斯主义  
 Russian language, 俄罗斯语言  
 Russian nationalism, 俄罗斯民族主义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俄罗斯东正教会  
 Russification, 俄罗斯化  
 Russification or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Russkaia pravda, 《俄罗斯真理报》  
 Rutheina, 罗塞尼亚

Rybalka, I  
Rywkin, Michael,

L. 雷巴尔卡  
迈克尔·雷夫金

## S

St. Petersburg,  
Sakharov, Andrei,  
SALT-II proposals  
Samarin, Yuri,  
Sarmaitis, Romas  
Semanov, Sergei,  
Semenenko, Piotr,  
Semper, Johannes,  
Serdtsse rodiny,  
Sevrukas, Viktoras,  
Shafarevich, Igor,  
Shamil,  
Shcharansky, Anatoly,  
Shcherbakov, Alexander,  
Shcherbitsky, V.V.,  
Shelest, Piotr,  
Shepitko, Larissa,  
Sherling, Yuri,  
Shevardnadze, E.A.  
Shevchenko, Taras,  
Shimanov, Gennadi,  
Shubkin, Vladimir,  
Siberiade,

圣·彼得堡  
安德烈·萨哈罗夫  
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会谈的建议  
尤里·萨马林  
罗马斯·萨尔迈蒂斯  
谢尔盖·谢马诺夫  
彼得·谢缅年科  
约翰尼斯·森珀  
《祖国的心脏》  
维克托拉斯·谢夫鲁卡斯  
伊戈尔·沙法列维奇  
沙米尔  
阿纳托利·夏兰斯基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V.V.谢尔比茨基  
彼得·谢列斯特  
拉里萨·谢皮特科  
尤里·谢林  
E.A.谢瓦尔德纳泽  
塔拉斯·舍甫琴柯  
根纳基·希玛诺夫  
弗拉基米尔·舒布金  
《西伯利亚人》

Silmale, Marija,	迈贾·西尔玛列
Skirpa, Colonel Kazys,	卡齐斯·斯克伊尔帕上校
Slansky trial,	斯兰斯基审判
Slavophiles,	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
“Slovo natsii,”	《民族开始说话》
Snieckus, A.,	安·斯涅奇库斯
Social Fund in Aid of Political Prisoners,	资助政治犯社会基金
“Socialism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社会主义与文化遗产》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
Sokolov, Vadim,	瓦季姆·索科洛夫
Solchanyk, Roman,	罗曼·索尔查尼克
Solomentsev, Mikhail,	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
Soloukh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
Solzhenitsyn, Alexander,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Sovetskaia Rossiia,	《苏维埃俄罗斯报》
Soviet civil rights movement,	苏联民权运动
Soviet Ministry of Culture,	苏联文化部
Soviet Muslims,	苏联穆斯林人
Soviet patriotism,	苏维埃爱国主义
Soviet Peace Committee,	苏联和平委员会
Soviet Russian nationalism,	苏维埃俄罗斯民族主义
Soviet-Yugoslav conflict,	苏联—南斯拉夫冲突, 苏南冲突
Spada, Vittorio,	维托里奥·斯帕达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Strategic Rocket Forces Day,	战略火箭部队日

Struve, Peter,	彼得·施特鲁韦
Sufism,	泛神论神秘主义, 苏菲教
Suslov, M.A.,	M.A. 苏斯洛夫
Svarinskas, Father Alfonsas,	阿尔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
Sverdlin, M.A.,	M.A. 斯维尔德林

## T

Tadzhiks,	塔吉克人
Taagepera, R.,	R. 塔格佩拉
Tamkevicius, Father Sigitas	西基塔斯·塔姆克维秋斯神父
Tarkovsky, Andrei,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Tashkent Islamic conference (1980),	塔什干伊斯兰会议
Tashkent recommendations,	塔什干建议
Tatars,	鞑靼人
Temrukova, Maria,	玛丽亚·泰姆鲁科夫娜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Tikhonov, Nikolai,	尼古拉·吉洪诺夫
Timur (Tamerlane),	帖木尔
Titular nationalities,	以民族名称命名共和国名称的民族 (命名民族)
Transfer society,	转让社会
Trotsky, Leon,	列昂·托洛茨基
“Turkestan” socialism,	“土耳其斯坦”社会主义
Turkmen,	土库曼
Turko-Muslim population,	突厥—穆斯林人口
Tverdokhlebov, Andrei,	安德烈·特韦尔多赫列博夫

**Tvardovsky, Aleksandr,**

亚历山大·特韦尔多夫斯基

## U

Ukraine,

乌克兰

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乌克兰科学院

Ukraino nasha radians'ka,

《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

Ulam, Adam,

亚当·乌兰

Union of Soviet Writers,

苏联作家协会

Union of Soviet Artists,

苏联艺术家协会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国新闻署

Urbanization,

城市化

USSR,

苏联

Ussuri River

乌苏里江

Ustrialov, Nikolai,

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

Uvarov, Count S.S.,

乌瓦洛夫伯爵

Uzbeks,

乌兹别克

## V

Vares-Barbarus, Johannes,

约翰尼斯·瓦列斯—巴尔巴鲁斯

Vasileva, A,

A.瓦西列娃

Veche,

《市民会议》杂志(苏)

Veimer, Arnold

阿诺尔德·魏莫

Velikanova, Tatjana,

塔季扬娜·温克洛娃

Velimsky, Viteslav,	维捷斯拉夫·韦利明斯基
Venclova, Antanas,	安塔纳斯·温克洛瓦
Venclova, Tomas,	托马斯·温克洛瓦
Village writers,	乡土作家
Vishinsky, A. Ya.,	阿·亚·维辛斯基
Vitkauskas, General Vincas,	文卡斯·维特考斯卡斯将军
Vladimir Prison,	弗拉基米尔监狱
Voldemaras, Augustinas,	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
Volkov, Oleg,	奥列格·沃尔科夫
VOOPIK (All-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全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协会
VSKHSON,	全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协会

## W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West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1918-1919)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1918-1919)
White key Brotherhood.	白钥匙兄弟会
White Russians	白俄罗斯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 Y

Yakhimovichs, IVan,	伊万·雅克希莫维奇斯
---------------------	------------

Yakovlev, Alexander,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Yan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亚诺夫
Yavorsky, Matvii,	马特维·亚沃尔斯基
Yvtushenko, Yevgeny,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Yung Russians	青年俄罗斯人
Ygoslavia	南斯拉夫
Yulaev, Salavat,	萨拉瓦特·尤列叶夫

## Z

Zemlia,	《土地》杂志(苏)
Zenklys, T.	T.任克利斯
Zhdanov, A.A.,	A.A.日丹诺夫
Zhukov, Yuri,	尤里·茹科夫
Zinoviev, Alexander,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